大国寡民

小引　血腥的风

惊怵和恐怖笼罩了这天的凌晨：1997 年 5 月 29 日，正奉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和陕西省高级法院之命，起草烽火村硫酸毁容毁身案复查报告的咸阳市中级法院院长任维突然车祸死亡——1996 年 10 月 20 日，说客摸进受害者武芳的隐居地，开价 10 万让她闭嘴，被严辞拒绝——1996 年 12 月 9 日傍晚，两个烽火村民闯进武芳娘家，威胁武母，武母恐惧，服药自杀，被救生还——1997 年 3 月，全国人大、最高法院、公安部干预未果——1997 年 6 月 1 日，警方传唤暴力威胁武母恶徒，被围攻殴打，派出所所长重伤住院——1997 年 6 月 2 日，县政协委员被揪游街，家被打砸——1997 年 5 月 8 日，行使监督权利的报社和作者被送上被告席。

一

"任维死了!"

"什么？任维死了!"我不相信。

"怎么死的？"我问道。

"车祸。"对方说。

"什么时间？"

"前天"

"在什么地方？"

“乾县回咸阳的路上。312 国道。”

“车上有几个人？”

“连司机四个。”

“其他人呢？”

“司机舌头咬断，其他两个人重伤住院，任维当场死亡。”

“谋杀还是事故？”

“正在调查。”

陕西吹来的风带着血腥的气味。

北京，1997 年 5 月 30 日。急促的电话铃声。

惊怵和恐惧突然间笼罩了不明不白的凌晨。

消息来得太突然，而且模棱两可。放下电话，睡意早已惊得无影无踪。

二十多天前，他还坐在我们面前。他身材魁梧，黑方脸，不苟言笑，谨慎、矜持、严肃的语气中饱含着凌厉和愤怒——“如果证据确凿，我绝不会手软!”——“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这位陕西咸阳市中级法院院长，1988 年 4 月 26 日礼泉县烽火村发生的惨绝人寰的特大硫酸毁容毁身案的重要知情者，深知此案二年不决、至今尚有嫌疑犯漏网的猫儿腻和背景。咸阳市中级法院是此案的原审法院。我近一年来追踪此案，他多次接受我的访问，实事求是地介绍情况，允许我查阅案件卷宗，让我获

得了大量的证据材料。他是这起硫酸毁容毁身案及九年来稀奇占怪现象的重要证人。更重要的是，目前他正遵奉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和省高级法院之命，复查此案，起草报告，而且断定“案件的的确确有问题。”我们把这份报告叫做“任维报告”。这个节骨眼儿上出车祸，巧得让人难以置信，巧得让人目瞪口呆。第一反应:“是不是谋杀？”第二反应:“或者是事故？纯属巧合？”

但愿是事故，一场与本案毫无关系的事故。闲绕着硫酸毁容毁身案的大较量已历时一年整，我们不希望这场大较量再继续流血，不希望我们的对手再采取极端的手段。烽火村硫酸毁容毁身案沉睡八年后被媒体揭露，“任维报告”无疑是这起重大案件复查进入司法程序的突破口。任维突然去世，这个突破口是否关闭？所有努力是否前功尽弃？都是未知数。前景茫然。我们好几天沉浸在忧伤和郁闷的情绪里。

6 月 4 日，我们从北京赶到出事的现场。

由西往东，再走十几公里便是咸阳。咸阳，六朝古都，居九?山之南，渭河之北，“山水俱阳，故名咸阳”。咸阳，阳光之城，阳光普照，阳光灿烂。任维回到咸阳，便回到了家；回到家，便回到了光明的怀抱里了。这个北京汉子把他的后半生都托付给了咸阳。咫尺之遥，伸手就能够着，却永远够不着。阳光黯淡了，阳光永远离他而去……

宽阔的陕甘 312 国遭，能并排走四五辆大卡车，没有树

等障碍物，矮坡坎，由近而远一望无际的麦地。太阳当头曝晒，麦子等待开镰，田野里膨胀着不祥的气氛。走到这里来，没有收获，没有喜悦，只有恐怖，只有不耐烦。走到这里来，我们感到了季节的混乱，不知道是走进了谋杀的季节，还是走进了事故的季节。无论是谋杀还是事故，都让人感到冥冥中有一种力量左右着天平的倾斜，左右着轨迹的走向，让人们不寒而栗。

社会反应，无非是三种，一是幸灾乐祸和诅咒，二是惊悸和恐惧，三是巨大的遗憾和悲痛。一位陕西人用陕西话学着“诅咒”，那种轻描淡写的恶狠狠，铭心刻骨，仿佛能摧毁任何信念。惊悸和恐惧也在预料之中。一些证人可能后悔，可能变卦；一些尚有些许良知的知情者可能踌躇不前，可能转变立场，可能永远闭嘴，甚至可能在威慑下与恶势力合作。所有因此而产生的怯懦和软弱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没有理由责怪他们。他们存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我们不能对他们有更高的要求，如果有更高的要求会显得不人道。面临压力，面临威胁，他们唯一的选择，可能就是沉默和等待。他们本来就面对的是一件令人惊悸和恐惧的案件，本来就生活在惊悸和恐惧的氛围中间，本来就面对着血淋淋的事实和巨大的邪恶势力，何况烽火村硫酸毁容毁身案去年 8 月揭露后，这样的惊悸和恐惧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996 年 10 月 20 日上午十时许，陕西韩城。

一辆摘了前后车牌的“桑塔纳”悄悄摸进了韩城下峪口。

武芳一凛。八年前，一股邪恶而强大的势力把武芳这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变成了“鬼”———瓶浓硫酸毁了她乌黑的头发，毁了她明亮的眼睛，毁了她美丽的脸庞，毁了她哺育过生命的乳房……那年，她整30岁，而立之年，是一个六岁女孩的母亲。可是一瓶浓硫酸毁了她的青春年华，毁了她对新生活的追求和希望，毁了她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女人的一切。——殴打者有之，倒硫酸者有之，压胳膊压腿者有之，脱衣服脱裤子脱鞋者有之，用手往身上抹硫酸者有之；怂恿者有之，围观者有之，包庇罪犯者有之，询私在法者有之，为虎作帐者有之，麻木不仁者有之……犯罪手段之残忍、愚昧，旷世未闻！怂恿者、围观者心态之丑陋，不亚于罪犯！包庇者询私在法者之肆无忌惮，不可思议！也正是这个邪恶而强大的势力徇私枉法，包庇罪犯，置生灵涂炭而不顾，置法律公道而不顾，案件三年拖而不决，八年喊冤不已……1992年后，她在礼泉活不下去，背井离乡，隐居韩城，继续控告漏网嫌疑犯。然而他们找到了她。他们的出现，分明是告诉她，她永远躲不开邪恶阴影的笼罩，永远生活在恐惧之中。她注视着他们，暗想：“他们怎么知道我住的地方？”他们是烽火村的说客。他们拐弯抹角打听到了她的隐居地。他们要堵她的！

“你咋这时候弄（口外）（注：‘(口外)’，关中方言，

这里是‘那’、‘那个’的意思）案子呢？”来人问。

“我一直就告得没停。”武芳说。

“你娃咧啥咧的，咱亲戚都在北屯，离烽火又那么近，告啥呢？不怕把你娘家咋了？”来人劝道。

奉劝里带着威胁，背后显然有指使者。

“我不想连累任何人。我告状伸冤哩！我怕啥？我都是死过好几回的人了!”武芳说。

“你不要乱填你的名字，牵涉到政治里面去，到时候拉不离手。”

“我不怕！我对我说的话负责。我说的都是事实。不是精脊背上插柳棍——给人搁事哩!”

“你还是那么直哩犟哩！你现在打官司为啥？”

“当年那么多经济损失没赔偿一点。”

“能花多少钱？”

“3 万多。”

“现在给你 10 万行不？”

“10 万？当年（1988 年毁容毁身后）住院动手术，我父母去找王保京（当时的咸阳市副市长兼烽火村党总支书记）要 500 元钱都不给，现在就是给我 100 万也晚了!”

武芳软硬不吃，来人面面相觑，一面嘱咐:“不要向任何人说我们来过”，一面讪讪出门。

烽火村并没善罢甘休。他们很清楚，武芳存在一天，他

们的威胁就存在一天；武芳只要活着张口，他们就永远胆寒肝颤。

软的不吃，便来硬的。

二

1996 年 12 月 9 日傍晚，两个精壮汉子摸进了陕西礼泉县北屯乡北二村，直扑武芳娘家。

武母董金香把炕烧毕，刚出大门，一个三四十岁、胡子拉碴的瘦黄汉子便逼上来，满嘴喷着酒气问:“你得是武芳她妈？”

“是的。”

“武芳在哪里？”

“你问这干啥？”

“你跟武芳说，把状子抽了。不抽，谁沾谁死!”

“你在胡弄哩！这是在中国哩!”

“你个老皮！你该入得土了哩!”

黄瘦汉子上来当胸一拳，将武母打倒在门槛上。

他疯狂地喊着:“你该入得土哩！你该入得土哩!”

武母大叫:“你咋这恶哩!”接着嚷了起来:“打人哩!……打人哩!……”

武芳兄弟闻声出来。瘦黄汉子又逼上去，抓住武芳兄弟的手，说道:“兄弟，我给你说，叫武芳把状子抽了。这事，谁沾谁死！再这样下去，绝没有好下场!”

武母吃不住惊吓，两天不进茶饭，害怕“人家啥时候再来。”老人想忘掉那段家破人亡的事儿。她和老伴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他们武家是“外乡人”，一辈子谨小慎微，担惊受怕，想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但是“人家”不让。老人由恐惧而绝望，喝药自杀，被抢救生还。经查，瘦黄汉子叫王爱社，又名王炳军，烽火村村民。

三

1996 年 12 月 13 日，管辖北二村的赵镇派出所的公安干警到烽火村对王爱社进行治安传唤，遭到一些人的拦阻。他们辱骂公安干警，撕扯警徽警衔警服，拦阻警车，致使王爱社逃匿，半年没有音讯。

1997 年 6 月 1 日晚 8 点半，赵镇派出所所长刘志权带领五名公安干警到烽火村传唤王爱社，结果被几十名烽火村民打得落花流水，鸣枪示警无效。警车被扣，有的干警押解王爱社先走，有的干警落荒而逃。刘志权外警服被抢，内警服被撕烂，警衔被撕掉，本人被打成重伤住院。县医院诊断:“1、轻度颅脑损伤，左额部、枕部头皮血肿: 2、左面部、左大腿多处裂伤; 3、阴囊挫伤。”

6 月 4 日，我们见到了重伤住院的刘志权。

他头重脚轻，走路需要搀扶，说话有气无力，断断续续,感觉“口干，舌燥，胸闷，气短，头上一堆包，头痛得很，眼睛怕光，身体虚弱，畏寒”。他和其他在场的公安干警说:

6月1日星期天，他在所里值班，研究部署一些急案，争取在忙前（注：“忙前”，关中方言，指麦收前）解决。考虑到烽火村王爱社私闯民宅，威胁老人，造成严重后果，王爱社外逃，案子拖了近六个月，口头传唤几十次，传唤证也发过两次，决定去王家。到王家后，问王妻：“王爱社在不在？”王妻答：“不在。”不信，公安干警四处寻找，发现王在里屋一间房子里，门插着。他喊话：“王爱社，你把门打开，我们是赵镇派出所的，找你谈个事。”里面半个小时不开门，怕王从后窗逃跑，遂砸开门。王欲跑，反抗，他命令给王上手铐。王抡胳膊打中干警张海峰的左眼眶，一面反抗一面大声叫骂：“你们是土匪！我犯了啥法了？”此时，王妻在前屋打电话，打完电话，她反锁了外面大门，并高声喊叫：“土匪抓人哩!”里外相持一段时间后，门打开，门外已聚集了几十人。他亮出证件解释，把王弄进“伏尔加”警车。王大喊：“快把车挡住!”于是有人挡车，有人砸车。缠扯20分钟后，“伏尔加”开走。还剩下刘志权等三名干警。一个妇女过来，一把抓住刘志权的衣领，喝问：“你们抓人，为什么不跟大队干部打招呼？”他解释说：“我们是在执行公务，这在我们的职权范围内。”以往经验，一和大队干部打招呼，王爱社就溜了。这时，从西边工农业任厂长的烽火村水泥厂赶来十几个小伙子，手里拎着绳子，大叫：“不和村干部打招呼，就走不成!”

人越围越多。有人用砖头砸警车，有人撕警衔，有人抢走外警服，有人抓住刘志权的双手，让王爱社的孩子打他的眼睛，有人在后边用拳头用绳子打他的头。一个妇女一把抓住他的生殖器，疼得他往下坠，几次被打倒在地，这些人上来踢踩他的胸部。有人高喊：“把他砸死!”他掏出枪来，朝天鸣枪示警。这些人有恃无恐，毫不在乎，继续殴打。经同去的两个便衣干警营救突围，四散跑开。

刘志权哭了，哭得很伤心。他说：“我是教师出身，1988年9月开始干公安，在两个派出所当过所长，一向文明执法，从未打过人，连态度都很少发。我在公安部门干了快十年，曾经为制伏三个罪犯，被刀扎伤，也未流过眼泪。没想到在烽火村，在这个先进村文明村，这些人竟下这么狠的手。我感到不可理解。我突围后，跑啊跑，穿过苹果地，穿过庄稼地，一口气跑了半个多小时，跑到了径河边。”

他全身都跑软了，停下来，才感觉到被暴徒殴打的疼痛。他躺在地上，望着星空，听着径河的流水，百思不得其解。他哭了，放声大哭。

这还不算完。

烽火村——一些人还怀疑县政协委员、原烽火村党总支副书记王行兴是“王爱社回家”的举报人，对他家停水，断电，剪断电话线；6月2日，闯进王行兴家打砸，用钉耙砸烂大门，破门而入，王妻劝阻，右胳膊被扭伤。还揪着王行

兴的领口游街，大喊“大家都来看！这就是咱村里的瞎种！叛徒！卖国贼!”还说:“你赶黑给我把人放不回来，我就要放你的血，跟你没完没了地弄个没完!”

四

1997 年 5 月 8 日，西安。天气阴沉，没有太阳。

人们像是赶集一般涌进西安中级法院这间只能装三四十人的法庭。乱哄哄，闹哄哄，大多是烽火村来壮声势的庄稼汉子。窗子上坐着人，墙边墙角过道上站着人，大门口拥挤着人，走廊上蹲着坐着游走着人。

这是个“庄严”的场合——“法律”明镜高悬。

舆论监督陷入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局面。陕西司法机构在一些权势者的左右下，引导事件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不仅不去调查硫酸毁客毁身案的漏网嫌疑人和徇私在法者，反而把将案件公开曝光的《中国青年报》和作者卢跃刚以“名誉侵权”送上了法庭。

更加蹊跷的是，受理“名誉侵权”案的一审法院，既不是侵权行为结果地（即原告所在地咸阳或礼泉），也不是侵权行为发生地（即被告住所地北京），而是在毫不相干的第三地——西安。

精修法律的朋友告诉我“面对法律你只有虔诚，你必须虔诚。因为法律的本质是信念。”

你不是大声疾呼法制么？你不是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

么？你看，“法律”冲你走过来了。我不知道是法律的尴尬还是我的尴尬。

任维生前告诫我们:“他们来调查，有明显的偏向。你们要注意。”

难道他在暗示，我们面临的“法律”是私下交易和幕后操纵的脆弱形式?

我坐在被告席上。武芳坐在台下旁听席里，离我只有几米远的地方。这位与我同年同月生的农村妇女今天作为“证人”出庭。

1958年8月我出生十几天后,武芳便开始了苦难的人生。她的家庭贫穷，她的父母早早地把她许配给了富裕的邻村烽火村。她反抗过包办婚姻，然而失败了。她毫不气馁，继续反抗。这次反抗，导致了惨绝人寰的结果。她由“人”变成了“鬼”，或者是人不人，鬼不鬼。她顽强地活了下来。在“文明村”，一群恶棍用浓硫酸毁了她的面容，毁了她的身体，却没毁灭她的意志。她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身心痛苦,忍受着权势嚣张、法律软弱的现实，楔而不舍地努力，三年告状不辍，把首要罪犯送进了地狱。她认为，这还不够，还有嫌疑人漏网。一直到今天，她还在继续控告，还在继续向社会追问良知，寻求正义，讨回公道。

“法律”看人说话。武芳的指控被拒之门外，却把揭露案件内幕、为武芳伸冤的报社和作者以:“名誉侵权”优先

送上了法庭。

什么叫“有恃无恐”？什么叫“寡廉鲜耻”？没有比这更荒唐更可耻的场面了。造了天大的孽，作了天大的恶事，还那么人模人样坦然地坐在原告席上。

要感谢陕西无形而强大的势力给我们这次机会，让我们来到“法律”面前，认识“有恃无恐”和“寡廉鲜耻”，认识陕西有些人的黑与白、是与非，感受“废都”的扑朔迷离和乾坤倒转。要感谢这股势力给予我们一次近距离观察，“法律”怎样被权势者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机会，观察陕西执法机关的“高效率”。

这种两重天的场面让我们大长见识：一重天里，民女武芳在陕西告状不已，哭干了眼泪，跪破了膝盖，八年里喊冤声声声震耳，求助法律，求助公道，谁问谁管？

不是八天八月，而是整整八年！她却讨不回来一个公道！

对待武芳案，法律出奇的迟钝，出奇的冷漠；人心出奇的迟钝，出奇的冷漠。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但在陕西，这话不管用！一些权势者的心肠是铜浇铁铸的心肠，是南极北极的坚冰，是昆仑山上千古不变的顽石。

再看看另外一重天吧。1997 年 3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八届五次会议《信访快讯》以“一起特大毁容案的凶手为何逍遥法外”为标题，全文刊登了武芳的控诉信。“编者提要”写道：“陕西礼泉县北屯乡北二村妇女给大会来信，控告其

夫王茂新与村干部多人合谋，于1988年4月26日将她骗至家（注：应该是骗回村）中，按倒在地，向其面部、腹部、腿部泼倒硫酸，致其颅骨外露，左眼失明，右耳缺损，烧伤面积达23%，经五次手术，才有幸脱险。这样一起特大残忍的毁容案，只是因为村干部王农业的父亲是咸阳市的副市长，拖了三年才对首犯主犯作了判决，而在这位副市长的包庇下，共同实施犯罪的村干部王农业等人，至今逍遥法外。为此《中国青年报》和《中国社会报》分别以‘蹊跷的特大毁容案’、‘特大毁容案的背后’为题，作了详细披露。来信要求人大为她伸张正义，洗血沉冤。”中央政法委书记任建新、中纪委副书记侯宗宾、公安部长陶驷驹等专就此案作出批示，要求陕西认真调查，依法处理。面对武芳控诉，面对舆论监督，面对人大监督，面对各级领导人的批示，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呢？

五

1997年5月8日。西安中级法院。

“起立，审判长入庭!”

“证人武芳出庭!”

一

被浓硫酸毁容毁身的武芳能活着，便是一个奇迹。她能从黄河岸边一个隐居了六年的偏僻地方勇敢地走出来，面对众目睽睽，面对法庭，便是奇迹。她不能回忆以往九年的生

活，谁要是引起话题，她就会语无伦次，哀号涕泗，几近癫狂。在她看来，命运最残忍的不是让她去死，而是让她活着，人不人鬼不鬼地活着！“天哪，他们当时为什么不把我一刀杀了啊!”武芳喊道。她不能见人，完全丧失了独立生活的能力，昼伏夜行。几年时间里，她在娘家、两个姐姐家、妹妹家轮换着住，苟且度日。想妈的时候，白天不敢出去，等天黑了，才悄悄地赶回家见妈一面。她虽然活着，却不能跟所有活着的人一样，生活在光明的世界里。她把自己关在黑屋子里。她看不见春天里白杨树绽出的嫩芽，看不见娘家院子里鲜红的石榴花。那棵长了几十年的石榴树。打小的时候，她给它浇水，盼它开花，盼它结果。摘下一朵石榴花，插进少女的辫子，乌黑的头发，鲜红的石榴花，泛出多少青春的醉意。好大的石榴！一掰开，两张红扑扑的笑脸。父亲祖籍临潼。临潼特产石榴。父亲移来了石榴种。大的石榴，有七八两重！满枝的石榴果，压驼了石榴树。——着实惹人爱，惹人疼。春风吹来，挠得心直痒痒。她和伙伴们剪窗花，织毛线，东家的女婿，西家的媳妇，期盼着嫁个好人家，生个胖娃娃。在所有的伙伴中，她无疑最出色最优秀，可是命运最悲惨。如今伙伴们都在哪儿？她多想跟她们说会儿话啊。下雪了！满眼都是白茫茫干净纯洁。妇女队长武芳和姑娘们在雪地里修渠整地，挑土拉肥，红头巾、大辫子在风雪中飞舞……灿烂，明媚，美好的憧憬，都变成了记忆，都变成了

一场梦，一场支离破碎的梦。她的生活，黑白颠倒。她只能在黑夜里行走。人们偶尔能在黑夜里看见武芳的影子。她既存在，又不存在；既是人，又是魂；既是实体，又是虚无。故事发生了，天长日久，渐渐被人淡忘了。故事渐渐遥远了，渐渐变成了与人们的生活不相干的传说。一个孤魂，一个虚无，与星星和月亮为伴儿，在礼泉的土地上徘徊，游荡。如同《聊斋志异》中的冤鬼，对白天出奇地敏感，黑夜才是她安全的家园。她在妹妹家住着，不准开大门。谁要是开门，她便会疯狂地扑过去，把门关上，插上。她大声嚷嚷：

“不要开门！”

“姐，不开门，从哪里进出哩？”妹妹说。

“我不管！我不管！”

“不让开门，要门作啥！”妹妹生气了，“门不要了！这不是人过的日子！咱把门堵上，墙边掏个洞，像狗一样进出哩？”

妹妹说着就要拿柴刀砍门。

武芳见妹妹真的要去砍门，又赶紧上前拉住妹妹的手：“妹子，都是姐不好。你别砍门。你砍姐！你砍姐！”

门也不能砍，姐也不能砍，妹妹扔了柴刀，姐俩抱着痛哭。一家人跟着哭。

父母内疚把武芳嫁给了烽火村，姐姐后悔当初听信村干部的话，把妹妹留在烽火接待站。如果那天把妹妹带回家，

就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了。虽然风传王家要对武芳下毒手，怎么也不相信。青天白日下，他们敢？他们再坏，也不至于那么坏，不至于那么没有人性。结果就是那么坏，就是那么凶残，就是那么没有人性。硫酸毁容后，心理伤害远远大于生理伤害。武芳喜怒无常，情绪捉摸不定，把姐妹们的生活全搅乱了。农村生活，一个钉子一个铆，维持下来已属不易，加上一个不能正常生活的病人，长期住在姐妹家里，更是难上加难。灾难不仅仅是武芳的，也是武氏全家的。

武芳出院后，已是残废。没钱住院，烧伤治疗也不彻底，在医院节医缩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头部伤口六七年不能痊愈，颅骨暴露，流血流脓，恶臭无比。眼睛直至今天炎症不消，眼泪管不住，总是无名地流，永远是哭的模样。右手肌腱烧毁，不能弯曲，完全失去了功能。我与她握手，像是握着几根僵硬的钢筋。生活不能自理，烽火村自己的家回不去，回去也没人会照料她。在烽火人的眼里，她是个该死的坏女人，一个给烽火，“先进文明村”抹黑的罪人，一个追命索债的孽障。她要治病，吃饭，穿衣，告状，所有的费用必须父母姐妹硬扛着。然而，娘家本来就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家，姐妹们上有老，下有小，还要从口里省出来救助武芳。几个家庭不堪重负，几近破碎。“那可不是人过的日子啊。”母亲说。几个家庭为了武芳，都发生过严重的冲突和矛盾。母亲救女儿心切，没跟儿子商量，把家里的肥猪提前

卖了，断了一家的生计。儿子一生气，带着媳妇跑了。二姐夫是个好人，为了帮助武芳，他去信用社贷款，拉石头挣钱，帮武芳写状子，带武芳去市里省里告状。可是好人命短，二姐夫积劳成疾，不久去世。姐姐家妹妹家吵嘴打架赌气闹矛盾，武芳都看在了眼里。她本来自尊心强，现在更是敏感，甚至过敏。看见人家的脸色稍有不对，不管是不是为她，转身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吃不喝不睡觉，任外面怎么喊怎么砸，就是不开门。这就难了，一个家庭怎么可能不磕磕碰碰，怎么可能不闹点矛盾拌两句嘴？“舌头和牙齿还要打架哩”，但是，她们理解武芳的处境。有困难背着她，生气背着她，闹矛盾背着她，总之，一切可能影响情绪的事情都背着她。可是，一个家就那么大点地方，不可能遮掩得那么严实。别说细枝末节的观察，光是在空气中，武芳就能闻出不自然的气氛来。她只能忍受，她必须活着，虽然她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地活着，虽然她活得窝囊，活得屈辱。妹妹家住久了换姐姐家，姐姐家住久了换妹妹家，来来回回住，以缓和矛盾，平衡自尊心。姐姐妹妹也不在意，走，任她走，来，任她来，大门都给她敞开着。“那阵子，我把姐妹们为难扎（注：‘扎’，关中方言，表示最严重程度的词）啦！把父母为难扎啦!”武芳说。

但是常年闷在家里不是个事儿。姐妹们劝她，“芳，出去走走。好人都会闷出病来。”武芳终于迈出了门槛儿。这

是白天！阳光灿烂的白天！

黑夜的武芳，刹那间变成了白天的武芳。

黑夜与白天，在大地高山的尽头，只有一线之隔。

从黑夜走向白天，却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受了那么多的折磨。

她走在了路上。

土地是这么的坚实，这么的熟悉。

天空是这么的宽阔，这么的深邃。

阳光是这么的欢喜，这么的温暖。

风儿在拍打着她的脸颊。

她情不自禁地迎着风……她还像原来那样去梳理自己的头发……头发？头发!……一阵惊悸……

“我”又回到了人间？“我”还是“我”？她怀疑着，确认着。

她在黑夜里行走，心里却渴望光明。

怎么？土坯的墙……青蓝的瓦……错落的村庄……来来往往的人……远方的树……园子里的苹果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朦朦胧胧？她的眼睛已近失明。硫酸已经把清晰和明亮夺走了。夺走了！她的心情顿时黯然。现在的武芳毕竟不是原来的武芳了！“鬼来喽!……鬼来喽!……”一群不知世事的孩子包围了她，呼呼啦啦地喊叫着，若即若离地奔跑着。事情来得突然，武芳木木地呆在那里，一时不知所

措。不远处，有大人驻足观望，只是唏嘘感叹。“娃还活着哩。”“娃可怜哩。”“走！走！回家去！”大人喝叱驱赶着围观的孩子们。

“吓死人喽！……吓死人喽！……”孩子们呼啸而去。孩子们的动静渐远，武芳才回过神来。“啊！……”她一声怪叫，摇摇晃晃跑回家，“嘭”地关上门，放声大哭，直到哭得没了声音，气喘如丝。“我是鬼么？”她问自己。这个问题，让她毛骨悚然。

二

王亭！亭儿！九年不见，小碎娃，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王亭的身材脸蛋儿都长得像武芳年轻的时候，一个模子扒下来似的。她只为王家生了这么一个孩子。她给她喂奶，她给她扎小辫儿，她给她做衣服，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1988年后，武芳回不得烽火村，朝思暮想，婆家人也不让见孩子。现在烽火人把王亭弄到西安的法庭，大伯领着，一定要见法官。王亭显然是在背诵大人教的话：“武芳说的都是假话。她在撒谎。”烽火人导演着一出让女儿控诉母亲的丑剧，一出继续摧残人性和伤天害理的丑剧。他们在武芳流血的心上捅了一刀。他们在孩子的心上捅了一刀。他们不仅毁了母亲，还要毁了孩子！武芳没有想到她们母女会在这样的场合见面。

孩子啊，你怎么知道母亲说的是假话，是在撒谎？那时

你才六岁啊！你还分不清真假是非善恶啊！将来你也会长大，也会为人妻为人母啊！但是，武芳知道，王亭不来也得来。她是烽火村反击武芳控诉的一个筹码——即使在法理道义上占不了什么起首，也要在感情上对武芳进行重重的一击。其实受伤害最大的，恰恰是王亭。她六岁的时候，经历了人间最残忍最丑恶的一幕：她的父亲，她的叔叔，她的伯母，用浓硫酸毁了她母亲的容，毁了她母亲的身；父亲被枪毙，叔叔进大牢，母亲流落他乡。一个家庭，顷刻破碎。一个家庭，转眼间成了陌生人，成了仇人。今天，母女相见却不能相认，咫尺天涯！孩子的眼睛，看到了亲情被血淋淋地撕裂，看到了邪恶在无情地蔓延，看到了丑陋无比的人生。

天哪，这是谁作的孽呀！

三

1988 年 4 月 26 日下午。礼泉县烽火村。

三个年轻妇女惶惶而行。高个儿妇女面黑，大嗓门；矮个儿妇女面白，眼睛有些斜视；居中的妇女，一米六八的个头，身材窈窕，眉目清秀，年龄明显最小。她们满脸的气恼和惊恐，一面走一面商量着什么。只见那年龄小的妇女头发凌乱，脸上、衣服上都是灰尘，像是刚刚厮打过的样子。她眼睛红肿，脸色苍白，眉毛紧拧着。她门两个年龄稍大的妇女：“咱们去哪里呢？”

“去村接待站。”

“不行哩，接待站躲不住。我在那里住过两天哩。”

“去找村干部。村干部总不能不管。”

“管啥哩！骗我回来，就是他们的主意哩。”

“把事情弄出个结果才能离开烽火哩。”

“茂新追来打人咋办呢？”

“咋，把人吃了不成？村干部在，人多，他敢!”

“咋不敢……”

村里人看得明白，这三个年轻妇女是武氏三姐妹。小妹武芳是烽火村王茂新的媳妇，高个妇女是武芳的二姐武凤梅，矮个妇女是大姐武春梅。

两个姐姐一脸怒气。武家五个孩子，武芳排行第三，上面两个姐姐，下面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弟弟妹妹年龄小，不抵事，出了事当然是两个姐姐出面。

她们刚刚把武芳妹妹从野蛮的王家救出来。

武芳嫁到烽火村上家八年整，打打闹闹八年整，来来回回不知被两个姐姐救了多少回。老娘也为了武芳这桩不幸的婚姻担惊受怕，哭干了眼泪。这是命中注定的事。谁要武家穷呢？武家单户独姓，四个女儿，一个小儿子，农村里所有不利条件都被武家占全了——外乡人，男丁不旺。待人处事,察言观色，谨小慎微，生就一个穷命，生就一个受气的命。武芳十几岁不醒事的时候，便由父母做主许配给了烽火村的王茂新。武芳长大了，出落得亭亭玉立。她性格开朗，模样

好看，当过民兵排长，当过妇女队长，在村上可是数得着的姑娘。可是这一切没有让她改变命运。她实在不愿意嫁给“其貌不扬，窝窝囊囊”的王茂新。可是她又不得不嫁。老娘跟她翻脸了。娘说：“咋不嫁呢！用了王家那么多钱，不嫁，人家要还钱，拿啥还呢？你弟还小，把钱一还，将来说媳妇咋办呢？把你养那么大，不听话，没良心哩！你要是不嫁，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我就去跳泾河!”

老娘在武芳面前哭着闹着数落着。看着老实巴交苦了一辈子的父母，看着还没长大成人的弟弟——这个武家的根儿，看着这个穷家，武芳有多少话，有多少眼泪，都咽进了肚子里。闹啥呢，早晚是个“嫁”。认命吧!

“妈，你别说了。我嫁!”武芳把头别在一旁说。

她的眼泪再也憋不住了，顺着脸颊无尽地流。

1981 年，武芳 23 岁时嫁到了烽火村。

娘曾说：“烽火村是个先进模范村，富着哩，嫁过去不吃苦。”这种选择很实际。天下父母谁不盼望自己的孩子好？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往火坑里推？对于一个穷怕了的家庭，不吃苦，过上富裕的日子，是最高当然也是最理想的目标。什么般配不般配，感情不感情，这些东西都不能当饭吃；过上日子生个娃，自然都会好起来。能嫁到烽火村，算是你武芳的幸运了。

为了这个穷家，为了小弟弟续上武家的香火，为了那些

还不起的彩礼，为了过上好日子，武芳嫁给了王茂新。她过上了日子生了娃，却没有幸福起来，反而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家庭战争。武芳是个倔强的姑娘。她说，丈夫光是其貌不扬本本分分倒还罢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谁要她家穷、使了王家的钱呢？谁要她是个女人、女人命贱呢？可是丈夫“还有小偷小摸、赌博等不良习惯”，又屡劝不听。她绝望了。然后就是闹，然后就是打，然后就是跑，然后就是抓，然后就是抓回来又跑。闹，打，跑，抓，又跑。受欺负，受凌辱，成了武芳嫁到烽火村做王家媳妇的无限循环的生活内容。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她决心改变自己的命运。她提出了离婚要求。

离婚？这还了得！在当地农村看来，女方提出离婚，是个伤风败俗的事情，是个见不得人的事情，是个大家都没面子的事情。更何况是在威势一方、光芒万丈的烽火村？她的离婚要求不仅受到了婆家的反对，也受到了娘家的反对。婆家反对，烽火村不开离婚证明，不开离婚证明，就办不成法律手续。中国的办事程序，结婚离婚光有个人的法律资格是不够的，光有法律的保护是不够的，还必须经过“组织”的审核批准证明，个人权利必须接受组织的管理和监督。——法律之前设置了权力和道德的障碍。要想诉诸法律，必须过权力和道德这两道关。娘家的反对，又没了道义支持。摆在武芳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逆来顺受，俯首听命；要么跑，

跑到远远的神鬼不知的地方去。

武芳暗暗做了出走的准备。

1987年中的一天，武芳从烽火村消失了。她离开了让她伤心绝望的礼泉。

她先去了辽宁，后又因生活不习惯回到陕西，来到了离礼泉二百五十多公里的韩城。韩城座落在黄河岸边。黄河水，渭河水，再浑浊不堪，都是家乡的水。

然而，正是黄河渭河经脉相连，使她居住在这里既不隐蔽，也不安全。她万万没有想到，烽火村编织的一张大网正向韩城扑来。

四

一封匿名信。一封1988年寄到烽火村的匿名信，作为证据提交给了西安中级法院法庭。据称，这封匿名信可以证明武芳作风不好，可以证明王氏人家、烽火村干部、公安干警一起出动，把武芳弄回村，不是蒙骗，不是威胁，“而是有前因后果的”。

不知道为什么，这封信没有在1988年——1991年提交给法庭，作为匡扶烽火村道德、对武芳施行家法的“正义”之举的依据，作为罪犯逃脱或减轻罪责的证据。武芳案前期侦察，放走罪犯，放走漏网嫌疑人，故意遗漏重要犯罪线索，却下了很大的功夫来证明武芳是个坏女人。

这样的匿名信，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制造无数。

“法官，法官……”

武芳要申辩，被法官制止。

五

烽火人发现了武芳。

1988年4月23日下午，太阳快落山了。黄河对岸的山西省地界，在夕阳下已是朦胧不清。从黄土高原直泻而下的黄河水在这里拐了弯儿，泛着金色的波光，慢慢腾腾地向南流去。一伙不速之客来到武芳的住地——韩城东北40里处的下峪口村郭玉生家。

见这伙人的来势不善，武芳躲到了隔壁邻居家。

不一会儿就听见郭玉生家的喧闹声。

“你们找谁？”房东问。

“武芳”

武芳。

“这里没有武芳。”

“我们知道武芳就住在你家。”

“谁说的？谁说的谁交出武芳。”

“你今天不把人交出来不行!”

“不交又怎样？”

“不交？我们今天就不走了!”来人说。

“不交就砸烂你家!”来人威胁说。

见双方僵持不下，有人跑过来喊：“武芳快出来，那伙

人在玉生家闹伏呢!”

武芳的内心十分矛盾。出不出去呢?一露面便前功尽弃了,可是不露面肯定要牵累房东。

武芳无奈,只好回到郭家。她一看,好大的阵势!这伙人中有村长王保东,礼泉阡东派出所两名公安干警,王茂新的哥哥王茂勤。还有下峪口镇派出所冯所长陪同。

一见面,王保东就说:“家里出事了”

武芳着急地问:“出啥事了。”

王保东说:“出人命事了。”

一说“出人命事”,武芳便想到了娘家人。之前,王茂新曾别刀到她娘家骚扰,不让进屋,就翻院墙上房,扬言不交出武芳,就要杀她娘,杀她小弟,断了她武家的香火!

她也没细想,便断定王茂新杀了娘家人。

她说:“那我就回呀。”

这伙人一听这话,脸上都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

她问阡东派出所的公安:“我回去,保不保人身安全?”

阡东派出所的白指导员忙说:“保人身安全。”

“回去后,我要与王茂新办离婚。给办不?”

“马上办。”

下峪回派出所冯所长在旁察言观色。他觉得有点蹊跷。通知家里出事,为什么还带公安?为什么还要下峪口派出所配合?还要求他所长亲自来?这是一个走也要走、不走也要

走的强迫的架式。来者不善啊。

冯所长把武芳悄悄地拉过一旁，提醒说：“是不是把情况弄清楚再回？”

武芳已是气昏了头，归心似箭。这时，她已经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她心系娘家人的安危。回去的路上和回去以后，都有公安干警的保护，又有村干部在，王家人也不敢把她怎么样。而且，永远这么躲着也不是办法。与烽火村的婚姻关系像一条锁链，还把她牢牢捆着呢！她要一了百了，挣脱锁链，光明正大地活着！

她主意已定：“我要回哩！”

当天晚上，她与烽火村的来人一起住进了下峪口镇旅店。

她的心已经平静下来。春天的星星，干干净净，晶莹闪亮，仿佛刚跳进了黄河水里洗过一般。

她祈祷着娘家人不要因她而出事，祈祷着回去能摆脱那个早已死亡的婚姻。这颠沛流离、远走他乡的生活，让她把苦吃够了。一个女人家在外面闯荡、举目无亲，无穷无尽的寂寞，无穷无尽的烦恼，无穷无尽的恐惧……这回好了，他们答应办离婚了。这种逃亡生活应该结束了。她梦寐以求的生活正在向她招手呢！离婚后去哪里呢？六岁的女儿能跟她吗？新生活将以什么样的面目来迎接她呢？

满心的期待，满心的憧憬，微微地熏陶着她。她感到头

有点晕，身体飘飘欲飞……

突然，屋外一声响动，让她一凛，把她从遐思中拽回来。咦？怎么屋里还坐着两个男人？大伯子王茂勤和王保东。他们坐在这里干什么？这么晚了，他们怎么不走？

王茂勤和王保东一脸的紧张，死死地盯着武芳。武芳上厕所，他们也跟着。武芳感到奇怪，撵他们走，他们也不多说话，就是赖着不走。武芳说："我睡觉哩。"他们说："你睡你的。"还是不走。他们身上好像肩负着十分沉重的压力，如果让武芳从他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了，回去不好向什么人交待。解决两口子的事儿，专门派车，村长亲自出马，还调动了公安干警，如此兴师动众，没有比村长更有权威的人物策划和指派，简直不能想像！

两男一女三个人，大眼对小眼，谁也没睡觉，在这间屋里枯坐到了天明。

这时的武芳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行动的自由。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她的心头。

六

说话间，姐仨来到了村接待站。

从烽火村西面山岗上下来，一条笔直的柏油路走到尽东头，便是烽火村接待站。不明就里的人乍一听，便生诧异：一个村还搞什么接待站？同时也能感觉到，这烽火村不同一般。老远便能看到柏油路两旁高高耸立的白杨树，老远便能

看到规划整齐的农民住宅。谁看到这样的情景都会兴奋。

20 年前，一批由作家和陕西师大中文系师生几十人组成的庞大写作组来到了烽火村。他们的使命是，完成《烽火春秋（续集）》的写作。他们是在进行一场接力赛。十几年前，60 年代初，陕西曾组织了一批“秀才”完成了一本书，叫《烽火春秋》。这部书 1960 年组成编写委员会，参加编写的有“中共醴（礼）泉县委、烽火公社党委、陕西师范大学、共青团陕西省委、陕西日报社、东风文艺出版社、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延河》编辑部等七八个单位。参加编写的人员先后约五十多人，有专业的文艺报刊、出版社编辑、记者，有大学中文系教师和学生们，还有许多具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公社书记、社长和基层干部们”，省委宣传部和农村工作部审阅了初稿、二稿，县委和公社党委负责订正事实并参与写作，省农业厅、西北农学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省科协的领导和专家也参与了意见。此书历时两年，1962 年出版。这是一部“烽火人民公社史”，“内容写的是陕西省醴泉县烽火人民公社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面大闹翻身的生活变迁史”。这部书以烽火村为依托，记载了翻身农民走向人民公社的历史，很有可能是中国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人民公社史。这部“史”的特点是，主要以作家、知识分子组成的编写委员会“把编写过程，也看成是一个深入生活和改造思想的过程”，与党组织、基层干部、农民合作，农民多人口述，多人提供

材料，由编写者多人记录、多人整理和编写成书，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时，中国刚经历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人民公社制度的乌托邦试验出现严重危机，包括陕西省在内，城乡居民生活危机，普遍饥紧，三四千万农民“非自然死亡”。

“续集”叨陪其后，写的是60年代到70年代烽火的历史。1977年，作家们来到了烽火村。这些作家后来成为陕西省乃至全国举足轻重的作家。作家笔下的“烽火新村”欣欣向荣:

村外，路旁，一排一排杨树，挺拔，翠绿。庄稼地，已经田园化了，像一块大棋盘，整齐，雅观。田间交织的水渠，像条条银蛇，闪光，耀眼。

村中，一幢一幢二层楼房，一律青砖蓝瓦，红漆屋檐，铁环大门，玻璃窗户。一条一条宽阔平坦的柏油村道，行人很少，只有拖拉机来回奔驰着，显得空旷、静谧。

连着“东方红”大街，是大队福利区：接待站、医疗所、妇产院、食堂、商店、义务厅、文化室、托儿所、农械厂。往南便是油坊、醋坊、酱坊、猪场、鸡场、牛场、窑场、菜园、果园。果院里有桃、梨、核桃、苹果、枣。鸡场里全是雪白雪白的来亨鸡。

南原坡上，一排排一层层窑洞从坡跟转到坡顶，被人称作“文化沟”。不时传来铃声、读书声、歌声。

看了烽火全景，我们一起称赞："好新村，真像座小城市!"

烽火村谁见谁爱，岂止充满了浪漫情怀的作家？这青砖蓝瓦二层楼，都是 1973 年开始盖下的。别说是 70 年代，就是 80 年代、90 年代都不啻是天上人间！别说是富饶的关中平原，就是当时的全中国，烽火村这般气派的农村，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可以说是莫大的奇迹。太富裕了！富得流油，富得让人羡慕，富得让人嫉妒，富得让人不可思议，富得让人羡慕嫉妒不可思议又高不可攀。不是一般两般的差距，而是天上地下的差距！差距太大了！谁不想来探究一下这种富裕的秘密呢？谁不想来追寻一下这种贫富差距的诀窍呢！参观取经的人蜂拥而至。关中各地、全省各地、全国各地、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都来到了烽火村，从 50 年代到 90 年代络绎不绝。

烽火村原名"白灵官"村，自从合作化时期点燃"烽火"后，四十余年没有熄灭过，以至于不得不修建接待站来接待参观学习的人们。随着参观学习的人数增加和时代的变迁，接待站从小到大，从干打垒、砖瓦房到钢筋水泥楼，三次翻新扩建，到了眼下的规模。从 50 年代开始，这里接待过许多中央大首长，接待过西北局、省、地（市）、县各级每届领导，接待过数不清的政府官员、作家、记者、科学家、农村干部和普通农民。这里装着中国各个时期各个朝代数不清

的荣耀。

武芳娘家北二村，离烽火村只有五里路，天天傍着烽火村光芒万丈的荣耀和令人朝思暮想的富裕。武芳 14 岁的时候，便说给了烽火王家。武芳的母亲说："把芳儿说给烽火，我们一块石头落了地。四个姑娘我最疼爱芳儿。把她嫁到一个有吃、有喝、有穿、有用的好人家，算是我们做父母的最大心愿了。咳，我们穷怕了！"

穷人家的孩子对贫困有着特殊的敏感。14 岁的武芳被迫接受着一个现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于一个情窦初开的农村姑娘来说，是一个铁的原则，甚至是一个铁的事实。她是怀着世事不明的憧憬和无可奈何的迷惑来接受这个现实的。她明白家庭的处境，更知道农村许多约定俗成的规矩，眼看着周围的姐妹们沿着一条不可更改的道路向前行走。于是，邻村——烽火村的一个小伙子闯进了她的生活。公正他说，小伙子是那种老实巴交的农村小伙子。他平时不多言不多语，下死劲干活。武家没有劳动力。武氏老汉十几岁学木匠，从临潼来到礼泉，早早地累驼了背。进北二村，只要看见一个九十度弯腰走路的老汉，那就一定是武氏老汉。武家第二个男人便是远没有长成的小弟。在农村，没有劳动力，独门独户的外姓人家，男丁凋零，都是非常致命的软处。小伙子倒没有什么怨言。盖房子的时候上房梁，"忙"时收麦杨场，只要是需要男人的重活，不用叫，他都干。这是女婿

的“义务”。农村风俗，只要定了亲，“媳妇”便成了定局，过门没过门都是他的人了。娘家可以理直气壮地收礼钱礼物，理直气壮地使用“女婿”这一廉价劳动力。男方也认同这种做法，哪怕女方的要求有时非常苛刻。一把屎一把尿一把泪，养大女儿嫁给人，所谓“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便是人家的人了，替人家做饭生娃，传宗接代。娘家，如同一家委托商店，女儿像是将来的哪家人委托在家里的名字叫“媳妇”的商品，一旦时机成熟，便要卖个好价钱，既要收回“成本”，又要赚取“利润”。收回的“成本”和“利润”，或者只付“成本”，或者要付“成本”和“利润”，或者还要贴更多的钱，在别的委托商店里为自己的儿子娶回媳妇。这便是“买卖婚姻”，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委托商店。每个家庭在买卖婚姻大循环中，既是买家，又是卖家；既是“媳妇”这个商品的流通起点，又是流通终点。这里面有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妇女既是这种交易的受害者，又是这种交易的操作者或者参与者；男人既是这种交易的受益者，又是这种交易的受害者。那么，这种交易的最终受益者是谁呢？社会？社区？家族？家庭？个人？否则这种往返无穷、乐此不疲的交易有什么意义呢？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种交易都是丑恶的和不道德的。门题还不在于是不是丑恶和不道德，而在于广大的农民为什么会接受它并让它繁衍至今。迫问下去会是怎样的结果呢？事实是，这种丑恶的和不道德的交易还在继

续。事实是，绝大部分农村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可能是按照这种方式组成家庭，繁衍血脉。在他们看来，这种方式可能不好，但是有效。这是值得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大题目。

武芳和她未来的丈夫不会去也不可能去研究这么深奥的问题。此刻，他正在挥汗如雨地收割小麦。此刻，他明白，这是他的责任和义务，更是这笔婚姻交易的一个部分，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武芳则被动地接受着眼前的事实。她的眼光里充满了诧异。这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关注着周围悄悄发生的变化。媒婆来了又走了，父母经常神秘地嘀嘀咕咕。媒婆走了又来了，带来了礼品，然后与父母亲讨价还价，然后皆大欢喜。她朦胧地感觉到，她的命运已经在这个循环往返的过程中被决定了。

武芳慢慢长大了，长成了争强好胜的大姑娘。这时候，中国社会已经进入80年代，正在缓慢地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中国人长期被禁邃、被封闭、被压抑的灵魂正在苏醒。让世界惊异的是，这场深刻的变革首先是在农村发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经济上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社会心理上则承认和强化了农民的自主意识和能力，有条件地承认了农民按照自己的方式亲吻土地的权利。对这种变化最敏感的群体当然是处身其中的农村年轻人，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一批农村题材的文艺作品深刻地展现了这群体的生

存背景。武芳当然也不能例外。她不喜欢烽火村的这个小伙子。她认为，他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她试图改变和把握自己的命运。她为命运抗争过，但是失败了。她还要继续抗争……

姐仨惊魂未定。她们还是犹豫。到底找不找村干部？还住不住接待站？村干部和接待站能给武芳安全吗？

一回到烽火，武芳的“不详之感”就得到了证实：这是一场骗局！一场由烽火村干部、阡东派出所、王氏家族共同合谋的骗局！她姐告诉她，家里什么事也没有，父母亲和小弟都好着呢！为什么村里要想方设法打听到武芳的下落，派专车，村干部亲自出马，还动用了公安干警？为什么一个普通村民的家庭纠纷要动那么大的干戈？为什么连哄带骗带吓，一定要把武芳弄回来？武芳不过是一个远走他乡、举目无亲、无依无靠的农村弱女子罢了，她有多大能量呢？她跑出来也罢，回去也罢，目的就是一个，与王茂新离婚。被欺凌了七八年，村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过不下日子，要求离婚，也算离经叛道？这也是做人起码的权利。为了增加离婚谈判的砝码，为了表示离婚的决心，她准备了2000元“离婚费”。对于她来说，2000元可是一笔巨款，这是她几个月在外谋生挣下的血汗钱。一句话，武芳是铁了心离掉这桩毫无人情、毫无人性的婚姻。可是事情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简单。汽车路过阡东派出所门口时，被公安和村干部夹在中间的武

芳嚷着往车外扑：

“我要下车！我要下车！”

“下车做啥？”王保东拉着她问。

“我不回村！我要回娘家！”武芳喊道。

“等把问题解决了再回。弄好了给你恢复名誉哩。”王保东说。

“我既然出去了，就再也不想见烽火的人。等我将来死了，让烽火来埋我的尸体吧！”武芳说罢又要往外扑。

“别闹！再闹，把你铐起来！”公安恶狠狠地威胁道。

回到烽火，人还没坐定，同去的阡东派出所白指导员就对村干部说：“人送到了，没我们什么事了！”

武芳急喊：“白指导，你们不能走哩！你们答应保人身安全哩！”

武芳把公安的许诺当了真。白指导员带着另外一名公安根本不搭武芳的茬儿，拂袖而去。按规矩，公安干警外出执行任务，必须经过公安局长批准。八年后，当时的礼泉县公安局长王治堂告诉我：“阡东派出所的两名干警去韩城，没经我批准。事后我严肃地批评过他们。”可两名干警接受调查时说，他们此行得到了王治堂的批准。当时任阡东派出所所长的李克让回忆说：“1988 年 4 月的一天中午，一个老汉到派出所来，自称是烽火村的党总支副书记，叫王正吉。他口大气粗地说：‘我找过县公安局的王局长了。我村一个娃

的媳妇在韩城与一个人鬼混。时间长了。王局长让你们派两个人帮助把人弄回来。’我对他的口气很反感，心想，谁家女人跑了，女婿不来寻，大队干部跑来干吗？当时我说：‘我们派出所单位没有出县办案的权力，要是王局长让我们派人，得有他写张条子或打个电话。’来人走了。过了一个来小时，县公安局局长王治堂果然给我打来电话，让派人帮他们把人弄回来。我就派两人跟烽火村的车去了。”白指导员后来在接受市检察院检察官的调查时说：“当时烽火村王保东、王正吉来联系，我当时说，要去就要县局领导同意。当时我们一块到县局去。局长王治堂同意让我们去，我们就去了。一块去的有我所王德田，烽火村的王保东、王茂勤和司机。”

对此，王治堂坚决否认。一位公安局副局长证实道，王治堂在事后一次会上批评过阡东派出所擅自出动的错误。

一边说批准了，一边说没有批准，总有一方说谎。如果是派出所说谎，要么是烽火与阡东派出所有私下交易，要么是屈服于某种特殊的压力，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否则，公安干警不会心甘情愿地为一个村去听差打工。武芳外逃，不属于治安案件。他们此行，远超出了他们的职权范围。如果是公安局长说谎，问题就更严重了。

让我们暂时不去纠缠谁在说谎，起码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公安干警参与了骗局，没有公安干警出场，武芳回不来，

因为这场骗局带有“强制”的含义。公安干警的任务很清楚，把武芳押回来就了事。他们压根儿就设想保护武芳的人身安全。他们把武芳交给村干部，死活就不管了。他们有分工，有默契。村干部也自有一套做法。在他们眼里，武芳就是“离经叛道”——为人之妻道，为人之母道，为人之媳道，特别是为烽火村之女人道。

烽火村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这里过去是、现在是、不久的将来也可能是全陕西景仰的地方。70年代“农业学大寨”的时候，陕西便有“外学大寨，内学烽火”、“学大寨，赶烽火”的号令。五六十年代更是风云一时。四十多年来，烽火村曾在陕西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如何“风”如何“火”，后文将有详细描述。烽火村能关心国家之大事、陕西之大事、咸阳之大事、礼泉之大事，当然要关心烽火村媳妃，“私奔”之小事，所谓“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权力所及，大事小事，公事私事，概莫能外，方显出英雄本色。再说了，“礼泉”是什么地方？望文生义，是礼节、礼仪、礼法、礼教、礼道……——世间一切“礼”的源“泉”。“礼”是什么？是秩序，是规矩，是伦理，是道德。烽火村自有烽火村的秩序，烽火村自有烽火村的规矩，烽火村自有烽火村的伦理，烽火村自有烽火村的道德，烽火村是礼泉县的烽火村，当然应该是、事实上也是出“礼”的地方。这里立着好大一个金字牌坊。在金字牌坊上点污，岂止是“离

经叛道”，简直可以说是“大逆不道”！总之，女方出逃，女方提出离婚，是个伤面子的事情。礼泉县包括历任父母官在内的人都知道，烽火村的面子伤不得。武芳的母亲一面哭一面对我说：“芳儿哭着喊着不去烽火，我的心也软过。可是又想，烽火离我们只有五里路，烽火比不得其他村子，哪敢得罪呀！得罪了，我们武家还过不过日子呀！”所以，武芳、王茂新家庭纠纷，武芳出逃，就不仅仅是一般的家庭私事了。所以，动用专政机关，动用组织权威，动用经济实力来施加影响，让一一个家庭由阴变晴，由缺变圆，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当然值得。几十年来，烽火呼风唤雨，想办的事就没有办不成的，何况本村村民这么一点鸡零狗碎的事儿？可事态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武芳软硬不吃。她是个刚烈的女子。她知道自己受骗后，破口大骂，直骂得地动山摇，河水黯然。“我要离婚！我要离婚！”任谁劝都是这句话。到烽火的当天，她坚决不回家，村干部没辙，把她暂时安排在了接待站北房，同时又安排王茂新与她同房。在他们看来，夫妻间天大的事情，天大的恩怨，在一块儿睡一觉就好了，就一了百了了。女人嘛，把那件事一办，火就消了，何况还有孩子呢。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爱。毕竟还是好几年的夫妻么！当然，同房是被强迫的。武芳知道受骗后，便闹着要离开。“走？哪能行？”村干部说。下了那么大的本，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好不容易把你弄回来，想一拍屁股就走

人？做梦去吧！

武芳实际上已经被软禁。她住的房间隔一间屋，就是烽火党总支副书记、接待站站长王正吉的屋子，紧把着接待站的大门。除了走大门，接待站四面封闭，插翅难飞。

第二天晚上，王茂新就来了。他要和她睡觉，不从，便骂便打。这套东西她太熟悉了。不过这回她是抱着最终解决问题的美好愿望来的。她正色道："茂新，咱好好说，别打人。"

王茂新说："我不打你，别人都乱骂我呢。"

武芳一凛。这叫什么话！别人骂你，你打我；怕别人骂你，你打我。天底下竟有这样的混帐道理！她问：

"别人是谁？"

"村上人么。"

"骂啥呢？"

"说我鳖卮（注：'鳖疱'，关中方言，即'窝囊废'。），管不住一个女人。把（口外）（注：'（口外）'，关中方言，这里是'他'、'她'、'它'、'他们'，'她们'，'它们'等等意思）往死里打，把（口外）打残了，看她还跑得成不！"

王茂新倒是个老实人，把村里人给他的压力一五一十跟武芳说了。武芳可气可恼。可气的是，村里人唯恐事情了闹大，唯恐不把武芳置于死地。可恼的是，你王茂新的脑袋是为别人长的？别人说啥就是啥？烽火村啊烽火村，你这是在

使坏啊！你这是在把人往绝路上逼啊！我武芳嫁到你烽火村八年，忍气吞声了八年，换这“离婚”两个字，换这“离婚”一张纸，竟是这样艰难！我就是千错万错，你也不能怂恿王茂新来打人呀！还要把人打残废喽！

她更是决绝：“打断我的手，我还有腿！打断我的腿，我还能爬！我就是爬也要爬出烽火！”

王茂新的火是他周围的人拱起来的。

武芳欲哭无泪，只是满腔的悲愤。

“我们好好过日子吧，娃都七岁（虚岁）了。”王茂新乞求道。

“不行！”伤透了心的武芳断然拒绝，“你王茂新就是把金砖铺进家里，我也不进你王家的门！”

王茂新举手又打。

她拉住王茂新打人的手——这双为别人而打人的手，这双代表着一种恶狠狠气氛的手——恳求道：“茂新，我们和和气气离婚吧。我们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别人怎么说咱不管。我给你准备了 2000 块钱，算是赎我的身。咱们各奔东西吧。”

“想得美！不离！让我打死你这个贱货！”王茂新揪住武芳的头发，脸上身上，又踢又打，又扯衣服，又扒裤子。

“你打，你打，再打，你一分钱也别想得到！大不了我这条命送给你！”武芳坚决不从。她一面抵抗一面呼喊：“正吉哥……正吉哥……快来呀！……茂新打人呢！……”

王正吉隔了一间房子住着，不可能听不见。武芳说："我听见外面有脚步声停在门外面，听里面的动静不言传。"

外面的人是谁？

王正吉不管。村干部与王茂新关于强迫武芳同房早有默契。要不然骗武芳回来干什么。

骂够了，打累了，天也快亮了。这一夜，烽火人都在竖着耳朵听，都在期待着一个结果，一个女人被男人强迫的结果。接待站由闹到静，天边由黑到亮，公鸡在"喔、喔、喔"打鸣，村外正直的白杨树——那可是烽火的标志之一——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已有喜鹊叽叽喳喳，那树枝上刚刚冒出的嫩芽儿在寒风料峭中瑟缩着不肯展开。

美好的春天。

美好的春天的早晨。

烽火人睡了一个甜美的觉。

乍看起来，这是王茂新和武芳两个人的战争，但是武芳很清楚，这是她与整个烽火村的战争。三天下来，这场战争陷入了僵局。两个人的眼睛又红又肿，互相怨毒地盯着对方。绝望中的王茂新出去了。一会儿，他带来一帮人，说是去办离婚。武芳信以为真。她跟着这帮人出了村接待站。路过家门时，王茂新陡然变脸，上前擒拿住武芳，连拽带推，像缚住了一只鸡，把武芳往家里弄。武芳倒地挣扎。他们倒拖着她的腿，将她拖进屋里。她拼死挣扎。她的头在水泥地上磕

碰着，头发散乱，头发上，灰尘和眼泪纠缠在一起。她被倒拖进屋的时候，身体与路面磨擦，一路灰尘纸屑秸草翻飞。“你们放开我！……你们放开我！……妈呀，你快来救救我呀！……”回应她的，只是烽火人那种冷冷的目光，那种幸灾乐祸的交头接耳，那种“活该”的恶声唾弃；回应她的，只有门外大铁锁的“卡嗓”声。

“开门！……开开门！……你们这些畜牲!”武芳又哭又喊又骂又砸门踹门，可是没人理她。

姐姐们来了。姐姐们听说妹妹被关在了家里，赶来解救。

“芳！芳!”姐姐在门外呼喊。

“我在里面哩！姐姐快救我!”武芳喊答道。

姐姐们砸门，砸不开，便用工具别下门槛。

武芳从门下钻了出来。

见妹妹蓬头垢面泪人样的惨状，姐仨抱头痛哭。

这便有了姐仨惶惶而行的情景。

这是武芳回烽火的第三天。武芳在姐妹中行三。“三”这个数字这时候跳出来，让人心惊肉跳。烽火这张网，把她从韩城骗回来，三天过去了，她能感觉到这张网已经失去了耐心，正朝她慢慢收紧；她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压抑，感觉到一双无形的手正扼住她的喉咙，让她窒息。

此时，全村人都在关心着接待站发生的事情。他们甚至认为在圣洁的接待站住着武芳这样的女人是一种耻辱，是对

烽火光辉历史的亵读。谁都不会出来拯救武芳。当然，谁也不敢出来解救武芳。无论接待站生出怎样的故事，他们都不会感到奇怪。

烽火人在等待着，更确切他说，在期待着。

烽火正在酝酿一场罪恶的阴谋。

03

七

西安中级法院。

法庭调查。

拉灭电灯，实施犯罪，是硫酸毁容毁身案的重要情节。

民事法庭调查刑事案件，显然与《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抵触。

法官问武芳：“村干部走后，屋子里还有几个人？”

武芳答：“三个人。”

法官问：“都是谁？”

武芳答：“我，王茂新，王农业。”

法官问：“谁拉的灯？”

武芳转身指着听众席上第二排一个黑脸小眼的壮汉：“就是他！王农业！”

法官问：“还有谁看见了。”

武芳答：“屋里就三个人。王茂新枪毙了，就我亲眼所见。”

八

姐仨找到了王正吉。

这位烽火村的接待站站长也算个知名人物。他负责对外接待，相当于烽火的半个外交部长。他倒是一个热心肠人。他很乐意地把武芳安顿下来。不过，原来住的房间要调一下，调到靠边的北房去。他说：“明天有省里的领导来视察。”后来知道，第二天来视察的领导是省长侯宗宾。

细心的武芳到新调的房间后，首先检查门锁。她发现，新调的房与以前住的房相比，有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差异：门上没有内关的保险栓。也就是说，外面人想进来随时可以进来。这间居子太不安全了。可哪儿安全呢、本来住接待站就是自投罗网。

俩姐姐陪着妹妹。她们深深地为妹妹的安全担心。她们刚进村时，就有烽火的熟人告诉她们：“你们要小心哩！有人要害武芳哩！要卸武芳的腿和胳膊哩！”在此之前，还有用刀子划脸、泼蓝墨水“破相”的传闻。

天渐渐黑暗下来。王正吉劝俩姐姐走：“你们回去，没事的。”

姐姐问：“离婚的事呢？”

王正吉说：“快办了。”

姐姐问：“我妹的人身安全呢？”

王正吉说：“不怕，出事找我。我也有女子哩。我也有

媳妇哩。”

王正吉将心比心地拍胸脯，俩姐姐将信将疑，但又无奈。在人家的村子里，不信村干部又信谁呢？

再说了，光大化日，朗朗乾坤，接待站又是村委会所在地，能把人咋？

“芳，正吉哥保安全哩。有事喊人。”她们临走叮嘱道。

她们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就在陕西省长来烽火的前一天，武芳被姐姐解救回了村接待站。然而，当她看到新换的房间没有内栓时，略放宽的心又收紧了。他们这是为啥？侯宗宾来跟我武芳原来住的地方有什么关系？害怕离大门近丢你烽火的脸？害怕我武芳这个“坏女人”玷污了你烽火这块金字招牌的清白？换房可以呀，但为什么偏偏要换到没有内栓的房间？

“安全阀”被一只神秘的手悄悄地拧开了。三天来，她的神经一直紧绷着，从未松弛过。一根针掉到地下，都会引起她的警觉。三大来，她不思茶饭，人渐消瘦，只是在一种渺茫的希望中等待着。然而，她等来的是绝望，等来的是被监视被禁闭。他们根本没有把她当人看待！她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把她看作一个没有思想、没有情感、只供泄欲和生儿育女的动物！看作了属于烽火村的没有意志、没有自由权利的一件什么东西。三天来，没有任何人来和她讨论她此行的唯一目的——离婚。他们一开始就在说谎，他们了

解这桩早已死亡的婚姻的原由，了解她的不容商量的态度，了解事态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调解的范门，了解村干部的职责与一个普通村民家庭的私生活应该持有的距离。然而，他们仍然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热情不懈地努力着。让武芳感到不解的是，他们调解工作的全部目标就是让她和丈夫睡觉。仿佛八年的恩怨、八年的痛苦、八年的被欺凌被污辱都可以一觉了之，仿佛就可以抹杀掉她被村干部和公安干警连骗带吓挟持回烽火的事实。我们不能否认，性关系是婚姻关系的本质。从一般意义说，由于夫妻性欲失衡或者某种社会压力，焦虑、压抑而失去理智而行为放大，导致家庭冲突和矛盾，适时的夫妻性行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冲突和矛盾。与此相对应的更高目标是：两情相悦。包办婚姻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不可能达到这种目标。在落后的经济基础和以村为单位的相对封闭的社区形态下，青年男女的交流十分有限，“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就很难被取代。一般情况下，“包办婚姻”可以实现软着陆，甚至平稳过渡，即使如此，也不能最终解决这种婚姻关系所孕含的深刻危机，特别是不能在那些自主意识强的农村青年中解决门题，随着社会的进步将越来越如此。武芳就是一例。她不能不反抗。她不能屈辱地被烽火人用猥亵的意识、被丈夫用暴力手段剥光衣服。三天来，她知道烽火人在后面戳她的脊梁骨，她知道很多人在怂恿她丈夫对她施暴。她一回烽火，村干部便把她

丈夫叫来和她住一个房间，为了能让他们在一起睡觉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任房间里怎么打怎么闹都没人去管，认为那是夫妻间的事情。

三天的折磨，武芳已是精疲力竭。她太累了。送走姐姐，已近黄昏。光明在天边轻浮地一笑，便把无尽的天空和大地让给了黑暗。

武芳关好门，和衣睡下。她在轻轻地啜泣。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武芳在似睡非睡中听见有人开门。

“谁？”武芳喝门。

“我”

是管接待站门钥匙的小伙子。

“做啥？”她又问。

小伙子不答话。

门被打开了。

武芳看见跟着小伙子后面还有一个人。

他是谁。

“茂新!”

小伙子送进王茂新便转身走了。

王茂新面露凶相。武芳仇恨的眼睛也直视着他。

王茂新摊牌了:“我有硫酸哩。”

为什么武芳知道王茂新携带硫酸而不逃避，不呼救？她

不知道硫酸的物理性能和危害?

事到如今，武芳已经彻底绝望了。王茂新和在后面支持他的烽火人，今天要毁了她。她孤立无援，只能以命相搏!“我就是这条命！整死算了!”她说。

完全疯狂了的王茂新窜上前，一把揪住武芳的头发，暴风雨般地拳打脚踢。

武芳拼死反抗。她摆脱他，冲向门口打开门，大喊:“正吉哥!……正吉哥!……打人哩!……打人哩!……”

村总支副书记、村长王保东，村总支副书记王正吉、王中辉变戏法般迅速地来到屋里。这是件蹊跷的事。规划整齐的烽火村，住得再集中，平常召集村干部开会也是件不容易或者需要时间的事儿，现在好，仿佛早有思想准备，仿佛早就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所以一呼便到。更蹊跷的是，他们到来后，不闻不问王茂新准备了硫酸的事儿，不去批评王茂新行凶打人，不去阻止王茂新已经非常明显的犯罪倾向，反而众口一词不厌其烦地规劝武芳与王茂新和好。

武芳非常清楚村干部们的立场。他们始终都在维护着烽火村王家的利益。他们都在说一些根本不打算解决问题的屁话。

她一句也没听进去。她的态度还是那两个字：离婚!

规劝陷入了僵局。

这时节，一个重要人物出场了。事态随着这个重要人物

的出场而发生了急遂的转变。正是这个重要人物拉开了关中平原八百里秦川惨绝人寰的一幕。

来者叫王农业，职务是烽火村农工商公司总经理兼烽火村水泥厂经理，年龄只有 27 岁，比屋里所有的人都小，却比屋里所有人的口气都大。他是烽火村党总支书记兼咸阳市委常委、副市长王保京的二公子，位居一人之下千人之上，是烽火村一百八十多户人家、一千八百多人口除王保京之外的最高首长。

读者可能会觉得奇怪，一个村党总支书记怎么还兼任着地级市的副市长和市委常委？这便是烽火村极其特殊之处。

王农业指着三个村干部说："你们三人走，到前面房喝水去。我来劝!"

三个村干部看着王农业的眼色，乖乖地鱼贯而出。

这位二公子个子不高，块头不小，有一种在烽火村什么事情都不在话下，什么事情都能搞定的自信。这个在农村长大、以"农业"命名的青年身上有一种处乱不惊、从容把握的气派。礼泉县有一位老同志曾指着他的鼻子，大骂其父和他本人不是东西，可以说被骂了个"狗血喷头"。可二公子始终赔着笑脸由他骂，不还一句嘴，等他骂够了骂累了，用不轻不重的语气递过去一句话："你们老一辈的事和我们小一辈没关系。叔，你先消消气，改天我备一桌酒席，让你们老一辈人见见面，说说话，把误解化喽。"一时倒弄得这位

老同志不知所措。一看便知，这二公子是个人物，烽火村的局势皆在他的把握之中。村干部和警方联手，村干部代表党、代表政权、代表王氏家族，警方代表司法机关，大动干戈，一般的农村妇女在如此大的阵势面前早就屈服了。可是武芳不吃这一套。现在的尴尬局面，无疑是武芳向烽火村所有权威公开挑战！这是不能容忍的。二公子亲自出马，会是怎样的结果呢？王农业一吆喝，在场的村干部也乐得顺竿子往下溜，把烂摊子留给王农业去收拾。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王农业没有婆婆妈妈地劝说。他没有这份耐心，他等人刚出门旋即转身就走。他边走边说：“武芳，睡去，几个月没见面了。睡去。”他要把复杂的问题化作简单的问题。武芳一看这架式不得了。他一走，屋里不是又只剩下兜里揣着硫酸的王茂新和她自己了吗？她追上去，一把抓住王农业的后衣角，说：“你们不能走。你们说保证安全哩。今晚我也不睡觉了，你们睡哪儿，我就坐哪儿。”

王农业挥手甩开武芳拉他衣服的手，疾步往外走去。临出门，他顺手拉灭了电灯。

灯灭了，门开着。武芳看见院子里有许多人。他们仿佛是来参加一场盛大的宰杀牺牲并供奉牺牲的聚会。武芳拼命想跟着王农业扑向门外，王茂新却在后面紧紧地抱住了她的腰。武芳朝门外伸出双手挣扎，早已等在门外的人紧跟着进来了，抓住她的两只手往里推。进来的人“是一个膀大腰圆

的短头发女人”

此时，她离门口只有一步之遥，离屋外的人们只有：一步之遥。屋子里一片漆黑，门外院子里却是白天一样明亮。她在呼喊，她在求救，她相信全村的人都能听见她凄厉的喊叫声，但是没有人理她……她被扳倒了……王茂新在踢她的头……王茂新在踢她的腰……胖大女人骑坐在她的肚子上……胖大女人摁她的头，俯身咬她的脸……武芳衔住了胖大女人的手指头，“心里恨得想把它咬断，但是不敢”……不敢？她今天难以理解，当时为什么不敢。他们早就对暴力的后果不管不顾了，而她却要担心后果。软弱，无助，恐惧？或许心底深处还有那么一丁点希望？……她在地下侧脸一望，门仍然开着，院子里影影绰绰仍有许多人，灯光极度眩目。这灯光令人恐怖。这灯光令人惊悸。这灯光令人厌恶。这灯光令人绝望。本来她多么想扑向她的怀抱，让她来解救她，让她来温暖她，让她来照亮她的前途……她的心被这灯光一片一片撕碎了……屋里的暴力与黑暗此时已和屋外的光明沆瀣一气……一股液体冲着她的脸倒下……液体接触到皮肤的一刹那，是那春天的夜空满飘而至的清凉幻觉，转瞬便是疯狂的烧的，刻骨铭心的烧的……啊！硫酸！王茂新说过他带了硫酸！……一瓶浓硫酸！……硫酸流进了她那美丽的眼睛。——武芳的母亲说：“我四个女儿，芳儿长得最好看。她那双眼睛好像永远在笑。”——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

给人的灵魂开了两个玲珑剔透的窗户，十分匀称地镶嵌在人的鼻翼两旁。世间万物有多少美丽的景象通过这两扇窗户摄进记忆啊！此刻，那“永远在笑”的灵魂正在迅速地消解、溃烂。硫酸分子在眼眶里肆无忌惮地渗透、扩散、弥漫，摧残着人身上最精妙绝伦的部分，摧残着人身上最美丽的部分……“啊！……救命啊！……妈呀！……你咋不来救我呀！……”……屋外屋内的人没人理她，没人在乎她……她本能地用手护住眼睛，使劲揉眼睛，结果却是更猛烈的烧的……硫酸在不断地倾倒……硫酸又向她那茂密乌亮、每次梳洗时都像黑瀑布一般奔泻而下的长发扑去……硫酸分子贴着颅骨的曲线蔓延，毁灭性地动摇着头发的全部基础。如同刚刚铺就便要褐走的人工草坪……头颅在燃烧。头发在燃烧。她的意识已被烧成了一片空白。她的脸在剧烈地溃烂，变形……硫酸扑向耳朵，耳朵便像蚕食桑叶般地没了……，“妈呀！……你咋不来救我呀！……”……撕心裂肺的嚎叫，唤来的不是妈妈，而是一个接一个的帮凶！……她的抵抗如同她的面容，已被彻底摧毁了。但是罪恶并没有停止……除了屋里的两个凶手外，又有人进来了……又有人进来了！……她已经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有人脱她的外衣，把她的毛衣往上掀……有人解她的裤带，把她的裤子往下扒……有人脱她的袜子……硫酸倒向了乳房，然后倒向上腹部、下腹部、大腿根部……

后经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烧伤科诊断:

1. 硫酸烧伤头、面、颈、胸、腹、背、臀、双上肢、右下肢，烧伤面积 23%，均呈三度烧伤，伴颅骨烧伤。

2. 双眼角膜烧伤后混浊（右眼部分恢复视力）。

3. 右耳廓烧伤后缺损。外耳道烧伤，鼓膜穿孔。

4. 右手背伸直肌腱部分缺损。

眼前的情景，真是不忍描述：大片颅骨烧伤外露，左眼失明，右眼几乎失明，右耳已烧成了一“焦核”，乳房烧毁，右手残废……

我必须去追踪这桩硫酸毁容毁身案的全部细节，寻找包庇者和漏网嫌疑人的蛛丝马迹。我需要事实，确凿的事实。我在法院的卷宗里看见了病床上的武芳———个全身焦黑的炭人！其状惨不忍睹！

炎热的夏天，憋闷的档案室，发黄的卷宗。档案室里弥漫着罪恶的气息。一本本案卷，记录着人间最丑恶的东西。档案管理员把卷宗放在我面前时，我的心禁不住发抖。一位外科医生说，她可以在解剖室里把人的肢体大卸八块，可以在手术台上眼都不眨一下把活生生的皮肤划开，把人的骨头锯下来，把人的五脏六腑拿出来，但是见不得被硫酸烧烂的人。甚至不愿意听别人说！谁说，她会嚎叫着跑开！因为她看见过被硫酸烧伤的人。就因为看过一眼，便成了永远的噩梦。以前我看过硫酸毁容的报道。一位上海姑娘被硫酸毁容

后，由一位好心的美国老人接到美国整容，花了大量的金钱，也没恢复“人”的面目。武芳不仅被毁了容貌，还被毁了身体，会是怎样的情景呢？翻开第一页，便是照片。一幅一幅的彩色照片——一斤装的硫酸塑料瓶，瓶口敞开着，像是一只毫无表情的眼睛，木木地逼视着你。——罪犯倒抹硫酸时被烧伤的手，一双曾经种植生命又践踏生命的手，一双残忍愚昧的手。它的骨节粗大，啮子黄厚，指甲缝里积攒满了污垢。你最大的庆幸是，它是一幅照片。它如果复活，扑向谁，就是谁万劫不复的灾难。——污秽狼藉的作案现场，厕所里烧成筋条状的被单，能让你想象激烈搏斗后任人宰割的场面，能让你想象动物世界弱肉强食的场面。——武芳的照片，如前所述。更让我吃惊的是，她腹部皮下纤维，竟呈鱼鳞状！

经过一番曲折，我见到了在黄河边上隐居的武芳。她把衣服撩开，把裙子翻上来，悲愤诉说，泣不成声。我看到的武芳，已是四次植皮整容的武芳，已是经过八年恢复的武芳。她的右眼勉强能看见东西，左眼失明；头部的创面鲜红，显然是刚刚愈合，武芳说：“一年前还流血流脓呢。”右耳烧毁，耳道封闭；右手不能伸屈，已经残废。她拿出出事前一个星期相片给我看。照片中的武芳，一米六八的个子，身材丰满而苗条，从头到脚打扮得利利索索，身上透着妩媚与自信。一看便知，她不是那种安于现状伏伏贴贴的农村妇女。两相比较，面目全非，不啻人间地狱！

我们应该记住这个触目惊心的事实：1988 年 4 月 26 日晚 11 时许，就在烽火村接待站兼村委会办公室——这个四十多年来接待过无数中央、省、地（市）、县党政要员，接待过上百万国内外各行各业参观取经者的地方，就在举世闻名的“精神文明”“新农村”，就在光大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了惨绝人寰的硫酸毁容毁身案。

多人参与！集体围观！危害惨烈！闻所未闻！

04

九

这个灵魂已与人间无缘，已与光明无缘。这个悲痛愤怒、哀伤和无助的灵魂，独自在地狱徘徊。他们就是要让她死不了，跑不掉，活不好。他们要让她做王茂新永远不敢出门的老婆，一个只会干活只供泄欲的工具。现场行凶的人，狼狈为好的人，是一群丧失了人性的畜牲！是一群倚强凌弱寡廉鲜耻的野兽！可是，在医院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武芳却念念不忘：“羞耻”二字。

她对第二天来医院看她的母亲说：“妈，我的短裤被他们拿走了哩！……我要短裤哩。……”

老母亲失声痛哭，“芳儿，啥时候了，你还想这些。”

她坚持道：“我要穿哩。”

母亲后来还真的为这条短裤去了趟烽火。

母亲后来对我说：“到哪里找呵，裤子早就被那些畜牲

整得不成样子了！再说，烧成那种样子了，还能穿什么短裤？”

穿不穿能不能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做母亲的一定要去。女儿今天的悲惨结局，与八年前父母的包办婚姻有着直接的关系。看见被硫酸烧成了焦炭一般的女儿，母亲心如刀绞，后悔莫及。这时候，女儿有任何要求，母亲都会去做，哪怕是要身上的肉部给。“我们真是罪孽呀！我们真是罪孽呀!”武芳的母亲不断地念叨着。武芳对母亲的恳求，武芳母亲的忏悔，分明给人类和畜类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界限，也让所有听了这种恳求和忏悔的人内心颤抖。

烽火人怎样了呢？他们能在这出惨绝人寰的悲剧面前良心发现吗？事实让人绝望，让人愤怒!

事态正沿着一条极其奇怪的轨迹向前发展。

灯已经大亮。在礼泉县公安局负责治安的副局长骆永坤眼里，犯罪现场如同魑魅魍魉的世界。一进屋，便有一股酸腐焦臭的味道。

灯由开到关，又由关到开，都给武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二公子农业拉灭电灯，拂袖而去，在他的身后留下黑暗，留下恐怖，留下兽行。灯再开时，武芳“只觉得脑海里一片大白。但是什么也看不见”。她已经疼痛得叫不出声来了。屋里的人都在忙碌着。从脚步声知道，匆匆忙忙，进进出出。刚才为了让硫酸分布均匀，烧得面积大，这些残忍和愚昧的

家伙，竟用手在武芳倒了硫酸的皮肤上涂抹！致使参与者多人被硫酸烧伤。他们其中有人手被硫酸烧疼了，跑出去，问院子里的人怎么办，院子里的人出主意，“快用水冲！快用水冲”！武芳看不见。她此时真想知道凶手们是怎样的面目。惊恐不安？幸灾乐祸？村里那个响了几十年的大喇叭又开始广播了。

武芳还有一只耳朵能听见王正吉的声音在大喇叭里喊：“郑志轩，郑志轩，赶快来接待站！赶快来接待站！”

已是午夜，泾河两岸睡死了一般。烽火的大喇叭惊醒了七邻八村。

这烽火村几十年都没有消停过！

郑志轩是烽火村的医生。

医生说：“快用水洗！”

大家赶快给武芳擦洗。武芳的脸上和身上已成血肉糊糊了！硫酸一沾水，便迅速溶解渗透，一擦，血肉就跟着下来，乱箭穿心似的疼。每擦一下，便是一声惨叫怪叫，叫得人汗毛孔发炸。这叫声与烽火村几十年的“莺歌燕舞”、“潺潺流水”、声名远播实在是不和谐。这个70年代初便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美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似乎应该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前面加“高度”这两个字了。“高度”的“物质文明”、“高度”的“精神文明”今天与这场多人参与、集体围观的惨绝人寰的硫酸

毁容毁身案排在了一个行列里！

骆永坤带着十几个公安干警赶到现场。他们看见，屋里，一片狼藉，床单、被子都烧成了网状焦絮，床上，厕所，到处扔的是。骆是个高壮的汉子，负责治安，出事那天晚上轮他值班。已经很晚了，他正和一个同事在值班室聊天，突然听见门外有女人的怪叫声。他跑出去，见有一辆客货两用车停在公安局门口。黑暗中有人告诉他："烽火硫酸烧人哩。人在车上哩。"车厢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呻吟。他爬上车厢，看见被烧伤的人身上盖着被子，一股恶臭扑鼻。"快送医院救人!"他说。他立即召集在家的所有干警奔赴烽火村。

就在骆局长领言人到烽火的时候，烽火村的客货两用车正拉着武芳去医院。一边抓罪犯，一边住医院，好像事情可以了结了。案件发生在农村，作案者多是一些普通农民，作案动机清楚，时间短暂，案情简单，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惩治罪犯不应该有问题……武芳躺在病床上与死神搏斗时也这么想。

然而，她想错了。公安人员来医院调查，她如实讲案发经过。她讲王二公子农业拉灯的情节时，来人说："你再也不要提王农业，再提王农业，你的案子永远结不了。"

这是什么话！也就是这话，说明事情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实际上，从拉武芳上医院开始就有了预兆，只不过没引起注意罢了。

我查阅了四医大的武芳病历档案。档案记载，武芳烧伤时间是 1988 年 4 月 26 日 23 点 30 分左右，四医大西京医院接诊时间为 4 月 27 日 11 点 30 分,中间整整隔了 12 个小时。在这 12 个小时里，烽火村的车去过县医院，因伤势过重而无法处理，建议往西安送。烽火村到礼泉县城十几公里，礼泉县城到咸阳市区四十多公里，咸阳市区到西安市东郊的四医大西京医院只有几十公里，满打满算，烽火到西安也只有六七十公里，怎么会跑了十几个小时、急诊不能治疗，在医院是绝对不能耽搁的。那么，烽火这台客货两用车拉着一生命垂危的人都去干吗了呢？武芳回忆说，县医院不能救治，车就去了咸阳。车到咸阳，她不知道是黑夜还是白天。车停了，一停就是好长时间。

“我听见他们说汽车没油了，要回烽火拿油哩。可一想，咸阳到处都是加油站，还要跑几十公里回烽火干吗？”武芳说。

车走了，她被抬了下来，在没有任何护理和救治的情况下，没遮没拦地搁在地下好几个小时。他们想干吗？真正的意图何在？去请示村党总支书记兼副市长王保京？王保京家住咸阳，离得那么近，再请示也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呀？如果武芳得不到及时治疗，有个三长两短，对谁有好处呢？

拖延，这仅仅是开始。拖延，可以化肥为瘦，化大为小，化有为无，化重为轻，化生为死。总之，可以化腐朽为“神

奇”。

然而，事实证明，腐朽还是腐朽，神奇还是神奇。武芳没有被折磨死。她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对于烽火村来说，对于王保京和王二公子农业来说，对于其他帮凶来说，最严酷的现实莫过于武芳还活着，顽强地活着。有人说，武芳是前世为烽火预备下的，事情没办完，她不会死。

这个现实让八年前所有的当事人惊诧不已。当时，无论是好心人还是盼她死的人，都对这个现实估计不足，都说，“武芳这娃不行了。”武芳八年后去看望当时送她回家的西京医院的王会计，王会计大吃一惊：“武芳，你还活着！”

重病卧床的王会计滚身下床，拉着武芳的手，左看右看，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还活着……”武芳话未说完，泪如泉涌。

这个世界上，只有武芳自己知道，“我还活着”这半句话之不易，包含着多少常人无法想象的心酸。

一〇

1988 年 7 月 21 日，出事 87 大后，武芳回到了烽火村。

她的烧伤远没有好完全。主治医生给院医教部写的“病情报告”说明了她的处境：武芳“被人谋害致伤，伤情严重，入院后己行两次手术；头、而、胸、腹及右上肢切痂植皮。术中所见，头部有多处颅骨烧伤外露，面积 150 平方厘米左右（注：原文如此）；右耳廓全部烧毁，外耳道全部为三度

烧伤，右手背伸肌腱烧伤外露，同时伴有双眼角膜烧伤。植皮成活困难，需多次手术（估计还需六～七次手术），住院时间长，整个治疗费用约需 10000 元。目前预交住院费 2000 元，已欠费很多，但该病人涉及法律问题，如何进一步治疗，请予批示。”

医院的处境也不太好。一方面是医生的天职：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一方面面临着严重的拖欠医疗费。左边是人道主义，右边是拖欠医疗费所带来的财务压力；左边是希波克拉底誓言所规定的铁一般的道德准则，右边是必须给予考虑的功利要求，否则难以生存。这是一个深刻的悖论。无论是在富裕的国家，还是在贫穷的国家，这一悖论都非常刚性地存在着，很难找到令人满意的平衡点，让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困窘之中。这种社会现象提出了一个冷冰冰的命题：道德的限度。温温馨馨的道德要求，总是被冷酷的现实击碎。遇到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就要看运气了。

武芳的运气还算不错。入院时，烽火村来人交了 1500 元，之后，武芳父亲武忠义交了 500 元，正如报告中所说，预交了 2000 元。但远远不够，特别是接下来就要做几次大面积植皮手术。

医院在费用没有到位的情况下，为她尽了最大的努力。第一次手术：头、面切痂植皮。第二次手术：胸、腹、左上肢切痂植皮。两次手术和必要的住院治疗费用已经远超出了

预交费用。接下来怎么办？总查房时，一位教授痛斥烽火村惨无人道，不来承担应有的责任！吩咐医生立即向院部报告，采取积极的措施抢救病人，同时，催促烽火村交费。

肥得流油的烽火村，交了1500元后便一毛不拔杳无踪影了。严格地讲，这1500元也不是烽火村的，而是武芳的。

烽火村好恶鲜明。三年后法院宣判，罪犯之一给武芳经济补偿2000元。烽火村预交的住院费便算是给武芳的经济补偿，补贴给了罪犯。烽火村宁愿补贴罪犯，也不愿拯救生命垂危的武芳。这便是有着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的烽火村！

武芳承受着极度的痛苦。第一次、第二次植皮成活不够理想，不久又作了第三、第四次手术。第三次手术，头、面、双上胺、胸、腹肉芽创面植皮；第四次手术：背部切痂，头、右上肢肉芽植皮。从病案示意图看，为了植皮，几乎把身上的全部好肉皮剥了下来！把烧焦和溃烂的皮切掉，把好皮揭下来植上去，这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啊！母亲见状，痛不欲生。

他母亲八年后跟我说：“我们家芳儿像羊一样，被人家活活地剥了一层皮呀！”

武芳也无法形容当时的痛苦。她只是哭：“遭的那份罪没法说呀……我不知道我是咋活过来的……”只见那只好眼睛兀自留下细细的一丝泪水。“我的泪水早就流干了。”她说。

痛苦突破了极限，便进入了麻木，像是一块石头无声无

息地扔进了万丈深渊。

一个女人，一个憧憬着未来的女人，被毁了容还怎么活？她曾经彻底绝望过。她恳求主治医生：“医生你给我打一针吧！让我去死吧！”

医生说：“不行，那是犯法的。”她暗自藏了一把削水果的小刀，被护士发现没收了。在陕西省医学院治疗时，睡不着觉，医生给了“安定”，她就偷偷地攒着，想攒到足以让她睡死过去的量，直到被医生发现。

她的一举一动早就被医生注意了。没了“安定”，更是烦躁。医生说：“吃药时，会喊你。”

她哪想吃药？此时，她只想去死。这个世界与她毫不相干了。然而，她求死不得。医学院四楼是烧伤病房。这一天，天气格外好，她突然觉得身上有了点儿力气。自从被硫酸烧伤后，已经住了两家医院，好几个月没有下过地。她想下床走走。她想呼吸窗外的新鲜空气。更重要的是，她想“看看自己还有没有站起来的能力”，想见烧伤科大门以外的人们。几个月来，她不敢照镜子，却又每时每刻想象着自己的模样，想象着外界的反应。烧伤科这扇大门里，无论是病人还是医生，在他们的眼睛里看到的只能是“见惯不惊”，只能是同病相怜。她要看到的是真实的反应。这种想看到真实反应的强烈欲望折磨着她，虽然“真实反应”完全在她的预料之中。她扶着床栏，扶着墙面，一步步往外蹭，内心忐忑不安。她

不知道等待她的将是什么。

“武芳，慢点走。”病友叮嘱。

“嗯,”她轻轻答应着。

“作孽啊……”病友在她身后轻轻地叹息。

她来到了走廊。不远处，便是医生护士的办公室，再往前是走廊尽头，有一扇窗户，灿烂眩目的阳光斜插进来，生机勃勃的模样。她仿佛受到了某种暗示和鼓励，扶着墙继续往前磨蹭。她右眼的视力略有恢复，已能朦朦??看清一些人物。她要到那窗口去。花儿还在开么？鸟儿还在叫么？树木是否还是那么葱茏？她的心早已扑到了窗口，让阳光赤裸裸地照耀。她的心渴望着从死寂中复活……她继续拖着虚弱的脚步往前蹭。猛然间，她发现前面有镜子，一面显然是医生护士的穿衣镜。“镜子!”她的心里“嘎噔”的一下。

女人的一生，是伴随着镜子的一生。镜子是女人生活的一个部分。从扎横七竖八的小辫儿开始，到情窦初开打扮自己，到适应社会和满足心理的审美设计，每天都要在镜子里观察自己的变化。快半年了，她都没有照过镜子。不是不想照，而是不敢照。家里给她拿来了一面小镜子，她压在枕头底下，无数次地拿出来，又无数次地放回去。每次拿出来放回去的过程，都是巨大的折磨。她一摸到光滑的镜面，心脏就“咚咚”直跳，说不清是紧张还是恐惧。镜子拿出来时，她总是让镜面朝下。镜背是一片朱红色，她只要一翻，便是

“自己”。朱红色的一面，仿佛是历史，是回忆，是曾经有过的虚无，是美好的梦，将她屏蔽在一个易碎的世界里。光滑的一面，才是现实，冷冰冰的现实。“翻还是不翻”，天哪，这样的选择，几乎让她窒息！

真实是这么的逼近，又被她推得这么的遥远。“我实在是没有勇气在镜子里面对自己。我想，当时我如果看见自己的模样，真不知道会是怎样的后果。”她说。八年来，她砸碎了数不清的镜子！她家大立柜的方镜，就不知被砸了多少块。她尽可能地不去面对镜子，只有在心情好的时候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独自坐在镜子前，梳那毫无生命的假发。然后是静静流泪，然后是小声抽泣，然后是嚎陶大哭，然后便疯狂地砸镜子。她把自己的绝望和愤怒全部倾泻过去，把自己和恶势力和社会的战争，变成了自己和自己的战争。她扑过去，有东西就沙东西，没东西就用手，拼命地砸，拼命地捶，镜子破了，手流血了，还是不停，直到没了力气。再看镜子，玻璃裂纹把脸撕扯得更加变了形……

镜子就在眼前，她必须通过。她甚至有了几分好奇，几分自己认识自己的强烈欲望。她站在了镜子前。她先是忐忑地旭斜了一眼，看不怎么清，干脆摆正身子直视……镜子里面站着一个人，穿着病号服，头部脸部烧得一片混陀，没有任何一点女性的特征！

她自问，这是“我”么？这怎么会是“我”？镜子里的

“我”，看不见以往的“我”一丁点儿的迹象和联系。两个互相陌生的“我”在两个互相独立的世界存在着。她们一个在人间，一个在地狱，同时也分不清谁在人间，谁在地狱。她们仿佛在互相询问:“你是我么？‘我’是‘我’么？”你是我。我是你。你不是我。我不是你。但是，“我”肯定不是“我”。“我”与“我”，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既抽象，又具体——被抽象被具体得那么惨无人道，那么不可解释。“我”既存在又不存在。“我”似乎丢失了，丢失得是那么彻底，像是一丝轻风，一缕薄云，一声鸟鸣，一忽儿了无踪迹。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我”失去了:“我”，“我”不是“我”，“我”成了另外一个“我”，“我”的存在还有意义吗?

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她在镜子里看到另外一个自己的时候，竟然没有大声喊叫，大声哭号。她的内心出奇地踏实、平静。她能感觉到一个“我”正在召唤另一个“我”。“我”注视着，“我”。就在互相注视的一霎，她明白了走向……女人的容貌如同生命，甚至比生命重要。容貌被毁成了这个样子，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她走向走廊的尽头，走向阳光灿烂的地方……她想翻上窗台，可是，她的身体太虚弱了，两条腿根本不听使唤，铅一般沉重。她使劲爬，使劲爬，虚汗如雨，一米多高的窗台，真是比登天还难！“天哪，就是爬不上去啊!”她说。她倚在窗子边喑喑地哭泣。苍天有眼啊——“我武芳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啊!”

05

——

由于经济的原回，87 天后，武芳从四医大出院了。她做了四次植皮手术，已经欠医院五千多元的费用，催烽火村，也不见人来，医院的忍耐已到了极限，无休无止地拖下去，还有完没完？病人拖欠医疗费用，不只武芳一例，给医院带来了巨大的财务压力，不得不在《西安晚报》呼吁社会正视这个问题。不只武芳一例，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院方被迫做出了让武芳提前出院的决定。武芳在颅骨外露、多处创面未愈的情况下出院，听天由命。

1988 年 7 月 21 日，快中午的时候，四医大的救护车把武芳拉回了烽火村，随车而来的医院会计始料不及，烽火村村干部闻讯演了一场“空城计”——他们全伙逃逸，留下了空空的村委会。八年后，这位医院会计说：“我们当时犯了一个错误，事先不该给烽火村委会打电话。我们到烽火村后，干部们无影无踪，鬼影子都看不到一个。我们如果不打招呼、突然袭击就好了。但是谁能想到他们竟是这样没有心肝呢！”

汽车停在村委会或接待站门口，把武芳的担架抬下车，也放在门口。这个看见便让人伤心的门口。原来是进去了出不来，现在是出来了进不去。大门口，一扇铁门，一把铁锁，为推开锁，为推开门，欢迎谁，不欢迎谁，每时每刻都体现着烽火村最高统治者的意志。显然，武芳是不受欢迎的人，

医院也是不受欢迎的医院。还在武芳住院的时候，就有烽火村的人在医院散布，武芳是个作风不好的女人，给她治什么病，活该，死了才好。现在倒好，她不仅没死，反倒抬回烽火村家门口来了。

7 月的关中平原，天气炎热。烽火村地处渭北高原脚下，空气不能对流，更是酷热。武芳进不了屋，就在大太阳下躺着，挪到树荫下，仍然遮不住滚烫逼人的暑气。武芳是大面积烧伤病人，汗毛孔封闭，体内热量不能散发，内外夹攻，苦不堪言。

烽火村围观的人很多，没人给武芳送口水喝，也没人给同来的护士、会计、司机送口水喝。有的人幸灾乐祸，更多的人不敢。烽火人行事，必须唯党总支书记王保京、王二公子农业父子和村干部马首是瞻。全村的人，谁不知道这事儿的来龙去脉？谁不知道王家父子和村干部的是非好恶？谁不知道对他们的意志稍有许逆，便会有严重的后果？即使同情，也只能是心里同情，眼神里是看不到的。他们的是非好恶喜怒哀乐如果没有充分安全的条件，绝对不会表现出来。这是中国农民的生存之道。为了他人，为了宣泄一种情绪，为了一种抽象的目标，他们不会轻易地做出选择；心里再有数，如果条件不具备，再苦再累再受蹂躏再有冤屈，都会逆来顺受，苟且偷生。这时候最丰富的表情是没有表情。这时候最佳的存在是没心没肺一张白纸。你既可以把它看作麻

木、冷漠或得以幸免的窃喜，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同情、关心或敢怒而不敢言。但是，外来人绝对没有资格对在场的人的真实想法做出判断。他们站在那里，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每个人所代表的利害亲疏的背景。他们在那里存在本身便说明了某种意义。然而，无论多么高尚，无论多么韬晦，无论多么有生存的道理，“无动于衷”实际上给恶一种暗示，一种鼓励，极而言之，不啻是为虎作伥！

可能只有武芳知道围观者的真实心态，她毕竟在烽火村生活了八年，她了解烽火村的水深水浅细枝末节，她曾跟下峪口的派出所所长说：“你没去过烽火村，不知道烽火村的狼是麻的。”可惜她看不清楚，不知道来的是羊还是狼，或者是羊与狼结伴而来。不管多么窝囊和悲惨，人们有一种预感，武芳活着回到烽火村，给烽火村似乎已经恢复了平静的水面又扔进了一块石头，激起的波澜足以影响烽火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都了解，她是个烈女子，这事儿不算完。

武芳在地下躺着。她热，穿着医院的病号服，盖着白被单，无法散热，五脏六腑都在燃烧。她想喝水，没人给她倒水；她想吃饭，没人给她送饭。护士、会计、司机从上午到下午，别说吃饭，水都没有喝一口。他们找干部找不来，等干部等不来，没人问，没人管，武芳交给谁呢？武芳不能妥善交出去，他们也不敢走。又渴，又饿，又热，又急，又气，他们早已失去了耐心。会计还指望着能与烽火村谈判，让烽

火村交上拖欠的医疗费用。不管怎样，烽火村是陕西省响当当的先进文明村，还能不讲道理？她是个好心的老大姐，在医院时就给武芳很多关照。她同情武芳的遭遇，了解武芳的案情，认为烽火村应该对此负责任。他们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更没有人积极协助，指点迷津。她太失望了。她放声大骂："什么先进文明村么！人的死活都不管，还是人么!"任凭怎么骂，没人吭声，没人接茬，烽火村如同一只缩头乌龟。眨眼的功夫，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走又不敢走，武芳没有着落，哪走得掉？可这样呆下去，烽火村摆出这般唱空城计打持久战的架式，何时能了，何时能休?

"我要是早知道烽火村那个样子，我根本就不去!"八年后，王会计说起这事儿，怒气未消。

此时他们正陷在烽火村，走，走不得，留，留不得，进退两难，煞是难堪。这个局面，早在武芳的预料之中。开始征求她的意见时，说能不能把她送回娘家，她坚决不同意。"我是烽火村的人，烽火村把我搞成这个样子，烽火村不管谁管！原来我是死也不进烽火村的门，死了，尸体荒郊野外喂狗，也不埋在烽火村。现在不行。我死也要死在烽火村!"她说。可是到烽火村，干部跑得无影无踪，婆家的大门锁着，显然是不想让她进家门。哎呀，太阳西斜，僵持下去，何时能了，何时能休?

被逼无奈，会计和武芳商量："武芳你看，我们来了一

天了，见不着一个干部，一口水没喝，一口饭没吃，你都见着了，拖下去总不是个办法。我家里还有孩子，他爸开救护车和我们一起出来了，家里没人做饭。我们商量一下，我把担架和医院的衣服都给你留下，把药也给你留下，我们先走，你看行不？”

事已至此，已经不是行与不行的问题了。他们已经尽力了。武芳在担架上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救护车一走，武芳便陷入了绝境。没有人照料她。她孤零零地躺在担架上。这时，来了个老妈妈。老妈妈颤颤巍巍走路，手里端着一碗盯豆疙瘩。“疙瘩”是关中一带面食的吃法，用面裹着某类蔬菜蒸制而成。

“武芳臭得跟狗屎一样！做了啥光彩事嘛？还给这种人吃哩!”有人在一旁恶狠狠地说。

老妈妈撇了一眼说：“咱村人，弄成这了，还说这话！就是犯人也要给吃哩。”

老妈妈把虹豆疙瘩端到担架前，痛惜地说：“娃受苦哩。”

论辈分，武芳该叫老妈妈“婶”。

“婶……”武芳一声“婶”音落地，一老一少已是泣不成声。

武芳说：“婶，难为你老人家哩。你这样待我，人家要寻事哩。”

婶说，“娃，说啥哩。婶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怕啥哩!”

人心都是肉长的。武芳会裁缝，谁家有困难，谁家有事求她，她都帮忙。婶家孩子多，生活困难，她帮着量布做衣服而不计报酬。在婶的眼里，武芳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受武芳恩惠的人家不少，武芳的亲戚朋友也不少，别说主持正义了，要在这个时候伸头相助，确实要担很大的风险。老人不怕。老人的家离接待站很近，一会儿又端来了水，等武芳喝完水，又给武芳接尿。

娘家人不知道武芳这天出院。一大早，母亲带着东西去西安看女儿。不到探视的时间，母亲就趴在病房窗子外面找。咦，女儿的病床怎么空了呢？床单已经换成干净的了，床上什么日用杂物都没有。

母亲敲窗子，问里面的病友："武芳呢"？

"武芳早上出院了。"里面告诉她。

伤势那么重，怎么会出院呢？母亲眼一黑，手一软，从窗台仰面摔到地上，失声痛哭。

路人惊问，她便把女儿如何被骗如何受害如何住院如何不明不白出院的故事讲了一遍。"女子这样子回去，是不得活了。"

路人说："那你还在这哭什么！赶快回去找呀!"

母亲这才清醒，一骨碌爬起来，往回赶。先回北屯村，不在，然后又急到烽火村。

母亲在接待站的走廊地下看见了武芳。

“芳儿！芳儿!”母亲呼喊着奔过去。

“妈……”武芳轻轻地答应着。

母亲扑到女儿身上，母女抱头痛哭。母亲哭着说：“芳儿，你回来，这病咋治哩……咱家没钱，这病咋治哩……”

武芳的姐妹们也是束手无策，跟着哭作一团。

武氏母女的冤屈，感天动地，惊泣鬼神，却不能让烽火人良心发现。

天气大热，创面未愈，恶臭招来了苍蝇和蚊子。母亲赶紧拿出手帕驱赶。然而，这烽火村的苍蝇和蚊子有那么一股子穷凶极恶的狠劲儿，叮住伤口不撒嘴，像是一群饿极了的饕餮之徒遇上了盛大的宴会，打死也不肯离开，密密麻麻一层。第一拨吃饱喝足了，第二拨便扎下来填补空当。

这一天，可能方圆几十里的苍蝇蚊子都赶赴烽火村，呼天抢地地来参加这个盛大的宴会。

二姐夫拿来了“敌敌畏”，撒在担架周围，企图建立一个死亡隔离带。可不知为什么，苍蝇蚊子不怕，仍然疯狂地俯冲下来，置死亡的威胁于不顾，它们似乎断定，软弱的武氏母女不能把它们怎么样；它们似乎认为，87 天前的战役胜负已定，它们也是烽火村的一个部分，它们不过是打扫战场罢了，分一点残羹剩饭罢了。那种肆无忌惮的疯狂劲儿，在场的人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惊心动魄。

武氏母女的哭泣声，苍蝇蚊子的“嗡嗡”声，仿佛是 87

天前、4 月 26 日晚惨绝人寰的恐怖交响。

一二

武芳终于安顿了下来，住在烽火村自己家里。这个家已是空空荡荡。丈夫被逮捕，不到七岁的女儿被婆家领走了。当初，她姐姐把她从这房子里救出去，现在又住了进来，一进一出，恍如隔世。这个只有恨没有爱的家，这个让她伤心透顶的家，这个毁了她一生的家……她的眼睛蒙着纱布，看不见，但是，她能听见，能闻见。一切是那么的熟悉。一切是那么的陌生。不管是熟悉还是陌生，一切的一切，都与她毫不相干。

这种天地翻覆般的变化来得太突然了，以至于所有的人无法适应。母亲第一次去医院看她，进了病房，不知道谁是自己的女儿，问:“芳儿在哪哩？”有人指给她看。“床上睡着一个烧焦了的炭人哩！哪是芳儿、”她说。“芳儿，妈来看你来了,”她试探着走近喊。“妈……”炭人的声音十分微弱,但是足能让母亲判断出女儿的声音了。“芳儿!……”母亲撕心裂肺地哭喊……现在母亲和女儿又在一起了。现在只有母亲能与形如“鬼魅”的女儿在一起。

医院说，武芳必需有专人护理，可是，包括姐妹，谁也不敢来。母亲让外甥女给姨换药，外甥女不敢，母亲喝叱道:“咋不去!”

外甥女忐忑着去揭姨脸上的纱布。“姨的脸儿原来好看

着哩，现在能咋样？”她倒想看个究竟。她刚一揭开纱布，便：“妈呀……”一声怪叫，一屁墩儿坐在了地上。外甥女双手捂着眼睛，一面哭一面说：“婆，你看姨成了(口外)(注：‘(口外)’，在这里是‘这样’、‘那样’的意思)!……我不敢看姨!……我怕!……”

只有母亲守着女儿，给女儿端屎端尿，送水送饭，洗伤换药。越是在这种时候，母女亲情越是强烈。对于母亲来说，不管女儿变成了什么样子，永远是自己的女儿，永远是自己身上的骨肉。

十多天的日子里，母女形影不离，耳鬓厮磨，把过去30年的亲情都浓缩在了一起。即使如此，母亲的内心仍然充满了内疚。“不是我逼着芳儿嫁到烽火，芳儿不会成今天这个样子。”母亲经常这样念叨。

“天哪，我前世作了什么孽!”芳儿住里屋，母亲住外屋。看着芳儿的模样，母亲就想哭。哭还不敢在里屋当着芳儿哭，自己跑到外屋哭；哭还不敢大声哭，只能小声哭，“害怕芳儿听见。”母亲深深地懊悔。

“把芳儿嫁到烽火图个啥？图名，图钱。没图上名，没图上钱，反而把芳儿推进了火坑。”母亲说。

为了赎罪，为了忏悔，为了拯救芳儿，叫她做什么都可以。

为了给武芳筹集经费治病，武家倾家荡产。农村家庭怕

两件事，一是天灾，一是人祸。武家什么都摊上了。武家的所有成员在之后的七八年时间里，生活秩序翻天覆地地变了一个模样。

四医大治了一半被推出来，在家呆着也不是办法；在家呆着，只有死路一条。出院时，医生说，出院三个月后，“门诊复查。”这都是空话！农村这样的条件，武芳这样的病情，三个月？三个月死了好几回了！武芳回家十几天，病情不断恶化，可又回不了四医大，欠了人家几千块钱，咋回？可是必须住院。

第二次住省医学院，需要 1500 元住院费。八十多岁的外祖母把寿材卖了，870 元；母亲卖了肥猪，190 元；二姐夫在信用社贷了 300 元；大姐把纺的羊毛线全卖了，大姐夫到河里捞石头卖……只要是能卖钱的东西，都卖了；只要能借钱的地方，都去借了。刚凑够了治病的钱，还没有吃饭的钱，找西安的叔父借了 50 元，才勉强凑合。为了省钱，武芳把医院规定的五顿饭减为两顿，两顿饭也拣最便宜的买，有时饿着不吃，等家里人给她送干粮。

那天下着大中，“大得很大得很”的大雨，把一个西安城都下黑了。母亲早早地卖了布，拎着十几个鸡蛋，冒雨去看武芳。武芳天天盼望着母亲，盼啊，盼啊，就是盼不来。今天这么大的雨还会来么？她已经饿了好几顿饭了。病友和医生问她：“咋不吃饭哩？”她说：“不想吃。不饿。”“妈呀，

妈呀，你咋还不来哩。”……正盼着，浑身湿透了的母亲进了屋，喊着“芳儿，芳儿”。母亲第一次到医学院。一个乡下人，一个平时围着锅台转的农村妇女，一辈子进县城都有数，偌大个西安省城，这个车转那个车，蒙头转向，茫茫大雨中迷了路。她知道武芳吃不起医院的饭，等着盼着她给送饭。她心急如焚，还是一个好心的大妈把她带到了医学院。到医院时，天已傍晚。

武芳听见母亲来，轻轻地喊道：“妈，我饿……”

母亲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芳儿……”

母亲不知为芳儿流了多少眼泪。武家，母亲是灵魂。父亲是上门女婿，老实巴交的木匠，村里人叫他“武老汉”，又叫他“武老实”，谨谨慎慎处事，老老实实做人，在外从不争强好胜招惹是非，在家大小事都听任母亲做主。母亲生性好强，里里外外操持着，养大五个孩子，最大限度地维护着这个“外来客”家庭起码的尊严。

一看便知，这是个有主意、担得住事儿的农村老太太——瘦削的身材，挺直的腰杆，齐脖根的花白短发，利利索索地别着发夹。武芳的性格像她母亲。武芳出事后，母亲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女儿救回来。

武芳情绪不定，经常变态，冲着母亲大嚷：“妈，你救我做啥哩！我这副样子，活着还有啥意思！不如死了！妈，你救女儿，是害女儿哩！是害女儿哩！”

母亲一声不吭，只是擦泪，依旧给武芳擦洗伤口，端屎端尿。母亲知道武芳安了必死的心肠，说：“芳儿，你不要寻死寻活哩。你死了对得起谁！为了给你治病，全家都掏空了。为了给你治病，跑了多少路，流了多少泪，磕了多少头!你死了，谁来给你伸冤，谁来给你报仇？”

母亲知道女儿活得屈辱。女儿活得屈辱，何尝不是母亲的屈辱?

母亲说：“芳儿，这是命，你谁都不要埋怨了，这是命啊……你今天活着，你死人变成了活人，我们母女能在一起说会儿话，这就好啊……”

母亲是个坚强的母亲，但是，为了救武芳，她也可以屈膝下跪。武芳住院要钱，有人提示说：“烽火村发生的事么，烽火村委会发生的事么，村干部参与的事么，烽火是先进村文明村富裕村么，咋不找村干部？找王保京!”

王保京？谁敢找。他可是个一跺脚，三秦大地都要抖三抖的人物。

“人家全国劳模哩，副市长哩，见咱？”

“咋不见!他还是烽火村支部书记哩。烽火村的大小事，他拿着哩。”

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王保京虽然位居咸阳市副市长，但烽火村的事，他说了算。

“对，到咸阳城，找王保京。”

06

一三

不知道为什么，案件没有任何进展。一种神秘的力量让时钟停摆了。

武芳等待着。一年过去了，传来的都是坏消息。罪犯王茂章，利用工作之便，给哥哥提供硫酸，证据确凿，抓进去没几天便放出来了，听说还养了娃，除了罪犯王茂新，其他参与者都安然无恙，活得舒舒服服。公安局检察院来过没几次，简单问几句就没影了，大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架式。不知道为什么，沾了烽火村的事，人们就讳莫如深，就鬼鬼祟祟，就退避三舍，就无法无天，冒天下之大不韪。天底下竟有这样的怪事，如此严重的罪行，顷刻无声无息，化为乌有。那么清楚的事情，那么长的时间，罪犯逍遥法外，正义得不到伸张，武芳忍无可忍了。她再也不能把自己关在屋里了。她一个小老百姓，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蝼蚁般的命，不能指望别人来主动怜悯她，关心她。她必须走出家，走出礼泉，走出咸阳。原来的武芳早已死了。现在的武芳藏着躲着，怕见人，见不得人，靠人家的怜悯和施舍活着，终究不是办法，终究解决不了问题。藏着躲着，苟且偷生，如同死人。母亲说过:“你死了，谁来给你报仇伸冤!”姐妹们鼓励她:“芳，咱去告！拼个鱼死网破也要告!”

从此，乡亲们看见了武芳的身影。“武芳还活着哩!”“娃

没死哩!”人们惊叹武芳顽强的生命力。人们诅咒：恶人得不到惩治，好人得不到保护。这起特大的故意伤害罪，本属国家公诉，本应从重从快，可是靠不住。“我不相信烽火村能一手遮天，不相信没有人出来主持正义，主持公道。”她说。

然而，她如此微薄的力量，能让一架见风使舵、被权力左右的大机器重新启动?

那些年，礼泉到咸阳的车费是两块七角钱，咸阳到西安的车费是一块多钱。对富人，这不是钱，对穷人，能急出人命来。就这几块钱欺负人。没钱，找亲朋好友乡里乡亲借，长期借，借多了，还不上，不好意思再借。穷亲戚，穷朋友，穷邻居，油盐酱醋柴，都是算计着花，家家都不宽裕。武芳重新捡起了裁缝活。她被逼无奈。暂时的救助，暂时的关怀，长此以往，怎么能维持？而且，一时怜悯，不能时时怜悯，怜悯下去，不是出路，她需要怜悯，需要有人来抚慰她受伤更重的灵魂，然而，这有限度。别人也有别人的生活，她埋怨不了谁。按她的秉性，她最讨厌的就是怜悯。她绝望过，软弱过，此时，她意识到，怜悯下去，会让她更加绝望，更加软弱。祖祖辈辈庄稼人，她听到的，看到的，都是这么一个事实：天灾人祸，谁也靠不住，只能靠自己。何况她面临的是一片没有尽头的苦海？严格他讲，她没有希望。她仅仅是话着，顽强地活着，为了惩治那些至今仍然逍遥法外的恶

人而活着。她不能在姐妹家白吃饭，还要积攒进城告状的费用，可是她出不了门。她原来会裁缝，有一手好针线活儿，可如今，手残废，眼残废，摸不着，看不见，穿不得针，引不得线，下不得剪刀，怎么办啊！

她想到了外甥女。外甥女也和所有家里人一样，在慢慢接受她，适应她，慢慢地消除恐惧。看姨可怜，也想帮一把。她借来了外甥女灵巧的手和明亮的眼睛——原本她也有的灵巧的手和明亮的眼睛。缝纫机旁坐着两个人。她教，外甥女学。她动嘴，外甥女动手。因为手生活慢，质量、时间难以保证，收费微薄，就挣一个去咸阳西安的车票钱。好人家可怜她，多少送些活过来。遇到借过钱的人家，不收费，算是报答。

从此，武家的缝纫机开始旋转了。武芳坐在缝纫机旁。她的生命随缝纫机的飞轮而旋转，如同驰骋疆场的武士寻回了战马，如同乐师紧抱着琵琶，切切磋磋，仰大嘶鸣。“嗒嗒嗒嗒嗒”的声音敲击着全家人的心，给全家死寂绝望的气氛注入了希望的气息。“嗒嗒嗒嗒嗒嗒”的声音，如泣如诉，哀命运之多舛，世态之炎凉；如歌如吟，怨世道之不公，人生之无奈；如啸如吼，怒权势之勾结，置生民水火于不顾！“嗒嗒嗒嗒嗒嗒”的声音，在关中大地徘徊，在渭北高原徘徊，时而逼近时而悠远，时而清晰时而含混，时而平和时而跌宕，时而自信时而犹豫，时而柔弱时而刚劲有力，百转千

回，肝肠欲碎。闻之者，无不扼腕叹息，痛心疾首！

武芳的行动鼓舞着家里人。他们看够了别人的脸色，尝够了生活的屈辱，以至于酿成今天这般局面。他们知道，武芳的命运，不仅是武芳的命运，而是他们武氏全家的命运。武芳的命运不过是武家命运最极致的表现罢了。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没有对武氏家庭生存势单力薄的自艾自怜，没有对烽火村权威的胆怯，也不会有今天这般局面。原来武家只有两个男人，一个被生活压弯了腰的父亲，一个年幼的小弟弟——武家不堪威胁的根苗，现在又多了三个男人——大女婿、二女婿、小女婿。武老实的驼背驼腰，不啻是整个家庭的象征。老远的，看见武老实走过来了。说是家里没有劳动力，他带着七八岁的小外孙守苹果地哩。今年风调雨顺，几亩地的苹果长得好啊。母亲说："地里搭了窝棚，黑天白夜地守，好几里路，晚上不回家，饭往果园里送。"武老实年老力衰身残，木匠活早就撂荒了，全家的收入都指望这几亩苹果园。

礼泉县盛产苹果，产量号称全国第一。平原、山区的庄稼地，大部改作了苹果园。正是苹果成熟的季节，漫无边际的苹果园，关中大地洋溢着"富士"、"秦冠"的芳香。

武老实听说家里来人，带着小外孙，身前身后地回来了。他佝偻着跨进门槛儿。这是个看上去让人心酸心碎的老汉。黑对襟衣服，扎着裤脚的黑布裤子，黑圆口布鞋——活脱脱

一个古书里所谓的“黔首”。他的脸和手以及暴露在外的所有皮肤，是浓浓厚厚的酱油颜色，一头雪白的发茬。酱色和雪白如此搭配在一起，有一种撼人心魄的感觉。他是个大个子，或者说他曾经是个大个子，由于弯腰驼背，身体足足矮了一半，而这高矮之间的差距，仿佛是大地之间的压力和重负不可抗拒的结果，是不得不屈服于压力和重负的结果。那根本来是挺直着的脊椎——一根男人的脊椎，被残酷的生活一节一节地摧毁，一直到让人的脸贴着地面走路方才罢休。他跟人说话仰着脸。他的脸上，沟壑褶皱，错落密布，挣扎，归顺，颜色由浅而深，像是刀削斧凿的结果。和他握手——一只大手握住，能感觉到铜浇铁铸的大骨节和嶙峋经脉间非常遥远的铮铮响声。当他侧脸仰望着你的时候，你能看见一双眼睛——一双与人为善、包容一切人间苦难的眼睛，一双与世无争、只期待最低生存标准的眼睛，一双逆来顺受、不知道与它说什么的眼睛，一双只能相信它并聆听它的眼睛。这是一双极其罕见的眼睛，它的背后似乎没有欲望，没有要求，或者早就消解了欲望和要求。这双眼睛贴着地面行走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思考还是认命，你不知道它是喜悦还是愤感。平时，你看不见他的眼睛，无论是正面背面侧面，你只能看见他佝偻的身影——只面对土地的身影。“屋里坐，屋里坐。”他把人让进屋，炕上刚刚坐定，便低声说，事情不能在院子里说。“别人听去了哩。”好像阳光下的任何地方

都有恶意的眼睛和耳朵，唯有暗淡的小屋子里安全。人多，拥挤，只好挪出去。

大家围坐在那棵石榴树下。他拿出烟杆儿，慢腾腾往铜嘴里拐着劣质烟丝，说到伤心处，便一面哭泣一面把没抽完的烟丝磕出来，阳光透过石榴树的枝蔓，一缕缕照射在他的身上，并没有改善他老老实实的黑色基调。石榴树保留着家乡的记忆，也时时提醒着他“身在异乡为异客”的身份。老人在哭泣，隐隐不敢放声；声音压迫在胸腔里，上下翻腾而不得宣泄。他坐在半尺高的小木凳上，身体越发佝偻，缩成了一小团儿。小凳子有了历史，硬杂木，木纹里深嵌着污渍。武老实的木匠活儿，方圆几十里闻名，怎会有这般矮小别扭的作品？如此庞大的身躯坐上去，便能感到它的扭曲和呻吟。武老实让座，先把高座让给客人，自己矮矮地坐在客人的面前。没凳子了，他便会讫蹴在一旁。总之，要矮别人一截才习惯。似乎只有这样的格局，才能使他真实，才能谦卑，才能低声下气说话，谨谨慎慎做人。以往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一种莫名的压抑气氛扼住了喉咙，想喊，想大声喊，却喊不出来。人到极情处，大悲，大喜，大哭，大笑，大声喊叫，在他已属奢侈。卑微的，轻轻的，猖猖的……反之，神灵似乎便会震怒，乾坤似乎便会倒转，秩序似乎便会崩溃。为了拯救武芳，武老实曾跪在王保京王副市长脚下哭求。他也是这般哭么？任何一个有心肝有良知的人都会动

容，可是从王保京王副市长那里换来的却是喝叱和驱逐！武老实形容王保京王副市长当时的模样：“杀伐！”

一位陕西作家解释说，陕西地界，文化厚重，民间多存古语。“杀伐”便是古语，“其势汹汹”、“气势威风”、“杀气腾腾”的意思。“杀伐哩”，好生了得、极其凶狠状，或者就是一种气氛；“某人杀伐”，是说某人气焰嚣张，威严逼人，具有左右局面而不可逆转的气势和能力；“某人长得杀伐”，是说某人高大魁梧，长相威风，凶神恶煞的模样，寺庙大门的守护神“四大金刚”便可说“长得杀伐”。这是贬义。随着语境的变化，还有褒义，或者贬义中就包含着褒义，要看什么人什么事什么环境，要听叙述者的语气语调和情态。更深的意思，更微妙的情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即使倾听者有与叙述者同步的语言背景和经验背景也是如此。当然，一句“杀伐哩”，可能把所有的意思都包含了。

这是中国语言的神奇之处。我们要感谢王保京王副市长，没有他的“杀伐”，就没有今天这番访问了。

武老实从来没有这么多话，了解的人说，武老实“把八年的话一次说完了”。

他哭诉着：“芳儿定到烽火了嘛……芳儿不愿去，那不成嘛……哪有定了的事又翻悔呢？……我们武家虽然穷，名誉品性顶重要嘛……这样把芳儿害苦了！……啊啊……我临潼家穷，14岁就出来做木匠活儿……弟弟生出来养不活，60

天就送了人，改姓了吴……烽火村有个村风，嫁到烽火村的人，想离婚，可以从村里死着出去，活着不准出去……芳儿嫁过去，还是不愿意，想离婚，不敢去乡里开证明……她哪敢去？……只有跑嘛……芳儿定亲后，不愿去……我想烽火村是个文明村先进村嘛……咱的村，穷得很……人家是个富裕村嘛……过去有碗饭吃嘛……咱又是个鳖人……独门独户的……我们跟人家定了亲，话说出了口，到时候人不去……丢不起这个人啊！……女婿又是个胡来的人……嗨嗨……好坏有碗饭吃……一句话，惹不起人家……咱也是瓜（注：'瓜'，关中方言，'傻'的意思）的……糊涂得很！……说媒的，来村里卖猪娃，说烽火有个娃，把芳儿说过去……烽火村有规矩，说媳妇，不准多给彩礼……但是，嫁女却多要彩礼……王保京是'好狗护三家，好人护三村'……说是新事新办，'退礼不退亲，永远不变心'……收的彩礼都要退哩……把我们这些穷人整扎啦！……女方看婆家时还要带一成礼……120元……'四色礼'：一身衣服，一双袜子，一双鞋，一张手帕，一只木梳……这成啥了么！……啊啊……咱瓜得很……烽火村挂羊头卖狗肉……谁不知道，他们发达，都是靠国家么……我临潼妹夫也是劳模，认识王保京……芳儿出事后，妹夫和我商量，去找王保京，不见么……去寻县上的老干部，寻了这个寻那个……老干部说，'你不要到处跑了，去寻王保京，人家是市长，村党支部书记，给点钱就

成’……我们给王保京跪下……王保京一分钱也不给，一口水也不给喝，就撵出来呀……”

这似乎与王保京的身份和形象不符，似乎与烽火村历来的宣传不符。烽火村堪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范。不信？有诗为证，有史为证。听了武老实的故事，还要听听《烽火春秋（续集）》记载的故事。

70年代，烽火村学小靳庄，学得邪乎，说半年写了上万首诗，弄得烽火村成了陕西的小靳庄。

何谓“小靳庄”？小靳庄是天津市宝抵县的一个小村庄，是江青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树立的所谓“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型，针对周恩来、邓小平进行残酷的政治斗争。江青等夸耀小靳庄农民如何以写诗、唱样板戏来占领上层建筑领域阵地，登上评法批儒的舞台，并把这种“经验”推向了全国。

在“秀才”的笔下这样写道：社员王文鹏到大队部参加学习，抬头看见前边墙上红纸黑字写着一段革命导师的语录：“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又“突然听见王保京说：‘如何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引向深入？实行两个决裂，咋个决裂法？大家充分讨论一下’”。于是有人议论，“应该和买卖婚姻这个旧传统实行彻底决裂”，“把女子当商品卖，这可害人不浅

啊”！经过激烈的家庭斗争，王文鹏说服妻子将彩礼———一台新缝纫机退还了亲家。在正月初六的“退彩礼会”上，王文鹏的妻子表决心说：“退礼不退婚，退钱不变心，机子不要，订婚有效。”五文鹏则“情不自禁地上台高声朗诵道”：

住上社会主义楼房，

进了理论班的课堂，

学习了马列毛主席著作，

武装了我的思想。

破旧立新退彩礼，

这个头儿我带起，

若问这动从哪里来，

党给我的千钧力。

还有一首社员“集体创作”的歌词《退彩礼》：

青年们，快行动，

订婚彩礼要退清。

父母要支持儿女闹革命，

党团员干部打先锋。

儿女不能当商品，

买卖婚姻行不通。

你也退，她也退，

四面八方齐响应，

大打一场破旧立新的人民战争。

青年们，快行动，

订婚彩礼要退清。

父母要支持儿女闹革命，

党团员干部打先锋。

退掉彩礼一身轻，

退掉了封资修的坏作风。

不要彩，不要礼，

男女老少齐响应。

要共产主义锦绣前程。

这样的史，这样的诗，既先进，又先锋。去掉假大空，去掉“闹革命”，去掉“人民战争”，去掉“封资修”，去掉“共产主义”，留下父母儿女退彩礼、破旧立新的实质内容，足以令人鼓舞，足以证明烽火村的开明。“退彩礼会”，退彩礼，表决心，念诗歌，歌舞升平，天上人间。

那么武老实的话真实吗？

令人奇怪的是，王保京50年代就是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当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党代会代表，党龄几十年，身居副市长高位，居然对武芳没有丝毫怜悯之心，对跪地求助的武芳父母无动于衷，对发生在村委会的惨绝人寰的硫酸毁容毁身麻木不仁？

07

一四

武老实被逼急了。人说他一辈子沉默寡言。“吃了没有？”村里人见了他问。“吃了。”再不多说话，兀自低头走路。老汉们蹲在墙角树边“谝”，他也是听得多，说得少。芳儿出事后，特别是他和老伴八次敲王保京王副市长家门、两次见到王保京王副市长后，就更加沉默寡言了。原来想得简单，王保京烽火村不给钱，全家人努力挣钱，给芳儿挣一条命，坏人已经抓了，公家自会公断。公断，公断，盼星星，盼月亮，两三年过去了，也没见到公断。案子若无其事地搁在那里，没人出来主持公道，维护法律。

欺人太甚！逼人太甚！就因为是无钱无势地位低贱的草民百姓？就因为烽火村朝中有人？就因为烽火村是陕西碰不得摸不得的金字招牌？就因为此案涉及王副市长的二公子？难道衙门是专门为烽火村为王副市长开的？武老实这个关中农民中最老实最本份的人都急了。事情怎么能是这个样子呢？法律何在！公理何在！武老实说：“兔子急了都要咬人哩!”礼泉没有理就告到咸阳，咸阳没有理就告到西安，西安没有理就告到北京。总要有一个说理的地方。忍耐是有限度的。忍耐已经到了最大的限度。武氏一家动员起来了。父母姊妹全家人都起来支持武芳告状。不管是怎样的结果都要告!

武芳上路了。她的身体极其虚弱。她的创伤还没有痊愈，头部、眼睛、背部还在流脓流血。她应该卧床休息，精心治

疗。她根本不能长途旅行。但是，她坚持上路。没有她，这状告不成。她要去面对社会，也要让社会面对自己。人心都是肉长的。人们啊，你们难道会对面前这位悲惨的女人无动于衷？你们难道会对逍遥法外的罪犯和那些包庇罪犯的人不表示应有的愤慨？她要让人们直接面对她。她要让人们直接面对着这张脸说话，要让人们直接面对这颗时刻都在颤抖的灵魂说话。可她每走一步都是那么艰难。她的身边，要么是母亲陪着，要么是姐姐陪着，要么是姐夫陪着。全家人轮换着陪她告状。他们带着来回的路费，带着馍，一趟一趟地去县城，去咸阳，去西安。饿了，啃一口干馍；渴了，找一个水龙头，喝一肚子凉水。春夏秋冬，告状不止。时间长了，长途车的司机售票员都认识他们了。

“又上咸阳？”

“是哩。”

“咋，还没有告下？”

“没有哩。”

“没人管？”

“人家有人哩。”

“有国法哩。”

“不管用哩。”

“咳，人的眼瞎了！人的心瞎了！”

“……”

一车人唏嘘感叹，然后沉默。

春夏秋冬，往往返返，每次几乎都是一样的对话，渐渐地没了话。售票员见武氏母女、姐妹上车，也不问去哪儿，就知道去哪儿，撕下票，径直递过去，收过钱，钱票肯定刚合适。

最难过的是夏天。

武芳的皮肤大面积三度烧伤，汗腺通道封闭，太阳地里行走，高温炙烤，体内热量又不能散发，内外夹攻，痛苦难当。每每欲昏厥，树荫下歇一会儿，稍好，又继续赶路；见到水，赶紧喝，赶紧洗，用以降温。

她们跑遍了省市县公检法，跑遍了省市县委和政府，跑遍了省市县妇联，跑遍了各个新闻单位。她们喊冤，她们下跪，她们悲泣哀号，以泪洗面。武芳已经没有了女人的顾忌。光看毁坏的脸还不够！她摘下头罩，掀起衣服，成百次地给人看头部乳房腹部惨不忍睹的创伤，让人了解真相，唤起人的良知，激起人的愤慨，希望得到怜悯、同情、帮助和支持。一个女人摘下头罩，给有权有势有头有脸的陌生人看脓看血，掀起衣服给有权有势有头有脸的陌生人看瘢痕累累的胸膛，诉说，恳求，哭泣，下跪……

这种场面成百次地重复，太残忍了！太不人道了！这是社会的耻辱！这是人类的耻辱！这样的场面，一次就足够了！一次就该终止！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一次就该作出强烈

的反应！但是，事实令人失望和痛心。找公检法，因为公检法供奉着神圣的法律，他们是共和国的执法者，应该保护公民起码的人权；找党委政府，因为党委和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因为中国办事，经常是谁官大谁管事，权力可以凌驾于法律；找新闻单位，因为他们应该代表民意履行舆论监督，主持正义，鞭挞邪恶；找妇联，因为妇联是妇女之家，它的天然功能就是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这是架庞大的机器。这架机器眼睛朝上，安有风向舵。这是架能迅速检索轻重缓急利弊得失的机器。这架机器，有时是灵敏的，一经启动，就会飞速旋转，加倍努力地工作；有时，却是那么迟钝，疲惫，势利，无可奈何。这架机器灵敏与否，迟钝与否，要看什么人什么事，要看动力来源于哪里。三年的时间里，武氏母女、姐妹出门进门，进门出门，各种衙门的门槛儿都踢破了，仍然没有感动“上帝”，也不见“神仙”下凡解决门题。她们看够了人间冷暖。

陕西人好唱秦腔，《宋巧姣告状》（又名《法门寺》、《拾玉镯》）人人皆知。明朝时，二八民女宋巧姣法门寺里闯驾告御状，了结了一桩大冤案。这个故事在陕西民间广为传唱。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法门寺大佛殿前，至今还有“巧姣跪石”。相传四百八十多年前，宋巧姣就是跪在这块石头上陈诉冤情，呈递状子。数百年来，人们来法门寺进香拜佛，为宋巧姣冒死告状的侠肝义胆所感动，都要在这块石头上跪，一跪，

默默祈祷一番。跪石上能看见深深的膝盖印，传说是当年宋巧姣跪下的。

法门寺距离礼泉县只有二三十公里。武芳也为宋巧姣的故事感染过。然而，她有宋巧姣一告即准的运气吗？她能碰见吃斋念佛的“刘太后”吗？她们遇见态度好的，还能让个座歇息一会儿，还能给口水喝，还能听她们把话说完，接下她们的状子，答应研究，答应转交，答应有个结果。遇到态度不好的，黑着脸，草草打发了了事。态度好的，几乎都是热情答应，拖着不办，结果是没有结果。有的地方，如果再去追问，立即变脸，说，“这事我们管不了”，“这事已经转给有关部问了”。至于说为什么不管，为什么管不了，转给了谁，无须解释，不想解释，由你去猜去想。几个农村妇女，猜不透，想不透，出得门来，只有伤心，只有哭，直哭得没了啃干馍的气力。

她们的道理很简单：公家人，吃国家俸禄，该管这种事。但是她们不会往深处想。为什么该管这种事？他们的俸禄是从哪儿来的，他们有权力，但是权力的基础是什么？农民交公粮交税，天经地义，这是农民亘古不变的义务。然而，农民把公粮和税交到国家手里那一刻起，就获得了宪法及其相关法律保护的权利。国家在拿到农民的公粮和税收那一刻起，便自然承担了对农民的一系列义务。农民是纳税人。税收支撑了国家，养活了国家公职人员，使国家这部庞大的机

器能够正常运转。纳税人和国家，不是恩赐和被恩赐的关系，而是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严格他讲，国家是在代表纳税人行使管理权力。国家公职人员，无论官大官小职位高低，都是国家义务的承担者。这是中国“民本思想”的源泉，更是现代社会行使国家管理的基础。如果说，“民本思想”还有道德软约束的涵义，那么，权利义务关系所形成的原则便是不容怀疑的刚性原则。这涉及到了政体和宪法等重大问题。如果国家公职人员办事不力，严重读职，监督和罢免程序自然生效。现在的问题出在：一、监督程序软弱无力；二、农民单家独户的小生产生存方式，农民在社会中实际的地位，使他们在争取权利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不利的状态。本该是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成了恩赐和被恩赐的关系——主人变成了仆人，仆人变成了主人。接下来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按陕西人的话说：吃你的饭，砸你的锅；住你的房，戳你的窝；得你的好处，捶你的眼窝。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大门不容易进，小门也不容易进，进了没两句话就被打发出来。无奈，学古戏拦轿喊冤，到政府大门口拦车喊冤。她们看见里面出来小车就拦，谁的车好拦谁。好的，摇下黑窗子接过状子；坏的，慢慢停下来，等你闪开路，一加油门，呼啸而去。车子和轿子太不同了。轿子蹒跚而来，蹒跚而去，拦得住，追得上。小汽车，大排气量，稍不留神就跑得没影儿了。你只能闻到突然加大油门排出来的一阵臭气。

三年了，武氏苦苦挣扎，节衣缩食，硬挺了三年，毫无结果。母亲说：“芳儿，咱认命吧。咱努力了。咱好好过日子吧。”

武芳冲着母亲大喊：“妈，我被弄成这个样子，咋好好过日子嘛!”

武芳急了就乱骂：“这是什么世道嘛！只要我武芳活着，他们也不得好死！看不到结果，我死不瞑目！杨乃武与小白菜还有个结果呢!”

武芳不会罢休。她还要继续抗争。她活下来的全部意义，就是复仇，就是要看到坏人受到惩治。

一五

西安中级法院。

法庭调查。

任维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有人包庇罪犯。”

法官问：“被告，你在文章里说，‘有人包庇罪犯’，‘有人’，是不是指的王保京？”

严格地讲，这是被告——我引用任维原话，法官应该问：“任维说‘有人包庇罪犯’，‘有人’，是不是指的王保京”。但是，我愿意替任维回答这句话的意思。

我答：“指的是所有参与包庇罪犯的人!”

一六

武芳终于来到了咸阳市人大。这个主意，还是位好心的

检察官出的。这位检察官深知武芳案中三昧。他说："武芳，你别到处寻了。你去寻一下市人大，看他们咋说。"

武芳不知道人大是个啥机构，"就知道是个每年开会的地方"。咋说？能咋说？唉，三年告状，告到今天这种地步，除了人大，所有衙门都进过了，早已是心灰意冷。既然检察官说了，不妨去寻一下。

1991 年 6 月 1 日，案发整三年后，市人大法制委员会的同志热情接待了武芳。市人大法工委的热情态度，大出武芳预料。这几年告状，看够了搪塞、推诿、鄙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脸色，寒来暑往，酸甜苦辣，顿时涌上心头。

她哭了，呜呜咽咽，想说话，一肚子的恬，一肚子的苦水，堵在了喉咙口，说不出来，倒不出来，只是呜呜咽咽。她看不清楚，但是她能感觉到周围善良的气氛，同情的气氛，正义的气氛。她知道，周围的人在耐心等待着。她着急，急得捶自己的头，越急越说不出话来。这种情景，让在场的人莫不动容。

"别急，慢慢说。"

"喝口水，慢慢说。"

有人给她倒了一杯水。

"……"

只隔了一天，6 月 3 日，市人大便作出强烈反应。

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方世信在武芳的伸冤信上批示：

“这是一起严重的毁容案件。拟转市检察院，要求尽快查结，向市中院起诉，并将查处情况报市人大法制委。”

市人大主管法制委工作的副主任郭建义亦是拍案而起。他批示道：“对这帮惨无人道的凶手一定要严惩。建议司法机关尽快查清此案，并请法制委随时了解进展情况和问题。”

7 月 25 日，人大法制委《情况反映》登载了“一起故意伤害案长达三年未结案”，并明确提出了处理此案的要求。

在市人大的强力干预下，司法机器开始转动了。在中国政治构架中，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同时又是行政和司法的监督机构，政府首脑和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必经人民代表大会任命。它的权力不可谓不大。但是在实践中也屡显尴尬。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非常实质的意义。咸阳市人大介入并推动武芳案就是一例。

武芳案三年沉闷，终于打开了黑匣子。

一个星期后，市人大接到了市检察院的正式报告。报告称：“此案是 1989 年 6 月 9 日由礼泉县人民检察院送我院审查起诉的，经我院补充侦查，认为被告之弟王茂章身为水泥厂化验员，熟知硫酸的性能而为其兄提供，并帮助灭电灯，推拉压被害人，其行为在客观上起到了帮凶的作用，应为本案被告，属于从犯，1989 年 7 月 31 日，我院将被告王茂章取保候审，列为被告，于同年 8 月 24 日将此案起诉于咸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9 月 24 日，中院以事实不清退回我院。我院经过工作于同年 11 月 14 日又起诉到中院，并对中院所提问题作了说明。中院接案后，又于 1990 年 3 月 31 日退回我院，并转来王茂新的投案自首的证明一份。退查问题有三点:‘一是王茂新与武芳夫妻关系不睦的原因不清。二是王茂新与王茂章在伤害作案前是否有预谋不清。三是王茂新能主动投案，积极抢救被害人，’”“接案后，我院又对被告王茂新投案和抢救被害人的行为作了查证。对中院提出的第一、二问题难以查清，但我们认为不影响本案的定性处理。”理由是:“1、本案是一起故意伤害案件，查清犯罪动机和起因是必要的。本案犯罪的起因就是夫妻感情破裂，被告才产生报复恶念，至于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与本案的关系不是很大。况且各说各有理。武芳说是王茂新经常打她，她过不下去才和人外出的。王茂新说是武芳作风不好，和人私奔。究竟谁是谁非，难以查证。但是，王茂新打武芳和武芳私奔外出都是事实，夫妻感情破裂致使被告伤害武芳(也)是事实。”“2、王茂新与王茂章是两兄弟，至于作案前是否预谋，怎样预谋，两被告均不供实，无法查证。但是，两被告在作案过程中，心领神会，密切配合，已属实施中的共犯。被告王茂章给兄送硫酸，为什么不送到家里，而直接送到武芳住的招待所？把硫酸送到以后，为什么不离开，而仍停候在院内？在压住武芳倒硫酸时，武芳的挣扎、反抗和喊叫，王茂章能不知道

是干什么？倒硫酸时，洒在了王茂章的手上，他怎么马上就知道是硫酸，赶快出房子洗手，而对武芳的情况怎样却放任不管，自己溜之大吉？这些情况，足以说明用硫酸烧武芳的事情，王茂章是知道的，虽不承认事前预谋，但足以认定是本案的被告，应追究其刑事责任。”“此案我院又于 1991 年 6 月 15 日起诉到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人大法制委在报告上批示道：“从报告看，毁容案长达三年判决不了，主要责任在市中级人民法院。”

这个批示显然对市中级法院不利。然而，这仅仅是根据一面之词作出的判断。

球踢到了市中级法院的怀里。市中法如何反应？两个月后，市中法进行了申辩。市人大接到了市中法的正式报告，报告详细陈述了审理过程和退案理由。细读此报告，市中法审理此案，起码和市检察院经历了四个回合。

第一回合：“1989 年 2 月 24 日，礼泉县人民检察院以王茂新一人故意伤害罪起诉至礼泉县人民法院。县法院审查后认为：被告犯罪手段残忍，情节极为恶劣，应属中级法院审级，于同年 5 月 3 日移送至我院。我院审查后认为，该案主要事实不清，应予补充侦查，遂向县法院交谈，以对被害人武芳损害具体程度鉴定不明；王、武婚后感情不睦原因不清，责任不明；卷中反映出王茂章的问题应认真查清，加强对其进屋后拉灯，拉、推、压武芳，脱武衣服的目的，及武呼救

时王（茂章）逃走的原因应进一步审查等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后，于同年 5 月 10 日退回礼泉县法院。望从检察系统补侦后移送起诉我院。”

第二回合：“1989 年 9 月 2 日，咸阳市人民检察院以王茂新、王茂章犯故意伤害罪起诉至我院。我院审查案卷后，认为原县法院交谈的问题并未进行补充侦查，经研究于同年 9 月 8 日以对王茂章应予收监不宜取保候审，收监后加强审讯，弄清其作案前的预谋情况，给其兄硫酸，入室后拉灯，拉、推、压武芳的动机、目的；对武芳与王茂新婚后感情破裂的原因应查清，此与对王茂新处刑轻重有关；对王茂新作案后投案和抢救武芳的情节应查证等六个门题发回检察机关进行补充侦查。”

第三回合：“我院退还检察机关补充侦查后，咸阳市人民检察院于 1989 年 12 月 4 日再次起诉我院，以内函答复我院所提问题时指出：对王茂章取保候审是我院检察委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作出的决定经研究仍维持原决定。王茂章给王茂新硫酸的情况二被告均已交代清楚。入室后推、拉、压武芳的目的是为了让武和王茂新睡觉。二被告均供在作案前没有预谋；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王茂新多次殴打武芳，曾被武芳的（表）姐夫蔡景乐碰见，武芳离婚不成，就跟姓蔡的外出，虽有过错，但对其如此伤害，故被告不具备从轻处罚的条件。并对其他几个问题也以卷内亦能证明作了答复。我院

此次审查研究认为：此案确实不好公开审理下判，按市检察院的复函，王茂章无伤害犯罪故意，既无预谋行为，是让武同其兄睡觉，这只是违法行为，却起诉为共犯。王茂新伤害武芳的原因，投案抢救武的情节未查证，对其刑期如何定。但大多数同志认为，市检察院已有函在卷，坚持不补充侦查，我们还是公开审判，当庭核对事实，把问题摆出来，通过当庭辩论把问题突出出来。然后再研究如何处理。于是决定交付审判。但承办人工作单位的调动，1990 年 2 月更换了承办人。新承办人阅（卷）后，于 3 月 10 日提请业务庭讨论。一致认为，该案基本犯罪事实不清，不能交付审判。但此案我院已经三次受理，两次退回补充侦查，检察机关又坚持不补充侦查，为慎重起见，提请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同年 3 月 16 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业务庭所提问题是正确的，关系到对被告人的定罪处刑，决议由主管院长同业务庭长与市检察院领导及业务处就王茂章与王茂新作案前有无预谋，作案中行为的动机目的，王茂新与武芳婚后感情不睦的原囚，伤害武芳后有无投案、抢救武芳等三个门题交谈后，将案件退回市检察院。他们若仍不同意补充侦查，由他们提交政法委员会讨论。同月 28 日，我院任维副院长同承办人去市检察院与郭志清副检察长、周继斌副处长及市检察院承办人交谈后，统一了认识。郭检察长提出共同去礼泉县召集公、检两家领导及承办人座谈，由县上收审王茂章，进行突击审

讯，补充侦查。同年 4 月 17 日，市检察院郭检察长、刑事检察处顾、周二处长同我院承办人同去礼泉县，在县公安局长王治堂、刑警队侯通胜、县检察院检察长李生发、刑事科刘志辉参加的座谈会上，王局长一再说明，案发后已将王茂章收审三个多月，李检察长也谈县上作了大量工作，但王茂章的门题是定不下来。我们当时提出，收审王茂章的材料卷中没有。最后，郭检察长归纳要做以下工作：1、武芳 1988 年 4 月回村后，谁安排住的招待站，都（是）谁、怎样做劝解工作的，特别是发生伤害的过程中都（是）谁做工作的，要一节一节落实材料；2、进一步落实王茂新作案后给谁咋讲的，有无抢救武芳、贷款给武治病的情节，要落实材料，这直接影响处刑；3、要认真审查王茂章事先知不知道要伤害武芳，原来收审了应将全部材料附卷，如何突击审讯王茂章，县上另行研究，也可以通知市法院办案人员来听听情况，共同出主意；4、王、武婚姻纠葛，即前因要查证，看属于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过程要从材料中反映出来。最后征求大家意见，一致表示按郭检察长意见办。经过以上工作，我们认为，市检察院领导及业务部门同我们的意见达到了一致，故将案件退回了市检察院。”

第四回合：一年以后，“1991 年 6 月 29 日，市检察院在找村干部、群众四人查证了王茂新投案、抢救武芳的情况后，将该案起诉至我院，并以内函说明：对王茂新投案、抢救被

害人的事实作了查证，对你院所提的第一、二项问题无法做工作，但是，我们认为不影响本案的定性和处理，并阐述了理由。”“经我院对这次市检察院移送该案全部材料的再次审查，认为1990年4月17郭检察长在礼泉县座谈会上所定做的四个问题，就新查证的四人十二页材料来看，王茂新投案、作案后抢救武芳的问题基本清楚，但对其余三个问题均不做工作而市检察院函讲无法做工作。我们研究后认为，该案仍不能审理下判，应由检察机关进行补充侦查清原来所定的问题。”

有意味的是，市中级法院在报告最后特别写道：“我们认为，人大这次监督此案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欢迎来检查我们对此案审理的全过程。更希望今后对我们的工作多监督指示。”

言之凿凿，不容置疑。08

一七

中国的司法程序，武芳这类刑事案件的审理，要经过三个部门：公安机关侦查结案后，提交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根据公安机关的侦查结果依法进行核查，如果完备无误，即可根据案情程度向相关法院提起公诉；法院接案后，即行案卷审理，如果条件具备，则依法输入开庭审理程序，直至一审二审判决。这个程序可以通俗地总结为：流水作业，互相协作，互相监督。当然，检察院、法院受理案件有着严格的时

间规定和限制。在司法程序中，除了公安、检察院、法院的监督程序，还有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程序和党委政法委员会的监督程序。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人大的权利和党的权利往往是一体化的，但是也有些微差别。它们毕竟是两个利益主体，如同母鸡孵蛋，一个蛋孵出了小鸡，一个蛋孵出的却是鸭子。鸭子有鸭子的属性。鸭子既然孵出来了，就要按自己的方式叫唤，就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它有自己的嘴已，自己的头脑，自己的尊严。

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咸阳市人大行动了。

一八

郭建义率领市人大法制委一队人马来到了礼泉县。礼泉县是武芳案的源头，他要追根溯源。

人大干预后，市检察院和中级法院都迅速作出了反应。从两份报告来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人大开始认为，武芳案拖了三年，责任在法院。但是看了法院的报告，结论似乎下得太早。那么简单的一个案件，检察院法院起诉发回，三番五次，来来回回，其中必有蹊跷。焦点集中在王茂章身上。

从已掌握的材料看，王茂章收审三个月后即被释放，而法院却看不到收审材料，却在释放一年以后的 1989 年 8 月 21 日由市检察院“取保候审”。检察院在与保人王茂勤谈话时说：“王茂章已构成犯罪，本应逮捕，但考虑到具体情况，

市检察院决定对王茂章取保候审。”在重大犯罪事实没有搞清楚、审讯记录无影无踪的情况下，罪犯有什么“具体情况”值得“考虑”并，“取保候审”呢？犯罪事实清楚，就应该逮捕起诉，什么叫“本应逮捕”？何况人早就放了，何言“取保候审”呢？

市法院对此提出了异议，市检察院则说：“对王茂章取保候审，是我院检委会根据本案实际情况，依法作出的决定，经研究仍维持原决定。”

“本案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没有进一步说明。市法院根据案情判断，王氏兄弟犯罪，有着明显的蓄谋迹象，要求补查王茂章的犯罪动机。

市检察院则以王氏兄弟“均供在作案前没有预谋”为由，认定王茂章帮凶的目的“是为了让武和王茂新睡觉”，也就是说“王茂章无伤害犯罪故意”，提供硫酸，暴力帮助其兄和嫂子睡觉，也只能是“违法行为”，起诉为“共犯”，显然有矛盾。市检察院后来又认定，王氏兄弟“作案前是否预谋、怎样预谋，两被告均坚不供实，无法查证。但是，两被告在作案过程中，心领神会，密切配合，已属实施中的共犯”，并详细阐述了理由。

既然王茂章犯罪证据确凿，理由充分，为什么不实施逮捕，却要“取保候审”，让王茂章逍遥法外达三年之久？“实际情况”到底是什么？

1990年4月，市法院市检察院共赴礼泉调查，县公安局县检察院除了强调县上做了大量工作外，还强调说，根据已有材料，“王茂章的门题是定不下来”。什么“定不下来”？不把收审情况附卷，把人放回家生孩子，就能定下来？

有关人员后来回忆说，县上的意见，王茂章的动机是帮助兄嫂睡觉和好，因此不构成犯罪。也就是说，在如此明白的犯罪事实面前，还有司法人员为王茂章鸣冤叫屈。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了“兄嫂和好”——提供硫酸、使用暴力、通过毁容毁身来帮助“兄嫂和好”，多么善良和崇高的动机！天底下竟有这样残忍的办法来帮助“和好”！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这里面似乎潜含着这样的逻辑：一、武芳是坏女人，王茂章提供硫酸并使用暴力帮助其兄，起码在“道德”上是可以理解的；坏女人应该受到惩罚，只不过惩罚得过了头罢了。二、“睡觉”，谁都明白，此时此刻就是“强奸”的同义语，王茂章顶多不过是帮助哥哥强奸嫂子罢了，顶多不过是犯罪行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态的发展和他没有关系。当然，法律要以事实为依据，对任何嫌疑人，不能作简单的“有罪推定”。但是，不去追踪犯罪线索，避重就轻，甚至包庇罪犯，法律怎么去衡量罪与非罪？

市中级法院显然不能同意这种荒谬的逻辑。严格地讲，市检察院也不同意这种荒谬的逻辑，市检察院案发三年后的

态度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前后态度略有不同。为什么前后态度不同，原因不明。

市、县司法机关联席会议决定，由礼泉县组织“突击审讯王茂章”，并继续侦查一些犯罪的重要情节。事态的发展表明，礼泉县没有执行联席会议的决定，市检察院的补充侦查也没有得到礼泉县的配合。

武芳案从此冷冻，一放就是一年。鉴于此，人大干预，市检察院没有补充更新的材料，在原有基础上重新起诉，当然被市法院发回。出于尊严，法院也要把此案发回。案件又出现了僵持的局面。所以，郭建义要亲自出马打破僵局，推动此案迅速进入审理程序。

郭建义是咸阳的老人。他在70年代曾任过礼泉县委副书记、兴平县委书记，80年代初任咸阳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常委，对礼泉县和咸阳市的“政治生态”了如指掌。他有一米八的个子，身材修长，深度近视，面容清灌，一头白发，往后梳理得非常整齐，虽已年近七十，仍不失翩翩风度。在“阶级斗争”的年代，由于家庭成分的原因，他为政谨慎，做人小心。在咸阳，他被公认为“有水平的干部”。他1992年退休。他临退休的时候，主持处理了武芳案，一时名声大噪，被老百姓称作“郭青天”。他说：“为民伸冤，人大责无旁贷！不能为民伸冤，还叫什么人大!”

礼泉县人大的会议室气氛紧张。经手武芳案的县公安

局、检察院、法院的主要负责人和办案人员都来了，坐满了一屋子。大家面面相觑，各怀心思。他们没有想到，武芳案案发三年，似乎已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今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

郭建义面色铁青。他熟悉礼泉县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他十分清楚，案件虽然简单，发生在烽火村就不简单。他了解到，不仅王茂章取保候审，逍遥自在，主犯王茂新在礼泉县关押期间，“还可以到监狱外溜达”。礼泉县处理武芳案，可以说是黑白不清，人妖颠倒，没有正义公理可言。他说：“武芳案疑点很多。‘麻达’（注：‘麻达’，关中方言，‘麻烦’、‘毛病’、‘问题’，的意思。）在县公安局破案时就种下了。”

首先是王茂章的问题。据 1988 年 4 月 26 日晚值班的县公安局副局长骆永坤回忆，案发后，他即率领十几个公安干警赶赴现场，当时就搞清楚了王茂章给其兄硫酸的案情，并把王茂章拘留了。第二天，他把案件交给了主管刑事的副局长王正公。“发案好长时间了，我们局里研究案件，（主办人员）侯通胜汇报案件时，只汇报了案犯王茂新的情况。我提出：‘不对哩。两个案犯么，咋只介绍一个案犯？’王治堂局长一听就火了，说：‘你办案么，汇报两个案犯哩，咋只汇报一个？……’”王治堂一发火，侯通胜等办案人员缄口不言，会也就开不成了。王治堂宣布散会。后来如何，不甚

了了。

其二，武芳一直指控有女人参与作案，明确说关灯后，首先冲进来抓住她的两只手并压在她身上的是一个女人。骆永坤回忆："我们调查时，有这么个印象，（武芳的）三个嫂子强行帮着王茂新与武芳睡觉哩。"武芳的三个嫂子分别是张彩娥、高雪铃、王雪铃。我们来看看她们记录在案的证词。

1988 年 4 月 27 日（也就是发案第二天），张彩娥的证词："我昨晚去接待站，在院子里见到王雪铃和高雪铃，不知谁说笑哩：'你几个嫂子帮茂新把他媳妇裤子一脱，叫睡觉去么。'人（们）都笑哩。一会儿，武芳住的房间里灯灭了，我还偏哩，没人管（口外）事。当时房子里呐喊哩，声音比较大，停一会儿，我三人先后到武芳房子。当时进去后，谁解裤子，我也没看清。我在武芳脚上脱袜子，当时她脚乱蹬哩。刚把一只袜子脱下，我就出去了。"

1988 年 5 月 3 日，高雪铃的证词：她与二嫂王雪铃、三嫂张彩娥来到接待站。"当时，在外面说话的人也比较多，不知谁说：'他三个嫂子来了。你进去帮你弟把媳妇裤子脱了。'当时话那么说哩，我都没言传。一会儿，武芳住的那个房子灯灭了，我和我两个嫂子先后进去了。进去后，我看到武芳在地下躺着哩。马趴着看不清，因为黑得很。我伸手到武芳身上摸，我摸到腰部时，觉得手粘糊糊，手上还热热地。我没停多大功夫就出去了。出去后，我就在灯亮处看，

我手上的东西，我知不道（是）啥东西，就叫那几个男的看。男的说，可能是硫酸，快洗你手。我把手擦洗后，赶紧到武芳住的房子，叫茂新把灯拉着。电灯拉着后，我见武芳躺在地上，床上被褥、床单乱成一团，人身上脸上的硫酸淌着哩。后我就和我三嫂王雪铃用床单擦武芳身上，用水洗。”

办案人员问高雪铃：“在接待站院子里，谁给你和你两个嫂子说，叫脱武芳裤子？”

高雪铃答到：“当时院子里人多，嘻嘻哈哈乱偏哩，具体谁说的，我没注意（口外）事。”

“你们三人进去后，房子（里）有几个人？”

“和我三个人，共五个人，武芳和茂新。”

1988 年 5 月 3 日，王雪铃证词：“我们三人就在院子里立（着）的。一些男人偏闲传哩。当时不知谁说，像都是他嫂子哩，你去帮茂新把媳妇裤子一脱，叫他睡去么，再说她（武芳）就跑不成了。”

三个嫂子的证词起码提出了如下问题：一、不管动机如何，三个嫂子受人支使，参与了作案过程，其中有脱袜子的，有帮忙时被硫酸烧伤的，为什么没有进一步追究？当时的县公安局长王治堂证实，有“女的压住（武芳的）身子，（让）王茂新倒硫酸”。“当晚收审了王茂新，监视居住了两个嫂子。两个嫂子监视居住了一天就放了”。理由是：“当时分析两个嫂子的动机，是为了协助弟弟（与弟媳）和好。”天底下竟

有这样的和好办法？二、那个操着流氓腔调怂恿三个嫂子进屋施暴的“男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不进一步调查？三、灯一灭，三个嫂子就进去了，作案时，屋里一共只有五个人，王茂章在哪里？他是什么时候进去的？什么时候出去的？为什么只有王茂章本人的陈述，而没有旁证？四、王治堂证实：“烽火村的主要干部肯定在院内门外。（当时）外面（有）好多人看。”这是一起集体参与、集体围观、有明显预谋迹象的重大案件，为什么前期只逮捕了王茂新，而漏掉了王茂章等其他人？是否追究王茂章，是否追究其他参与者，会直接涉及到有权有势的王二公子农业，这是门题的要害。

第三，关于拉灯人。

一九

西安中级法院。

法庭调查。重要当事人，烽火村党总支副书记王正吉。

法官问：“王正吉，1988 年 4 月 26 日晚，你们去做武芳的工作，有几个人在场？”

王正吉答：“四个人。有我，王保东，王中辉，王农业。”

法官问：“王农业是什么时候进去的？”

王正吉答：“在我们后边，王农业进去了。”

法官问：“你们在屋里干啥？”

王正吉答：“我们在里面劝武芳哩。”

王正吉说：“我走时灯亮着哩。”

王正吉说："我们四个人先后出去。我们三人先出去，王农业后出去。"

我当庭询问："先后出去，中间隔了多长时间？"

王正吉说："没有几秒钟。"

09

二〇

王正吉的证言，说明了两个事实，一是王农业在犯罪现场，二是王农业最后离开犯罪现场。

王正吉的证言与武芳的指控一致。

公安局检察院置武芳对拉灯人王二公子农业的指控于不顾，只凭王茂章前后不一的供述，自始至终认定拉灯人为王茂章。这是非常蹊跷的事情。拉灯人的动机和行为，在犯罪学上怎么认定，我们暂且不去管它。把房子的灯拉灭，为罪犯提供了犯罪的条件和可能，无疑是一个必须彻底查清的重大案情。王治堂在案发八年后明确告诉作者："拉灯人一直没有定下来，（开始）都不承认拉灯。""公安侦查被县检察院打回来后……仍然没弄清拉灯（人），只是把药（硫酸）的来源搞清楚了。我的印象，主要情节搞清楚了，（认为）拉灯的情节就不重要了。""我的印象，研究过多次，就是没有搞清楚拉灯（人）。一是拉灯是信号，二是其他人要进去。一般作案，直接就倒（硫酸）了。拉灯肯定有原因。""王茂章不可能是拉灯人。"他还强调："案件分析时，肯定是预谋，

但是在案卷中没有显示。明显有矛盾。”拉灯的情节前面说不重要，后面又说重要，这不是“矛盾”？既然重要，既然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草草收场？“肯定是预谋”，“王茂章不可能是拉灯人”，为什么不继续追查？

王治堂 1953 年参加工作，在法院干了 30 年，1984 年由县法院副院长调任县政法委副书记，1987 年任县公安局长，1995 年退休。从经历看，他是个老资格的司法王作者。他是个细心人，凡他经手的事情，都记在小本上备查。他退休回家的时候，什么都扔了，几十年的工作笔记一本没扔，拉回了一大架子车。武芳案是他经手的重大案件之一，肯定要妥善保管。为了保证与作者的谈话质量，有根有据，第一次谈话后，他又仔细翻阅了家里珍藏的笔记本。关于后来认定的拉灯人王茂章，他的措辞谨慎而肯定：“办案人员侯通胜汇报时，没有报王茂章，只报王茂新。我生气了，把本子部摔了。(我质问道)：‘这个案子涉及王茂章，你为啥不汇报王茂章？’他说：‘王茂章的事不落实。’‘不落实可以查么。你们查清楚再研究！’”关于王农业：“办案人员汇报过程中，没有提到王农业(拉灯)。这有两种可能：一是武芳没说：二是武芳说了，有初审，故意不汇报。如果汇报，我一定要追。侯通胜发案一个多星期就去了西安，看来可能捣鬼。我说老实话，笔录都是毛笔录，事后要整理。”更蹊跷的是，“必须永久保存”的武芳案预审案卷，在公安局不翼而飞，至今

下落不明。

即使如此，在法院已有案卷中，仍然留下了做手脚的蛛丝马迹。

让我们来恢复八年前的原貌。

1988年4月27日，发案当晚，警方对王茂章的讯问笔录。王茂章供认，他从水泥厂化验室找了一个食盐水瓶子（500毫升），往里倒了“多半瓶子”硫酸。晚上他到了村接待站，“候了好长时间”，“我哥从我嫂子住的房子（里）出来。我给我哥说：‘你要的酸哩，我给你带来了。’”王茂新取过瓶子，回到“我嫂子住的那间房子。我就在接待站的院子里转哩。这时候，大约有九点多的样子，我没有看表，时间也说得不太准。当时我哥进去的时候，房间里面灯亮着，停了一会儿，我听见哥进去房间里喊叫哩，具体喊什么，我就不知道。当时门开着，我看见房间里面的灯灭了，我就到房子里面去了。当时我嫂子武芳和我哥在里面撕拉，已经在门口，我就上前拿住我嫂子武芳的手。武芳在拉的过程中，我哥拉的那个手放开，我就把两手都拉住，我就把我嫂子武芳揿在床前。当时房间里面只有我和我哥及我嫂子。灯黑着哩。我把我嫂子的手拉着哩，在往床跟前拉的时候，我听见我嫂子武芳喊了一声：‘妈哦，你咋不管我哩！’我感到手上有了硫酸，就把手松开跑出来……跑出来后，房间里只有我嫂子和我哥。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我回去后就把硫酸

洗了，不敢出去”。警方接着问：

“当时的房子里的灯是怎么灭的？”

“我不知道。（灯）灭了以后我才进去的。”

“到底灯是怎么灭的，你要老实交代。”

“灯是我进去以后拉灭的。”

“那你拉灯的原因是什么？”

“把灯拉灭，把她衣服脱了，让她跑不成。”

在王茂章为数极少的供词中，这份供词应该说是比较靠得住的。从录取供词的时间看，匆忙慌乱中，所有相关的人还回不过神来，不大有可能串供，不太可能周密策划以扭曲篡改案情。这份供词有几点应该是清楚的：一、王茂章作为硫酸的提供者，看见其兄将硫酸带进作案现场，并在参与作案的过程中，不假思索地“感觉到手上有了酸”，十分清楚硫酸的用途。二、他使用了暴力，被硫酸误伤后，迅速逃离现场。三、作案过程供认基本清楚，最后突然改口，揽过拉灯人的责任，并得到警方的确认。但是，王茂章的供词仍有问题。他说房间里只有他和兄嫂，与武芳和其她几个参与作案的嫂子证词不符。

武芳的证词与王茂章前期供认一致：拉灯人不是王茂章。

正如王治堂所说，公安局办案人员侯通胜在案发一个多星期后的 1988 年 5 月 5 日来到四医大西京医院烧伤科，录

取武芳证词。这是第一次司法调查。武芳神志是否清楚，能否接受调查？这是一个关键。

我搞到了医院原始“病历记录”。根据医院病历记录，1988 年 4 月 27 日中午 11 点 30 分急诊住院，急诊检查结果是：神志清楚，血压 110、70，脉搏每分钟 100 次，呼吸每分钟 16 次，体温 37.4℃。5 月 4 日，医院神经外科会诊记录：“该患（者）受伤后，一直意识清楚，口述清楚。”通常情况下，险重病人神志不清，院方不会同意任何人任何形式的访问。

在警方询问过程中，武芳明确指控王二公子农业关灯。村接待站房间里就那么些人，就是数大前发生的事儿，当时的过程，一幕幕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房间里由亮到黑，她跟着王农业往外走，眼又不瞎，人也不糊涂，脸正对着门，灯绳就在门边上，“怎么看不清谁拉的灯”？

武芳八年后回忆说：“我说的这些话，来调查的人根本不记。我问为什么不记，他们不说话。他们后来说，你再也不要提王农业，再提王农业，你的案子永远结不了。”警方的说法，既像是劝导，又像是威胁。警方记录在案的询问是这样说的：“十一点左右，茂新和我吵闹了，我往外想走，他把我拉住，当时门开着，猛地从门口进来一个人把灯拉灭了……”拉灯人等重要案情被模糊了。字面上看，光说了拉灯人，拉灯人到底是谁，没继续问，也没继续说——如此重

大的犯罪情节，这是不可能的！据介绍，侯通胜在公安局经验丰富，办案干练。这就为后来隐去王农业、王茂章出面顶缸埋下了伏笔，也为公安局汇报会上不汇报王茂章、汇报会不欢而散作了一个注脚。

即使如此，武芳一直没有放弃对王农业的指控。

武芳出院后，伤病未痊愈，忍受着巨大的身心痛苦，坚持告状。她在1989年写的。“刑事诉状”上说：“王农业是这事的指挥者和参与者。在受害的这天晚上，是他把灯拉灭（的）。拉灯意味着什么？目的是什么？又出现了什么样的结局？难道说这不应受点法律的裁判吗？”这份写得并不规范的“诉状”散发给了各级司法部门和各级政府。

市检察院也早已得到了武芳明确的指控。

1989年7月24日，咸阳市检察院检察官询问武芳：

“灯是怎么灭的？”

“是王农业劝我走时把灯拉了。”武芳肯定他说，“我往外出走，我丈夫就从后边把我抱住了。我俩正撕拉哩，进来人把我双手拉住了。你（们）为啥不把这人弄住？为啥不逮这个人？烧我的不是一个人。”

但是，指控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1991年6月，武芳呈给市人大法制委的“诉状”，仍然指控王农业是“拉灯人”。

1991年底，在市人大的干预下，罪犯王茂新、王茂章受

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但是，武芳紧迫不舍。她找到了郭建义。“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武芳。把人弄成这个样子，人不人，鬼不鬼。惨哪。”郭建义愤怒地说。武芳对市人大为她伸冤非常感谢，但是对法庭认定王茂章是拉灯人不满。为了慎重起见，郭建义找了一个书记员记录。武芳说：

“开庭那天，我（两个）姐两个姐夫去参加旁听了。开庭时，审判人员问王茂章拉灯没有，王茂章说没有。连问两次都说没有。后来看了条子（手里拿的条子），又说拉来。”

“条子是谁给的？”

“说不上。听我姐说，开庭时，把王茂章拉上来后，他自家人把王茂章围了，给剥鸡蛋给嘴里喂哩……拉灯，是王农业拉的灯。这是真的。当时我看到的。王农业走时还说，对了，武芳睡去，几个月没见面了，睡去。边走边喜眉笑脸地说。”

市人大对此无能为力。正如郭建义所说，问题在前期侦查的时候就留下了。

在 1991 年 8 月 10 日的市人大检察院法院武芳案协调会上，市人大法制委主任方世信说：“王农业最后一个离开房子。他调解（时）说了什么？武芳拉住（他），他不睬，他怎么办？（他）有无反应？”奇怪的是，问题提出来后，案卷中没有丝毫记载，也没人出来说明。

在场的人，谁都知道，这是一张窗户纸，但是谁都不愿

意捅破，捅不好，惹一身骚。

不管公检法的态度如何，之后的五年时间里，武芳坚持不懈地告。她说：“我的一生就这样被他们毁掉了。如果不继续追查其他参与作案的人，我死不瞑目!”

为此，我在八年后对武芳案进行了重新调查。

这是一项极其艰苦困难的工作，更是一项不可回避的工作。糟糕的是，这是一起恶性的刑事案件，我必须像一名受过职业训练的侦探那样，收集大量的证据，而且没有司法调查的条件。????中能感觉到，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在操纵这个案件——包庇罪犯，毁灭证据，误导破案方向。光有感觉不行，需要证据。从哪里人手呢？拉灯人是关键。武芳既是受害者，又是目击者，她被害前后神志清楚，八年连续指控王农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应该得到重视。目前为止，直接证人有三个，武芳，王茂新，王茂章。王茂新已于 1991 年底枪决，王茂章正在服刑，还有没有可能获得其他旁证，为司法重新调查提供线索？

法院的判决，认定王茂章是拉灯人，并按照王茂章变化无常的口供认定了拉灯的细节。王茂章是必须访问的人。

1996 年 7 月 4 日，我来到了陕西铜川市崔家沟监狱。这里是王茂章关押服刑地。下西铜高速公路，一条专用柏油公路，几十公里长，直通崔家沟山区。崔家沟有一个很大的煤矿，山清水秀，与世隔绝。虽然有人多方包庇保护，1991 年,

王茂章也没逃脱法律的制裁。一个多小时的访问，王茂章只是说：原来我也是个好学上进的青年，犯了罪，我愿意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争取重新做人。却拒绝回答涉及案情的所有问题。这条线索彻底断了。这是一次令人沮丧和绝望的访问。然而，临离开监狱时，监狱警方陪同人员告诉我，两天前，王茂章的妻子王亚乐曾来探监，她离开后，监狱管教人员对王茂章进行了例行的问话，问是否对我的调查有用。监狱警方向作者提供了一份“证明材料”。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材料。材料全文如下：

“1996 年 7 月 2 日，在陕西省崔家沟监狱矿建大队二十九中队二分队服刑罪犯王茂章的妻子来探监，探监后，王茂章回到中队。在干部值班室，九中队副中队长廖云强同志询问了王茂章妻子接见（探监）的情况。罪犯王茂章在回答完问话后，谈到其妻要代其申诉。当时在场的有九中队指导员李广智同志，监狱狱政科狱侦干部程建东同志。在询门王茂章的案情时，王答道：‘我是以毁人面容和伤害罪被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十三年，兄和我是同案，已被执行枪决。’在询问作案经过时，王茂章答道：其兄曾让搞过硫酸，王茂章没有问用途。在实施犯罪过程中，灯绳不是他拉的，当时也不知道其兄要用硫酸毁其嫂的面容。王茂章说：‘我去村接待所（站），有人让我进屋内给我哥帮忙，我就进去了。进屋后，屋里是黑的，灯绳我确实没有拉。’在问灯绳是谁

拉的、谁让你进屋里给帮忙时，王茂章闭口不答。”

王亚乐是个重要的线索。

王亚乐1996年7月2日走进了礼泉县律师事务所。严格地讲，她与孩子也是受害者，王茂章被判刑后，村干部许诺并兑现的优待，一是微薄，二是短暂，她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度日，生活非常艰苦。她在等着丈夫。她希望丈夫早日出狱。根据她了解的案情，她认为王茂章“判刑的事实不对，判刑太重。”她要委托律师为丈夫申诉。律师接待了王亚乐。以下是她与律师的对话：

律师问：“请你讲一下事实不对，量刑太重的理由。”

她说：“王茂章在我村水泥厂化验室工作。他哥王茂新在厂里给他要硫酸。要硫酸后的六至七天，大队（村）把王茂新媳妇叫回来。”

“王茂新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因何事离家出走？”

“王茂新的媳妇叫武芳，与王茂新关系不和，经常提出离婚，多次离家出走。”

“大队（村）谁把武芳叫回来的？”

“王保东。（他）任村长，开大队（村）的客货两用车把武一芳叫回来的。回来后，大队（村）干部王保东将武芳安排在大队（村）招待所（接待站）。武芳在大队（村）招待所（接待站）住了三天。第三天晚（上），我丈夫去接待站逛哩，大队（村）干部都在接待站院子（里），我三个嫂

子也在接待站院子（里）。”

“大队（村）干部谁在院子（里)？”

“王正吉、王农业、张振西等人都在接待站院子（里）。”

“继续谈。”

“大约九至十时（晚上）左右，王农业给我三个嫂子说，进去把武芳袱（注：‘袱’，关中方言，即裤子）脱了去。我三个嫂子进去了。不知谁给我丈夫说：‘你也进去给你哥帮忙去。明天就要离婚了，叫你哥去把（口外）睡一下。’”“你是如何得知上述情况的？”

“我听三个嫂子说的。”“具体听你哪个嫂子说的？”

“听高雪铃说的。其他两个嫂子也说过。（她们）表示很后悔”

“王农业叫你三个嫂子进去脱武芳的裤子，你是如何得知的？”

“听高雪铃说的。高雪铃和我另外两个嫂子说她们不知道王茂新拿的（着）硫酸。王茂章也不知道他哥拿硫酸。三个嫂子进去前灯就灭了。王茂章是以后进去的，不可能拉灭电灯。”

“你丈夫到底拉没拉电灯（拉灭)？”

“没拉。”

“你有什么依据？”

“我问过他几次。他说没拉，在他进去以前，就有人把

灯拉灭了。”

王亚乐说：“我一直想申诉。大队（村）干部说大队（村）管，只管了一年。现在家中老的老，小的小，谁管呢？”

律师问：“大队（村）谁说管呢？”

“王保东说的。我找过王保京。王保京说让我回去，给你些钱。”

王保京王副市长又露面了。这回露面是安抚家属，打扫战场，怎么安抚家属，怎么打扫战场，后面还会详述。

为了申诉的事，王亚乐专门去监狱征求王茂章的意见。在王亚乐的反复追问下，王茂章说他“千真万确”没有拉灯，是他人叫他进去的。他对申诉有顾虑：“现在是官宫相护，怕翻不过来加刑。”

王亚乐与律师的谈话，还说了一个事实，那个操着流氓腔调支使三个嫂子进屋作案的人是王二公子农业。我找到了曾与王茂新同关一个监号的 A 和 B 为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和从当事人的安全考虑，姑且隐去他们的真实姓名，用“A”与“B”来代之。

真是邂逅奇遇！我坐 B 开的车，聊天，他知道我正在重新调查武芳案件，无意中说，他曾经与王茂新在县公安局拘留所一块关过，与王茂新有过一段同监号睡上下铺的交情。“(口外）是个鳖人（注：‘鳖人’，关中方言，没有能耐、没有主意的老实人）。”他说，“号子里，房间小，人多，天

气热，床上睡不着，水泥地擦得干净，我们俩干脆把床上的席子揭下来睡地下。地下凉快。睡不着，偏闲传哩。”B 后来“无罪释放”。

B 根据回忆书面出证说：

“大约晚上两点前后，因长时间关押，睡不着觉，我于（与）王（茂新），就各自的问题交谈。王给我说，他估计他能在‘忙前忙后（注：‘忙前忙后’，关中方言，指麦收前后），就可回家’。听了这话后，我说：‘你可能不的（得）回家。因为我在家听人说，你把你妻子烧的很厉害。’王说：‘你有所不知，我的案子有王市长的儿子王农业给我办哩。’我说。‘他为啥要给你办呢？’王说：‘我给你说了，你不要给别人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妻子在家胡弄哩！我（村）干部看不惯。我用硫酸烧我妻子是农业教我的办法，我拿不住，弄得厉害了，把事情弄大了。那一天用硫酸烧我妻子时，是农业拉灭了电灯后我才实施的。此事发生后，农业给我说，让我进监狱后不要怕，不要给人说有他，他一定能把我在短时间（内）保出监。几次我哥都给我捎过话。’”

俩人的谈话和书面证言，口语和书面语杂糅，为了保持原貌，照实录之。

A 与王茂新是烽火邻村同乡。陕西话叫“乡党”。他说：“我进去后，调了好几个号子。1988 年快过国庆节了，我被调到（拘留所）后东六号，和王茂新一直关在一起。”他们

铺挨铺，无话不谈。天气热的时候，晚上他们也不睡床，就“光着身子”趴在床底下聊天儿。“床是南北床，东西睡着哩。床底下光得很。”他说，“号子里人多，在一块不能讲，晚上睡床底下悄悄说哩。老乡关心老乡哩。王茂新人瘦瘦的，老实，没本事，”

A 问:“你把你媳妇弄成（口外）样子，为啥呢？”

王茂新叹一口气说:“唉，她在外面胡跑哩，（我们）经常不在一起睡哩。跟人在韩城办缝纫部，不回家。她娘家也没有办法。娘家没有良心，他们盖房，我给他们成大帮忙哩。村里人看不惯，我也没主意。”

“咦，你咋下得了手呢？”

“咱好几个人商量哩。村上干部出面解决我俩的关系，一直处理不下去，因此，干部和家里人商量，把她弄难看，看她还跑不跑，干部出面整她一下。把脸弄日蹋（注:‘日蹋’，关中方言，‘坏了’、‘槽了’的意思）了，看她还咋跑，谁还要她。干部出主意，我才这样干的。还有人出主意，打断一条腿，干脆把她弄残废了，看她往哪里跑。”“呀，没拿住劲，把人弄的那么狠，把奶都烧没了。唉，我为啥要弄这事哩。”

王茂新“整天盼回家”，很自信地说:“我忙前忙后就回去哩，”

A 问:“你这么大的事情，咋还能回去呢？”

“农业在办这事哩，我时间不长就会回去。我村王保京是市长，王农业是村上领导，是王保京的娃。我弟回去，就是农业帮忙弄回去的。”

“农业咋要给你办这事呢？”

“你知不道，农业能拿一切事。农业也看不惯她在外面胡跑哩，是农业派人把她从韩城弄回来的。他不管，谁管？况且，他自己也洗不清自己。”

A 姑姑是烽火村人。姑姑来看他，他问：“王茂新能回去吗？”姑姑说：“(口外)人可能回去，有农业给他办着哩。”他当时也认为王茂新能回去，“王保京是市长，权力大着哩，娃的权力也大着哩。”1989 年 7 月，王茂新调号，他以为王茂新要回去了，还托王茂新给他家里捎话呢。A 和 B 与我谈话的时间、地点不同，但是，内容基本一致。经核实，A 和 B 曾与王茂新同号关押。

10

二一

事关王保京王副市长任党总支书记的烽火村，事关王二公子农业，郭建义在礼泉县的调查效果可想而知，县公安局检察院的汇报含混不清，不得要领，市人大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材料。郭建义愤怒地说：“你们太不像话了！那么重大的案件拖了三年!”三年？要不是市人大干预，案件还会无休止地拖下去。看看坐在郭建义面前的人都是什么人、什么心

态就知道了。

王治堂八年后反省说：“这个案件出在王保京的烽火村，我不愿多过问，怕！提起王保京，不光我怕，县委书记、县长也怕他。所以我尽量不染上。况且，当时礼泉县检察院检察长就是王保京的外甥。”

郭建义说：“不能指望礼泉县破案！”

礼泉县这潭水已经被搅混了，一下两下澄不清，不敢恋战。

他回师咸阳。他能够直接督促的是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礼泉县还隔着一层。“我们要充分运用人大的权力，加快审理武芳的案子，自上而下地解决问题。”

他要求市法院汇报情况。听完汇报后，郭建义盯着不放，紧紧抓住要害：“今天汇报这个案件很有必要为我们提出了几点重要情况：一、这个案件已到过县法院、检察院，并认为是重大犯罪上诉到市法院，而被告没有王茂章。二、市检察院两个材料有矛盾，前边说王茂章是同案犯，后材料说王茂章推、拉、压等都是帮助其兄嫂睡觉。三、你们 1990 年 4 月 17 日和市检察院到礼泉（和）县公安局、检察院座谈情况很重要。县公安局长王治堂说案发后就将王茂章收审了三个月，但是案卷中没有审讯王茂章的只言片语。王治堂说审讯有材料，但材料至今没有送来。”

郭建义敏锐地指出，武芳案，“案中有案”！“礼泉县公

安检察为什么不将王茂章列为被告？案发后王茂章被收审，为什么不见审讯材料？是否收审过王茂章？如果没有拘留，为什么公安局长王治堂汇报说将人收审过？”“要采取有效办法，认真查处!”

两天后，郭建义召集市法院和市检察院两家见面，会商加快武芳案的审理进程。他严厉批评道：“不管怎么说，这起案子已拖了三年多，不能及时处理，这就是打击不力!”“还要深究此案的其他原因，将这个案件作为整改的典型案例。注意这个案件的案中案!”

二二

案中案，要查，谈何容易。煮了个夹生饭，公安、检察屁股上都有屎，自己擦自己屁股上的屎？别说得罪权贵，自己都没有面子。什么人民的痛苦，什么法律，都在其次。

关于武芳案，关于案中案，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大家心照不宣。

不管愿意不愿意，蹊蹊跷跷的案件，蹊蹊跷跷的背景，拖拖拉拉的过程，尴尴尬尬的结果，所有当事人都要接受“历史的检验”和良心的责难。

八年后，市检察院主办检察官张双余坐在了我面前。在他的司法生涯中，武芳案是最头疼最难办的案件，至今忿懑之色溢于言表。

“这个案件反复扎了。”他说。

他 1989 年 7 月接手武芳案，那时他还只是个“代理”检察官。案件在他手里放了两年办不下去，“办完后也没有立功受奖，连先进都没有”。案件的解决，他是个关键人物。武芳来找他伸冤，他说：“光靠我不行了，你可以去人大。”他点醒了武芳。他知道此案有名堂。他接案才一个多月，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按上面的意思，对既没有收审也没有拘留的王茂章“取保候审。”既没有关押也没有起诉，取什么“保”，候什么“审”？

他说：“出事时，王茂章还没有结婚。我接手此案时，他刚结婚不到一年，媳妇刚怀娃。”也就是说，当司法机关无所事事的时候，王茂章和关心他的人并没闲着，结婚生娃，喜庆事儿一件件地办着哩。什么也没耽误。

这口气怎么能让武芳咽下去？看看烽火村，哪像是出事儿的样子，放鞭炮，接新娘，喝喜酒，进洞房。好不热闹！王茂章洞房花烛夜，武芳躺在病床上生命垂危，凄凄凉凉。两幅图景拼在一起，何等不协调！这就是烽火村的喜怒哀乐！这就是礼泉县的世态炎凉！张双余说：“这个案子比较怪。我感觉有人装葫芦（注：‘装葫芦’，关中方言，‘装蒜’的意思），把我这办案的人当瓜子（注：‘瓜子’，关中方言，‘傻瓜’的意思）。别人在玩弄事情哩。县公安局和县检察院都不同意抓王茂章，不把王茂章列入被告，理由是：兄弟没有帮哥哥共谋，兄弟只是帮哥哥睡觉哩。保兄弟的人特别多。

为啥不知道。我不相信口供，肯定是商量过的。我下去调查，县公安局和县检察院都不配合。我印象很深，武芳一直控告嫂子和村干部，但是案卷里干干净净，没有记录。武芳控告，证据不足。我感觉到，有人想影响此案，但又不明说，总是在朦朦胧胧笼罩着。这个案子麻达多得很。我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左右此案。谁左右此案也没证据。我这人是直杠杠。人要有良心，别说职业道德了。只要是在法律的范围内，帮点忙可以。人是感情动物。人是有思维的。但是不失原则。说执法人员没有私心不对，但是不要把人当瓜旱!”他对有人背着他利用他，拿他当王具，在无形中左右案件，至今耿耿于怀。

谁在保王茂章？谁在左右案件？为什么保王茂章？为什么要左右案件？

二三

西安中级法院。

法庭调查。当庭宣读任维对西安中级法院的谈话笔录。

任维说：“办案过程中，我们发现的的确确有问题：一、这么大的案子，为何起诉到县法院，而只起诉王茂新一人；二、我院受理后，为何对王茂章不收监，而取保候审，在收监上为何一拖再拖；三、法院要审查共犯的故意，而解释说王茂章只是帮其兄与武芳睡觉，为什么？四、王茂章在案发后就被县公安局收审三个月，为何在案卷里没有记录？这么

大的案子，为何拖了三年没有解决？的的确确有问题。”

二四

咸阳市中级法院与咸阳市司法局同院。灰不溜秋的楼，破旧的大门，与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实在是不相称。处理武芳案件的过程中，市法院始终态度强硬，坚持查清案件的来龙去脉，坚持起诉罪犯王茂章。一起重大刑事案件，来回退四五回，历时三年，在咸阳法院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天气炎热，市法院院长任维穿着圆领短袖衬衫，西装大裤衩。几年前，他是管刑事的副院长。武芳案便是在他的手下处理的。他是北京人，空军飞行员出身，而色黝黑，大块头。他面无表情，慢条斯理，不冷不热，略有笑容，稍纵即逝。他始终保持着大法官的尊严。

他的办公室紧挨着厕所，挂着一张洗白了的蓝布门帘，里面简陋。

我们的谈话开门见山。

“有关机关为罪犯开脱!”这是他客套后说的第一句话。

他的坦率令我大吃一惊。“市中级法院一直认为，（武芳案）一是有些事实不情，二是遗漏罪犯。市检察院只报首犯，不报（王茂新的）兄弟。这个案件关键是在公安局和检察院。公安和检察两家穿了一条裤子。法院认定王茂章是本案的罪犯。检察院的正式函件上都是讲王茂章是帮忙性质，不是犯罪。说是弟弟帮助哥哥与嫂子睡觉，一睡就能好。作为检察

机关，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听了检察院的道理，人大郭主任气得拍了桌子，说：‘你们是混蛋逻辑！’武芳一直说还有人，还有入关灯。你看案卷也是白搭，其他枝枝蔓蔓一点儿也看不出来。这个案件现在办，第一、人家查不查；第二、能不能突破。首先要找到共谋的问题。共谋的问题要有突破，一抓一个准。王茂章坚持不承认共谋。从案发现场，你一看就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其他人是否能牵涉进来？目前，我们只能突破到这种程度。法院只能做能落实的事。市人大质询，案子为啥拖了那么长时间不办？我们提出，有人包庇罪犯！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才起诉王茂章。王茂章为啥抓，为啥放？公安局的收审手续是后补的。收审号都对不上。他们搞的名堂，咱都知道！我的看法，这个案件根本查不清。谁在底下活动，硬要把‘帮凶’说成‘帮忙’？谁在背后操纵？我说‘案中有案’，开始时，把王茂新在基层法院起诉，起诉王茂章又为他开脱。里面有问题，不正常，但是原因搞不清楚。这种犯罪已经够严重的了！混蛋逻辑里就有混蛋人！能把这件事查一查，能把包庇的人和阻碍公检法办案的人查清楚，为人民伸张正义，只要查实，我们就不客气！如果法院不顶，只判一个人，武芳作为一个老百姓，到哪里说理去？”

“有关机关”为什么要为罪犯开脱？谁在后面指使？

任维说到这里，话锋一转，把问题引向了更深一层：“你

弄的事情是社会比较敏感的事情，应该从深层次探讨。这是典型的腐败啊！我看到里面有问题，但是拿不到真凭实据。这里有个背景：王茂新、王茂章是烽火村的人，烽火村是咸阳的先进村子。村里能这么处理事儿吗？强行不准离婚是先进？”

在办案期间，司法机关不认真追查罪犯，却以查“离婚原因”为名，用了很大功夫查武芳的作风问题。1989 年 2 月 25 日，烽火村委会还正式出具了武芳作风不好的证明材料，并在案卷中备案。“证明材料”说：“据村上人传言，武芳平时经常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接触，有男女关系问题。尤其是多次出走西安、肖坝等地，在群众中影响很不好。”

这份“证明材料”与 1997 年 5 月 8 日烽火村向西安中院当庭出示的“匿名信”一样，都在证明武芳的作风不好，证明武芳被硫酸毁容毁身是咎由自取，或者说事出有因，为王茂新等罪犯减轻或开脱罪责。任维毫不隐讳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作风不好，是道德规范问题。不管把她说成什么样子，她也有离婚的权利。人家受到那么大的伤害了，还要在人家的伤口上撒把盐；把人弄成那个样子了，还说是该着！他们查的目的是，查出武芳作风不好，可以减轻犯人罪责，给罪犯找减刑的理由。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刑事案件嘛。妇女提出离婚要求，就导致了这么大的灾难。观念落后！陈腐！一点法制观念都没有！”

二五

1991 年 10 月 29 日，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王茂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茂章有期徒刑 13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王茂新、王茂章不服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

二六

一声枪响，王茂新罪有应得。我们要追问的是，是谁导致了这个结局？是谁导致了王茂新和武芳家破人亡？王茂新是害人者，然而，犯罪后他根本不知道罪行的严重，直到临死前，还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某些人兑现让他出狱的承诺，还相信一种力量能超越法律来拯救他。王茂章也是如此。他平时嫂子长、嫂子短，尊重武芳，好学上进，却被一个强大的氛围输进了犯罪的程序。王茂新、王茂新曾经是老实的青年农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茂新、王茂章兄弟和武芳一样，都是受害者。光用“愚昧”来解释王家兄弟犯罪的原因，显然是不够的。

一声枪响，并没有给武芳案画上句号——武芳的噩梦并没有消失，所有当事人和参与者并没有因此而谢幕退场。他们都没有心安理得的心情。

这一天，关中平原好大的雪。早晨，北风怒号，寒气刺骨。武芳在阡东镇上瑟缩着等车。她不知道今天是枪毙罪犯的日子。她不能满意判决的结果，虽然这个结果已是来之不

易。她还要上咸阳告状。

“芳，今天雪大，路不好走，改天再去吧。”家里人劝道。

等不及，不好走，也要走。她像以往那样，背上了干粮，谁也挡不住她。家里人也习惯了，由着她的性子。

咦，那不是烽火村的“东风”车么？车上还有好些人。他们从棺材铺抬出一具上好的寿材。

“烽火谁死了？”她问。

“枪毙王茂新哩。”旁边的人说道。

这阵势不小。烽火村显然是要厚葬王茂新。

烽火人也不避讳。他们张张扬扬地买寿材，张张扬扬地进城，把车停在大街上显眼的地方。寿材没上漆，崭新耀眼。他们也没有必要避讳。他们就是要告诉世人烽火村的态度。

武芳悲从中来:“我要是死了，烽火村能给我买这么一副寿材么？别说寿材，恐怕死无葬身之地!”

知情者告诉我，烽火村是非好恶鲜明。他们今天好像不是去给王茂新入殓送葬，而是要迎回自己的英雄。

烽火村的大喇叭响了。它像往常那样发布着“最高指示。”知情者告诉我，几十年来，烽火村村民就是靠着这喇叭的声音保持着与村领导的联系，去劳动，去学习，去斗争，去革命。喇叭声扩散开去，水银泻地般钻进每家每户。

村长王保东在喇叭里喊:“今天要给王茂新送葬，希望

村民都去参加，因为王茂新跟人不一样。”跟谁不一样？外人听不懂。但是烽火人一听就明白。村长强调“跟人不一样”，自有很深的道理。

知情者告诉我，烽火以王姓为主。王氏家族还要分六大宗派：“马道”一支，“殿”字一支，“凉粉”一支，“湖洞”一支，“捻道”一支，“书坊”一支。虽然都姓“王”，都是一个大家族，但是也有微妙的亲疏里外之分。这是农村宗法关系的一个特点。对外，团结一致，只有一个“王”字。对内，要分大“王”小“王”、富“王”穷“王”、强“王”弱“王”。大家族里，各支各派按血缘远近独成体系，亲疏明白。亲族里面，还多少有些过节。婚丧嫁娶，在农村是大事，亲疏里外，分得绝对清楚，谁都不会瞎搀和，也不敢瞎搀和。村党总支书记王副市长保京谓“马道”王家一支。“马道”王家，本是王氏家族最小的一支，但居烽火村的统治地位，从50年代初开始，连续统治了四十多年没有动摇。王茂新、王茂章属于“殿”字派一支。历史上，“殿”字派与“马道”有矛盾，矛盾深沉，隔阂在心里。其他各支派，当然以“马道”马首是瞻。如果没有村长的特别说明，不会有多少人去给王茂新送葬。光是村长说话还不行，人们心里明白，村长仅仅是台上的木偶，牵动木偶的人是王保京和王二公子农业。王保京跟外面介绍经验，说他是“白天当副市长，晚上当支部书记”。王二公子农业名义上是村水泥厂厂长、村农

工商总公司经理，实际上代表王保京领导和控制村委会。村上大小事，没有王氏父子首肯，村干部绝对不敢动。何况要全村人给罪犯王茂新送葬这样的大事？

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王家兄弟虽然名声不太好，但是在村里还算是老实人。武芳在王家做了八年的媳妇，当然了解王家兄弟。说到王茂章，她说：“我看着娃长大的。娃是个老实娃，左一个嫂子，右一个嫂子，对我可尊重哩。”

光凭他们两兄弟，借他们几个胆，也干不出这番“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再不通情理，也知道用硫酸毁人是件伤天害理的事情。

为伤天害理之人去送葬，本身就是伤天害理。按祖宗传下来的老规矩，作奸犯科者，续家谱都不得列入，何况被杀头者？烽火村几十年来是“破旧立新”的典范，由此成为陕西省的“先进文明村”。难道这是“先进”、“文明”的标志？给王茂新隆重送葬，不啻给王氏家族记下了耻辱的一笔。不管愿意不愿意，这是命令，不服从命令，就可能被记录在案，头上就可能永远笼罩着阴影。

武芳案被伤害被污辱的，不仅仅是武芳和她的家庭，还有更多有良知的村民。有形的伤害和污辱还可以论说，无形的伤害和污辱却难以估量。现实太残酷了。代价大沉重了。

一场官司下来，武芳债务累累，一贫如洗。她家里的缝纫机、锁边机、自行车、架子车、大小立柜，本属她与王茂

新共同的财产，如今被婆家全部转移。法院判王茂章赔偿武芳经济损失 2000 元，其中 1500 元村里付的住院费，算在了王茂章的名下，还有 500 元，宣判五年后的今天还没有执行。

案子“结了”，她似乎丧失了在礼泉生存的理由。婆家不能回，娘家也呆不下去。她更不能容忍人们异样的眼光。那些眼光分明是在说，她是这场悲剧的祸根。那些能杀人的眼光！她的境遇并没有因此而改善。“礼泉县没我武芳的立锥之地啊！……”她在哭号，但是没人理睬她。她陷入了更加悲惨的境地。

她出走了。她拖着伤残之躯，远走他乡，苟且谋生。

烽火村无情无义，必欲置武芳于死地而后快，对罪犯的家属，却给予了优待。

王亚乐找到了王副市长保京。与跪地哭求的武芳父母相比，同是他治下的子民，王保京的态度判若两人。他对王业乐说：“啥不行了，言传（注：“言传”，关中方言，意即‘说话’、‘告诉一声’、‘打声招呼’等）。”

之后，王茂章的家庭先后三次得到了 1600 元的资助，盖果园房时，得到了一吨水泥、三根木头的资助。

罪犯是罪犯，罪犯的家庭有困难，得到人道主义的呵护和关怀，当在情理之中。问题在于，最应该帮助的被害人却被扫地出门。真是天壤之别！令人疑惑！令人寒心！令人愤慨！从实际的效果看，烽火村的本意，与其说是资助罪犯的

家庭，毋宁说是安抚罪犯，打击武芳。

烽火村座落在泾河之滨，在这里理解“泾渭分明”，再恰当不过了！“泾渭分明”也因此有了现代意义！

泾河水清澈，渭河水污浊。本该清澈的径河水，竟变得如此污浊！

二七

谁要是以为，随着一声枪响，武芳案一了百了，那他就彻底错了。王茂新已经被枪毙，王茂章蹲了监狱，武芳背井离乡，还会有谁来管这事儿呢？

1992 年，将王茂新、王茂章绳之以法几个月后，嫌疑人王二公子农业不为其祸，反为其福，当选为省人大代表和省劳动模范。

他们低估了武芳。武芳是一个农村妇女，但是，不要忘了，武芳是一个身入绝境的农村妇女，是一个“生不如死”的农村妇女，是一个有文化的农村妇女，是一个觉醒的农村妇女，是一个性格刚烈不屈不挠的农村妇女。她活着的全部意义，就是复仇，就是惩治漏网犯罪嫌疑人。她坚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八年来，她一如既往，从未放弃任何机会和努力。

他们忘了，一声枪响，只是在户口本上抹去了一个人的名字，并没有抹去邪恶，并没有抹去人们对邪恶的记忆，并不能阻挡八年后正义对邪恶及其背景的追踪。一连串的疑问

缠绕着我。我必须弄清楚。如此重大而简单的刑事案件，倘若发生在其他地方，可能早就“从重从快”了，为什么一拖三年？犯人抓了放，放了抓，为什么长期逍遥法外？为什么面对如此清晰的犯罪事实却能堂而皇之地不问不查？为什么司法机关和接到武芳控诉的各级政府、有关群众团体如此麻木不仁？就因为发生在烽火村？就因为涉及一个副市长兼村党总支书记的儿子？为什么法官在接受访问时要特别提醒烽火村的背景？为什么公安局长提起烽火村党总支书记就噤若寒蝉？为什么检察官办案阻力重重？为什么有人敢置事实不顾包庇罪犯？为什么烽火村人犯了丧尽天良的大罪却能若无其事？烽火村怎会有如此大的魔力？王保京到底是何许人？

武芳可能不会想到，正是她悲惨的命运，为我们揭开了烽火村早已尘封却继续发生影响的历史，为我们揭开了她悲惨命运的更加广阔的背景。

01

一

烽火村的反应速度极快。1996 年 8 月 8 日，硫酸毁容毁身案内幕及烽火村的劣迹在《中国青年报》大白于天下，第二天，数封“烽火村委会”的长篇电报从咸阳发到北京。

像过去几十年历次政治运动和处理各种危机那样，烽火村的轮子又飞速旋转起来了。

8 月 12 曰，王保京又以个人名义向社会散发了《致（中国青年报）公开信一篇报道引发的政治‘毁容’事件》。

报道说，烽火村 1958 年极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当时以浮夸亩产 15 万斤而威震全国，从“大跃进”到“文革”，一直是陕西省的一块金字招牌。一直担任烽火村党总支书记的“王姓副市长可不是一般的副市长，直至现在对咸阳市乃至更大范围的政治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而烽火村是他的政治基础。”

“公开信”说:“我们烽火村在 50 年代就是农业战线‘科学种田创高产’的典型，作为烽火互助合作组长，我被评为全国劳模，13 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的培养和关怀下，在全国、全省和全县人民的支持下，我和烽火村伴随着共和国四十多年来的风风雨雨成长和发展起来。早在 1953 年，我就光荣出席了共青团陕西省委召开的团代会，1955 年 9 月，在北京出席了由团中央主持召开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还当选过党的十大代表及第二、三、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翻开历史的一页，我个人和烽火村的荣誉和成绩，既来之于全体村民的努力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爱护，还来自于全国诸多新闻单位，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社、陕西日报社，特别还有中国青年报社的报道和支持。”报道“短短几句话，就恶意中伤乃至丑化烽火村的历史，抹杀了烽火村一千五百

多名村民几十年艰苦奋斗用血汗换来的荣誉和成就，煽动和营造一种不良背景，误导舆论对我及烽火村的正确认识用心何其狠毒”。“借用作者的标题，他是拿歪曲事实这个‘硫酸’对我个人和烽火村的一次特大政治‘毁容’。”

8月24日，《陕西日报》发表了一篇“省委政策研究室章陆柳”对王保京的“访谈录”，似乎想说明《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无伤王保京和烽火村一根毫毛，省委支持王保京。然而，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罗久序对前来采访的新华社和《中国社会报》记者申明：“我可以负责任他说，省委政策研究室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也没有章陆柳这个人。”他表示要追查这件事。

8月28日，《陕西日报》三版在“烽火村在改革中阔步前进”的通栏标题下，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为王保京和烽火村歌功颂德的一组文章。后经查明，这是王保京和烽火村花钱买的版面。新华社和《中国社会报》记者询门《陕西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尹维祖，这一版报道是否是陕西省委和《陕西日报》针对《中国青年报》报道的态度？尹维祖说：请不要误会，这一版不是新闻，而是收费的广告专版，这既与省委无关，也与报社编委会无关。他还指着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说：“我们只是在最后把关时拿掉了王农业的署名。因为他被指控为漏网嫌疑人，所以不能让他的署名出来。”王保京为此还发了火，指责说：“我们花了钱，为什么不给

署名!”

这说明,《陕西日报》在知道《中国青年报》报道和王农业是烽火村硫酸毁容毁身案的漏网嫌疑人的情况下,冒新闻界之大忌,不惜拿出整版篇幅,收钱为王保京和烽火村消灾。

9月初,西安市中级法院迅速受理王保京、王农业和烽火村委会诉《中国青年报》和作者的“名誉侵权”案。

《中国青年报》和作者对西安市中级法院受理此案的司法管辖权提出异议,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条款,认为报道行为发生地是北京,行为结果地是咸阳市和礼泉县,西安既不是行为发生地,也不是行为结果地,并上诉陕西省高级法院。陕西高级法院亦援引相关法律将上诉驳回。

11月30日,《中国社会报》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刊登了新华社记者与本报记者合写的长篇报道《特大毁容案的背后——对“武芳毁容案”的追踪调查》。明确指出硫酸毁容毁身案与王保京、王农业父子有关。他们追踪调查的结论是:《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准确无误”。

1997年6月,《中国青年报》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公安部,指出烽火村硫酸毁容毁身案虽有全国人大、最高法院、公安部的干预,陕西有些人仍阳奉阴违,顶着不办,而且事态还在进一步恶化。

1997年7月18日,《南方周末》一版刊登报道,继续揭

露烽火村硫酸毁容毁身案，继续揭露收买武芳、威胁武芳母亲、武母被迫自杀、暴力妨碍警方执行公务、围攻县公安局县委县政府、打砸县政协委员王行兴家等为非作歹的行径。

面对王保京和烽火村的反击，50年代曾经为王保京和烽人村的发迹出过力的《中国青年报》，不得不在90年代为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声誉上阵应战了。这次应战，不仅是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声誉，更是捍卫中国新闻界的权利和声誉。

二

好一个“政治毁容!”

看来，王保京和烽火村的背后有“高手”参谋。“政治毁容”与“硫酸毁容”，真是一个高明而奇妙的对应。它的高明而奇妙之处在于一句潜台词：你是拿“硫酸毁容”来对我进行“政治毁容”。

我们暂且不说是不是“政治毁容”。我们要问的是，没有“硫酸毁容”，何谈“政治毁容”?

是不是“歪曲事实”，要由法律衡量。

是不是“政治毁容”，要看事实。

在陕西历史上曾经生造过两个字，“?”和□。“?”，来自皇帝；□，来自民间。“?”，已经入典，通“照”，武则天自己的名字专用，取“日月当空照”之义。□，至今民间流传，没有也不能入典。□，是民间根据一种面食制作的声音而创造的字。传说，一位集怀才不遇愤世疾俗贫困潦倒饥寒

交迫于一身的秀才来到咸阳，他路过一家面馆时，听见里面“biang——biang——”之声不绝，一时饥肠辘辘，不由得踱将进去。只见白案上摆满了和好的长条状面块儿，师傅拎过一块儿，扯住两头，顷刻间摔打成裤带般宽厚扔进锅里，顷刻间摔打了好几块儿，顷刻间从锅里捞出一大海碗，碗底事先盛着作料和一些豆芽青菜，自然要浇上一大勺油泼辣子，热腾腾端上来。秀才看得兴起，大叫："好啊！店家来一碗!”“这位客官一碗……”店小二一声长长的吆喝，顷刻间一碗面摆到面前，顷刻间碗中罄净，直吃得秀才大汗淋漓。“店家，结账!”秀才喝道。一摸兜，坏了，一时忘形，竟忘了囊中早已空空如洗，顿时窘住，刚才的热汗顷刻间冷冰冰刷在脸上。一旁，店小二斜着眼耸着肩，一脸坏笑。“小二……”秀才讪讪，话刚出口便被店小二堵住:“客官，本店小本经营，概不赊账。”见店小二不通融的模样，秀才又向身上摸去，左一摸，右一摸，上一摸，下一摸，好像早晚能摸出几文钱来似的。店小二心想:“你个穷秀才，看你摸出什么来。”天呀，这不是有辱斯文么？秀才一面摸，一面思量脱身之计。他与店小二答讪:“小二，你家这面何名？”“何名？”店小二学着秀才的腔调说:“biang、biang 面。”秀才问:“biang、biang 面？biang、biang 字咋写？”这家面店可是远近闻名的老字号，其面做得特殊，面与面板摔打撞击，“biang、biang”也，故称“biang、biang 面”。“biang、

biang”二字咋写，店家做面，客人吃面，谁也没去想过。见店小二答不上来，秀才顿时有了主意，他说：“小二，你与老板商量过，本人今天没钱，可否写出‘biang、biang’二字，换这碗面吃？”店小二顷刻间回来，说：“成。”店家心想：“古来就没有‘biang、biang’二字，看你穷秀才怎么赖账。”“biang、biang、biang、biang……”秀才心里嘀咕，嘴上嘀咕。秀才读书，也最认书，古往今来偏偏没有这“biang、biang”二字。“书上没有，岂可生造乎？”皇上可以造字为名，秀才岂敢与之比肩？秀才满腹心酸，一腔惆怅；寒窗苦读，功不成，名不就，众目睽睽下，落到赖账这般田地，天理不公啊！他一急，心里骂皇上：“什么‘日月当空照’？民间疾苦，哀鸿遍野；宫闱倾轧，豺狼当道；贪官污吏，横行乡里；我秀才寒窗苦读，就因无钱无人，打不通关节，获不取功名……日月何照之有！罢罢罢，你皇上能造字，我秀才何尝不能？”秀才一声大喝：“笔墨伺候!”只见他笔走龙蛇，大大地写了一个□！他一面写一而歌道：“一点飞上大，黄河两边弯；八字大张口，言字往里走，左一扭,右一扭；西一长，东一长，中间加个马大王；心字底，月字旁，留个勾搭挂麻糖；推了车车走咸阳。”一个字，写尽了山川地理，世态炎凉。秀才写罢掷笔，满堂喝彩。从此，“边边面”名震关中。

这一天，武芳的母亲和父亲坐了车“走咸阳”。

他们到咸阳城为女儿寻找希望。咸阳城是阳光之城。“阳光”与希望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比到“阳光城”找王保京寻求希望更合理的事情了。

可是，父亲有些犹豫：“人家是市长，不见咱呢？”

母亲说：“市长也是共产党的干部，也要讲道理!”

早上天不亮，两个老人就到了市长楼下。一敲门，里面问：“找谁？”

“找王保京市长哩。”

“你们是哪里的？”

“礼泉北屯的。”

“找市长做啥？”

“我是武芳的妈，找市长有急事哩。”

过了一阵儿，里面冷冷地扔出一句话：“市长不在！你们走吧!”

“啥时在哩？”

“不知道!”

来了好几回了，都见不着人，芳儿等着救命呢！这么早的天，怎么会不在家呢？礼泉到咸阳几十公里路，来一回不容易，两个老人干脆坐在楼下大门口死等。从上午等到下午，不吃不喝地等。久而久之，来往的人都知道他们在等王保京。快五点的时候，见有人上楼。一位好心人悄悄告诉他们：“那人是烽火的，你们赶快去。保京在哩。”

两个老人赶快跟着上楼。

门打开了，烽火的人刚进去，里面的人就要关门，母亲连忙把胳膊伸进去。门夹住了胳膊。一个恶狠狠的声音说：

“你们想做啥哩!”

“我们要见保京市长。”母亲恳求道。

父亲老实，从没进过这么大干部的家，在一旁吓得说不出话来。

里面无奈，只好放两个老人进屋。

两个老人进屋后，没人招呼他们坐啊喝水啊，顿时有些茫然。他们活了一辈子，见到的最大的官儿，就是原来的乡里乡亲、现在的王保京副市长。古戏里唱，“侯门深似海”。在两个老人看来，市长的门也深似海，磕开可比登天难。进得屋来，主人冷冰冰的态度，让他们诚惶诚恐，手足无措。母亲妇道人家，在烽火村旁生活了一辈子，却不认识王保京。父亲认识。几十年来，整个陕西的人都到烽火村学种庄稼，学搞运动，武老汉就见得回数多了。他看见王保京在里屋躺着呢。他扯扯老伴的衣服，用眼睛往里屋指了指。

两个老人径直来到里屋床前，“扑通”，齐齐地给市长大人跪下。

市长大人也不起身，也不下床，头枕着两只手，眼睛朝上，直望着天花板，根本不看跪着的两个老人一眼。武老汉回忆说：“当时天气热，王保京穿着半截袖衬衫，软布料裤

子，穿着圆口布鞋，腿搭在床边上。他不把我们当人看哩!”

武老汉年长王保京王市长五六岁，是看着王保京王市长长大的人。“原来都叫他京娃子么。农村娃么。咳，人家当了市长了么……”世道变化，眼花镣乱，武老汉感叹道。

“王市长……”

话刚开口，便被王保京王副市长打住了:

“你们来要钱哩？”

王保京王副市长农民出身，不兜圈子，一针见血。

“不要钱，要啥哩？你给想点办法，救娃一条命。”母亲说。

“我想办法？我有啥办法。你女子跑出去，给新娃（罪犯王茂新小名）寻麻达哩。”

“咋叫寻麻达嘛……我女子跟新娃过不下去了嘛……天天打她，不跑咋办嘛……”母亲跪着哭诉道。

王保京王副市长“腾”地下了床，来来回回地走动，没有一点搀扶两个老人起身的意思。武老汉描述说:“王保京高大的个子，胖胖的身材，一脸杀伐!”

一个人站着俯视着说话，两个人跪着只能仰望着说话，俯仰之间只有两三米的距离。在两个老人眼里，王保京王副市长的形象益显高大。

屋里还有好些人，两个老人一把鼻涕一把泪，跪在地下哭求，这种场面，真是伤面子。王保京王市长气急败坏地说:

“你们快走！你们快走！我的身体不好，影响我休息哩！这事我不答？”

说着就要往外撵。两个老人急得喊王保京王市长“爷”：“保京爷！保京爷！你是共产党员么，支部书记么，市长么，你不管谁管呀!”

“谁把你女子弄成这样，就寻谁去!”

“保京爷，茂新押着哩，咋寻哩。”

“那就去寻王亭哩!”

王亭此时只有六岁。

两个老人惊呆了！他们断断没有想到，他们如此敬畏的咸阳父母官，竟会说出这样蛮横无理的话来!

两个老人伤心之极。母亲说：“保京爷，你老人家是瓜的么！那七八岁的娃，能屙金尿银么？能找娃要啥么!”

“……”

母亲继续哀求：“保京爷，救命哩！多少给些钱。”

“你们要多少钱？”王保京王副市长问。

“保京爷，你给 500 元就对咧。”

“500 元？五毛钱都没有！我没有钱！你们走！走走走!快走!”

王保京王副市长连推带搬，把两个老人撵出了门。

两个老人在王保京王副市长家里呆了一个多小时，哀求了一个多小时，痛哭了一个多小时，跪了一个多小时，鼻涕

眼泪流了一地，浸湿了膝盖，却没有一丝一毫能感动王保京王市长。

了解王保京秉性的人说，王保京王副市长对此事有点反常。第一次换届选举的时候，市长候选人都要上台向人民代表发表施政演说，其他候选人连篇累犊，唯独王保京言简意赅。他说："我是农民，没读过什么书，不会讲话。我有一个缺点，就是爱帮人家办事，就是爱批条子。这个缺点，将来注意改正。"这段乍听大而化之、实则颇有心计的发言，赢得了满堂彩。大家对那种面面俱到的报告听烦了，倒愿意听这种给劲儿的大实话。在一个情绪化的氛围里，官场拐弯抹角、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负责任、不办实事、大话空话套话假话废话盛行，猛不丁来一点赤裸裸的坦率，倒是满受用。根本不需要进行理性分析，光是"坦率"本身就可以鼓掌。王保京充分把握了这种心态，一番"检讨"，分明是说，选我当了市长，玩实的不玩虚的，将来有事，尽管找我。

但是，对烽火村发生的人间悲剧，他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这场特大硫酸毁容案，对于村党总支书记的王保京来说，虽然没有直接的责任，间接的责任是必须负的。何况还有他的二公子参与？不要说他是烽火村的党总支书记，不要说他是咸阳市副市长，就是一个普通干部，普通党员，普通公民，两个老人跪在自己的面前哀求帮助，起码的人道主义同情是该有的吧？起码的谦恭礼让、尊老爱幼是该有的

吧？起码的怜悯之心是该有的吧？这些都是人性人情起码的标准。

老百姓膝盖软，市长大人心肠硬。地下跪着的磕头作揖，哀求哭号；地上站着的态度冷漠，无动于衷！地下跪着的渺小下贱，状如孑孓草芥；地上站着的高大尊贵，耍够了八面威风!——地下跪着的心存希望，呼唤良知；地上站着的大声喝叱，扫地出门！地下跪着的永远在仰望，地上站着的永远在俯视！好一幅“市长草民图”！好一幅，“官场民间图”！

画面还要丰富。此时此刻，地下跪着的和地上站着的，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父母，他们都是同一案件当事人的人之父人之母，只不过当事人人跟人不同，一边是被害者，一边是害人者；只不过父母与父母不同，一边是草民百姓，地位卑贱，一边是高级干部，权倾一方。此一人，彼一人，哪有公道可言？——好一幅“父母天地图”！好一幅：“世态炎凉图”!

母亲父亲哭泣着离开了王保京家。母亲父亲绝望地离开了王保京家。

咸阳，咸阳，你何“阳”之有！你徒担了个哪阳“阳光城”的虚名！你让两个老人充满了希望而来，怀揣着屈辱和绝望而归！屈辱对于武氏不算什么！他们一辈子都在屈辱中苟且偷生，然而，他们的心灵深处却有着期待，像是星星门烁，忽明忽灭；有着永恒而渺茫中的一丝希望。然而，阳光

和希望竟与他们不相干！

从市长楼下来，他们的眼前一片空空荡荡没有着落。天早就黑尽了，本来就陌生的城市变得更陌生了——扑面而来的都是陌生，扑面而来的都是排斥，扑面而来的都是绝望。他们身无分文。他们要吃饭。他们要住店。他们举目无亲。他们算计着，白天来，白天回，没料想是这样的结局。武老汉走路九十度佝偻，母亲挺直，灯光把他们的身影冷冷地投射在街道上。他们给这个黯淡的城市留下了两个符号———一个大大的问号！一个大大的感叹号！

他们由国棉七厂十字路口往北，来到了路西一家骡马店。店老板说："住一晚两角钱。"他们没有。武老汉哭着把女儿在烽火村被硫酸毁容没钱治病，今天到市长王保京家要钱的经过讲了一遍。一提王保京，咸阳城谁都知道。店老板同情他们的遭遇，说："王保京咋是（口外）人哩！不要哭，不要哭。算了，你们住，不要钱！"

老两口遇到了好心人，总算安顿了下来，在骡马店的一张小床上挤了一夜。

黑洞洞的小屋，心酸难眠的一夜。小床安顿下了两个老人，却安顿不下两颗被欺辱被踩躏的心。

02

三

西安中级法院。

法庭调查。围绕王保京和烽火村50年代“浮夸”的质证。

王保京的律师拿出了王保京50年代获奖证书和奖章清单，拿出了50年代报纸清单，“是想说明，烽火是搞科学搞出来的，不是极左和靠浮夸出来的”。

“请法庭注意，这是科学！科学！”

好一个“科学”！

王保京的律师声音洪亮，理直气壮。

民事法庭调查，既紧紧围绕刑事案件，又紧紧围绕历史背京。

四

王保京和烽火村的历史，是从“科学”开始的，也是从一首叙事长诗开始的。

农民诗人王老九出场了。诗人黑袄黑裤黑布鞋黑瓜皮帽，腰里别着一杆旱烟杆儿，一副纯粹的关中农民打扮，身上散发着土地和玉米秸秆朴素的香味儿。这样的打扮与我们想象中的诗人形象相去甚远。他原来是乡村快板书手，是武芳父亲武老汉的临潼“乡党”。他没有读过书，但是他有用快板书来抒发心中喜怒哀乐的天赋。

50年代，陕西出过两个最著名的农民，一个是农民诗人王老九，一个是以“科学种田”而成名的农民“科学家”王保京。农民诗人王老九的名气绝不亚于农民“科学家”王保

京。因为他的诗歌曾编入小学教材，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有人考证说，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从未有过“农民诗人”的桂冠。诗人浪漫的气质似乎与追求实际的农民格格不入。诗人可以像一阵风，一片云，一声鸟儿的啼鸣，农民则是踏踏实实长庄稼的土地。诗人可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农民则必须四季年轮周而复始地为生存奋斗。诗人可以不稼不穑，农民却真正是不劳动不得食。王老九开天辟地，应运而生。新时代把“诗人”的。桂冠戴在了农民的头上。这块生活过李白、杜甫、白居易的土地，如今长出了农民诗人王老九。如同“农民科学家”一样，“农民诗人”也成了新时代的标志。两个标志在烽火拼在了一块儿。

王老九选择了勃勃生机的1956年春季，涉过渭河到泾河。

他为烽火改天换地的奇迹和精神所激动所鼓舞，不禁诗情奔涌。他写了著名的叙事长诗《王保京》。长诗讲述了1956年以前王保京的故事。故事惟妙惟肖，波澜起伏，颇有戏剧性。为了后面注释方便并尊重历史，全诗引述如下:

开头的歌

八百里秦川一铲平，山清水秀有名声。一声春雷天地动，风吹云散太阳红。多少鲤鱼变活龙，能人多过满天星。注阳西，礼泉东，泾河湾有个白灵宫，杨柳罩天一片青，水浇田地绿英英。新庄村，一贫农，大号名叫王保京。玉米丰产出

了名，披红戴花进北京。提起去脉有来龙，听我老王说分明。

第一回

水有源，树有根，鱼儿离水命难存。王保京，粗眉大眼心灵动，说句话儿敲洪钟，中等个子脸白净，走路好像一股风。小时候，家贫穷，粟店里边当相公，挨打受气苦情重，好比小鸟入了笼。四九年，桃花红，阡东镇上把集逢；粟店里站着王保京，提斗捉秤忙不停。赶集的农民一窝蜂，有一个老汉挤当中：身子不高黑瘦脸，旱烟锅子插腰间；背着包袱扛着担，破烂草帽头上苫；一双眼睛滴溜溜转，帽檐下把保京看。王保京急忙走出店，跟在后面开了言："舅，零碎杂货可买全，啥时候再去进北山？""有桩生意实在谄（注:'谄'，关中方言，'美''好'之意），我前来把喜讯传。"出了城门拐了个弯，来在一个大坟园，东一盯，西一看，二人坐了个面对面。擦根洋火抽着烟，他舅开口露笑颜："解放军展开大进攻，四方八面如潮涌，和平解放了北京城，关中马上要变红。"保京一听真高兴，心像麻雀往上蹦："盼了月亮盼星星，到底盼来大翻身。""要翻身，靠咱干，有件事儿你敢办不敢办？"王保京，拍胸膛，未曾开口眉梢扬："咱若胆小不姓王，生就的骨头硬如钢；龙潭虎穴都敢闯，不怕矛子不怕枪。"原来他舅是党员，假贩杂货走马栏，上上下下暗活动，这一回嘱咐外甥撒传单。安顿保京多注意，胆要大，心要细，行动快，守秘密，不能带一点娃娃气。王保京，

豹子胆，离了栗店回家园。点香磕头拜朋友，四个青年联一手。王保佩，文化高，一笔字儿写得好；大天白昼不敢闹，深更半夜水笔描。写下传单一大套，张张就像红旗飘。上写：“打到西安去，活捉蒋帮胡宗南。”又写：“迎接解放军，男女老少齐支援。”四人暗暗商议定，看谁敢进咸阳城。王保京，打头阵，后边紧随王文鹏，点心盒子空壳壳，传单装了一垛垛。急急走，快步行，脚下生起阵阵风，日头压山进了城，熟人家里把身容。夜静更深人睡定，夭黑地暗路不平，两个小伙血气盛，枪刀林里往进冲。走出小巷多大街，一张张传单掏出来。传单撒在街道上，标语贴在巷口上，门扇上，电杆上，撒在人民心坎上。渭河掀起三尺浪，消息惊动古咸阳。王保京骨头硬如钢，革命斗争里才成长；王保京，眼窝亮，一心一意跟随共产党。

第二回

日出东海阳气生，红旗飘飘大关中；王保京听了党的话，心里点亮一盏灯。互助组里当组长，阳关大道看得清。五二年，四月间，政府号召闹丰产，张明亮首先挑起战，每亩回茬玉米打一千。好比掀起黄河浪，波涛滚滚高万丈，又像惊起南山鹰，比翼并飞绕青空。礼泉县，开大会，互助组长齐商议，八仙过海显奇能，争取丰产夺红旗。王保京，是代表，会前就把县长找。一笔细账早算好，他说：“应战事儿办到。”县长点头又带笑，拍拍肩膀：“快坐了，有勇气，实在好，

有啥把握说根苗。”王保京，劲头高，搬开指说分晓：“‘红心马牙’种子馅，棒大粒满磨出面，三角密植作务到，结上三棒剥斤半，一亩两千四百苗来算，就是玉米结不繁，一苗一棒剥半斤，每亩千二不煎熬。”算的细，说的详，最后要求政府多帮忙。县长站起忙握手，鼓励的话儿说出口：“共产党，前引路，广大群众后面走，只要你胆大下苦干，任啥困难不发愁。”次日会场人坐满，保京上台先发言：“回茬玉米能丰产，每亩十二不空谈。”有人一听脸色变，个个拍手眼瞪圆，离了会场舌尖转，都说这娃要，“泥砖”。这股消息像闪电，陕西日报大宣传，一日一夜传几县，风声刮进他家园。有的乡亲大瞪眼，七嘴八舌说破天，有的说：“这娃是二杆，吹牛皮想把火车掀。”有的说：“鸡蛋壳壳身上粘，就想一步坐高官。”保京他爸吊着脸，双眉紧锁直熬煎，出来进去把脚弹，愁的眼窝挤严严。城外看了六八遍，心慌意乱坐不安，一辈子受苦筋挣断，守了这么个命蛋蛋。单怕娃把错误犯，全家大小受牵连。保京那日回家转，这些人光拿眼窝翻，那个唤他“一千二”，这个叫他：“新状元”。他爸一见红了脸，眼睛瞪的赛鸡蛋：“我种庄稼五六十年，谁经过玉米打四石，你身上黄毛还没干，黑狗装熊硬上山。只图你人前装大胆，看你怎样成神仙？”他妈一旁眉头挽：“娃呀!说话不检点，听人说应了什么战，操心拉你去坐监!”媳妇见了没好脸，水不舀来饭不端，黑了上炕把灯点，怪话说了

一大摊：“人把你脊背能指烂，唾沫星子要把你淹；安宁的日子不好好过，偏要惹事寻麻烦。”保京听了笑开言：“这不是偷人赌钱抽洋烟，响应号召闹丰产，我走的路正道儿端，哪怕旁人把嘴说烂。我的心里有账算，手里没有金刚钻，哪敢去把瓷器揽！”王保京，意志坚，千斤车子总要掀。

第三回

白灵原下一棵松，根子扎在土壤中，有了阳光和水分，不怕寒霜四季青。王保京，心里明，依靠群众办事情，召集组员先开会，煤油灯下热烘烘。王正海，劲头高，扬胳膊伸腿直吼叫：“十指成拳力不小，每亩千二办得到。”姚生枝，点头笑：“咱可不能放空炮，黄忠八十不服老，我老汉跟上大伙闹。”窗外星儿眨笑眼，窗里人们涨红了脸。王保京，时杆杆，七户贫农撑后边，不怕地薄牲口软，不怕别人说闲言。独有中农郑富财，组里开会他不来；一愁组里多穷汉，不愿互助想离开；二愁增产事闹坏，一屁股骚气落下来；前怕老虎后怕狼，单怕树叶塌脊梁。他家有块好水地，保京跟他来商议：“我家土地一点点，全部都叫棉花占，你家地肥好条件，拿出来作丰产试验田。”郑富财，不言传，叭嗒叭嗒抽旱烟，拍拍尘土往起站，停了半晌才开言：“你拿你的土地干，造下福利我不沾；你渡你的东洋海，少使我的小木船。”千说万说不情愿，急得保京红眼圈。姚生枝，好老汉，忙说：“保京先别烦，我和他爸自小馅，让我前去把腿搬。”

费尽嘴舌事遂愿，让了一亩七分田。郑富财红脖又涨脸：“瞎了地你可要承担!”姚老汉，抽了口烟，嘻嘻哈哈说的欢：“嘿!莫生气，莫红脸，这个担子我来担；你的地能打两个五百斤，组内给你装一千。”技术站派了杨建武，满腔热情来帮扶，打破古规不守旧，改良技术细作务，庄稼行里有学问，保京学习很用心，要把“法宝”手握紧，要向科学大进军，命令土地打开增产门，交出银子交出金。收罢麦，不停缓，八车粪上拉地边，月亮当作油灯盏，全组下地拿锨翻；换来良种红心白马牙，密植留苗三千四百八。人不吃饭两腿软，地无粪上力气单，全组人凑钱买肥料，枣核子堆起成了山；油渣买来千二三，分期上到地里边，勤浇浅浇用沟灌，再不用老法子大水漫。苗苗出土长的欢，如同手拔扇子扇，风吹哗哗遮地面，秆粗叶宽赛竹园。保京高兴的心花转，爱如珠宝金蛋蛋。一天到晚看凡遍，单怕兔吃老鸽?。全组人，都含笑，眼看玉米节节高，谁知青天雷吼叫，乌云遮顶风啸啸，忽啦啦大雨像瓢浇，打的玉米顺地倒。王保京，真着急，看了东，又看西，淋得好像落水鸡，从头到脚满身泥，进了家门抱头睡：“唉，这回可算倒了霉!”猛抬头，嗬，眼一亮，一张旧报贴墙上，上写英雄黄继光，英雄的事迹天下扬。眼前一闪心里亮，想起往事好几桩：当初心盼共产党，曾撒传单闯咸阳；又想起，刘县长，句句话儿敲心上。看了看，想了想，浑身上下添力量，一骨碌翻身跳下炕，召集组员忙商量。会

议开了多半晌，大伙心里开天窗，脚踏实地双手忙，扶端玉米马兰绑。三天过后天气晴，玉米抬头朝青空。多少人，不相信，跑在地里辨假真。王金禄一见瞪大眼，吐吐舌头连声赞：“嘿！保京这娃不简单，当真人力胜过天，咱的玉米没照看，瘫了一地像绿毡。”多少人羞的开了口：“再不能死啃老骨头。”

第四回

大河行船遇浪涛，全凭艄公把稳篙，乘风破浪向前进，哪能回头朝后跑。王保京领着众组员，突破陈规闹丰产。风里雨里加劲干，玉米长的丈二三。人家的棒棒吐丝线，他们的还是光秆秆。村里人，都去看，怪话说了一大摊：“错打算盘把谁怨，咱看个水塌泥淤船。”有两个老汉蹲地畔，挤眉弄眼“胡弹弦。”这个说：“不结棒子光长秆，搭个草棚不缺椽；做饭烧水节省炭，锄把镬把也不熬煎。”多那个说：“不结棒子拿镰砍，也是一种好出产，埋在地里过了年，卖了甘蔗够本钱。”这个说：“自古谁见留稠苗，不瞎庄稼才怪了。”那个说：“保京这娃胡成精，竹篮篮打水一场空。”众组员，也慌乱，垂头吊脸怕言传。王保京心里像油煎，强打精神装硬汉，鼓励社员莫怯胆，天明再听鸡叫唤。每日地里走几遍，心如刀割乱箭穿。人在曹营心在汉，如同疯病把身缠，清早回家去吃饭，舀下米汤来洗脸；媳妇骂他：“瞎了眼，你朝脸盆看一看？”他嘿嘿一笑把水换：“唉！我真成了二杆杆。”

端饭忘吃前后转，好像演唱时乱弹。半夜回家门碰头，他爸唠叨不停休：“黑明跑的不沾家，你的心叫狗吃啦!”保京愁的把病患，躺在炕上难动弹。有些人，思想瞎，加油添醋讽刺他：“天火着了火焰大，指望眼泪能顶啥？再不见娃吹大话，这一回高楼必倒塌。我若是听了政府的话，十拿九稳有办法。母牛尻子上种下一窝瓜，叫它结得像咸阳原的冢疙瘩。”又在背后传瞎话，说什么保京急疯啦。这股子歪风传得远，保京的亲戚都加熬煎，他妗子、他姨把病探，抱怨老婆和老汉：“京娃年轻少识见，哪知酸辣和苦甜，你为啥不把娃照管，由他任性招祸端；如今娃把疯病患，你看泼烦不泼烦!”老汉听言唾沫溅：“人家能的赛神仙，强的好像生锈的剪，任他插翅飞上天。”刘县长，吃一惊，骑车子来看王保京。他爸听说是县长，吓得心跳脸皮黄：“莫非为玉米没结棒，来找麻烦把脸伤。”他妈吓得眼窝瞪，滚油烧心坐不宁：“万不敢给娃把罪定，五花大绑拉狱中。”听见县长说话声，小房里走出王保京。倒茶取烟端板凳，说说笑笑谈心情。谈到日落西山起彩云，县长的话儿真中听：“保京啊，想一想，革命的道路有多长，多少烈士把命丧，艰苦奋斗志如钢；困难挡不住有心人，铁杵能磨绣花针。同志，你把心放静，相信科学成大功。”好话入耳就生根，句句敲醒王保京，鼓起勇气继续闹，离开病床下地了。杨建武，把心担，帮助保京不歇缓，化学肥料买不到，发动组员把炕搬：“炕肥性质

温又暖，捣碎砸烂打成面，撒后再浇水一遍，管保玉米棒子繁。”众社员，齐动手，推上炕肥地里走。七日七夜把效见，杈杈上发出羊角尖。大伙一见真高兴，开笼的包子热腾腾，风吹玉米哗哗响，地里一片乱弹声。

第五回

王保京好比铁旗杆，风吹雨打腰不弯，不怕石头把脚绊，迈开大步走向前，谁料事情多有变，阴雨又下了好多天，地皮湿润土泛松，大群的蛐蛐来横行，太阳一照满地蹦：咬的玉米根上尽窟窿。保京心如猫爪抓，又跟组员想办法：麸皮、香油气味大，和六六六药粉拌一搭，晌端日焦顺地撒，要把蛐蛐一起杀。王俊英有意把人糟蹋，捉了个蛐蛐手中拿，回家和药粉包一搭，装进自己袄岔岔。见了保京往出拿，解开包包可蹦啦：“你夸药粉效力大，我看这就不顶啥，不怪人都叫。‘白料’（注：‘白料’，关中方言，意指‘白搭’），今天一试果不差；政府说话也掺假，我看尽是哄傻瓜。”保京虽然撒了药，心中到底不实确，整夜翻转睡不着，只盼鸡叫星儿落。天明下地快如马，蛐蛐死的黑刷刷。这个办法真不差，全村人跟着也来撒。刚把蛐蛐铲除净，秆秆又生钻心虫，杀虫药粉用不上，大家研究下苦功：全组男女齐出动，照着窟窿拿针通。来了个中农王俊英，瞎话出口六月冷：“你们作务比人能，还会给玉米看胃病；美帝在朝鲜放毒虫，你们为啥不显本领，失掉机会没得重用，还在家里当百姓。”保

京的玉米除了虫，又绿又胖黑洞洞。谁又知棒棒不生颗，急得保京瞪眼窝，心有事只显夜太长，天不明下地用手摸，剥了一个又一个，个个都像长虫壳。杨建武，有把握，召集组员把话说："人工授粉很保险，上边天花挑选扳，花粉收在盘内边，纸筒筒里头把粉灌，套住棒棒指头弹，保险玉米能丰产。"保京带上众组员，日红如火地里钻，头晕脑胀身流汗，人工授粉闹得欢。村里有人通不过，背后又把闲话说："这样的办法不稳妥，八十的老人谁经过？百样无头命难活，好人怎敢把头割。红日当头如烈火，枉费心机顶什么？抽了天花难结颗，我看他娃要'挨挫'。"授粉以后没十天，棒棒歪头离了秆，颗颗肥大上了面，从根到梢挤严严，长短足有尺二三，又坚又硬赛单鞭。秋天玉米黄了秆，许多乡亲来参观，剥开棒棒仔细看："嘿！这样的玉米真稀罕。"过了秋分麦种完，全组下地用手扳，响声赛过连花鞭，连说带笑唱乱弹，剥皮晒干拾掇净，群众会上拿秤称，一千二百三十还挂零，消息震动白灵宫。泾河放喉来歌颂，树林阵阵发笑声，多少个保守旧脑筋，事实面前都打通。

第六回

互助组连年大丰产，天摇地动全国传，政府奖励群众赞，红旗插在泾河湾。到了一九五四年，王保京带组把社转，报名的人儿一连串，土多墙厚根子坚，社的名字叫"烽火"，增产劲比火旺的多，勤俭办社人心合，做庄稼全是新耕作。

有些社员眼光短，肚里的疙瘩上下翻。马书秀，真古怪，人在社里心在外，自留一亩丰产田，要跟社里作竞赛，产量若不比社坏，牵牛拉车出社外。泾河水，不倒流，终南山永远抬着头，社员齐心多下苦，秋后又是大丰收。全面庄稼都出众，最好的玉米一亩打千五。铁匠打钩弯回头，事实教育了马书秀。多少人踏上合作路，心盼一步往天堂走。白灵原下新庄村，出了一个新圣人，共产党员王保京，披红戴花进北京。见了领袖毛主席，浑身力量添十分，带头转入高级社，社主任就是王保京，依靠群众不骄傲，下决心再次立大功。他好比地下金一锭，共产党刨出放光明；他好比山头一彩凤，展翅高飞万里腾；他好比火车一声鸣，带动无数车厢奔前程。各位同志众亲朋，都来学习王保京，多创造，多发明，打破旧套老规程；闹增产支援工业化，建设祖国显本领。青天外面有青天，高峰上面有高峰，上青天，攀高峰，咱向科学大进军。革命事业无止境，社会主义放光明。

王老九的叙事诗，描述了王保京 1956 年以前的经历。1956 年初，他应报社“给王保京编快板”的约请，先后两次来到烽火，第一次住了 20 天，写了初稿，第二次住了 15 天，修订成稿。报社约请，不啻是党交给的任务。他是新时代的受益者，自然是新时代的讴歌者。正是在新的时代里，他这个农民快板书作者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尊重，把他称作“诗人”。他去西安，能与作家协会的大文人们切磋技艺，抵足

而眠。他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新时代也因为有了王老九这样的“农民诗人”而感到自豪和骄傲。王老九的快板书与诗歌，歌颂党，歌颂毛泽东，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劳动模范，歌颂解放军，歌颂互助组、合作社，歌颂“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歌颂一切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他与王保京相得益彰。农民写农民，自然得心应手。

叙事诗《王保京》基本上写的是真人真事，可以与《烽火春秋》的史料相互映照。王老九是关中土生土长的农民，深知农村生活之三昧。他不像《烽火春秋》的文人作者，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头并进，构筑了一部浪漫的人民公社史。叙事诗《王保京》只有两条线索：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而且，“科学试验”相当淡化，保守、落后的思想与勇于探索的思想的斗争也相当和缓。他是诗人，更是农民：他不乏诗人的浪漫情怀，他相信奇迹，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能做出前人做不到的事情来。然而，娃是娘生的，庄稼是地上长的。他应该知道当时一亩地能打多少斤粮食。他知道农民的文化水平。亩产王米1500斤比亩产1230斤要辉煌得多，却被他一笔带过。可悲的是，他攒足了劲写的亩产1230斤，被晚些年出版的《烽火春秋》给否定了。《烽火春秋》说，只打了八百多斤。王保京明明说是群众大会过的秤，怎会有假呢？王老九不会错过风靡陕西风靡全国的《烽火春秋》。当他看到《烽火春秋》的记载，会怎样糟心？王

老九 1958 年大跃进时，再去烽火，便没有留下美丽的诗篇。他是农民。他比别人更知道什么是胡闹。他尽了力。他的材料，来自实地采访——两下烽火，住在农民家里，采访不可谓不深入。但他毕竟是外乡人，人生地不熟，人们拣好听的告诉他，他也无法甄别。比如，人们只告诉他王保京帮助地下党撒传单的事实，却没告诉他几年前王保京因诈骗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事实。他叙述了王保京遇到挫折，称病在家，听说县长登门，吓得王保京父母“心跳脸皮黄”。王保京是独生子。胆大妄为吃过亏。父母经不起惊吓。母亲说：“万不敢给娃把罪定，五花大绑拉狱中。”自家的地，结不结棒子，顶多瞎了一料庄稼，顶多“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捞不回来，影响个人名声，怎么会定罪进监狱呢？俗话说：吹牛不要本钱。王老九不知道王保京父母担惊受怕的原因。他如果找到烽火乡新坡头村的张崇辉，疑问便会迎刃而解。

张崇辉陈述说：“1949 年，我任独立八团一营一连副指导员。当时部队驻扎在（陕西）彬县。我受组织命令，于当年的 9 月份，率所部到（礼泉县）阡东地区剿匪，打击地痞流氓、富豪恶霸邪恶势力，为建立新政权扫清障碍。到阡东不几天，群众纷纷反映王保京（当时在阡东梁耀先的粮店当相公）私刻假印，冒充陕西省（公安）特务大队长的非组织活动，并非法开具假证件，吓唬群众，欺压良民。当时我想，这虽然不是我的主要任务，但对建立新政权是有威胁的。我

便派人请示了当时在彬县的部队。当时的部队首长命令就此事立即调查制止。我立即派人前往簿大后村（现烽火乡政府所在地）调查落实这一情况，并当场将王保京抓住，带到吁东区政府进行门讯。一开始，王保京说，这假证明是阡东梁家梁耀先、梁耀祖兄弟开的。经查证，二梁并不知此事。经几天的盘问，王终于承认是本人所为。我当时非常气愤地打了王保京两个耳光，最后将这事交阡东区委处理。”

这段历史记录在案，经查无误。根据正式结论，“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的王保京，1949年农历六月“曾给本村五六个青年吹嘘说：赵寿山委任他为陕西省侦察大队长，并说‘你们好好干，将来大小给你个官’。随后，他在白塔发现庙墙上贴着一张彬县专员公署布告，遂将布告撕下剪去了印模，贴在伪造的公事上，欺哄王文朋，被王文朋之父识破。同年七月，又用肥皂私刻‘陕西侦察队分队’假印一枚，伪造证件，委任王文朋为副大队长，王保培为代大队长。并出公告，其内容是：‘陕西省政府侦察队第一分队公布，奉令派到咸阳、泾阳、礼泉、县大队长王保京，私查一切不公之事，土豪劣绅土匪家藏私枪支一律部可来管。此布。希城防官长验布放行为荷。’此后，王保京又向省主席赵寿山、贺龙元帅写假信各一封（未发出），以此宣扬个人，欺哄青年。可是王保京又发现一敌伪军官造谣煽动，即以所谓‘陕西省侦察大队’的名义出了一张‘现在有些坏人造谣生事，捣乱

破坏，大家要注意，不要上坏人的当’的安民告示。同时，王保京又假借‘职权’为其舅父杜富华结婚为题，在簿太后村介绍人刘启发面前及一些群众中拿上所谓‘派令’，大肆吹嘘自己，企图威胁女方与其舅父结婚，在群众中影响很不好，正在活动期间，1949 年古历 7 月 21 日被西总二支队副指导员张崇辉回家发现，遂绑送县公安局以刑事拘留。”

张崇辉证言与组织结论相符。张崇辉复员后，曾任阡东区第八乡党支部书记。后来，时光倒转，他因这两耳光，打出了祸事，后来几十年的人生充满了磨难，而王保京青云直上，成了礼泉县、咸阳市的父母官。历史本来是那个模样，现在成了这个模样：张崇辉烛光残照之年不能正其名，王保京功德圆满，衣锦还乡；张崇辉在九重天下哀号呻吟，王保京在九重天上光芒万丈。

功德圆满也好，衣锦还乡也好，光芒万丈也好，基础都是靠不住的科学实验结果：亩产王米 1230 斤、1500 斤纪录。王米亩产的纪录，城里人不会那么敏感，也不关心，城里的当权者和新闻媒体又好大喜功，不管农民和农业专家怎么怀疑，不管是否虚假，都赫然记人了历史。王保京已经捞够了好处，已经塑造了难以抹去的光环。他顺应时势，投其所好，彻底挽回了“诈骗”的不道德形象，控制住了烽火的政治局面，搭起了烽火大舞台，完成了烽火交响诗的合唱序曲。王保京踏着时代的节拍，从礼泉走向了咸阳，走向了关中，走

向了陕西，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烽火”点燃了，接下来便是不可阻遏的燎原之势。

03

五

但凡是历史，特别是名人的历史，人便心向往之，如同面对未来。未来飘渺迷茫，历史朦胧不清，现实这根扁担，前边挑着，“飘渺迷茫”，后边挑着“朦胧不清”，“扁担”的意义何在呢？这便是现实人们的困惑。在历史与未来的挤压下，现实寻找着出路，寻找着意义，起码要寻找存在的理由。当然，“寻找”本身便是现实存在的理由和意义。于是有了“历史学”、“未来学”。前者是已经发生了什么，后者是即将发生什么。即将发生什么，离人们远一些，已经发生了什么，则离人们近一些。人们愿意作出现实的选择，愿意跟近一些的事物打交道，愿意跟:“历史”为伴，甚或沉浸其中，来解读现实的寂寞、烦恼与困扰。这只是一厢情愿。历史愿不愿意跟你打交道，愿不愿意跟你为伴？你逼得越近，便发现它离你越远，永远与你保持着一段距离。你越想探究清它的面目，它就越像川戏里面的“变脸”。今天一张脸，明天一张脸，后天一张脸，瞬息万变的脸，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脸——扭曲的脸，变形的脸，夸张的脸，割裂的脸，面具的脸，东拼西凑的脸，涂脂抹粉的脸。把扭曲、变形、夸张、割裂的脸矫正，把面具摘掉，把涂的脂抹的粉洗掉，还:“历

史”一个本来的面目，是现实和未天的需要。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历史已经久远。“真实的历史”往往如同茫茫黄土高原层弱如丝的潜流，老井村的人们打划井不止，祖祖辈辈打的都是枯井。“真实的历史”往往如同遮盖脓血的疮疤，揭开疮疤便是惨烈，便是目不忍睹。或许“真实的历史”是一场正剧，却被演绎成了荒诞剧，滑稽剧；或许就是一场荒诞剧或滑稽剧？不管是什么剧，都让它上演吧。

烽火村搭起了历史的舞台，以“烽火”为标志，以“王保京”为标志，从 50 年代到 90 年代，锣鼓开场，轰轰烈烈。

读完了王老九为我们提供的历史，再读一下王保京本人为我们提供的历史是有益处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王保京提供的历史没有遵循时间顺序，为了阅读方便，我全文引用时，按时间顺序作了调整，经历或荣誉有明显遗漏，称谓不完全或不准确，则用括号补齐或校正：

1946 年给礼泉县地下党做过工作

1949 年担任支前小队长

1950 年担任农会主任

1951 年加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青年团

1951 年组织临时互助组，任组长

1952 年任长年互助组组长

1954 年 8 月 22 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4 年任（烽火）农业社社长，后任党支部副书记、书

记

1958年任烽火公社社长

1970年任礼泉县革委会副主任

1971年1月任礼泉县委副书记

1973年任咸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副书记

1977年4月至1980年兼任礼泉县县委书记

1984年任咸阳市副市长、市委常委

1992年任咸阳市特邀顾问

1994年7月退休还乡

1952年获陕西省人民政府丰产奖章一枚（主要玉米〔丰产〕创全省纪录）

1953年、1954年获农业部丰产奖章一枚（主要玉米丰产创全国纪录）

1955年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成员）

1956年出席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获奖章一枚（物质奖励价值120元）

1957年参加全国劳模大会（任陕西代表团副团长）

1957年参加莫斯科第六届青年联欢节（随胡耀邦团长一块去的）

1958年被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陕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

（1958年曾为《陕西日报》评论员）

1958年参加全国第二次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获奖章一枚

1959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9年随陕西代表团参加十年大庆的国庆观礼

1965年（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73年参加全国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

1983年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先后为陕西省一届、四届、六届人大代表

（伴随着这些经历，不计算电台电视台的报道，新华社、《人民日报》、《陕西日报》、《中国青年报》、《红旗》杂志等等中央和地方的报道计有数百篇。我粗略统计，光是《陕西日报》，1954年至1996年就有近两百篇报道，而且大多数篇幅大，位置标题显著。）

王保京的历史可谓完满无缺，善始善终，光辉笼罩。1949年后的中国，有这样经历的农民，“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不敢说“独一无二”，也可以说“凤毛麟角”。细察其辉煌，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丰产“纪录”，二是媒体包装。考察烽火村的历史，考察王保京的历史，首先要考察的，是各个时期粮食的丰产或高产“纪录”，这些“纪录”是烽火村和王保京历史的全部支撑。前面说到，王保京早期的历史，既有革命的历史，也有利用革命进行诈骗的历史，1952年亩

产 1200 斤的“纪录”，已被主旋律《烽火春秋》证伪。1954 年亩产 1500 斤的“纪录”是否真实呢？

王保京和烽火村的故事，自始至终是围绕着粮食产量的“真”与“假”展开的，自始至终是围绕着科学与伪科学展开的，自始至终是围绕着中国社会的沉浮变迁展开的。

六

赵启文老人的眼睛，会说话似的观察着你。他可以把你当作棉花地里的小苗仔儿，你的些微变化和波动，逃不过他的眼睛。他望着窗外远处，落魄而茫然。他在回忆。回忆像伸缩的镜头，把他拉得很近，又推得很远。他犹犹豫豫，几多惆怅。——能想象老人在时间轨道上徘徊的模样。“典型”，往往是上级根据政治需要选择和培育的结果。他认为，烽火村发迹，从互助组到合作社，是一个重要的坎儿。翻这个坎儿，他是始作俑者。“我不知道，这是功劳呢还是罪过。”他说。

他的眼光停留在了 1954 年春天。

04

七

坐在南源上，一马平川地看去，好水灵的白灵官。泾河、泔河，自北山下来，蜿蜒流转，兀自南去。麦苗儿猫了一冬，风刀雪剑严相逼，憋曲坏了，此刻，正舒展开身体，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春天的灵气，与那树木花草一起，把一个“绿”

字繁衍开去。万物都在这春风洋溢中窃窃私语，喧闹嬉戏；万物的经脉骨节都在“嘎嘣、嘎嘣”作响，毫不掩饰地表现着出对春天的渴望和喜悦。

县长刘新怀带着县政府建设科主管农业生产的赵启文和魏作栋，在白灵官村住了一夜，第二天赶早出了村。

“刘县长回哩？”

“回呷。”

村民认识刘县长，互相打着招呼。

他们骑上南塬的大坡，出了一身薄汗。

“累了，歇一会儿”。县长提议。

他们翻身下车，把三辆自行车旁边一撂，席地而坐，各自点燃一根烟，眯缝着眼，望着塬下的白灵官村。

白灵官村，六十多户人家，生活在泾河西岸。礼泉县是个穷县，主要是缺水。可这白灵官村的耕地，大多在礼泉县唯一的自流灌溉区内，土地肥沃，“得天独厚”。

1954 年的春天，是一个不寻常的春天。继 1951 年 12 月《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之后，1953 年 12 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这意味着毛泽东修改了《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社会的判断，要用比较快的速度进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分散的自耕农更充分地组织起来，完成由互助组向合作社的转化。《决议》发表的时候，全国已经有一万四千多个合

作社了。陕西落伍了。此时，陕西批准试办的合作社只有234个。礼泉县只有包括王保京互助组在内的18个互助组。压力是无形的。县里急得团团转，急于想从18个互助组中挑选一个最精彩的作合作社的试点，作榜样，然后推广。开始时，选来选去，选中了史德镇陈迪村金光耀互助组。金光耀互助组搞得最早，搞得最好，是全县互助组的佼佼者。金光耀还被县上敲锣打鼓地推举为“劳动英雄”。试点，非金光耀互助组莫属。

殊不料，此举在陈迪村遇到了巨大的阻力。陈迪村是个富裕村，善于“看马下骡子”养牲口，主意特别大。赵启文奉县长之命，在陈迪村住了一个多月，苦口婆心做工作，可是“家家户户都不愿意成立合作社”。

赵启文跟金光耀说：“你是劳动英雄哩，要带个头哩。”金光耀的回答斩钉截铁：“宁愿不要‘劳动英雄’，也不要合作社!”这让赵启文大惊失色。《人民日报》社论说：合作化是“使全体农民走上幸福生活的唯一道路”。一家一户，几家几户，机械耕作，兴修水利，行么？明明对你们有好处，为什么坚决不干呢？人数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啊！阳关道摆着不走，为什么偏走独木桥？

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阳关道”，还是走分田单干“独木桥”，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初都有连续不断的大争论。前者是“进”，进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后者是

“退”，退到合作化之前的生产方式上去。50年代的争论以毛泽东激烈批评“小脚女人”，全国范围内掀起合作化运动的高潮而告终。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争论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人民公社乌托邦试验的失败和农民分田单干而告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走了一个小小的轮回。一个血与火的轮回。一个以牺牲几千万人生命、农村经济崩溃、数忆农民陷入极端贫困为代价的轮回。

“幸福生活”都不去追求，还有什么值得追求呢？精打细算的农民，此时怎么转不过脑筋了呢？奇哉。怪哉。

这里面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背景，就是1953年的粮食危机。史家注意到，1953年底加速农业合作化进程与当年的粮食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几年，由于急速推进工业化，城市人口膨胀，1953年城里人的粮食消耗量比上一年增加了31.6%，而政府从农民手里征收的粮食只增加了8.9%，形成了粮食收支的巨大缺口。1953年夏季，国库存粮仅能维持城里人两个月！而且，长江流域水灾，夏粮减产已成定局。形势极其严峻。私商也趁火打劫，大量囤积粮食，粮价攀涨。农民不跟政府合作，要么瞒产，要么囤积备荒，挨家挨户核实征购，既不现实，也会惹起事端。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惊呼“挑了一担炸药”：前边是城市，后边是农村。1953年10月，毛泽东说：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对付出粮的”政策出台了。据说陈云向政治局

提交了解决危机的八种办法，政治局挑选了最严厉的“统购统销。”该政策的核心是，关闭粮食市场，政府行使粮食专买专卖权，农民必须按政府核准的数量、价格、品种将粮食交给国家，卖给国家，灾荒年歉收也不得减免、如果交完不够吃，由政府核准后“返销。”前者叫“公购粮”，后者叫“返销粮”，再后来又搞了一个“超产超购”政策，有的地方包括陕西美其名曰：“爱国粮”。其核心是，不“超产”也“超购”，以弥补“公购粮”之不足。总之，想方设法地从农民的手里多拿些粮食。烽火当时流行着一个顺口溜：“合作合作，王米面坨蛇；单干单干，白米细而。”讲合作与单干的生活差距，烽火也有明内人。

《烽火春秋》记载，一个叫王彪（真名王作创）的村民1957年悦：“咱社搞什么科学研究，什么丰产田，都不是胡整吗？还有什么合作化，明明没有单干好呀！还有什么统购统销政策，把农民的粮食一家伙都哄骗去……”郑守业（真名郑富财）说“统购统销把农民的粮食都弄完了，把我娃饿得成大价哭。”

1953年10月，“统购统销”政策公布实行，一个多月后，合作化《决议》公布，以保障政策的实施。也就是说，“合作化”是“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度保证。合作化运动像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一边翅膀是“统购统销”，一边翅膀是“合作化。”合作化不到半年的时间，政府完成了粮食征购计划，

而且超征了 60 亿斤。

农民也不傻。首先是金光耀不傻，陈迪村人不傻。他们知道，这是政府在算计他们粮囤里的粮食。所以，不管你说得再好，磨破了嘴皮子，就是不办合作社，这个账很好算，国家拿走了多少，自家粮囤里还剩下多少，够不够吃，富不富余。更要害的是，农民将失去曾经属于他们的土地——为了土地他们不惜流血牺牲，支持中国共产党人打赢了战争，取得了天下——进而将失去粮食处置的主动权。

这是一场大博弈。政府与农民的博弈。政府是赢家。谁也挡不住奔腾的潮流。合作化不久，就是人民公社，再加上户籍制度，农民就被牢牢地管住了。这不能小说是一个奇迹，中国川史上，从来就没有一朝代能把一盘散沙的农民聚拢起来，而且是用如此高的组织形态聚拢起来，将众多的小辫子梳成了大辫子。当然，农民和农民不同。王保京就与金光耀不同。他有金光耀辈所没有的政治眼光。他也算账，不过算的是更长远的账。王保京审时度势，“随机应变”，顺应潮流，采取了与政府合作的态度。何况他本人还有碴儿抓在政府的手里。几年前，他伪造公章，冒充陕西省公安侦察大队长的身份，招摇撞骗，被公安局刑事拘留。年轻，不懂事，可以是一个说法，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个记录在案的历史污点。“骗子”的形象，无论在村子里，还是在政府那边，都是个受到鄙视的形象。合作化无疑是个机会，一个洗刷形象

的机会，一个由政府来确认他在白灵官村领袖地位的机会。他把握住了。如果不借助政府的力量，农民不会认同或接受一个道德不完善甚至有污点的领袖。

社会学家秦晖先生，专门研究“农民学”，不久前写了一本书，叫做《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现代社会的再思考》。他告诉我，从“农民学”的角度看，关中平原是一块非常独特的区域。由于富庶，由于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曾经是中国政治统治的核心地带，从宋朝开始，农村宗法势力一直受到政权的抑制和打击。与其他地方相比较，关中一带血缘秩序比较早地趋于消解和淡化，使得农民更加信奉权力。他形象地比喻为：“天大地大不如权力大，爹亲娘亲不如权力亲。”对权力的追逐，对权力的崇拜，对权力的盲从，构成了关中农民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通常情况下，乡村理想的领袖或英雄，首先是道德的，然后才是能力的。当然，新的意识形态的引进，乡村传统道德已经被或正在被“摧枯拉朽”。王保京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利用和把握“摧枯拉朽”的趋势，最终确立巩固自己在烽火村的政治基础，以至走上陕西的政治舞台，这都是后话了。~“觉悟的农民”与“不觉悟的农民”从此分野。王保京从此改变了自己命运的走向。

合作化问题，县政府着急，王保京热情，一拍即合。一夜下来，皆大欢喜。

难怪刘新怀等一行三人能踏踏实实地坐在源上抽支烟，欣赏源下白灵官的大好风光了。他们知道，他们已经推倒了礼泉县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已经挖开了拦水大坝的缺口，接下来便是不可阻挡了的潮流了。土地公有制的风暴，如同几年前的土地改革一样，将席卷整个乡村社会。桃花源中人，将汇入社会变动的大潮中，现在似乎已经听到，“轰隆隆”的响声了。柳青此时正在终南山下一个僻静的村庄里，注视着关中大地、中国大地农村社会的变革。一部《创业史》，用史诗的笔调描述了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进程，塑造了梁生保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他们刚刚摆脱了旧时代的束缚和压抑，以对党和领袖的无比信赖，以对新生活的渴望与追求，响应合作化的号召，把那些情愿或不情愿的农民组织起来，史无前例地抛弃了数千年延续下来的沉闷单调的小生产耕作方式，向科学进军，向社会主义进军。这种对新生活的渴望与追求，是不容怀疑和阻挡的。作家们裹挟其中，抒写和沤歌着这一时代主旋津，并奠定了这些作家的文学地位。然而，他们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合作化运动深层制度背景，在先进与落后、创新与保守、非黑即白的认识框架内把握着社会激变，以饱满和真诚的政治热情，以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匆匆拿起笔来，加入合作化变革的行列。他们的眼光凝固了，他们不会料到，接踵而来的是 1957 年、1958 年、1959－1961 年、1966－1976 年，更不可能料到人民公社的

崩溃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历史跟作家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历史经常跟轻信的作家开玩笑。浪漫情怀如果跟意识形态联姻，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尴尬。痛心疾首的尴尬。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你会怎样呢？我不知道“重写文学史”会怎样评价那一时期的作家和作品，但是，可以肯定他说，作家为我们提供了那一时期农民生活的时代脉络，文学价值不敢说，起码为社会学和历史学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比如梁生保和王保京的比较——艺术的梁生保与艺术的《王保京》，现实的“梁生保”与现实的王保京。“启文，你背上铺盖，到白灵官住上一段”刘县长说。“金光耀咋办哩？”赵启文问。

“撂了!”

撂了金光耀，培养王保京，终成定局。

05

八

赵启文跟着县“建让工作组”进了白灵官村，工作组发动，卓有成效。其实，工作组来之前，许多农民就有根高的觉悟了。《烽火春秋》已载了村民王保利与妻子在被窝里的一段对话：一天晚上，下保利在床卜翻来覆去睡不着。老婆问他:

“你不是整大念叨着办社，眼看社就办成了，还有啥事叫你睡不着？”

保利说：“计办起来，?扎啦！人高兴得很！一高兴，就

想起过去的苦日子。”

他翻了个身对老婆说：“咱爷手里穷的揭不开锅；咱大做活，一个能顶两个，可是，还是个穷，老来还要出外给人打短工；到咱手里，我样样活路不避，拼死忘命地干，倒越发穷的不像样子了。全家十一口人，守着二亩地，实在穷到了底，苦到了头！多亏毛主席、共产党来了，咱才活成了人。解放给了咱一条活路，土改给了咱一层家底，合作化又给咱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这回社一办起，咱祖祖辈辈没午没车的日子就到了尽头。从今向后，咱娃咱孙就再也不受咱那号子罪了!”

老婆听着听着，高兴了说：“那以后咱走亲戚去，怕也能坐上个牛车啦!”

这番文人整理的“被窝谈话”，像是在被窝里开会作报告。情节细节不可考，暂且由它去。

“被窝谈话”的第二天一早起来。王保利绞了两担水，便出门“串连大伙都入社，走社会主义的路”。他看见他四叔王金寿进了王保京家的院子，他也跟了进去。他看见四叔拉着王保京说话。论辈分，王保京也该叫王金寿老汉四叔。“你给四叔说个定点，社里到底要不要我这个孤老汉？”

“四叔，要哩，一定要哩!”王保京笑着说。

“给!”王金寿老汉见王保京答应要他，便从腰里莫出一卷白纸。

“啥？”王保京问。

“这是四叔的家当——土地证，你收下，从今往后，你就给四叔把家当上。十八年年馑手里，我全家子饿死的只留下我这条老命了。旧社会我沿门讨过饭，给人拉过长工，打过短工，脊梁杆子都挣弯了，差点没饿死。这会儿，一入社，就算跌到福窝里了，这把老骨头死也要死在社里。”王金寿老汉将土地证递过去，“眼窝里泪花子早扑门扑闪地流出来了。”

王金寿老汉的感情，不可谓不真实。《烽火春秋》的秀才们选择王金寿老汉拥护合作化，主动交出土改时获得的土地证，具有象征的意义。同时，不经意他说明了合作化运动的真正目的：即收回农民对土地的权利，进行“二次土地革命”。这场“交易”的过程相当神奇。从字面上看，似乎仅仅是为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许诺和期待，农民便心甘情愿地交出了还没有捂热乎的土地证。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历史上，农民为了获得土地或者说在土地上活下去，不惜挺而走险，揭竿而起，进行了一场又一场惨烈而悲壮的农民战争。为了土地，农民支持共产党人打赢了一场战争，彻底改写了中国的历史。“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不惜背井离乡，不惜流血牺牲。现在，农民又要继续作出牺

牲，刚刚《暴风骤雨》，又要《山乡巨变》，谁会真正愿意呢？作为一种象征，王金寿具有代表性吗？可以提供给我们分析的是，王金寿老汉既占了鳏寡孤独，又占了老弱病残，一句话，他虽然有土地，却没有劳动力，没有走出贫困。这些农民担心守不住土地，担心《人民日报》社论所说的。“两极分化”，自然就像土地改革和以往任何一次社会革命社会运动那样，成了合作化运动的主力军。这些贫苦农民，按照当时的说法，是革命和运动的“老基本”。早期的合作化，就是“依靠贫雇农”的策略和“自愿互利”的政策。

哪些人自愿？哪些人互利？是社员之间的互利，还是农民与政府之间的互利？贫苦和富裕农民之间谈不上互利，劳动工具，劳动力数量、素质，勤俭，家政……等等方回，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白灵官村的富裕农民王崇财和另外一个富裕农民郑富财说：办社是好事，就是有些穷光蛋，光想拿着干捻子蘸别人的油。哼，心里想得怪谄！这是富裕农民的普遍心理，当然就谈不上“自愿”了。但是，有一个信息传达得非常清楚：政府正在强有力地支持着农业合作化运动，支持着村里一部分积极办社的贫雇农。

王金寿交出土地证，无条件出让自己对土地的权利，就土地和农民的关系、农民和政府的关系来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农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拿走了土地，等于拿走了农民的“通灵宝玉”，拿走了农民的

灵魂。农民和界碑一样，恋恋不舍地被人从土地里拔了出来，身上满是泥土的芬芳。

1954 年 5 月 4 日，是白灵官村大喜的日子，也是礼泉县大喜的日子。白灵官村全体村民大会。18 户入社的农民喜气洋洋，农具擦洗干净，耕牛脖子上挽了大红绫子，也一块儿来到会场。王保利几天前刚买的铁锨也扛到会场上来了。人欢牛叫，铁器铿锵，锣鼓喧天。县委工作队自然也来助威。场面热闹，每一个细节安排周到，青年王保京第一次在县领导面前显示了非凡的组织才能。

开会了。王保京讲话了。他说：“经过一个多月来的酝酿、学习、讨论，咱们农业社今天成立了。县委为了鼓励咱们，永远高举革命的火炬，把咱社命名为‘烽火初级农业社’。我们一定要听党的话，使这把火越烧越旺，越旺越亮。”

说罢，“掌声、锣鼓声和口号声，响成一片”。

“白灵官”从此消失，“烽火”从此点燃。点燃后便一发而不可收。烽火初级合作社，烽火高级合作社，烽火人民公社，烽火人民公社烽火大队，一直到今天的烽火村，烽火“烽烽火火”地燃烧了四十余年，果然“越烧越旺，越烧越亮”，成为陕西省一杆永远不倒的红旗。王保京也从此走上了陕西的政治舞台。从王保京的简历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烽火”的命名，还有一段故事。说的是，白灵官村有

座无量庙，庙里住着两个叫化子。一个姓刘，瞎子，人称“刘瞎子”。一个叫王志清。两个叫化子，不知何方神圣，好几年寄居破庙，早出晚归，相安无事，过着与白灵官村人毫不相干的牛活。其中王志清颇有特色。相传他的祖上是清末秀才，后来家道破败。他耳儒目染，家学渊源，练得一手好字，算得上方圆几十里有学问的人，因此赢得了白灵官人的尊敬。他出去要饭，亦不辱斯文，拎的是毛笔和墨汁，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盖房架梁，给人写对子，叫做“文明要饭”。闲了便出谜语逗孩子玩儿，比如：“三人同日去观花，百友原来是一家，禾火二仙对面坐，夕阳桥下两冬瓜”，打四个字。白灵官要成立合作社，一时不知起个什么名好。有人提议找无量庙的叫化子王秀才。王秀才在破庙里摇头晃脑，掐指盘算，脱口而出：

“‘烽火’咋样？”

“啥意思么？”人问。

“烽火一举，万里为畴!”王志清云。

人们不知所云，仍赞道：“烽火”，名字响亮，好！

叫化子王志清“烽火”二字，奠定了白灵官人几十年的气势。

“烽火”燃起来了，渐成燎原之势。这是白灵官村的农民所没有料到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白灵官村的农民多少也有些预感，革命运动即将来临，他们都将成为被革命被改造

的对象，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也会像王金寿老汉那样，交出上地证。他们不甘心。他们进行过顽强的抵抗，然而，像全国所有的不愿意合作化的农民一样，顷刻间上崩瓦解，灰飞烟火。他们的抵抗，为土地私有制唱了一首无可奈何的挽歌。

只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合作化运动“烽火连天”，掀起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无比欣喜他说：“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〇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呢？完全是的。一切地方的党组织部全面地领导了这个运动。农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地加入这个运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最广大的群众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将

来。”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中下三册，收集176篇文章，约九十万字，是一部影响深远的书。毛泽东精力充沛，亲自编订、作序，亲自在大多数文章前加了按语。这种情况是极其罕见的。约九十万字篇篇过目，“序言”气势磅狄，“按语”高屋建瓶，妙语连珠，义采飞扬，非常极致地展现了毛泽东不可替代的领袖魅力。

毛泽东的“序言”和“按语”有很强的针对性。1951年出现的农村合作化，发展到1955年，出现了许多重大的问题，在党内引起了分歧和争论。副总理兼中共中央农村王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农村合作社要“小发展”，适度发展，发展一段，巩固一段，维持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分红。毛泽东则认为农村合作社要“大发展”。毛泽东对邓子恢说：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他斥责邓子恢的思想和政策是“小脚女人”走路，“东摇西摆。”他为《陕西日报》1955年8月3卫日的一篇报道写的“编者按”说：“这是一篇动人的叙述，希望读者好好地看一遍。特别要请那些不相信广大农民群众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同志和那些动不动就想拿起刀来‘砍掉’合作社的同志好好地看一遍。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最大的缺点，就是在许多地方

党的领导还没有主动地赶上去。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使各级地方党委在这个问题上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动立场，将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到自己手里来，用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态度去领导这个运动。不要重复叶公好龙那个故事，讲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临到社会主义跑来找他，他又害怕起来了。”

王保京无疑是毛泽东表扬的合作化中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党内的邓子恢等，无疑是“叶公”。叶公从此成了“右倾”的代名词。不知道为什么，在《高潮》的陕西部分中，没有烽火合作社。这似乎不合理。1954年，烽火社就试验新种“红心白马牙”，单产王米1500斤“零十三两”（注：当时是老秤，一斤16两），创造了玉米单产的全国纪录。1955年又获玉米亩产1624斤的纪录，这应该是陕西人的骄做。50年代初期的农业技术水平，玉米亩产上千斤就不得了。王米亩产1500斤、1624斤，像是天文数字。报纸公布后，在全国引起了轰动。谁不相信报纸呢？这难道不是合作化的伟大胜利？为什么不去利用呢？如果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毛泽东，将是何等快意的事情啊！《高潮》编订于1955年12月，陕西有足够的时间送材料呀！是不是其中有诈？史载，当时的县长和乡党委书记亲自参加了过秤，很多人围观，还会有诈？烽火亩产玉米1500斤的消息，轰动了西北农学院。

一张报纸摆在了西北农学院副院长康迪的办公桌上。不

愧是神农后稷的子孙。武功和礼泉相隔只有几十公里，烽火玉米高产的冲击波，首先引起地震的便是武功这个西北农业科学和教育中心。在传统的耕作方式和物质条件下，玉米亩产1500斤，是当时的农业技术专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康迪相当敏锐。觉悟的一代社会主义新农民，探索科学，向传统的耕作方式挑战，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奇迹是完全有可能的。一般理由是，生产关系调整后，必然会带来生产力的变化，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出来呢？近在咫尺，应该派人去看看，如果总结出一般性的经验，推广开来，大面积丰产，岂不美哉。派人去，派谁呢？去的人，既要有学术造诣，又要能吃苦，还要有与农民打交道的经验，学院没有先例。颇踌躇。

06

九

90万大洋的办学经费和学成出国留学的诱惑，60年前把苏献忠从北平吸引到了武功。1936年，苏献忠高中毕业后，考进了北平农学院，还没上路，他又看见了《大公报》一则西北农业专科学校（西北农学院的前身）的广告，优厚的办学条件，美好的前途憧憬，使他的脚步犹豫了。他在河南开封古城徘徊。这里曾是大宋帝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富甲天下，外族觊觎，后来竟成了耻辱的象征。占往今来，逐鹿中原，开封开封，既“开”又“封”，既富裕又羸弱，留下多少英

雄的豪情和怅惘，留下多少英雄的沮丧和叹息。开封正是春天，却满目苍凉，顿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感慨。国家的前途何在？个人的前途何在？对于一个前途迷茫的穷学生来说，北方是大都市，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高深莫测；南面的西北，则是穷乡僻壤，但前途却有一线光明。他斟酌再三，决定放弃北平，再考西北农业专科学校。这一选择，彻底改变了苏献忠的命运。这种选择也许是明智的。当时，日军南下，直逼华北，兵临城下，北平已经相当吃紧，一年以后便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也正是这一选择，把苏献忠的命运与烽火村紧紧地捆在一起了。

也许苏献忠与烽火村有着深深的机缘。他学术生涯的种子埋在了泾河岸边，埋在了烽火村这块即将大噪大动大红大紫的土地里。他是玉米专家。他也看到了报道。他的眼睛一亮，脑海里一，系列的数字飞速旋转着，由数字而画面，上系列的画面呈现在眼前。他十分清楚当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一亩打个七八百斤就不得了了，千儿八百斤，算是顶尖的水平了……1500 斤，用什么品种？要种多少株玉米？每株结多少个棒子？怎样的耕作方式？怎样的田间管理？用多少肥料，用怎样的肥料？……他更知道王米单产 1500 斤，如果总结推广，对于还没有摆脱饥馑、人口却急速增加的中国人将意味着什么。当时他正带着学生在宁夏实习。一天，他突然接到急电，学院要求他立即返校，电报

上没有说明理由。

他走进了康迪的办公室。他有某种预感。“康院长，你看……”他把报纸递过去。康迪知道苏献忠要他看什么。康迪心领神会，没接递过来的报纸，从办公桌上拿起一张同样的报纸来：“你是不是要我看这张报纸？”

“你有什么想法？”康迪问。

“应该派人去看看。”苏献忠说。

“派谁去呢？”

“当然是我去。”

他们相视一笑。

“苏教授，这次请你回来，就是要请你去礼泉。”康迪况。

一〇

1955 年夏天，回茬玉米播种前，苏献忠副教授来到了烽火。大学教授背着铺盖卷儿到农村，帮助农民种庄稼，可是烽火开天辟地的事儿。土生土长的农民，大学教授是啥模样都没见过。“大学的教授先生们来了，咋服侍呀？”陕西文化深厚，农民没读过书，却尊重读书人。而且，教授带来了种庄稼的“科学”。“教授”陌生，“科学”更陌生。可要好生服侍。他们给教授腾好房子，专门到阡东镇请厨师，要给教授开小灶。苏献忠当然拒绝。当天晚上，他与全体社员见面，说：“大家不要把我特殊化了。我来，就是社里一成员，

在称呼上见面喊名字或是叫我，‘老苏’就好了。在生活上，和大家一样，大家吃啥，我吃啥。”农民不让他参加劳动，他说：“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我还没过第一关——‘劳动关’，你们就拦马？”

他在烽火一住就是半年了同吃同住同劳动。之后五年的时间里，他断断续续去礼泉指导农业生产。他后来写到：“我深深体会到，要想在政治思想上有所提高，使自己成为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向他们学习阶级斗争的知识和生产斗争的知识，这样，自己的思想才能得到彻底的改造，才能成为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又红又专的干部。”思想发自肺腑。“又红又专”，可以说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和努力目标，也是组织上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标准。如果实现了这个目标，达到了这一境界，自然受益无穷。陕西省委后来发出决定，向西北农学院学习，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帮助农业社提高了农业技术，改进了经营管理，增加了农业生产；一方面使农学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更能结合实际，并且使教师学生在同农民的经常接触和劳动锻炼中，逐渐养成与劳动人民同甘共苦、亲如家人的思想感情。”思想感情是一回事，科学技术是一回事。苏献忠是那种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农学院派他来烽火的任务很清楚，总结玉米丰产全国第一的经验。他庆幸“烽火的农民与别的地方的农民不一样，有这么高的热情，肯拿出地来

进行科学试验”。他向王保京详细了解玉米。“丰产”的技术措施，并划出试验田，严格按照亩产1500斤标准复制全过程。结果怎样呢？

1954年，烽火玉米亩产1500斤，至今说起来，仍然是个谜。因为在此之后的一二十年时间里，烽火大田玉米平均亩产徘徊在400斤左右。王保京曾有个外号叫“一千二”。今天许多老人还记得这个外号。王保京也在会上说，王老九的叙事长诗《王保京》已有记载。《烽火春秋》记载得更详细一些。1952年春天，王保京向西北劳模张应亮挑战，一亩丰产玉米要打1200斤。村里人都说他“疯了”！“立在唐王陵（注：即唐大宗昭陵）上摸天——不知高低。”人们扎堆聊天儿，看见王保京走过来，会悄悄地说：“一千二来了。”然后散开去。这年秋天，试验田“吃小灶”打了859斤。当时，859斤也算奇迹。没有公开报道，没有核实，也没人去核实。中间沉寂了三年，突然说玉米亩产比1952年翻了近一倍！其中必有诀窍。诀窍是什么呢？

苏献忠42年前去找诀窍，我42年后去找诀窍。

苏献忠已是近八十岁的老人了。他戴着深度眼镜，满头银发梳得很整齐，背略驼。他记忆力惊人，能一眼认出几十年不见面的熟人。像所有的老人一样，他说起以往的经历，津津乐道，眉飞色舞。

屋子里空空荡荡，杂乱无章。老人一个人住，平时住西

安女儿家。他隔三岔五地回来。西安人生地不熟，白天女儿一家上班，没人陪着说话，甚寂寞。“回学院，都是老朋友，打牌，下棋，聊天儿，自己买菜，自己做饭，充实得很。”他说。

他毕竟在武功张家岗这个大院子里生活了 61 年。他舍不得这个地方。读书，教学，科研，春夏秋冬，日起日落，青年，中年，老年，在这里经历了人生的一个轮回。他要回来。他要一个人独处一会儿，静静地读书，静静地回忆，静静地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落叶声——他所熟悉的风声雨声落叶声。他离不得土地。他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他更愿意在更深夜静的时候倾听土地的脉动，更愿意感受乡上里百花齐放、五谷丰登的醉人的滋味儿。很少生人来访，生人来访便热情。他因为和烽火的关系，曾经作为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型风光过。他以为，世界早把他遗忘了，他蹒跚着沏茶倒水，蹒跚着从里屋拿出南瓜子，拿出油炸果子。他的热情中透出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机敏和圆润。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一切都是预备好的，好像为了这次访问，他已经等白了头发。

他的头脑十分清晰。1955 年第一次到烽火的情景，老人记忆犹新。报纸上写的都是应时的套话，他的内心深处是另外一套想法。他去烽火找王保京，蹲点检验调查，“一是按你的一套搞，看是不是能搞到你说的那么高的产量；二是总

结你的经验，并用来指导玉米生产和教学”。就是要证明你说的产量是否属实。许多农业科学家都有怀疑。

他严格按照王保京的说法搞“丰产试验田”设计。可是一开始便发现了漏洞。“首先是玉米品种。他们用的是‘辽东白’、‘红心白马牙’两个品种。这两个品种都不能算是好品种。”他直截了当地说。

再看播种期。“夏玉米播种期特别关键。”王保京说，深翻土地，“立茬曝晒”。“立茬曝晒”这项措施，延长播种期一个多星期，显然不利于玉米生长。这是常识性的问题。俗话说：“五黄六月抢种田，早晨中午差半年。”极言适时播种之重要。“延长播种，个多星期，肯定要影响产量。”

还有播种质量、防虫、“提早灌头水”、“两开兑一凉种籽处理”等措施，都需要进一步试验和改善。这些都不说，就踏踏实实按你说的办，配上最好的劳力，精耕细作，满足最好的水肥条件，像看护刚出生的孩子那样看护“丰产试验田”玉米，一年下来，挣死了命，亩产 1027 斤。差了近 500 斤！

天气，1955 年不比 1954 年差。毛病出在哪儿？还有什么“丰产”的诀窍呢？外界只知道 1500 斤，不知道苏教授验证的 1027 斤。纪录肯定有诈，只不过不说罢了。

在当时的大气候下，苏教授把“1027”这个秘密涂深地埋在了心里，一埋埋了四十多年。他的文章，报道他的文章，

从来也不提“1027”的产量。1959年，他写了烽火“夏玉米丰产经验总结”，“总结”里，只讲经验，只讲精神，只讲利弊得失，回避当时最可能风光的产量。如此大的差距公布出来，结果会怎样呢？

1954年烽火创玉米亩产1500斤的全国纪录便永远记入了历史。但是，苏教授毕竟是农业科学家。他在50年代写的文章里透露了烽火王米高产存在的技术的问题，非常巧妙地为重新了解和认识历史埋下了伏笔。

1955年9月17日《中国青年报》刊登新华社记者拍摄的新闻图片，王保京笑容满面地站在即将收获的玉米地前，图片说明是，王保京带领烽火农业社，“用科学的耕作方法，热心学习新技术，深耕细作，大胆试验，使社内庄稼连年获得高额丰收。1954年该社玉米丰产地平均产量达1500多斤，打破全省的纪录。今年，该社王米计划丰产地要达到1600斤的高额产量”。

图片刊出后，编辑部收到广西郁林县读者庆增兆的来信，质疑：“看了这个图片，使我们广大群众十分惊讶；到底这个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或是你们把150斤说成了1500斤？因为玉米从来没有这样高的产量。”

编辑部为了核实真假，委托《陕西青年报》记者再访烽火，并于1956年2月17日用二版三分之一的篇幅刊登了王保京和烽火社员显然是摆拍的五幅照片。图片说明引证王保

京原话："只要我们听毛主席的话，走合作化的道路，用先进的科学耕作技术，庄稼就一定能增产。今年我们农业社已转成高级社，社员的积极性很高。我们争取在今年积够五万斤草木灰来上地，多打粮食。就我们的青年玉米丰产田来说，今年计划每亩地要打 2000 斤，比去年还要多 500 斤。"

图片说明还引证了《陕西青年报》记者的说法："现在，烽火农业社的男女青年和社员们一道，正热火朝天地投入到大生产运动里，争取玉米更高的产量。"

编辑部以此判断"消息是真实的"。

核实烽火社玉米高产的报道，除了大而化之的豪言壮语外，什么过硬的依据也没向读者提供。王保京跟记者说，1955 年玉米丰产地要亩产 1600 斤。此时，苏献忠正在烽火，在王保京的大力支持下，挣命打了 1027 斤。王保京要在 1956 年"比去年还要多 500 斤"，"要打 2000 斤"，从何谈起呢？

与此同时，省农业厅和省委农村工作部也对"1500 斤"提出了疑问。农业厅长赵锦峰找到团省委书记白纪年，说："老白，1500 斤不可能么！"他掰着手指头跟白算账："一亩地 660 平方米，最多载 2000 株玉米。如果要打 1500 斤玉米，起码要载 3000 株玉米，而且要保证每株玉米结一个大棒子，每个棒子要剥半斤干玉米籽，这怎么可能呢！"

《王保京》中的王保京就大着胆子把不可能算成了可能。据查，1954 年后，一直到今天，烽火的玉米亩产没有真

正超过“1500 斤”纪录。

1954 年与王保京搞玉米高产试验比赛的马书秀曾在 1958 年跟王行兴说：“1954 年，王保京的丰产田玉米把化肥上扎哩，水灌扎哩。人家把这玉米当爷服侍哩！玉米就是长得好。到底打多少我也记不清了，1500 斤的数字，我也是在报纸上看到的。苏教授到烽火来，我问苏教授：‘苏教授，你见过王米亩产 1500 斤没有？’苏教授说：‘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

这次谈话时间是 1958 年。事隔四年，马书秀心里仍然不服气。

苏献忠并没有发现烽火玉米丰产的真正秘密。

真正的秘密是什么呢？

烽火玉米亩产 1500 斤的消息公布后，陕西团省委干部刘志奇来到了烽火。他此行的任务是，总结烽火社在王保京的带领下科学种田创高产的经验。

王保京一直是共青团关注和培养的典型。50 年代初期，一个农村青年踊跃组织合作社，热心农业科学实验，难能可贵。“科学”是个神圣的字眼。青年敢想敢干，与科学有着天然的联系。50 年代共青团工作充满了活力。他们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各种活动，注意发现和培养青年积极分子，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王保京作为觉悟的一代社会主义青年农民的代表。他的一举一动，首先在团省委的

内部刊物和报纸上总结发表，首先得到团组织的支持和肯定。共青团系统的大小活动，大到北京开会，小到西安开会，都少不了王保京。

50年代的陕西团省委书记白纪年80年代曾任省委书记。他告诉我："王保京可以说是团组织培养起来的。"把王保京50年代推举成为陕西省一颗耀眼的新星，团组织功不可没。王保京是共青团的骄傲。1955年秋季，是王保京人生的第一个高潮。他出席了全国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后，他还出席了陕西省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也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与会人员回忆说，王保京坐在主席台上相当显眼，因为他像延安大生产时期的陕北老劳模的样子，头上扎着一个雪白的豹子头羊肚毛巾。

这是一个至今部让礼泉人不解的典故。关中人也扎头巾，但是从前往后扎，在后脑勺挽纂儿。唯有王保京例外。王保京的头巾是从后往前扎，脑门儿挽个豹子头纂儿，完全是陕北人的扎法。头上扎白毛巾，是中国人熟悉的北方劳动模范的标志。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延安式"，如陕北著名劳动模范杨步浩、刘玉厚；一种是"陈永贵式"。50年代，陈永贵还没有兴起，劳动模范的主流形象是"延安式"。对于从延安出发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最熟悉的当然是"延安式"。延河水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养育了红军八路军，养育了共产党人，这是当政者所不能忘记的。当时乃

至更长的一段时期里，陕西主政者是陕北人。

王保京是一个极其机敏并善于追赶潮流的人。他的打扮，改变了关中人的形象，能一步到位地联络当权者的感情。他在接受新闻界的采访拍照片或者其他正式场合，都是这般打扮。他公开发表的标准照，也是这般打扮。一个扎着豹子头白羊肚毛巾的年轻而陌生的面孔在媒体公开露面，给人以中国革命后继有人的感觉。十几年前，扎着这种头巾的人支持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十几年后，扎着这种头巾的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一系列的象征意义。特点鲜明，而且亲切。

“豹子头白毛巾”，无疑是沟通农民与当权者关系的最没有障碍最直截了当的符号。1955 年全国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有一张著名的照片：毛泽东接见与会代表，被一群年轻人围在中间，毛泽东与一个年轻人握手，王保京扎着豹子头白毛巾，欢乐而幸福地望着毛泽东。在毛泽东时代，能与毛泽东一起照相，不仅是王保京的荣耀，也是礼泉县、陕西省乃至中国农民的荣耀。不仅是荣耀，更是身份的确认。《烽火春秋》“正史”记载了王保京的回忆：“我跟大家一块唱着歌，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毛主席。像照完了，我们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涌上去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慈祥地微笑着，伸出他那巨大的手掌。立刻，毛主席手上的温暖传遍了我的全身，觉得心里格外暖烘烘的。这时，我仔细地看着毛主席，他老人家是那样健康，全然不像六十多岁

的老人。这真是全国人民的幸福啊！我握着毛主席的手，忘记了一切，只知道笑，不觉眼里涌出了热泪，早已准备好的一大堆话，不知说啥好，就先说了一声：‘毛主席！你好！我们全体社员问候你。’”

“毛主席微笑着说：‘社员们好！你是哪个社的？’”

“我大声回答：‘陕西省烽火农业社的。’”

“毛主席看了看我头上挽的豹子头羊肚手巾，又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保京。’”

有王保京在场的照片记录在案，王保京与毛泽东握手并与毛泽东对话的情节不可考。一个典型农民装束的青年与伟大领袖握手并交谈的场面，拍下来应该更精彩。但是没有。王保京与毛泽东的对话，应该是个精彩的特写，当时的报道也没有记载。要么有，便是在场的记者失职。要么没有，便是另外一回事了。不管怎样，王保京似乎意识到了“豹子头羊肚毛巾”的“符号”意义。他在之后的省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自己散发了戴着“豹子头巾”的标准照，引起大会不小的轰动。此举，受到团省委书记的严厉批评：“你又不是毛主席，怎么能到处散发你自己的照片？”

王保京有与陈永贵相似的经历，他们都是戴着白头巾走上政坛的。他们也有不同：第一、王保京比陈永贵早出名；第二、陈永贵官儿比王保京大，当到了副总理、政治局委员，

王保京当过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第三、也是最大的不同，陈永贵不管当多大的官儿，不管是正式还是非正式场合，包括接待外宾，从60年代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到80年代下台，都戴着那个让全国人民熟悉的白头巾。起码在形式上保持着农民的本色。而王保京当官后，“豹子头”便永远消失了。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王保京因为玉米亩产创造了1500斤全国最高纪录而参加了全国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之后又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否则，刘志奇不会来烽火蹲点总结经验。

秋天的傍晚把成熟塑造得如此完美。泾河西岸，玉米穗上金色的余晖渐渐褪去，径河东岸的远方，还能看见成片的灿烂。不久，月亮出来了，像是一汪水泼向了大地。刘志奇散步，踱出村来。路两旁都是一人多高的玉米，可以说是玉米的海洋。人是那么的渺小，村庄也被湮没了。炊烟弥漫开，与清香的玉米味儿裹挟在一起，凉凉地贴在脸上。蛐蛐东一声西一声，已经是有气无力。夏天，“丰产试验田”王米苗拔劲往上长的时候，蛐蛐肆虐，大噬嫩苗儿，人与蛐蛐展开了一场大战。六六六粉不行，六六六粉拌玉米皮不行，后来想出了六六六粉拌麦?皮拌香油，才把蛐蛐制伏。王保京为了王米“丰产试验田”，力气出扎了。“要不然，1500斤怎么产得出来呢？”刘志奇不禁赞叹。

刘志奇想大便，钻进了玉米地。他说："我（尸巴）（注：'（尸巴）'，关中方言，用作动词，'解大便' 的意思）哩，蹲下不久，听见外面路上有人走过来。好几个人，一面走，一面"偏闲传哩"，声音压得很低。他不吭声，仔细听着。走近了，方听清楚，说的是王保京的事。"

"丰产田的庄稼好哩。"

"哼，好啥哩！保京干下的瞎事！"

"咋？"

"他把大田的棒子往丰产田里撂哩。丰产田咋不'丰产'？"

"打肿脸充胖子么。"

"小声点！谨防人听见！"

"……"

听这一席话，吓了刘志奇一跳。"原来王保京弄虚作假哩。"刘志奇无意间发现了烽火高产的秘密。据说产量是县长县委书记亲自过秤。过秤不会有假，可是把大田的棒子往丰产田里撂，神鬼之事，谁知道？这偶尔得到的秘密，跟不跟上级汇报呢？礼泉县有个顺口溜："王保京是英雄，掂个（玉米）棒棒上北京。"王保京到北京开大会，到省上开大会，这里介绍经验，那里介绍经验，这个首长接见，那个首长接见，这家报纸介绍，那家电台广播，成了人物。这个秘密讲给别人听，别人会相信吗？王保京是共青团的典型，说

出去，不是给共青团抹黑吗？1957年，刘志奇被打成“右派”，这个秘密便埋没了。七八十年代，右派平反，秘密才慢慢流传开。但已事过境迁，再没人去理会，当作茶余饭后的笑料罢了。知情者，读《烽火春秋》正史，亦不过轻轻一哂。

据考证，《烽火春秋》关于王米亩产1500斤的重要情节有假。这段故事由和王保京一起搞科学种田的王万均口述，三个文人（一个记者，一个团省委干部，一个出版社编辑）整理。请看原文:

真是心没白操，功没枉费，几年来，我们在玉米作务上，还采取了深耕、施足底肥、分期追肥、合理密植、灌足底墒水、提早灌头水等技术，丰产玉米丰收了。

玉米刚从棒棒上剥下，大家都急得等不得干，就吵嚷着要过秤，看个水落石出。

过秤的那大，场上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大家都要亲眼看看这个。“洋种子”到底能打多少。县长和乡党委书记，也从塬上下来，亲自验收，数字出来了，社会计王万杰，把算盘“唰拉”往上一举，跳上桌子，放开嗓子唱道:“丰产玉米平均亩产一千五百斤……零十三两!”

“打得美！打得美!”人们一片欢呼声。

请注意:“玉米刚从棒棒上剥下，大家都急得等不得干，就吵嚷着要过秤，看个水落石出。”说明1500斤“零十三两”是湿玉米，是有水分的玉米；有水分的玉米，怎么能是“亩

产”呢？显然弄虚作假。1962 年和 1954 年，相隔八年，作者心里很清楚，玉米亩产 1500 斤“零十三两”有水分，并进行了追踪，果然。当时的情况下，作者能实事求是地将真相记入历史，已属不易，为我们今天继续追踪和认识王保京和烽火村提供了基础。

一“湿”一“干”，天壤之别。通常情况下，一斤湿玉米能晒半斤到 7 两干玉米，就算没有“并亩”增产，1500 斤玉米折算下来，还有多少？

还有，社会计王万杰算出产量的生动细节不存在。王万杰和王万均是叔伯兄弟，他是互助组会计，在村里的一个破庙里办公，丰产田王米过秤的时候，他不在现场。他 43 年后跟人回忆说：他当时在破庙办公室里，“没说这话（《烽火春秋》记载的话）”。王万均跑来说：“今年玉米打得美，打了 1500 斤！”他说：“刚好 1500 斤。那合适？拿出去笑话，再加上个 13 两么。无零不成账么（意思是，要哄人，要让人睡着么）！”

王万杰说：“我就知道么，玉米是刚剥下来的么。刚剥下来称，也没有 1500 斤！”

关中一带，玉米棒子晾干需要一个多月时间，少量玉米也要稍晾干后，剥下来再晒，晒十几天才能彻底干。

蹊跷的是，《烽火春秋》两次重要的玉米产量故事，都是由王万均讲述，而不是主要的参与者和受益者王保京讲

述，原因何在？是为了增加上米产量的客观性、可靠性？

刘志奇碰巧得到的情况，42 年后，原烽火村党总支副书记王行兴给予了证实。王行兴亲自参加了把大田的玉米往丰产田里撂的描儿腻。其细节，后文还将详述。

1952 年王米亩产 1200，假的！1954 年王米亩产 1500 斤，假的！但是这两项当时的王米亩产“全省纪录”、“全国纪录”已经媒体宣传，名扬四海。1995 年新华社记者写的报道里还确认这个“纪录”。

然而，玉米亩产 1200 斤、1500 斤还是王保京的小儿科目标，到了 1958 年，他的目标才登峰造极。

西安市中级法院。

07

——

法庭质证。

《中国青年报》和作者的律师也向法庭提供相关证据。

1958 年 3 月 22 日《陕西日报》一版，肩标题：“王保京浑身是劲”。主标题：“今年要亩产粮食五千五百斤”。内文说：王保京“他又提出了更雄伟的目标。他说，他们社里的全体社员，决定今年要一亩地打五千多斤粮食。他们的办法是先种大麦，然后套种农林四号红苕和玉米，收了玉米又移苗栽谷子。把过去的一年一熟或二熟改一年四熟。他计算，大麦收一千斤，红苕收一万二千斤（折三千斤粮食），玉米

收一千斤，谷子收五百斤。共五千五百斤。他说，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全体社员排山倒海似的革命干劲，甚么事情都能办到，就看人作不作。”

1958 年 7 月 5 日《陕西日报》一版头条，肩标题：“看烽火村的大火箭。”主标题：“一年四熟亩产三万二”。内文说：“醴（礼）泉县烽火社主任王保京和他领导的社员，经过学习总路线，最近又在湖北、河南等地小麦高产奇迹的鼓舞下，干劲越来越大，决心力争上游，采取套种办法，试验一年四熟，亩产三万多斤粮食。”“四料套种的办法是：玉米采取方块密植，每隔四尺一方块，方块内种五行玉米（两边四行，行、株距均为七寸，中间一行，行、株距为一尺），共留苗五千四百株，将来每株结二斤，可产一万零八百斤王米。玉米中间留的那四尺宽地，现在种绿肥，将来压青后种小麦，计划亩产三千斤。到明年 2 月间，在收获后的王米地上套种马铃薯（采取育苗移栽），计划栽五千窝，每窝产三斤，可产一万五千斤；4 月间马铃薯收后，再栽红苕三千窝，每窝产二十斤，可产六万斤。这两料薯类共可产七万五千斤，按每四斤析一斤粮食计算，共折合一万八千七百多斤，再加上玉米、小麦的产量这一亩地一年共可收获三万二千五百多斤粮食。”为了实现计划，“他们就采取紧急行动，不分昼夜地给这一亩地送了六万斤土肥，还有二百斤油渣和二百斤化肥作为基肥，并计划沤腐熟的两条狗作追肥。”“社主任王保

京满怀信心他说：‘有总路线的照耀，有湖北先锋社青年创造的亩产四千多斤作样子，我们再继续苦干一年，实现亩产三万二千斤是完全有把握的。’”

1958 年 10 月 3 日《陕西日报》二版，肩标题：“烽火社万能试验田预测”。主标题：“玉米亩产万斤”。

更精彩的是，1958 年 9 月 7 日《陕西日报》一版登载的“醴（礼）泉县烽火人民公社社长、青年农民科学家王保京”的署名文章：《有高度密植，才有高额丰产》。这篇署名文章有六幅密植播种示意图，分列如右：波浪式播种图，空中播种图，坡形播种图，凸形播种图，麦棉间作图，区田播种图。多有奇思怪想，其中“空中播种图”最具发明创造。这些奇思怪想发明创造构成了王保京的“田间设计学”。

1958 年 9 月 29 日，《陕西日报》三版登载消息，肩标题：“突破专家包办圈子，工农大胆著书立说”。主标题：“王保京正在创立田间设计学”。一个庄稼汉，用语都是“科学”，颇具魅力，颇具想像力。其思想是：“使种植庄稼像建立厂房一样进行各方面的综合设计。”王保京在署名文章中说：“像我们烽火公社今年计划培植的一块亩产十五万斤的小麦卫星田，按计算每亩要下籽一千五百斤，平均每公方分范围内有三粒籽每亩约两千万株，如果不从耕作制度上进行根本改革，将来作物的生长、作务等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为了使种籽播种的均匀，我们还计划把麦粒按照预定的密度粘

在纸上，然后铺到地里，上边再盖以肥土，即可整齐出苗。同时还要用微量元素、生长刺激素、狗血、猪血、赛力散等拌种促进籽粒发言。”“假若试验成功，每料收成以亩产十万斤计算，每年收三料，每料设楼种八层，每亩地每年即可收粮二百四十万斤。”

240 万斤!

王保京的律师辩护说：“请法庭注意，王保京说的是计划，是可能，恰恰说明王保京实事求是，而不是浮夸!”好一个“实事求是”！好一个“不是浮夸”!

被告代理人发言：亩产 240 万斤是什么概念？我们粗略地算了一下，用 200 斤的麻袋装小麦，一亩地，能摞一两层楼高。我们现在推开窗子走到大街上去，放心，绝对不会摔得头破血流!

这笔账，50 年代、60 年代、70 年代、80 年代、90 年代都被陕西人当笑话算过。不过算的是 1958 年王保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亩产 15 万斤的标准。关中的麻袋，一麻袋装 180 斤小麦，15 万斤小麦，刚好能一个挨一个睡满一亩地!

一二

赵启文老人正坐在你的面前。他戴着一顶蓝呢帽，套着一件蓝呢而皮袄，穿着一双蓝呢面棉鞋，从上到下，一身笨重的蓝色调。他烟瘾很大，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着，食指和中指已是焦黄。烟雾顺着脸爬上去，鼻子，眼睛，额头，被帽

檐阻遏，在斑白的发际间索绕。烟雾笼罩着老人。他的面目，时而清晰，时而朦胧。他的声音绕过蒸腾的雾燔，传递给对方。

“您还记得起原来的事儿吗？”我问。

地点点头。他的眼睛有些混浊、充血，一望便知是长年农村生活，烟熏火燎的结果。他打扮得像农民，但他不是农民。他曾经是礼泉县最有文化的人之一。他当了近三十年的县农科站站长，1983 年退休。毕生致力于基层农业技术的推广。他是礼泉乡下人，1950 年便在县政府工作。50 年代初，他被选派到西北农业大学深造，是礼泉县第一批接受农业科学系统教育的基层干部，也是礼泉县第一个获得“农艺师”职称的人。他的农民、基层干部、知识分子的三重身份，使他在观察礼泉这块土地时，具有了三重眼光：三个不同的角度，三个不同的立场，三个不同的心态——农民与生俱来的“相信眼睛，不相信耳朵”的执拗，基层干部血脉相连的感同身受，知识分子的科学理性和良知：以及互相之间的交错和转换。但是，你能观察到，这三重眼光中，似乎有一种恒定的东西，一种不太容易改变的基调，如同他身上穿了几十年的深蓝色。他是烽火村历史的构造者和见证人。他像几乎所有的礼泉人那样，在 50 年代、60 年代、70 年代，积极参与了烽火村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并把烽火村视为“革命的圣地”和科学技术的摇篮。

烽火村崛起于50年代合作化时期。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发表了著名的按语《鸡毛也能飞上天》。这篇按语给予坚持走合作化道路的农民以极大的赞美，并预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高潮即将到来。

烽火村在汪洋大海般的农村中，无疑也是一根鸡毛，无疑也能飞上天。青年王保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天不怕，地不怕，有一股子敢想敢说敢干勇往直前的闯劲儿。他醉心于科学实验，在烽火村折腾起了一个眼花镣乱的世界——建起了农业科研小组，农业技术学校，卫星农业大学，等等。

在科学的名义下，几十年里，烽火村像变魔术一般地向外界公布着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纪录:

玉米亩产，1200斤，1270斤，1500斤，1600斤，2000斤，2400斤，10000斤；棉花亩产，90斤，100斤，125斤，150斤，160斤，200斤，270斤，300斤；小麦亩产，5500斤，32000斤，10万斤，15万斤，30万斤，240万斤。

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惊诧地注视着烽火村。烽火村的业绩，是农民祖祖辈辈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岂止是业绩？明明是摆在你面前的不由得不信的奇迹！陌生的制度和陌生的方法下产生的陌生的奇迹。陌生的奇迹又营造了陌生的气氛和陌生的环境，如同一群“浪里白条”被扔进了浆糊里——江河湖海都变成了浆糊。水有水的习性，浆糊有浆糊的习性，在浆糊里游泳，在浆糊里打鱼捞虾，“浪

里白条”们也施展不得。这一奇迹斩断人们的经验，斩断了知识的传递路线——白纸黑字地写着，不仅超出了正常人的理性，甚至超出了正常人的想像力。王保京不仅说到了，而且声称做到了，而且得到了党报的确认，而且得到了各级领导各级组织的鼓励、支持和赞赏。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离礼泉只有几十公里远近的武功县曾经诞生过周的祖先后稷。后稷名“弃”。传说，弃母姜原踏巨人足迹而怀弃，生弃后，“以为不祥”，弃置“隘巷”、“山林”和“渠中冰上”，却得到马牛、飞鸟的庇护。“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史记》载：“弃为几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寂，麻、寂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干部，号日后稷，别姓姬氏。”后稷因善稼穑，相传为小米和麦子最早的种植者，被民间尊为农业之神。武功县有后稷庙祭祀之。80年代，陕西人在武功县杨陵镇的农业科技城竖后稷像，红砂岩质地，左手揽抱小麦，右手垂执镰刀，高约两丈，形象伟岸，继续得到人们的尊奉。

后稷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象征，想必也为他的同乡取得天文数字般辉煌的成就而感到骄傲。他毕竟不懂得“科学”。他不过是尧舜时期的一个农官，顶多不过是一个胸怀“巨人之志”，善于耕作和管理的农夫罢了，而王保京则是正儿八

经的“农民科学家”。1958年，王保京因坚持大搞科学实验，一直保持粮食高产纪录，并要创造粮食生产的“卫星”纪录，被陕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堪称八百里秦川新时代的“农业之神”，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受到人们的尊奉。

几千年前的“神”和几千年后的“神”比较，后稷是传说，是石头和泥上雕琢的神像，王保京则是活生生摆在你面前的人，所有事迹记录在案，可圈可点，可模可仿。后稷是仆人（给尧舜打工），王保京是主人（工农当家做主）。不敢胡说，有书为证。《人民日报》1958年5月刊登长篇通讯《新农民的新风格——记农民科学家王保京》，并且加了热情洋溢的“编者按。”不敢稍有剪裁，把“编者按”全文引述如下：“历史告诉我们，劳动人民是科学的主人。在毛泽东的时代里，广大的劳动人民，已经在科学技术事业创造了极为伟大的奇迹；也涌现了许许多多具有新风格的新人物。目前，科学技术革命的高潮，正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一日等于二十年地飞跃前进着，这些新的人物，他们将更好的为党的科学事业提供新的贡献。但是，尽管如此，还有一些人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右倾保守思想。他们因循守旧，只知教条地玩弄老经验，不敢大胆地去设想新问题。他们认为科学是神秘奥妙高不可攀的东西，农民搞科学是‘癞蛤膜想吃天鹅肉，根本办不到’。他们没有认识到劳动人民就是科学的主

人，科学的历史就是劳动人民创造科学、发展科学的历史。为了调动广大劳动人民广泛而深入地开展科学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我们选用了这篇文章。文章里所提到的仅仅是王保京同志许许多多事情里的一点一滴，意思是大家向他学习。不难设想，在党的总路线和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一个新旧思想之间的革命，将取得更大的胜利，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科学风格，将在广大的劳动人民中普遍的扎实的建立起来。”

历史，主人，科学，革命，运动，奇迹，创造，右倾，保守，总路线，大跃进，毛泽东时代，共产主义……都是些陌生而时尚的词汇，神圣，庄严，斩钉截铁，一言九鼎，分量要说多重就有多重，涵盖的而积要说多宽就有多宽，生吞活剥发散性地一股脑地倾泻过来。容不得你揣度思量，上百只耗子在你的脑子里上窜下跳，左奔右突，逮得着这只，逮不着那只，直搅得脑花儿闪烁颤栗。王保京从省城开会回来了，英雄般地坐在主席台上。台下，全县农口的干部，如痴如醉地聆听着。谁也不敢小觑台上这位扎着白羊肚豹子头毛巾的农民。台下有多少人进过省城进过北京城？别说坐过北京城和省城的主席台了。光荣啊！台上坐着的是代表——礼泉县农民的代表，陕西省农民的代表，甚或是几亿农民的代表。对于偏于一隅的礼泉人来讲，台上所讲的毋宁是省委的精神党中央的精神。“我等他们先报产量计划，五千，一万，

两万，三万，五万，七万，八万，十万，十二万，报完了，我最后报：亩产十五万！把他们都压住了！”王保京眉飞色舞地说。

“哗——”台下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杨眉吐气啊！为陕西人争光啊！曾几何时，陕西被河南、湖北压得喘不过气来。《人民日报》的消息说，1958 年 6 月以来，粮食亩产纪录频频被河南湖北打破，然后其他省又追上来，2150 斤，2394 斤，2664 斤，4412 斤，4689 斤，5103 斤，15000 斤，43075 斤。毛泽东视察过的河北徐水县，一亩小麦打了 12 万斤！徐水震惊天下。1958 年 3 月到 10 月 30 日，到徐水参观的外宾有四十多个国家的九百三十多人，既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也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人，赫鲁晓夫还专门让塔斯社记者到徐水采访。半年多的时间，全国各省市区和中央机关共有三千多个单位、32 万人到徐水参观。人群中，有干部、工人、农民、学生、教授、记者、艺术家、工程师、民主人士、科学工作者、归国华侨，还有大批中央领导人，如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刘澜涛、胡乔木、杨尚昆、李先念、薄一波、邓子恢、胡耀邦等等。

徐水产量还不是最高的。1958 年 9 月 18 日，《人民日报》说，四川陴县水稻亩产 82.4325 万斤！湖北远点儿，压力还小点儿。河南，邻省，正北面，像一顶沉重无比的大帽子，压在陕西人的头上。1958 年，河南人出尽了风头：可不到两

年的功夫，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上百万人非自然死亡。饿殍遍野，易子而食。这都是后话了。

本来烽火村跑得够快了，烽火村跑得快，就是陕西省跑得快，烽火村喊不出高指标，陕西省怎么大跃进？陕西跟不上趟了，落下个“保守”的名声。如今王保京登高一呼，长了陕西人的志气，与党的要求拉近了距离，何不欢欣鼓舞乎？王保京不仅会上用亩产小麦 15 万斤的高指标，技压群雄，而且还在《陕西日报》发表他的署名文章，说是如果试验成功，烽火村每亩能打粮食 240 万斤！四川郫县也不在话下。（四川人也为浮夸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大跃进时代，人们对数字已经麻木了。高指标，党不怀疑，毛主席不怀疑，不仅不怀疑，而且还鼓励，谁还敢怀疑？

1958 年 6 月 16 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的文章，题为《粮食亩产会有多少？》。文章说：“六月十二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两千一百零五斤以后，又有二亩九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小麦。”“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碰顶了吗？”“科学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年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

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丑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

如果利用好自然潜能，亩产两千多斤算什么？亩产能达到四五万斤!

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召见其秘书李锐。李锐问道：你怎么会相信那些“高产卫星”？毛泽东说：我是看了钱学森的文章后才相信的。

政治权威加“科学”论证，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亩产15万斤小麦，要下多少斤种呢？”王保京这么一问，台下哑了。

“比如说下150斤种。怎么下呢？”王保京又问。

150斤种？台下的赵启文嘀咕开了。你烽火是有礼泉县最好的自流灌溉水浇地，平均亩产小麦也就是二三百斤，撑死了三四百斤，150斤种，咋下哩？看你咋说哩。

王保京从容不迫：“把麦颗颗粘在纸上，然后往地里摆。”

会后，赵启文指着王保京说：“京娃，你胡谝哩!”

“京娃”，是王保京的小名。赵启文比王保京年龄大，打小就这么叫，一直不改口。

不过，说人家“胡谝”，也没有依据，自己也没有试验

过。凭经验？大跃进早把经验扔到九霄云外去了！自己又不得不在私下讪讪地承认：“这冲还有些怪点子哩。”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高指标是“科学”的产物，王保京基本没念过书，初小文化程度，对“科学”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科学经验要示范，典型人物要推广，否则就没有意义了。于是，陕西农业教学和科研单位的大科学家小科学家云集烽火，为烽火村的科学革命添砖加瓦，著书立说，寻找依据。赵启文作为礼泉县最权威的科学官——县科技站站长紧跟其后。烽火村的科学热情空前高涨，可以说到了“惊大地，泣鬼神”的地步。烽火村的农民祖祖辈辈没有看见过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那么多的大干部小干部、专家学者，睡在烽火村的炕上，钻在烽人村的地里，昼夜观察，献计献策，大搞农业科学实验。人们渴望着烽火村能结出一个大大的科学硕果。

烽火人民公社 1958 年 9 月 1 日正式成立，王保京任社长。不久，公社农业技术学校（又名“卫星农业大学”）办在了烽火村，公社党委书记任学校党支部书记，王保京任校长。学校设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管理财务、伙食和文书；教学，设科学技术教研室、政治文化教研室；试验，设农作物试验组、气象试验组、畜牧试验组、蔬菜试验组；还没有分析室、种子室、展览馆。管理方面，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设一个中队四个小队，两个学习辅导员，

九个学习小组长。教研室和试验组的领导，由帮助试验的“技术干部”和“学生”共同担任。学校没有专职干部，说是“农民办学也就是学生办学”，学生自己教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学习内容：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三结合”。教员来自四个方面：一、来烽火蹲点的专家学者、技术干部；二、来宾；三、老农；四、“留校”学生。教学方针：所有的教学、科研、试验紧紧“围绕农业增产‘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教学目标一：“大放‘卫星’”；教学目标二：“依靠党的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烽火“真正成了一个……正规化试验农场”，岂止是试验农场，更像是试验战场。他们号称拿出了 148 亩 1 分 7 厘的土地做试验田，占全村土地面积约百分之十。其中最热闹的，当属“敢想田”和小麦“卫星田”。“卫星田”的负责人是王保京。烽火至今流传着“108 将大战卫星田”的故事，这里暂时按下不表。

先说“敢想田”。“敢想田”分成两块，不到一亩地，农业技术学校（即卫星农业大学）的年轻人，谁都可以在里面亮招。试验内容，主要是培育农作物优良品种。设想和试验相当大胆，并记录在案。

棉花方面：计有八尺高的海岛棉和泾斯棉有性杂交试验，棉花和蔓陀萝、甘薯、薯葵、马铃薯、洋生姜、凤仙花（鸡冠花）、向日葵、红葡萄、蓖麻、构杞草、菊花、南瓜、笋瓜、茄子等野生杂草和蔬菜瓜果进行嫁接、杂交试验，和

椿树、榆树、构树、苦楝树、柿子树、桃子树等树木进行嫁接试验。小麦方面：有不同小麦品种间的有性和无性杂交试验，小麦和燕麦、大麦的杂交试验，和高粱、豌豆、玉米、芝麻、芦苇、鹅冠草等农作物和野生植物的嫁接和有性、无性杂交试验。

玉米方面：有各种玉米品种间有性和无性杂交试验，玉米、甘蔗、谷子、南瓜的嫁接和有性杂交试验，三十多种玉米品种的引种、选种试验。

还有各种果树互相嫁接，果树蔬菜互相嫁接，甘薯和西红柿、南瓜和笋瓜、西红柿和洋生姜、西红柿和茄子蔬菜间的有性和无性杂交、反交、嫁接试验，还有各种作物和蔬菜的单株卫星试验，各种作物的一年两熟试验。“不到两个月，光技术学校的学员们，就搞了一千一百多种试验。”

他们期盼着：“要棉花长的像树一样大”。“棉桃结的和仙桃一样多一样大”。“棉花和薯类嫁接，要它上面拾棉花，下边吃甘薯和马铃薯”

“棉花和花草嫁接，要它成为各种有色棉”。

“小麦和芦苇嫁接，小麦和芝麻杂交，要小麦变成一个秆儿粗的、多年生的、周身都是麦穗的小麦”。

“玉米和甘蔗嫁接、杂交，要它身上结棒子，头上长种子，秆秆像甘蔗”。

“南瓜和甘薯嫁接，要它根生甘薯蔓结瓜”。

“番茄（西红柿）和茄子嫁接，要番茄长的像茄子一样大”。

“番茄和辣子嫁接，要辣子长的和番茄一样大”。

“放单株卫星，要一株棉花拾二十斤籽棉，甘薯一株产五百斤，大蒜长的像碗一样大，一根葱三尺长……。”他们的说法是：“要想富，地里开个杂货铺。”

他们相信：“众人是圣人。”圣人，自然有圣人的思想，圣人的事业。“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科学家”王保京大会小会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思想空前解放，空气格外清新。你们驰骋想象吧！你们膨胀想象吧！有人说，想象是一只自由自在飞翔的小鸟。在烽火，把想象形容成小鸟，算是保守，算是小资产阶级，不够大跃进，该吃板子。小鸟，分量不够，力度不够。在烽火，想象是一只搏击长空的老鹰!——暴风骤雨挡不住，压不垮。

多么美丽而壮观的景象啊！田地里五颜六色五花八门，有花有草，有果有木，小麦，玉米，棉花，高粱，谷子，蔬菜……分不清你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取所需，各取所长，优势互补。一片片棉花林将呈现在你们面前：粗壮高大的树干，仙桃一样繁密的棉花，树根还结满了甘薯或马铃薯。再看看吧：果树上，既结果，又结瓜，又长蔬菜。再看看吧：甘蔗上长着玉米，麦秆上下一个挨一个像芝麻一样挤

满了麦穗。你采摘完满地跑的南瓜或满枝的西红柿后，别忘了把根拔出来，地下还埋着大窝大窝的甘薯哩！你不信？有照片为证。一群激动万分的青年男女就从西红柿秧下拔出了甘薯。一称，四斤重哩（经当事人确认，西红柿和甘薯的嫁接试验没有成功。图片是假的）！收获怎样？当然是“可喜的收获”；“海每岛棉和泾斯棉、单片花和岱字十五号、蔓陀萝和棉花等几个有性杂交试验，初步得出了新的杂交后代。甘薯和番茄无性嫁接成功，上部结了番茄，下部还结了四斤甘薯。黄瓜和笋瓜靠接，结果，结了一个七斤多重的瓜，样子像笋瓜，味道像黄瓜。甘薯蔓上嫁结南瓜，结果结了两个大南瓜。萝卜插孔种白菜，结果，白菜长的很大。洋生姜和番茄嫁接，结果，下边结了洋生姜，上边又结了很多番茄，马铃薯和番茄嫁接，结果，结了四个番茄。南瓜和番茄嫁接，结果，又结番茄，又结南瓜。南瓜、苹果果实嫁接，结果，成活了十多个。苹果插条育苗，结果，成活了一百多天。南瓜和紫茄子有性杂交，结果，成活了六十多大。芦苇上嫁接的小麦，一直活了下去。向日葵的一年两种两收试验，结果成功，收了两料。高梁一年一种两收试验，结果成功，收了两料。玉米红棒子试种试验，结果，百分之八十仍然保持原色。在单株试验方面：一株玉米长了七个棒子，可产三斤玉米。一株棉花结了一百四十个桃。一株小麦分厂七十六个蘖。一窝甘薯产了十八斤。一窝南瓜结了十五个瓜，每个十斤左

右。一窝笋瓜结了丑个瓜，每个重二十斤左右。一个番茄重二斤六两。一个六尺长十二斤重的大丝瓜……等等。”奇哉!伟哉！真乃20世纪农业科学技术最伟大的试验，最伟大的发现，最伟大的进步！烽火人也承认，许多试验失败了。但是，上述成功的试验，拎出任何一个来，不断试验，深入试验，都可能带来农业革命性的后果，都可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比如，玉米每株都长7个棒子（而不是一般只长1到2个棒子），每株小麦分65个蘖（如果都是有效分蘖，而不是如农谚云“一麦破九头”，一般一株只有9个分蘖），每株棉花结了140个棉桃（而不是一般一株结25个棉桃），其中任何一个结果，都不得了啊!

“丰衣足食”，怎么是期待和梦想呢？简直就是唾手可得的现实！而且，精神的收获，更是无法度量。

难怪毛泽东听到各地的喜讯后担忧：“粮食多了怎么办？”难怪共产主义离大家不远了。大家写文章，赵启文也写文章。他写了《“敢想田”里百花齐放》。一写不得了，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哄动一时。文章加了“编者按”。“编者按”既兴奋，又理智，说：“广大的劳苦人民，用他们的双手，创造了世界，创造和发展了科学。但，几千年来，谁也不会支持他们去搞科学。解放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一贯被人认为神秘、奥秘、高不可攀的科学禁门，已经被共产党时代的劳苦农民打开了。这篇烽火人民公社农业技

术学校的《‘敢想田’ 里百花齐放》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标志着广大劳苦农民已经踏上了新的科学里程；新的科学事业将在他们的伟大劳动中飞速发展。

“但是，当劳动人民已经能够掌握科学的时候，一些人仍然戴着老光镜看问题。他们说什么‘农民不能搞科学’，‘出了科学的框框’。又说什么‘农民这些不是方向’。还说什么，‘农民搞简单的可以，搞复杂的就不行了’。

“我们的看法不同。农民不能搞科学？这问题，农民已经用他们的事实作了很完满的答复。他们在敢想试验中，不是很多都已经成功了吗？是不是出了科学的‘框框’？这问题，农民也说得很对：‘后人胜过先人，自然会超过先人的框框。’哪怕有些试验，超出了所谓‘科学原理’，但是，几千年来想也不敢想的农民，今天敢想敢作了。单就这一风格来说，已经是很宝贵的，是值得我们庆幸的了。农民搞这些是不是方向呢？不错，农民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大搞丰产运动，不能摆脱大田生产专作这些试验，况且烽火大队的社员和技术学校的学生，他们从来也没有这样作。但是，我们认为，他们用一点点土地，利用生产空隙去搞这些试验又何尝不可呢？如果说全公社、全县以至全国的农村都能够像这样拨出一席之地，组织农民，鼓舞农民，发挥农民的智慧，让他们利用生产间隙时间，搞一项、几项敢想试验，谁能预料到这块土地上将会培养出多少英雄豪杰呢？谁能预料到将

会创造出多少新的品种，新的耕作制和新的科学理论呢？一些人说‘农民只能搞简单的，不能搞复杂的’，意思是：农民的知识条件不够。固然不错，一些比较复杂的试验，搞起来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困难不等于不能作，况且好多复杂的试验，农民都已经搞成功了；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个优越的政治条件。“当然，其他地方要仿行烽火这种设立敢想田的办法，在仿行过程中，希望能够引导农民首先从解决农业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入手，比如：引种、育种、深翻、肥料、种子低温驯化等等，继之而进行其他嫁接试验。这样作有利于大田生产。”

从专业的角度看，这篇“编者按”写得相当有水平。保护农民敢想敢于大跃进的积极性，批评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新事物，强调共产党领导这一优越的“政治条件”，其中不乏浪漫激情，不乏强词夺理，不乏荒谬逻辑，同时强调了要“有利于大田生产。”农业科学实验要着眼于“有利于大田生产”，是“编者按”的核心，是编者的一番良苦用心。形势要跟，大话要说，干劲要鼓，问题也要委婉地点出来，以期记录在案。这是中国新闻王作者受到意识形态禁锢的困境所在，智慧所在。

文章发表于 1959 年 12 月，此时，“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已经充分显现。一年下来，高指标没有实现，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卫星田”、“敢想田”开小灶，粮食浪费严重，

大田无人管理，许多地方民不聊生，全国已经出现了饥馑的前兆。“庐山会议”本想解决大跃进的问题，由于政治原因，风头逆转，把反“左”的会议，开成了反右的会议，揪出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继续“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左”的思潮，继续说谎话，终于酿成“谎祸”——60年代初期全国人民浮肿、数千万人非自然死亡的悲剧。人类历史，“谎祸”之大，概莫如斯！

08

一三

西安中级法院。

法庭质证。

王保京的律师出示原礼泉县委副书记孙明才的证词。证词大意：王保京是全国劳模。1958年大跃进，毛主席提出超英赶美。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1958年郑州会议上提出了大干生产，放开肚子吃饭。从那时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泛滥成灾。这些已是历史了，没有必要翻腾了。

证词想说明的是，在错误的历史潮流下，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毛泽东、谭震林这样的大人物都犯错误，别说王保京这样的小人物了。在时代大背景下，迫于压力顺应时尚，说假话，搞浮夸，是可以理解的。问题不在于理解不理解，而在于你是否说了假话，是否搞过浮夸，是否撒过弥天大谎

并带来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而在于你从未接受历史教训，杜绝虚妄浮夸之风，反而挟带特定历史条件下骗取的政治余威，继续钻营，横行乡里。

如是，就必须接受历史的审判。

一四

1958 年所有浮夸者的手里都拿着“科学”这张王牌，加上形势需要、政治保护，加上一些“科学家”的保驾护航，谁也不敢公开怀疑。

农民怀疑，说你“保守”；干部怀疑，说你“右倾”，说你“观潮派”；科学家怀疑，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些说法一直延续到 70 年代。

《人民日报》1976 年 3 月 19 日发表了王保京的署名文章:《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批判攻击开门办科研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奇谈怪论》。文章说:“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散布了许多奇谈怪论，他们攻击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工农兵占领科研阵地，专业科技人员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他们看来，群众办科研、开门办科研等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是好得很，而是‘问题很大’。我们广大工农群众一定要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彻底革命精神，给右倾翻案风以猛烈回击。”“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硬要用，‘文化水平太低’的借口，阻挡工农兵占领科研阵地，妄图把工农兵撵下科学研究

的舞台，把科技战线重新变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变为党内不肯悔改的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我们坚决不答应!”“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指当时主持中国科学院“汇报提纲”的胡耀邦。“党内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指被第三次打倒的邓小平。杀气腾腾，不一而足。这篇批判文章的论据，就是50年代以来王保京和烽火村科学试验、丰产高产的浮夸成果。

让我们再回到1958年。

1958年，《陕西日报》报道说，“农民科学家”王保京发明了“田间设计学”，并刊登了王保京发明的五种小麦种植方法。依次是：麦行做成波浪状的“波浪种植”，麦行做成“凸”字状的“凸垅种植”，麦行做成梯形的“梯形种植”，地面不做成凸状的“平垅种植”，用竹筐装上土播种或栽麦的“空中种植”。其中最妙的、给礼泉人印象最深的是“小麦空中种植”。王保京在报纸上夸下海口，说小麦亩产可达240万斤，就依据的是这种种植方法，叫做“小麦上楼”，叫做“工厂化”搞农业。这种方法，80年代初还受到《人民日报》的充分肯定。

“小麦上楼”，蔚为壮观，烽火村一时热闹非凡。全省各地纷纷前来参观，取经，效法。

已经70岁高龄的梁治英，退休前是礼泉县教育局局长。1958年，他任西张堡乡的副书记。县里在烽火召开有各乡镇

长书记和部分农业社参加的小麦种植现场会，会场在村西北角。

谁见过这阵势？一亩麦地里搭木架，3层高，每层高约1.5米，一水儿6米长、土碗口粗的浸满沥青的电线杆，立柱和横杆纵横交错，都是不到2尺的间距，估算一下，大约有3000根电线杆！

好气派！好宏伟！一个高5米余、长宽60平方丈的黑色方阵！如小麦之“阿房宫”！第一层上面摆着竹筐。竹筐高2.5尺，直径2尺，里面盛土种麦子。麦苗墨绿色，密密麻麻透不过气，地毯一样厚实，像是专门种植的草坪。黝黑间以墨绿，活脱脱一尊现代派雕塑！其阵势不亚于15年后发现的世界第八奇迹——兵马俑。参观者无不张口结舌。

报纸登，电台播，全省都来参观。正应了叫化子王志清起名“烽火”的原意：“烽火一举，万里为畴!”

为了迎接各地蜂拥而至的参观者，烽火人在小麦楼架四周用篾席搭了四个厕所，供大小便。烽火人中有说怪话者言:“他（王保京）图参观哩，咱图攒肥哩。”

麦架周围的地都溜光踩实，像打麦场一样。

眼下，礼泉县乡村三级干部也像麦苗一样密密麻麻，伸长了脖子听王保京讲话。只见王保京头上扎着豹子头白羊肚毛巾，穿着黑粗布对襟衣服，挽着裤腿，站在小麦楼架前。王保京声音洪亮，神采飞扬，说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

产。人听毛主席的话，地听人的话，产量听人的话。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河南一亩地产 10 万斤粮食，我们要亩产粮食 15 万斤!

梁治英跟在场大多数县乡村干部一样，都是农村人，都是在庄稼地里摸爬滚打长大的，种庄稼大概有个谱，虽然鼓掌欢呼，肚子里却在嘀咕:

我的爷！搭那么高的架子，水咋上么?

我的爷！15 万斤小麦，要下多少斤种么？种那么密，分蘖咋办么？通风透光咋办么？肥料咋办么?

我的爷！3000 根电线杆，哪里去寻么？人家有电力局、邮电局、物资局支持。我们哪会有这待遇!

我的爷！编种麦的竹筐，烽火集中了全乡的篾匠，二三十人，编了一个月。谁能行?

我的爷！再说肥料，一个乡的草木灰，大车小车往烽火送。谁给我们送?

找到这本 1958 年 11 月印刷的小册子，真是一个奇迹。太珍贵了！这本和我同龄的小册子，历经 38 年，居然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陕西醴（礼）泉烽火人民公社卫星农业大学农业科学研究室（1958 年下半年度）试验研究简介》。44 项试验方案，田间设计，小麦丰产，小麦密植，小麦两熟，小麦杂交，小麦短光照，小麦移栽，小麦锈病预防，小麦根外追肥，小麦壮苗，小麦种子处理，小麦播种方法，小麦品

种观察对比，麦棉套种，预防小麦倒伏，麦地深翻，灌溉制度，万能套作，卫星套作，生猪丰产，动物肥料，微量元素肥料，细菌肥料，农具改革，野生植物调查利用，防治病虫害，白菜萝卜丰产……应有尽有。试验范围之广，种类之丰富，用语之专业，设想之大胆，目标之宏伟，堪称“经典”。

珍闻奇葩，不敢独享，谨示于大庭广众。

前言：“醴（礼）泉县烽火人民公社在原烽火农业社农业科学研究室和万斤大学的基础上成立了卫星团、万斤农业大学和农业科学研究室，公社的成立打开了小村小社难办事的局面，现在卫星团和万斤农业大学拥有近150名由各大队选出来的青壮学员（战斗员），4个政委和4个团长，近20名各级指挥员。战斗的队伍形成了，在党和上级研究机关的领导协助下，更具体制订了1958年下半年度到1959年度的丰产计划和研究题目计划。我们的雄心是在1959年不但要获得足以指导生产的研究成果，还要放出5颗小麦卫星，其中最高的要达到亩产15万斤和30万斤，培养出100名以上的农业技术人员，我们要用事实来证明党的工农知识化指示的英明正确，农民的智慧和土地的潜力一样，巨大无穷。”

小麦卫星田1959年要放出亩产15万斤的小麦卫星，计有11项技术措施：

一、改变耕作制度和种植方法，以适应“高度密植”，即所谓的“田间设计学”。

二、合理密植。“在确定密植的播种量之前，我们先根据产量指标预算了每亩穗数，曾经提出每亩下种量1300斤，但与此同时，就布置了播种量试验，试验播种量从每亩50斤到3000斤。根据试验结果，我们决定（每亩）播种200斤……”

三、狠抓深翻地，大量使用基肥改良土壤。“具体计划是：把第一、二、三尺的土层翻开在第四尺的上层上施肥，然后用锨或深翻犁混合土壤和肥料，然后盖上原来的表士，再施肥并混合，这三次肥料的总数是：每亩地厩肥200大车，以上堆肥50000斤，人粪尿200担，油渣5000斤，废棉仁2000斤，麸子1000斤，草木灰20000斤，病牛一头，狗若干条，硫酸铵1000斤，硝酸镀钙1000斤，过磷酸钙1000斤，硫酸钾500斤，碳酸氢按200斤，食盐20斤，土化肥10000斤，和岩面上刮下来的肥土200大车。”

四、土壤局部灭菌和预防地下害虫。计划用六六六粉杀地下害虫，学习苏联经验，用漂白粉歼灭土壤有害细菌。

五、粒选种子和种子处理。“我们决心要用手一颗颗地选出最肥大的种子，这些种子还要经过26%的硫酸铵水选，务必使它们粒拉饱满，颗颗发芽。我们也要像一些洋专家一样，结合温汤浸种和药剂拌种，用奈乙酸、微量元素（五种正在试验）、腐植质来处理种子。所有这些洋办法，洋专家能作，我们为什么不能作？我们不但要学会作，而且要作得

更好。”

六、合理施肥和二氧化碳施肥（注：方法是，把二氧化碳放入小麦行内。二氧化碳是气体。怎样施行？不解）。“有人要说，你们把洋办法部用上了。我们说，是的，全用上了。不单这些，还有人工降雨，地下灌溉，缩短光照，等等要应用，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现在能想到就要做到，能学会的就要学好，而且相信没有学不会的东西。我们大力向科学文化进军，洋办法在我们掌握之后就是土办法，例如用洒壶作人工降雨，用竹管作地下灌溉，我们不但能作好，而且是不要高价的机器材料。我们管这叫‘化洋为土’。”

七、人工降雨和地下灌溉。“我们不但要叫麦子吃得饱，而且要叫它喝得美，除了在冬春二次灌溉使麦地底墒饱满外，还抱定人定胜大的决心，用土洋办法实行人工降雨，土办法是用洒壶，洋办法是弄一部小抽水机。”“在整个生长期内，尤其是从拔节到乳熟，我们完全用人工方法和巨大决心，控制土壤含水量，要雨时人给下，不要雨但天要下，就给挡出去，必要时我们要搭架扯蓬，给小麦撑伞。”

八、人工通风和人工光照。“计划采用的办法有：1、用喷粉器向麦行内煽风；2、用竹竿划开麦行，轮流划开晒太阳；3、用芦席装在地头，拉绳煽风；4、用鼓风机向麦行内煽风；5、用人力、畜力或电动鼓风机鼓风；6、通入二氧化碳，帮助呼吸。”“为了十五万斤，哪怕我们成天用口吹气，

我们也干。”人工光照方面，计划：1、小麦分蘖后期用席子挡太阳，人工造成短目照；2、小麦行内需要辅助光照的时候，给它安电灯。

九、防止倒伏。“风雨吹打和小麦因穗子重秆子长等原因造成倒伏，就更好解决：在周围搭架拉绳就可以防止，可以设想，在株株紧靠的麦丛周围再加绳架支撑，就是推也推不倒的，今年小麦水稻卫星的穗子上可以站人，这就是很好的证明。观潮派的希望一定是失败，”

十、防止冬旺。

十一、“为了进一步保证我们的丰产计划和我们的卫星更高更大，更进一步证明土地生产潜力无穷，我们决心在卫星田上搭起‘二层楼’，用竹篮盛上架在空中，栽培第一层和第二层小麦，每一层都要收它十万斤，有人要问这是因为我们的土地不够吗？不是。是随意胡弄吗？更不是。这是我们农民要显示我们的生产威力，显示生产潜力。如果我们愿意，我们能叫一亩地生产几百万斤小麦。我们要叫土地长几层就长几层。只要我们干，我们就叫它产多少就产多少。”“党的教育和全国丰产卫星的事例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农民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是无比巨大的，党武装了我们的头脑，使我们在任何困难面前决不气馁退缩，全国的所有卫星都是在党的领导支持下，由劳动人民放上去的。我们也一样能放上去。我们一定要达到亩产小麦十五万斤，叫观潮派口服心服，让

帝国主义在我们的丰产卫星前面发抖。”

给小麦搭“阿房宫”，给小麦撑伞挡雨，给小麦安电灯照明采光，吹二氧化碳、甚至愿意用口吹气帮助小麦呼吸，给小麦洒壶降雨喝水，给麦地消毒灭菌保证小麦健康，给小麦喝狗肉牛肉汤强身健体……小麦，小麦，小麦……几近疯狂。——小麦已经不是一种具体的植物了。它已经被深刻地抽象。无论是在田间地垄，还是在党委书记的办公室，无论是街谈巷议，还是党报头条，它成为社会价值的主流衡量标准，成为人们获得力量并显示力量的源泉，像图腾一样被人们供奉，被人们崇拜。

我请当事人按 1958 年的不变价，按最低限度的标准，粗粗地算了一笔账：烽火小麦卫星田建起的。“阿房宫”，3000 根电杆约有 300 立方米，每立方米 180 元，约值 54000 元；竹筐约有 1500 个，人工费加竹料成本，每个竹筐约值 2.4 元，1500 个竹筐约值 3600 元；计划如果得以实施，全部肥料体积约有 3400 立方米，高度可达 1.6 丈，不算人工费，约值 9500 余元；捆扎电杆的铁丝约有 1 吨，值 500 元；“108 将大战卫星田”的 108 个青壮和其他数十参与者的人工费不算，其他杂七杂八的费用不算，这亩地投入人民币约有 67000 余元。1958 年的 67000 元呀！当时小麦的收购价，每斤一角多钱，如果实现小麦亩产 15 万斤，也就值 15000 余元。依此类推。

可以肯定他说，人类农耕文明以来，到 90 年代，到未来世界，如此狂热、如此奢侈地种庄稼，敢说空前绝后！烽火村背后的情景却是，近一半烽火人吃不饱，有的家庭靠萝卜白菜红薯藤度日。在很长的时间里，烽火是著名的，“高产穷队”。烽火私下流行的顺口溜悲愤而凄凉地唱到：“驴屎蛋儿，外面光，不知里面受凄惶。”

没有明白人呢？有没有“皇帝的新衣”故事中那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儿？

王保京在村里开大会说，要亩产 15 万斤哩！有个爱谝闲传爱说怪话的王茂义说。

“保京，你胡谝哩！老先人手里，连 1000 斤都没有打过，你能打 15 万斤？！”

王保京说：“你没听过的话没见过的事多着哩！你见过一里路壮（直径）的树么？”

王茂义接口道：“你见过二里路长的锯子么？”

王保京说：“你胡谝哩!”

王茂义讽刺道：“那你一里路壮的树，没有二里路长的锯子，咋锯得下来哩!”

意思是，你会吹，我比你还会吹。

09

一五

烽火村的起家，烽火村的浮夸，离不开方方面面特别是

专家科学家的帮衬和努力。1958 年 5 月，因其“解决了麦、棉一年两熟的问题”，“培育出来的小麦、玉米、棉花等优良品种达七八种之多，正在试验的小麦品种有一百余种”，王保京被陕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

5 月 15 日，陕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俞启葆、科学院陕西分院秘书长梁德柱、西北农学院副院长康迪、礼泉县长折敬盈到烽火宣布祝贺。西北农学院教授赵洪璋也到会祝贺。

5 月 20 日《陕西日报》发表了赵洪漳教授六七百字的署名文章:《祝烽火社技术革命成果辉煌》。

赵洪平璋，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小麦专家，毕生从事小麦育种研究。农业粮食增产的关键是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科学技术的关键是优良品种。他一生只研究成功了四个小麦优良品种。烽火几年的功夫，就研究成功七八种小麦、棉花、玉米优良品种，“正在试验的小麦品种有一百余种”。此前，王保京在《陕西日报》公布了要亩产粮食 5500 斤的消息。赵洪璋不能回避烽火科研成果和刚刚公布的显然是违背常识的粮食超高产试验。他在文章中说了一大堆时兴必须说的套话，但在关键的地方写道：烽火“为了增加单位土地面积的收入，今年春季还开始了棉麦套种和两熟试验；由王保京同志直接参加和领导的亩产粮食 5500 斤的丰产试验，更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行文相当谨慎。前几天说王保京

解决了麦子、棉花一年两熟的问题，他却说今年春季开始。“两熟试验”，完全是两个天壤之别的判断。对于亩产粮食5500斤丰产试验，他说“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兴趣”。这句话可以两面理解。不到半年，王保京又在《陕西日报》头版头条上公布，他要一年小麦、玉米、土豆、红薯四熟，“亩产三万二”！他已经不满足一年麦、棉两熟，亩产5500斤了！

不管王保京试验成果是否可靠真实，陕西省权威研究机构的聘任，权威研究机构领导、政府领导和著名农业专家莅临烽火，在事实上确认了庇荫王保京几十年的“农民科学家”的桂冠。“农民科学家”具有意识形态的象征意义，象征着农民真正成了科学的主人，先农民而后“科学家”，主次地位既定，科学家等而次之。从此，王保京由“农业劳模”走到“农民科学家”。他比谁的心里都明白，他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科学种田，除了敢想敢说敢做、胆比别人大之外，无论是种田经验，还是科学知识，孤家寡人，单枪匹马，一次两次可以把外行蒙过去，要长此以往撑起“科学”的门面，打好“科学”的招牌，不依靠专家科学家，绝对不行。事实上，从1955年西北农学院苏献忠副教授肇始，到烽火村来的专家教授、农业科技人员从未间断过，参观实习技术指导，西北农学院、中国农科院陕西分院、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陕西省科委、陕西师范大学、省农业厅、省气象局，等等等等，或者常驻，

或者短期指导，形成了红花和绿叶的关系。王保京是红花，烽火村是红花，专家教授、农业科技人员是绿叶。王保京的背后有一支强大的专家队伍，总结经验，发布新闻，极度浮夸，都没离开过这支队伍。

一六

一辆“飞鸽”加重自行车在咸阳至礼泉的公路上飞翔。车上坐着两个人。骑车的是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的见习试验员任尚学，后支架驮着该所的助理研究员杨鹏年。两个人都是高个。前者微胖，后者微瘦。

这是 1958 年初秋的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公路车少人稀。自行车出咸阳城，端向北，直奔 30 公里外的烽火村。

一七

“1958 年至 1960 年，我和杨鹏年在烽火住了近两年哩。我是他的助手。时间不算短吧？”任尚学已经老了，像所有老人那样，新近发生的事情记得不清，但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却如数家珍。

王保京不排斥农业专家长年累月住在烽火，不仅不排斥，而且欢迎。这一点，一般农民，一般农村，是很难做到的。这是王保京的过人之处。

翻开烽火的历史，参观学习的不算，专程赴烽火的人，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党政官员：副总理、西北局书记、陕西省历任书记和省长、历任地县委书记，及各职能部门的

领导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人员；第二类是中央和地方各大媒体记者；第三类是农业专家和科学家。中美建交，美国总统卡特也来参观过。第一类是权力和政治笼罩，第二类是紧跟权力和政治的包装宣传，第三类则为第一类和第二类人物提供权威的“科学”依据，给典型宣传以说法。作为农业技术专家和科学家，在过去的年代里，他们能受到农民的欢迎，能与农民合作，进行农业技术推广和科学研究，真是莫大的庆幸。农业科学研究，农业科研成果，如果不与土地结合，一切都等于零。而土地恰恰掌握在农民手里，在烽火，则掌握在王保京手里。

他们来到了烽火村。然而，他们没想到，或者是想到了不能不来，或者是想到了更想来，烽火村的土地，是一块完全政治化的土地，是一块光长政治光长说法的土地，是科学态度、科学精神被大大歪曲了的土地。这里的主人是王保京，是政治，科学与科学家只能是附庸。当然，烽火也是一口大锅，如果想的话，如果满足某种条件的话，如果有某种个人企图的话，谁都可以在烽火这口大锅里分得一杯羹。光是“农民领袖”浮夸，成不了大气候，如果政治与“科学”连袂保驾护航，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检索历史，追踪历史，公正地看，除了极少数昧了良心的所谓科学家外，大多数农业专家科学家是被迫上阵的。

武功县和烽火村同在一个台风中心。武功距离礼泉只有

几十公里。武功是西北地区的农业科学研究中心。小小一个杨陵镇，集中了西北最庞大最精华的农业教学和研究队伍。80年代建起了陕西省农科城，1997年还要建一个可能是中国最大的农业开发区。1958年，这些后稷的子孙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中国农科院陕西分院许志路副研究员，是位小麦专家，曾经考察过烽火的科学种田。他的夫人许效琦副研究员也是小麦专家。他家里摆着《资治通鉴》、《四书五经》。他退休后，在家研究历史，研究传统文化。他半身不遂，多数时间在床上，遂能静下心来读书，总结人生经历。他说："1958年，我们搞小麦的压力特别大。各地都放小麦卫星，陕西坐不住了，小麦专家也坐不住了。省领导说，要你们科研人员干什么？不如农民！农民都能搞几千斤！省长开大会讲，河南湖北小麦亩产几千斤。出会场，有人专门指着我问：'你信不信？'我说：'不信！'然后被耻笑为'保守'。往后就不是什么几千斤的问题了，而是几万斤，十几万斤！我们院当时也搞卫星田，指标是亩产12万斤。我不同意：'这是胡吹么！违背起码的常识！'有人说：'搞科研嘛。'我说：'你们是装糊涂！'中国农科院的专家也胡说八道，写报告说，杨陵有个'稀植逆流'。点了一些人的名，包括我的名。那时人都疯了！吹牛无罪，吹牛沾光。正常人活不下去。有个老师不信《人民日报》刊登小麦亩产几千斤几万斤，有人就

指责他‘不相信党报就是不相信党’！”

许志路这样顶着干的和那些昧着科学良心同流合污的农业专家都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心存疑虑，瞻前顾后，缄口不言。大家不敢说话，甚至不敢怀疑，疯狂的形势，意识形态的压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经验，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他们要生存。他们要吃饭。他们还有家庭和孩子。

1957 年“反右”的恶蔓，已经长进了 1958 年。

“1957 年的阵势你没见过。害怕人得很！许多同事昨天还好好的，是专家教授，是自己的同志，今天就成了右派，成了阶级敌人，成了专政对象。”任尚学满脸的恐惧和愤怒。

1957 年、1958 年如此紧密地拼在了一起。“右倾”和“右派”只有一步之遥。反右的嚣尘还浓重地笼罩在上空，“反右”的利刃还搁在喉咙上，人们甚至能透过皮肤感觉到利刃攫人心魄的凉气。

只准一张嘴说话，不准大家说话；只准一个脑袋思想，不准大家的脑袋思想，是整个时代的特征。整个中国，只有一张嘴，一个脑袋。谁官大，谁的手里就掌握“真理”，谁就有解释“真理”维护“真理”的绝对权力。知识分子已经微不足道，像一群随时都可以碾死的蚂蚁。一面是思想的极度沉闷和压抑，一面是梦想狂想的极度膨胀；一面是生存的惊悸与恐惧，一面是假话空话大话的空前盛行……如此这般

地构成了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更难受的是，1958 年大跃进，向科学进军，主要是向农业科学进军，农业专家科学家还不能不说话，不能不按照别人的意志说话，用他们的嘴说官员的话，或者是借官员和农民的嘴说“科学”的话，说农民的话。话说得非常清楚，他们不是科学研究的主人。与西方中世纪黑暗不同，这里发生的事，一方面崇拜科学，一方面把科学当婊子，鄙视科学态度，践踏科学精神，把真的说成假的，假的说成真的，把空想说成现实。谁搞浮夸，谁说假话，谁就可以登头版头条。谁说真话，谁敢怀疑，谁就在报纸上挨批判。更可怕的是，巨大的压抑产生了变异，许多人正在怀疑自己是否还有正常的思维，怀疑自己的经验和学识是否僵化并阻碍着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否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一个地方一个人违背常识可以解释，可眼下不是一个地方一个人的事儿，能说普天之下都违背常识？事实上，1958 年的浮夸狂飙，没有农业专家科学家的妥协和加盟，光靠农民、官员，是刮不起来的。被逼无奈的可以理解，头脑发热甚至助纣为虐则不能原谅！

许效琦一旁插话道：“1958 年我到安徽开农业会议。会上，人家都报小麦亩产几万斤，我逼得没办法，只好报亩产一万斤。院里的卫星田，五六亩地，深翻五尺，上了好多肥料，亩产才是一千多斤。这块地，长了十年的好庄稼。”

“京娃，你胡谝哩!”赵启文指责王保京吹牛的话音还

没有落地，便在西安人民大厦省棉花工作会议上经受了一场洗礼。会议热火朝天，互相挑战。会场上，专门有个地方贴大字报。会议专门准备了白纸墨汁。谁想过关，谁想喝彩，谁就把指标往高里报。省上领导跟他说：“启文，你礼泉带个头，指标往高里报，把会议气氛烘托起来。”赵启文大笔一挥：“亩产棉花 6 万斤，要与专家比高低!”

棉花亩产 6 万斤的挑战书，像在人民大厦扔了个炸弹！光炸还不行，还要专家给亩产 6 万斤棉花的技术措施。吓得专家屁滚尿流。

“咋不屁滚尿流哩？亩产 6 万斤棉花，像王保京那样，上嘴唇在天上，下嘴唇在地下，不要脸胡吹哩！那达找措施嘛!”赵启文一分为二，分成了两个赵启文。会上一个赵启文，会下一个赵启文。会上的赵启文“胡吹冒撩”，会下的赵启文骂王保京“胡吹冒撩”。会上的赵启文大胆哄抬指标，会下的赵启文小心论证。

回来后，县上派他当县棉花指导委员会主任苏献忠副教授的助手。

几天前，住在礼泉的苏献忠也感到了压力。参加棉花会的书记打电话找他：

“苏教授，我们要放棉花卫星哩!”

“咋放？”

“会上有人提出亩产几万斤棉花!”

“几万斤？你说错了吧？”苏献忠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就是几万斤！行不行，听你一句话。”

“不……不行!”吓得苏献忠声音发抖。

“咋不行？”

“太……高！不……行!”

“想想办法么。”

“我办不到么!”

“那你说多高？”

“我也说不出来……”

书记要在苏献忠这里压出个说法来，好在棉花会上风光：“你们看，教授都说行!”可苏献忠死活不松口。苏献忠口气嗫嚅，但态度坚决。顶到这种程度已经相当不容易了。杨鹏年在烽火指导亩产小麦15万斤，征询苏献忠的意见。他说：“不好说。”实际是不敢说。王保京批评他“太保守”，并在背后跟别人说：苏教授不支持我哩。那时候，顶个“太保守”、“不支持烽火”的名，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赵启文负责测算全县15万亩地的棉花产量，县里强令要达到平均亩产150斤皮棉。可是赵启文测算了一下，平均亩产顶多100斤，并将测算结果如实禀报。这一如实不得了!县委书记大怒：“给我把赵启文叫来!”

他赶忙跑到书记办公室：“书记叫我哩？”

“赵启文！你知道不，你犯了右倾保守主义！后面再加

一个‘者’字，你就犯法啦!”

书记劈头盖脸一顿训斥，上纲上线，吓得赵启文浑身发抖。

他赶紧回去重新算账。

原来算的标准是120个棉桃剥一斤籽棉，现在干脆80个棉桃剥一斤籽棉，亩产数自然上到了150斤。这才蒙混过关。

晚上，赵启文睡在烽火村民王建元家，和报社记者、农民诗人王老九等六七个人挤一个炕，不禁长吁短叹，难以入眠。世道咋成这个样子了！说实话倒霉，说假话沾光。——这些记者诗人也一样?

因此出现了“农民科学家”和政客大胆设想，农业专家大胆论证大胆设计的局面。

10

一八

杨鹏年和任尚学的待遇比赵启文、农民诗人王老九好，住村民王述安家，两人一间屋。

杨鹏年是江苏人，任尚学是本地人。杨鹏年是大学毕业生，年龄比任尚学大，专业是土壤化学。有意思的是，任尚学虽然是杨鹏年的助手，在烽火住了那么长时间，朝夕相处，抵足而眠，却从不正儿八经地讨论时局，讨论“科学试验”问题。当时知识分子盛行：‘两个人说真话，三个人说假话，

四个人说梦话’。可这杨、任二人搭档，在一块儿连真话都不说。邪门。两个人的性格并不是天壤之别。杨鹏年思想活跃，任尚学十分健谈。所里考虑他们搭档烽火村，想必是给杨鹏年搭配任尚学的本地经验。可任尚学没有想到的是，“杨鹏年是个能人”，适应能力特别强，很快就进入了烽火角色。有报纸为证。《陕西日报》1958 年 10 月 3 日刊登烽火万能试验田预测“玉米亩产万斤”的消息，杨鹏年是两个作者之一。而且文中还专门提到杨鹏年参与了万能试验田的“新创造”。显然是自己表扬了一回自己。

38 年后，有上保京参与，由杨鹏年和县农业局局长张兴民执笔的《烽火卫星农业大学农业科学研究室（1958 年下半年度）试验研究简介》摆在任尚学面前的时候，他大吃一惊。“我怎么不知道这事!”他说。

为什么不让他参加？资格不够？还是别的原因？

他参加过试验计划的讨论。

他非常清楚地记得，在讨论小麦密植的播种量时，王保京一挥手说：“播种量要搞 2000 斤!”

在讨论增加小麦单位面积产量时，王保京提出了亩产 15 万斤、30 万斤的高指标，大家面面相觑。王保京灵感大发：“可以搭楼种小麦么!”

怪不得省领导批评这帮知识分子不如农民。

任尚学在会上惊叹——

爷！一亩地打多少斤粮食么！2000斤种，咋播么？

爷！那么高产，肥料在哪达么？可以算么。

爷！小麦种在空中，不通地气了么。冬天冻死了么！

王保京则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句话把所有犹豫都封住了。

任尚学的疑问，当属保守思想之列。有保守思想的人当然不能进入核心层操作。所以才有38年后的"大吃一惊"了。

事实上，杨鹏年等主持的试验设计小册子，不仅完全贯彻了王保京思想，而且还有深化和发展。小册子出自专家之手，大量应用了土壤生物、土壤化学、植物栽培学等术语，为幻想和浮夸蒙上了浓厚的"科学"色彩。

比如"卫星小麦丰产试验"，其亩密植播种量试验，分别是50、100、200、600、800、1000、1200、1400、1600、1800、2000、2400、2800、3000斤，远超过了王保京的设想。其种子处理试验，用奈乙酸、硫酸铜、硫酸锰、硫酸锌、钡酸钠、硫酸馍（？）、钼酸安（铵）、硼酸钠，以及钴、镐（？）等微量元素浸种，作种肥。这些让人眼花镣乱的化学名称，想必此时的王保京做梦都梦不见。蒙住党政官员、记者等外行，不在话下。

其播种方法试验，其中一种是纸条播种法。据考证，这种方法不是烽火村的发明，许多地方包括杨陵的农业专家科

学家都有试验，具体何人发明，何地发明，不可考，当事人描述说，烽火的具体操作方法是，用 1.8 米口径的大锅煮稠稠的两大锅面糊，抹在 1 米见方的麻纸上，麻纸打有小火柴盒大小的方格，每个方格点 6 粒小麦种。这种方法要像绣花一样精心。面糊抹多了，麻纸拎不起来，抹少了或者抹不到位，小麦种沾不住。其理论依据是，密植精确，均匀，可以合理吸收养分。

关于肥猪试验：1、割除甲状腺、耳朵、尾巴；2、注射蛋白；3、喂肥猪药。当事人回忆，具体实施的时候，饲养员手下留情，耳朵只割了四分之一，尾巴只割了三分之一。那几天猪的凄厉嚎叫自不必说，从此烽火又添了一新景观，一群缺耳朵缺尾巴猪欢快嬉戏。

给猪注射蛋白？可谓豪华养。

关于动物肥料试验：1、动物血粉拌种；2、动物血追肥;3、猪或狗肉沤肥拌种；4、猪或狗肉沤肥追肥。措施：喂养肥料用狗和兔。前面说要放出亩产 15 万斤小麦卫星，需要杀牛杀狗沤肥少现在又增加了两种动物，猪和兔。

猪牛狗兔，王保京、杨鹏年辈端上来的，简直就是一席西式大餐！小麦不亦悦乎！人类不亦悲乎！当时有半数以上的烽火人吃不饱肚子呢！中国有半数以上的农村人吃不饱肚子呢！

杨鹏年等一如“卖火柴的小女孩”，饿着肚子憧憬着未

来。青黄不接没吃的，大家饿得不行，杨鹏年本来就黄瘦的脸更加黄瘦。饿急了，他想出了主意，炒红薯叶吃；把包心菜根刨出来，洗净削皮炒着吃：把红薯藤烘干，磨成面，搀点儿白面，蒸馍。这些设计了小麦“阿房宫”的人，这些喂小麦猪牛狗兔肉汁的人，此刻正在津津有味地大嚼红薯叶红薯藤，大嚼包心菜根。任尚学跟着沾光，并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一九

1958 年至 1960 年，礼泉与乾县“合大县”，礼泉归乾县管。

乾县档案馆县委 331 号永久档案记载了王保京小麦卫星试验田 1958 年的实际产量：1167 斤。直到 1964 年，王保京才在报纸上公开认这个账。任尚学说，如果不是及早间苗，肯定颗粒无收。麦苗开始还长得好好的，往后，墨绿顷刻变成了枯黄。

投入 67000 元人民币，产出小麦 1167 斤，平均每斤小麦约投入 57 元人民币！按照 1958 年的小麦价格，能够买近 600 斤小麦，够一个农民生活一年！67000 元人民币买小麦够烽火村民生活一年还有富余！

风风火火，轰轰烈烈，顿时灰飞烟灭。大会小会，报纸电台，王保京和烽火的大话满天飞，这个台怎么下。

恰值此时，省委第一书记来到了烽火。

忐忑不安的王保京和省委书记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王保京对省委书记说："我把好事办成瞎事咧!"

省委书记问："你啥好事办成瞎事了？"

王保京说："把几亩地的肥料上到一亩地里，可没打下那么多的粮!"

省委书记问："你打了多少？"

王保京说："打了一千多斤。"

省委书记问："你爷爷手里打了多少？"

王保京说："打一百多斤。"

省委书记又问："你父亲手里打多少？"

王保京说："打二百多斤。"

省委书记安慰说："你比你爷爷你父亲都打得多，怎么说是把好事办成瞎事了？"

王保京没想到台下得这么轻松，一时激动得"答不上话"。

省委书记接着说道："指标过高不好，应当既积极又可靠。我们从这次总结经验中，得到丰产、政治、经济、技术多方面的收获，这样，今后就能更好地前进。"

这个对话，偷换了概念。因为省委书记是"忙后"（麦收后）来的，问答的产量自然是小麦产量。省委书记问"你打了多少"，应该平均亩产是多少。王保京打了个马虎眼儿，把一亩多"卫星田"的亩产量报给了省委书记。根据正式记

载，烽火 1957 年、1958 年、1959 年小麦平均亩产也就是 200 多斤，60 年代的 1961 年、1962 年小麦平均亩产分别是 220 斤、270 斤，70 年代的 1970 年平均亩产 189 斤、1971 年 451 斤、1972 年 713 斤。烽火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的小麦亩产水平，也就是王保京父亲手里的水平。

说出来大家都尴尬。再说了，王保京这一千多斤是怎么种出来的？王保京父亲二百多斤是怎么种出来的？王保京父亲能有各级领导支持，有那么多专家指导，投那么多钱，投那么多工，投那么多肥料？而且，王保京父亲手里的二百多斤显然是平均亩产，两者不可比。

省委书记心里明镜似的糊涂，聪明冷俐的王保京赶紧顺竿子往下溜，互相默契，皆大欢喜。省委书记既肯定了王保京的成绩，鼓足了干劲，又含蓄地轻描淡写地批评了高指标。王保京的心里也明镜似的，高指标还不是你省委一级一级压出来的？这叫做，各搭各的台，各唱各的戏，各下各的台。公正地看，与全国其他省比较，陕西的浮夸风，除了烽火王保京后来居上、有全国最高水平的表现外，相当节制，浮夸的产量，还没有广泛波及“平均亩产”，还没有那么狠地搜刮农民，把农民家里的粮食通通搬到国家仓库里去，以邀功请赏，换取顶戴花翎。

这位省委书记在，“保守”的名声下，还算有良心，还算实事求是，不像河南、安徽、四川、甘肃等地搞得尸横遍

野，民不聊生。“保守”二字，救了陕西人的命。30年后，“保守”二字又阻碍了陕西的发展，那是后话了。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一个省委书记，能在当时的政治局面下，保住一方水土，一方百姓，当可树碑立传了。

《陕西日报》头版刊登了省委第一书记戴着大草帽在烽火地头视察的照片，给了侧目烽火村的人们一个明确的信号：省委第一书记也就是省委继续支持烽火，烽火大浮夸这场闹剧可以体体面面风风光光地收场了，王保京也可以体体面面风风光光地下台阶了。“左”的东西，不仅没有得到清算，而且继续得到鼓励，为一个多月后召开的“庐山会议”继续反右倾作了一个铺垫。

1959年8月28日，《陕西日报》在“反右倾，鼓干劲……”的通栏标题下，头条发表了王保京的署名文章《党给我们继续跃进的无限力量》。这篇文章象征性地为烽火、为王保京、为中国的1958年划了一个可悲的句号。

王保京是否也因此摸到了“反右不反‘左’”、“宁‘左’勿右”的脉搏？

01

一

“明白事在戏上哩，糊涂事在世上哩。”王行兴满怀惆怅他说。他与许多陕西人一样，爱听秦腔。所有的戏唱下来，总有个是非、真假、善恶的结局，来教化和宽慰看戏或听戏

人的心。现实生活可没那么简单。事事不如意，满眼望去，多有是非不清、真假难辨、善恶颠倒之事。人们困惑而软弱。秦腔唱腔，粗砺，激越，倔强，不加修饰，外向扩张，拔出冲天之气，扯开喉咙吼，十分气派给劲。走到陕西任何一个地方，陕北高原，秦岭山地，黄河岸边，关中平原，你都能听到秦腔攫人心魄的声调。

秦腔似乎还延续着古风——秦长城，兵马俑，汉唐气度，横扫六合……断断续续，跌宕回肠。金、元诗人元好问《送秦中诸人引》说："关中风土完厚，人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至于山川之胜，游观之富，天下莫与为此。固有四方之志者，多乐居焉。"

"歌谣慷慨"尚闻，"山川之胜"、"游观之富"犹存，"风土完厚"、"质直尚义"安在哉！经济落后，法制羸弱，道德沦丧，民风调敝，怨斗频仍，几不堪言。

二

王行兴面相奇特，剑眉，凹眼，窄额，大耳，高颧骨。一看便知，他不是个普通的农民。高个儿，瘦削，行动敏捷，思维敏捷。他有很好的记忆力，条理清晰，谈话喜欢归纳总结，谦逊又不失己见，甚至固执己见。如果你有与他不同的看法，他会想方设法说服你。他喜欢读两大类书，一类是文学，一类是科技。他读过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创业史》，李若冰的《柴达木散

记》，等等。见面时间不长，他便问我："你怎么评价《废都》和《白鹿原》？"这是文学界很专业的问题。他的敏感，已经远远超越了烽火一隅之地，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年龄。他今年 55 岁。谈到科学，他跟我滔滔不绝他讲米丘林和摩尔根，以及这两大遗传学派的差别，以及 50 年代重米轻摩、引起政治批判的科技界公案。谈种庄稼，他不是一般地谈种地经验，他可以把经验量化，可以进入微观解剖，提供基本概念，提供基础数据，阐述农作物生长机理，推出宏观判断和结论。他不打牌，不打麻将，闲了就看书练字。

陕西人说话，他是"麦秆里睡觉——细人"。礼泉县产苹果，农村人吃苹果，树上摘下来，裤子上一蹭，连皮吃。他不。他吃苹果要削皮。

别人笑他，他会反驳，"你们不懂"。"苹果树要打农药么。"他说。"刮风下雨，农药洗干净了么。"别人说。"再咋也洗不干净。有机磷残留物质洗不掉么。"他说。"都不洗吃，咋不见吃死哩？"别人说。这也是真的。他不管。他有理论，"理论指导实践哩么"。他随身带着指甲刀，指甲长了，拿出来剪磨清净，手掌上下一翻，满意了，再揣回去。解手毕，一定洗手。他牙不好，吃完饭，剔牙，还要随手拿一根牙签，插进烟盒外的塑料包装纸里备用。当然，他的细还远远不是这些。

本来，他是烽火的第二号人物。1964 年入党，1966 年

他便任了烽火历史上最年轻的支部副书记，也是烽火历史上任职最长的党支部副书记，总共 31 年，一直到 1997 年 6 月砸了他的家、打伤他妻子、拉他游街为止。

他还有一段奇特的经历，1976 年，他与礼泉县另一个先进村——袁家村党支部书记郭裕禄一起被提拔为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时进入县委常委。这期间有让他任另一个县县委副书记的动议，被王保京挡驾，说是烽火更需要他。1979 年，他与郭裕禄一起被解除职务，回去任烽火公社党委副书记兼烽火党支部副书记。

他高中肄业，1958 年回乡，因为是个有文化的人，回乡后即得到王保京的刻意栽培重用，先任烽火农业科学试验小组长，不久任烽火团支部副书记。他一直是王保京得力助手，一人之下，千人之上。王保京 1973 年被提拔为礼泉县委副书记后，他是烽火的看门人。王保京主外，他主内，珠联璧合，黄金搭档，被外界称为王保京的“内务大臣”。王保京的许多想法，都是通过他组织实施的。

他父亲在烽火当了一辈子饲养员，看不惯王保京吹牛，听说儿子要当村干部，坚决反对，他不听。王保京是他当娃时心目中的英雄，“能行人”。搞科学试验，当农业劳模，到北京开会见毛主席，到省里开会见领导，到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还给烽火招来那么多参观学习的人。真给烽火争光长脸。没有王保京，谁知道世上有个白灵官，有个烽

火？人怕出名猪怕壮，怕不被别人说哩！

他父亲骂道："你跟（口外）干嘛！（口外）不是个正儿八经的人么！跟他，你要吃亏哩！人家胡吹浪偏哩！人家在外面好吃好喝哩！人家有本事，你没本事么！"

一天三顿饭都免不了挨骂，直骂得他不敢回家吃饭。吃饭的时候，他打发小娃或妇女打探："看我大（注：'大'，关中方言，这里是'父亲'的意思）在家没？"不在家才回去。

王行兴是王保京"培养教育青年干部"的杰作。他也经常犯错误，比如光抓生产不抓路线，王保京便耐心教育他："毛主席教导我们：'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抓生产必须先抓路线，如果不抓路线教育，势必越抓越乱。"

王行兴跟随王保京40年，一步一步地看着王保京和烽火村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紧跟形势，突出政治，对错都有理——对了是党的英明，王保京领导有方，错了有党在前面遮挡着，党就是"挡"嘛，总不可能党犯了错误由一个农民、一个劳动模范、一个村党支部书记来承担吧？——怎么着也不会阻挡王保京和烽火村从胜利走向胜利。

"嗨！烽火村瞎事好事我都做完了！说给下一代听，天方夜谭哩！脸红哩！"王行兴说道。

王行兴便是这样走进了王保京的世界。

三

1960年初，一则消息引起了全国的震动：陕西省委和乾县县委决定，让王保京等九名农民上大学。庄稼汉上大学真是开天辟地的新鲜事。社会上有什么议论，王保京都不会在乎。王保京心里“有底”。他跟记者说：“党让学，就一定能学成。只要听党的话，世界上没有办不成的事。”

王保京当西北农学院学生的身份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乾县烽火人民公社社长、陕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带着小麦和玉米高产的“纪录”，带着一系列农业科研成果（有公开的表彰为证：培育出小麦、玉米、棉花优良品种7个，进行过112种小麦试验）。其成果超过任何一个农业专家，包括西北农学院的教授。

所以刚入学时，有人间王保京：你来学习，是当学生呢。还是当先生？

王保京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

他说：“同学们，老师们，我上大学是党交给的一个政治任务。我一生有三个父母，一是党，二是父母，三是老师；党给了我政治生命，母亲给了我肉体生命，科学知识要你们给我哩！我是来当学生的，你们该打就打，该骂就骂，不要因为爱护我，把我耽误了。”。

1958年搞浮夸，一年以后上大学，在王保京看来，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回事，都是“党交给的一个政治

任务”。“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群众知识化”，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农民上大学，其政治象征意义超过一切意义。他是一个极其清醒的逻辑大师。翻开所有的报道，他始终把他个人行为的大前提廓得很清。在这个大前提下，他王保京就是一个棋子，一个能把大前提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棋子。

他的概括不错，甚至可以说很精辟。他直言不讳的魅力，也可以说是时代的魅力。

西北农学院热情欢迎烽火农民兄弟的到来，专门为农民兄弟准备了一个庞大的教师队伍，一年学习13门课程，每门课配备一名老教师，一名青年教师。

九个农民中，有一个像王保京一样穿着黑色对襟棉袄的青年，喜气洋洋，东张西望，为眼前热烈的气氛所陶醉。他今年18周岁。他叫王行兴。

16岁回乡，18岁跟着王保京上大学，幸运降临得是不是太快了点儿？王保京把王行兴叫到社交际处（注：交际处，是为了营造烽火典型，由省县两级政府出资建设），说道：“行兴，省委决定，要让农民进大学深造，给咱名额，你跟爷（注：论辈分，王行兴叫王保京爷）一块去。爷文化程度低，你跟爷能帮忙。”

他说：“能行。”

他是烽火农业科学试验小组组长，1958年、1959年的

大失败对他打击很大。他憧憬科学，渴望成功，狂热地追随王保京，废寝忘食，不知道苦，不知道累。王保京的动员，总是言简意赅，总是激动人心："第一，咱弄事就要弄老先人手里没有弄过的事。第二，要敢弄科学家不敢弄的事。第三，搞新东西，不要怕别人讥笑讽刺，不要怕挨骂，失败了没有关系。六六六粉试验了666次才成功哩！（后来在西北农学院学习，才知道，六六六粉不是试验了666次，而是农药的分子式。）人这一辈子，屁都没人骂你，成不了大事！""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想到的事情，立即去办才办得到。"

都是真知的见。对传统的叛逆，对权威的挑战，成大事业而对世俗评价不屑一顾。王保京布置试验任务，王行兴负责记录，整理后请王保京过目实施。对王保京，老年人怀疑，年轻人崇拜。他的奇思怪想，他的花样翻新，他对科学的激情，他对新事物的敏感，他不怕事的精神，没有一项不符合年轻人的口胃。

王保京咋说，大家咋干。遇到问题，便向王保京请示汇报。

王保京要用狗肉沤肥，安排王行兴他们去买，许多人家要留着看家护院不卖。

王行兴请示："狗买不够哩。"

王保京说："你们咋这笨哩！买儿只母狗去招引么！"

这一招果然灵。“母狗不摇尾，公狗不跳墙。”这句话，可以说人的男女关系，当然更是狗的公母关系。小青年们牵着母狗出去转，母狗尾巴一摇，不花一分钱便招引回烽火一群公狗。

把那么多狗整死也不容易。先把狗撵进铁匠铺的大院子里，拿着木棍追着打，狗疯狂逃命，追不上。后来发明一种打法：给铁丝通上电，把狗往铁丝上撵。奇怪的是，狗的脚似乎绝缘，踩在通电铁丝上无动于衷。后来又发明用棉袄捂头勒死的办法。这办法很灵。狗悉数勒死，愉快地煮进了锅里，圆满地完成任务。

“谷雨前后，种瓜种豆。”工保京要试种100斤重的大南瓜，嫌养分通过南瓜根南瓜蔓吸收太慢，南瓜长到碗大的时候，他把王行兴找来吩咐：“我们要试验间接吸收为直接吸收，在南瓜上刻个孔，把人粪尿灌进去，果实就会膨大得快了！就像人生病，身体虚弱，靠吃饭补充营养慢，打葡萄糖见效快么!”

动物植物，生命同理。王行兴便领着小组成员上贵祥、王万英、王殿胜、王天顺等六七个人，挑了十几个南瓜试验。南瓜上划开一个方孔，都是小伙子，没有忌讳，就地脱了裤子，往南瓜里拉屎撒尿，拉完撒完再封住口。倒是立竿见影，三天时间，拉过屎撒过尿的南瓜稀烂如牛屎，一塌糊涂，臭气熏天！总结经验，是不是把王保京的想法理解错了？王保

京说的人粪尿是不是沤熟的人粪尿，而不是生瓜蛋子们直接（尸巴）哩尿哩？或许往南瓜里灌了沤熟的人粪尿，真的能结 100 斤的大南瓜哩？不敢和王保京细说。

还有不敢汇报的事。

社里杀狗杀牛和棉籽饼沤肥，他们负责煮。大锅里，或是牛肉牛头牛蹄牛下水，或是狗肉狗头狗腿狗下水，咕嘟嘟，咕嘟嘟，满屋子满院子肉香扑鼻！意志再坚定，也被摧毁了！肚子呱呱叫，由不得他们。他们偷偷揣上白酒，牛肉狗肉下酒美得很么！牛肉狗肉，麦子吃得，人吃不得？人吃牛肉狗肉，天经地义么！一口牛肉一口酒，或一口狗肉一口酒，哥儿几个，就着瓶口轮流喝，直喝得面红筋胀，东倒西歪，夕阳西斜。吃牛肉，打牛肉嗝；吃狗肉，打狗肉嗝。恐怕遮不住，这事，在烽火可是“杀头”的罪！要打隔，赶紧捂住嘴，转过脸，远远跑开。大家都缺肉，一年也吃不上几顿肉，对肉味儿敏感得很！打个嗝，没准儿十里八里都能闻见！

王行兴吃得心里不踏实，觉得辜负了王保京培养他的一片苦心。先说 1958 年带他到西安人民大厦开农村工作大会。他一个碎娃，第一次到西安，啥时候见过这么宏大的场面。王保京让他和塬上村的造林模范王德生老汉睡一个屋。老汉也是第一次到西安，闹了不少笑话。晚上睡觉，不敢睡沙发床，说：“塌下去咋办哩！”床上扯过一条毯子，铺在地下睡。王保京曾和老汉住过一块，说老汉不会关灯，用袜子把灯罩

住；开会不会坐沙发，一坐下去，身子就翻了，两脚踢翻了面前的茶几。王行兴不上会，在屋里呆着，收拾收拾屋子，打打开水，每天等着王保京回来谈会上那些激动人心的事。王保京每次回来，都是神采飞扬，讲全国的形势，陕西的形势，会上的形势，如何大跃进，如何放卫星。

第一回到西安，没出过大厦的门。第二回就不一样了。省里支持烽火放卫星，给了烽火一台新南京“嘎斯”车。爷!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肉夹馍！大大的事！风光得很！县委县政府也就有一台美式中音普么。别说看见，就是听见，都能让全国农民嫉妒得眼睛冒火！任务重大，王保京派他押车安安全全地去，安安全全地回。他和司机接上车，与司机商量:“西安城里转转么。”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北大街，围着钟楼美美地转三圈，再往回开。这是 1958 年！两个农民开着南京“嘎斯”逛西安城，何等惬意！何等畅快！街上车辆稀少，行人稀少，他们仍然摁响喇叭。他们要向城里人证明:：‘我们来了!’”望而却步的西安城，今天如此妩媚亲切。不知其大的西安城，今天如此短暂狭小。王行兴把头伸出车外，仰望古老而厚重的钟楼，仰望在秋风中嘻戏的燕子，给古老而厚重的钟楼带来些许轻松和快乐……逛了西安城，再上北京城。

好事接踵而来。北京召开“全国农村农业科学试验经验交流会”，给陕西两个名额，烽火村有一个。

王保京把他叫去，说道：“行兴，北京开会，你去哩。”

他惊讶道：“咋，我去？”

王保京说：“行兴，你去北京，好好逛一下，开阔一下眼界。好好介绍经验，好好学习人家的经验，带回烽火来，指导科学试验哩。”

中国农业科学院陕西分院的科学家、省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站站长、县农业局长，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写作班子为他写发言稿。发言稿的题回是：“农民咋搞科学试验”。他也不怯阵，大会发言，一炮打响。接下来的是新华社记者采访，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邀请座谈。故宫，颐和园，天坛，全国科协……都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地方。

没有王保京，哪有今天的殊荣？

说起来，充满了矛盾。许多试验，道理上都是通的么，怎么会失败呢？“话都说得对着哩！想法部好着哩！”王行兴说。

是否同种同属同科暂且不去管它，也没有必要去管它，也不知道怎么去管它，反正有党的支持，地多的是，人多的是。玉米和谷子杂交，秆儿上长玉米，头上长谷子。失败。小麦与芝麻杂交，让小麦颗粒长得像芝麻一样多一样密密麻麻，两者不同季节，就调整小麦的杨花期。失败。大白菜与萝卜嫁接，把萝卜缨削掉，在萝卜上切口，插进大白菜苗，地下长萝卜，地上长大白菜。结果是大白菜长起来了，萝卜

成了空壳。失败。杂交成风，嫁接成风。人们甚至想到了“驴日马下，骡子养大”，让马与骡子杂交生骡子，让铁匠与木匠杂交生铁木匠。人们的思想空前解放……失败不可怕，科学探索的过程中，没有比失败更正常的事情了。这是常识，他懂。可怕的是，至今搞不清失败的原因。

放小麦卫星的时候，王保京说，“要有地下水库、地下肥库，才有地上粮库”，“不种百斤，难打百石”。说起来顺嘴，看起来顺眼，听起来顺耳。

王保京的说法怪异，村里人凭经验不信，却说不出理论，只会调侃。“乳牛的肥大水大，可以在乳牛的沟子上种小麦哩!”“把化肥倒进水井，水井里种小麦，肥大水大。”

农民诗人王老九 1956 年写了叙事长诗《王保京》，现在也加入了调侃的队伍。他 1958 年第二次来烽火寻找素材，没为烽火写诗。他可能觉得烽火王保京太邪乎了吧？烽火试验养鸭，全养死了，只剩下“养鸭池”一潭死水，几声蛙鸣。王老九唱道：“养鸭池不养鸭，养了一群蚧蛤娃（癞蛤蟆）。”

丰产田小麦种植过密，收获时节，一片凄惶。村里人形容说：“麦穗像蝇子头，麦颗像茴香，茴香不窖（香），磨起没面，麦秆烧起没焰。”

调侃不顶事，大错已经铸成。

问题在于，不仅不总结失败的原因，不仅不对巨大的损失和浪费有丝毫的内疚或沉痛，反而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

利，从光荣走向更大的光荣。如今，他们在王保京的带领下，英雄一般地被迎接进了大学的殿堂。

王行兴这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先前是沮丧，现在是迷惑。

说起来，他对科学家并不生疏。1955 年从苏献忠开始，到烽火来的农业专家科学家络绎不绝，1958 年达到了顶峰，一大堆人扎在烽火搞科研，创高产。他认识科学家就是从偷杨鹏年和任尚学的烟抽开始的。

“任老师，你还认得我么？”38 年后，王行兴见了任尚学问。

“咋不认得你？偷我烟抽的娃么!”任尚学一眼就认出了王行兴。

他们都是花白头发当爷爷的人了。

“还是‘宝成’、‘红金’烟哩。”王行兴说。

“几十年了!”任尚学感叹。

“几十年了!”王行兴也感叹。

“你们村的人我还都认得哩。就像昨天一样!”任尚学说。

这回好了，上大学，可以和那么多的老师，那么多的农业专家朝夕相处了，可以专心致志地研究和探索烽火科学试验屡屡失败的原因了。

02

四

王保京是灵醒人。他非常有角色意识。烽火是他的天下，他说什么，科学家不管心里怎么想，都会积极地去论证，去设计，进了大学门就不一样了。从他别上“西北农学院”校徽的那一天起，他就成了学生。

他面前摆着一年13门功课：数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学、植物学、土壤学、昆虫学、病理学、作物栽培学、遗传选种学……

首先是英语字母问题。发音不准，记不住。他灵机一动，和大家一起，给记不住的字母起外号：“T”——钉子，“d”——带背椅子，“Q”——带把鸡蛋，“Y”——双股铁锸，“V”——没锅盖盖……

王保京还有说法：“农民只要听党的话，干啥都能成功。”“数理化再难，也是人创造出来的。我们是人，总能学会它。科学，身上长刺，我们也要碰；理论是刀山，我们也要钻、要上！”

不知道是秀才们帮忙还是他自己，还总结了学习的“五怕”、“五关”、“五抓”、“五问”。

“五怕”：怕听不懂，怕记不下，怕不会用，怕考不好，怕人笑话。“五关”：名词关，笔记关，计算关，试验关，理论关。“五抓”：抓大头，抓实际，抓对比，抓关系，抓应用。“五问”：问科学的科学性、目的性，问科学定律的来源，

问创造科学定律的人碰到什么困难又怎么克服困难的，问定律和实践的关系，问定律是否已经到顶。还有一个“四边”:边讲授，边讨论，边实验，边自学。还有“以土解洋，以洋解上”等方法。

抓住农民的学习特点和心态，抓住学习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学习方法总结得十分精彩。

他知道，上大学不是在烽火搞浮夸，搞浮夸，下面盯，上面不盯，不仅不盯，而且支持、鼓励，即使弄瞎了，也不会追究。上大学，完成党交给的学习的政治任务，大学生和老师的眼睛都面对面地盯着哩。到这里来，校方再照顾，一关一关都必须过。

王保京应该是农民中的顶尖人物，智商非凡，什么事都明白，什么事都难不倒他，再尴尬，都会找到解脱的途径。比如对“科学”的认识，1961 年 4 月学习结业后，他说:“科学，它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需要实实在在的态度对待它，才能学到实实在在的科学。如果不按它的规律办事，就会走弯路，还可能把事情办坏。1958 年我搞丰产时只知道水肥越上多越好，地越翻深越好，结果地翻得过深，麦子反而长得不好；肥多烧坏了根，反而造成了倒伏使产量没有达到原计划的要求。又如，没学习前，我只知道套种能增产主要是‘光’的问题，这就看得不全面。这次学了植物和植物生理以后，才知道除充分利用‘光’以外，肥、水也是增产的主要因素.

使我们不但在生产上能很快提高一步，更重要的是懂得了科学道理，掌握了规律。”

哪些话是他自己总结的？哪些话是秀才们根据形势需要帮助拔高的？

1964 年 2 月，他在“西北地区农业稳产高产经验座谈会”上发言说：“搞社会主义农业，必须有远大的理想，但绝对不能有不切合实际的空想。空想，今天办不到，明天办不到，永远办不到，理想，今天办不到，明天后天也可能办不到，但经过努力，总可以办到，要敢想敢说敢干，但绝对不能胡思乱想盲目乱干。在这方面我们也有不少教训的。前些年，我们在提高丰产试验田（产量）的时候，地翻得过深了些，庄稼种得过密了些，指标定得过高了些，规划搞得过大了些，科学研究项目也过多了些，好心好意办好事，但是，由于超过了一定限度和实际可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群众意见很多。”“学习了《实践论》，使我们越来越懂得了，总结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提高认识、改进工作、搞好科学试验的重要性。我们是好心好意为群众办事的，我们办的事情都是为群众谋利的，因而工作中的成绩总是主要的。”

这篇长篇发言在《陕西日报》发表时，中共中央西北局农村工作部加了“按语”：

陕西省礼泉县烽火公社烽火大队，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大搞科学实验，获得粮棉稳产高产的事迹，看了之后令

人高兴。烽火大队在生产战线上获得丰收的同时，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在科学实验战线上，也都打了胜仗。在社会主义三大革命运动中，那里锻炼出一批既懂政治又懂生产技术、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建设社会主义农业是一项崭新的、极其艰巨的事业。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

烽火大队的经验告诉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农业建设，首先要有敢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要有革命到底的决心和信心。烽火大队党支部认识到这一点。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把教育农民，当做最主要的问题来抓。他们特别重视毛泽东思想挂帅，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从而使生产不断提高、不断发展。烽大大队的经验还告诉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农业建设，必须进行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要征服自然，首先就得摸清自然的脾气，掌握自然的规律，然后才谈得上适应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烽火大队实行了领导干部、科学技术人员和群众三结合的办法，在农业科学技术部门和农业科学家的指导下，大学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大搞农业科学实验，这就使他们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夺得了主动权。曾经有人怀疑，农民能不能进行科学实验，烽火大队作了肯定的回答，只要有科学家的具体帮助，农民不但能进行，而且能作出成绩来。他们的经验证明，必须把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才能使农业生产不断得到发展。

烽火大队进行科学实验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应该走的道路。

社会主义农业，是前人从未干过的事业，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工作中也难免出现一些缺点和错误，关键的问题是要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来总结工作中的成绩与错误。烽火大队在总结经验时，坚决听党的话，以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精神，实事求是、全面分析，既能坚持真理、肯定成绩、爱护群众革命热情，又能改正错误、检讨缺点，把群众引向更正确的道路。这样，他们便进一步密切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烽火的经验是宝贵的，值得大家认真学习。

1958 年大跃进浮夸、1959 年反右倾、“二年自然灾害”严重破坏了农村经济，饿死人，人吃人，国民由于没吃没喝缺少营养，大面积浮肿病，都要有个交代，于是又拉出了烽火这杆旗。

1959－1961 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是不是“自然灾害”？国内一批著名气象水文科学家根据全国”120 个水文站历年的水文气象资料编制了一份《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清楚地记录下了 1895－1979 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态势。作家金辉先生又根据此表编制了《部分年度全国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结论是，1959－1961 年间，“中国大地

上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当正常”。也就是说，“三年自然灾害”得不到科学数据的支持。“实际情况是，在1959—1961年间，导致‘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少30％以上’的成灾面积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自然灾害，而是9000万人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使人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灾害。它显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它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造成了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1959—1961年到底因饥荒非正常死亡多少人，一直没有官方正式数字，至今仍是一个谜。一大批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此作了大量的考证和推算，没有定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一千万。”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儿和费正清编著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说：“据估计，这几年增加的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为1600至2700万。”丛进在《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曰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金辉在《“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中推算：全国在1959—1961年的两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060万，仅农村就可能达

3471 万。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在其文《“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的计算则是 2158 万人。外国学者还有五花八的统计结果。

人类历史上单位时间里死亡如此多的人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几次长期战乱和连年饥荒使总人口锐减上千万至数千万的记载，但其时间跨度是十几年几十年至一两个世纪。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五年，死亡 840 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七年，全世界总共有 4000～6oo0 万人死亡。八年抗战,中国人死亡2100万人,平均每年死亡也不过只有262.5万人。

没有战争，风调雨顺，却有千万人的饥馑饿殍，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空前悲剧。

“文化大革命”中，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的一位老战友问：你们四川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到底多少人？

张国华伸手做了一个“八”字手势。

“8 万？”

张国华摇摇头。

“80 万？”

张国华又摇摇头。

“？……”对方骇然了。

张国华低声道："800万!"

据安徽阜阳地委宣传部长介绍，原有800人口的阜阳地区在三年灾害中竟饿死200余万人。当年整顿时，安徽向国家主席刘少奇汇报阜阳地区饿死150万人；而"文化大革命"中揭发的数字是240万人。

一位作家在一篇报告文学中说，三年灾难中，仅河南信阳地区就"饿死近100万人"，酿成了所谓"信阳事件:。一位信阳籍的干部回忆说，当时人饿得走不动路，出不得屋，妇女出去挎一个筐，里面放一把镰刀，看见刚饿死在路边的人，便割肉拎回家。"那时，只要看见谁家的烟囱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与四川、河南、安徽等省比较，陕西总体上没有上述省那么严重，但也损失惨重。

20世纪，陕西发生过两次大饥荒，一次是民国18年至民国20年（1929—1931年），一次是"三年自然灾害"。前者是天灾，真正的"三年自然灾害"；后者是人祸，由"大跃进"导致的三年人祸。

历史记载，1929—1930年，关中一带，"三年六料无收，村舍为墟"，1929年，光是礼泉县就有129000人饿死，逃荒66000人。

陕西省博物馆有一方字字血声声泪的《荒岁歌》碑刻，记载了清光绪三年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大旱人吃人的情景:

“……饥饿甚，实在难，头重足轻，跌倒即为人所餐。别人餐，还有可，父子相餐甚不堪……人肉竟作牛肉卖，街市现有锅儿煎。家有亡人不敢哭，恐怕别人解机灵。尸未入殓人抢去，即埋五尺有人剜……”

“三年困难时期”，《陕西省农业合作简史》记载：“由于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大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捧风），因而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很大摧残，农村普遍出现了‘三少三瘦’（农村劳动力、耕地、牲畜减少，人瘦、地瘦、牲畜瘦）的严峻情况。全省劳动力比 1956 年减少 20.4％（78.7 万人）（注：劳动力减少，什么意思？死亡？逃荒？疾病？语焉暧昧）。大牲畜 1962 年比 1956 年减少 55.9 万头，其中能使役的牲畜还不到 60％，比 1956 年下降 16.5％。有的地方每头牲畜负担耕地达六七十亩，甚至一百多亩。不少地方出现了人拉犁、人拉车、人推磨的现象，1958 年粮食放‘卫星’，实际上当年秋收因大批劳力被抽去大炼钢铁而搞得十分粗糙，损失不小，丰产未能丰收。1959 年以后几年，全省粮食总产量逐年下降，到 1961 年下降到 75.6 亿斤，比 1958 年减产 27.5 亿斤。棉花总产量由 1957 年的 232.4 万担，到 1962 年下降到 90 万担，减少 1424 万担。油料总产量由 1957 年的 126.7 万担，到 1962 年下降到 38.9 万担，减少 87.8 万担。生猪由

1957 年的 274 万头，到 1961 年下降到 2133 万头，减少 60.7 万头。农业大幅度减产，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失调，造成市场供应全面紧张，物价不断上涨，使城乡人民的经济生活都处于十分困难的状态。当时，全省的棉布计划供应由每人每年 24 尺减少到 4 尺。城市居民的肉食供应，由过去一月 1 斤，减少到除节日供应外，平时根本不供。食油供应由每人每月 1 斤减至 2 两。农村的困难情况更加严重。当时全省农村人均曰粮由 430 斤左右下降到 230 斤左右。就连八百里秦川的‘白菜心’——高陵县，农村人均口粮也只有 260 多斤。农村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据 1960 年的不完全统计，全省有浮肿、干瘦病人 4 万多人。有的地方（如安康地区和山阳县）还发生有饿死人的严重情况。有的社员全家饿死，有的一家 8 口饿死 5 口，其情节之惨，令人目不忍睹。”

民国 18 年，“三年自然灾害”，陕西人，至今谈之色变。

秦惠王时，苏秦游说，说道：秦国“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史家考证说，最早的“天府之国”不是指川西平原，而是指八百里秦川等地。而今，实在看不出“天府之国”的气象。1958 年大跃进，1960 年上大学，1964 年烽火第三次被引上了政治轨道。发言两万多字，两个整版发表在《陕西日报》上。又是上面派来的写作班子

与王保京合作的结果。王保京的发言题目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大搞科学实验连年稳产高产”。他们又一次公开在陕西人面前撒了个弥天大谎。就在王保京在陕西人面前、西北人而前信誓旦旦宣称烽火“大搞科学实验”，培育出一系列棉花、玉米、小麦优良品种，一年两熟，改进耕作制度，粮食“连年稳产高产”的时候，正值春荒，烽火人“一半的人家没粮吃”！这一状况受到了省工作组的严厉批评。

台上掌声雷动，台下饥肠辘辘！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烽火是有名的高产穷队。烽火人悄悄流行着一个顺口溜:“驴粪蛋，外面光，不知里面多凄惶。”知情者愤怒了。他们向上反映情况，并导致了半年后的大规模调查。这次调查，是烽火出名以来第一次大规模调查。这次由省委农工部、省农业厅、县农业局、科学家、记者等18人组成的调查组，调查相当仔细慎重。比如，王保京1959年拿回一种玉米品种，第二年种下去，第三年他便对外宣传他培育成功了小麦、玉米杂交新品种，并在烽火农业科学研究室作为试验成功的标本陈列。这种玉米长得奇怪，秆比一般玉米秆细，叶子比一般玉米叶子窄，玉米植株上可以长三四个又细又短的小棒子，玉米颗粒两头尖，与小麦形状相似。王保京对王行兴等说:“是我用小麦与玉米杂交出来的新品种。”

中国农科院遗传研究所的专家来烽火考察农业科学研究成果，参观烽人农业科学研究室，王行兴陪同参观。专家

走到小麦、玉米杂交新品种标本面前停住了，他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后来才知道，这位专家是青种学家，小麦与玉米杂交成功，是农业科学技术里一件大大的事！天大的新闻！“你把玉米剥下来，给我看一下。”专家跟王行兴说。

王行兴把标本棒子扳下来，搓下玉米籽，用纸袋装好送到接待站。专家提出疑问：一、通常情况下，“芒种不见面”，小麦 10 月播种，第二年 5 月扬花，麦收以后播种玉米，即小麦杨花时，玉米还没播种呢，怎么授粉杂交？二、为了试验，科学家曾经找了许多玉米品种和晚熟的小麦品种，调整扬花期，作了大量的杂交试验，都没有成功，你仅仅一次，咋能说成功？这些道理似乎没有说服王保京，两条理由不算扎实。你科学家没有实验成功，就能说我不能试验成功？你们也说杨花期可以调整嘛！中国农科院陕西分院研究员张相麟与同院的玉米专家张彩霞参加了调查组。张相麟为了调整小麦和玉米的扬花期，搞了 50 个单项试验，都失败了。这种争论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专家鉴定说：这是“爆裂型玉米”，玉米品种里的一种，烽火属于引种，不是什么新品种。

烽火相当紧张，调查组的活动受到了监视。调查组晚上开会，分析情况，张相麟出去小便，回来时看见有人趴在门上偷听里面的谈话。他回忆说：“我们两人主要去了解烽火科学试验情况。烽大的做法，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1964年的形势还‘左’着呢。对烽火一些‘左’的说法，不敢很

大胆地批评，只能说‘不可能’，不能说‘吹牛’，害怕这样说打击积极性。王保京当时是知名人士，有权哩！他和省上能说上话，我们算什么！我们走后，他就到省上告状。我们了解到，王保京解放初期关押过。”

这次调查结果被随行记者捅出去后，省长批示，今后电台报纸不准宣传烽火。从此，烽火在陕西媒体上消失了整整七年。

这是烽火历史上第一次挫折。

03

五

王保京并没有真正地总结经验教训。1958 年的失败没有触及他的灵魂，骨子里，他并不承认失败，因为上面也不承认失败。

1962 年国民经济略有好转后，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一个“检讨”，没有在根本上解决“左”的问题。不到两年，开始“四清运动”，四年后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历史学家追溯“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劫难的起源，1958 年大跃进乌托邦试验板上钉钉。

我们今天来解剖烽火和王保京，也能清楚地看到这条历史脉络。王保京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极度放大，甚至不惜用说谎作假的办法，而且上面的说法是，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前进当中的问题。一年多的学习，几个专家教授就能转变

他心目中的“科学”概念？

他一方面说“科学，它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需要实实在在的态度对待它；只有用实实在在的态度对待它，才能学到实实在在的科学”，一方面又说：“我学（科学）规律，不是为了给（科学）规律做奴隶，而是想做（科学）规律的主人，叫（科学）规律给降住了，那不算真正学懂了（科学）规律。过去，人是随自然转，我学习就是要想法子叫自然随人转，把自然给整住，让它为社会主义多打些粮食出来。”他念念不忘把自己摆在党和社会主义的后面，念念不忘把自己的行动政治化，这样，他的动机永远不可怀疑，永远可以受到权力的保护，永远可以变被动为主动。他的“人随自然转”，本质上是人随人转。摆弄自然，摆弄科学，实际是摆弄人，以使自己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中始终处于主动状态。科学是为人服务的，我是人，当然也是为“我”服务的。“科学”就这样被政治庸俗化了，灾难也被文过饰非。

农民务实，相信眼睛，不相信耳朵；相信肚子，不相信宣传。一些稍有文化的农民，经过 1958 年和三年困难时期，渐渐开始觉醒。王行兴算一个。然而，他并不孤独。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作检讨四个月后，即 1962 年 5 月，陕西户县城关公社七一大队会计杨伟名、党支部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三名共产党员联名写了《当前形势怀感》（亦名《一叶知秋》），分别寄送给公社党委、户县县委、咸阳地委、陕

西省委、西北局和党中央，同时还寄给了省委宣传部、西安市委和《陕西日报》。

这封信像一块大石头，扔进了一派沉闷虚妄的政治生活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6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摘要刊登了《三个共产党员对当前形势和经济政策的一些意见》。7月28日，《宣教动态》又刊登了《对三个共产党员对当前形势和经济政策的一些意见作者的调查》。

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并在8月6日的北戴河会议上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针对户县城关公社三个党员的来信说，信中有一句话，“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回答了没有？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

一封怎样的信，竟引起毛泽东龙颜震怒？

《户县县志》收录了信的全文。信的“前言”部分开宗明义他说：“参加农村基层工作，已八年有余，俯首回顾，百感交集，尤其在当前困难形势下，其所见所闻，势如汹涌波涛，冲击心膛。每于激动之余，口述笔道，常至情不自禁。”“这篇‘怀感’，不是向上级领导‘报喜’，而是‘报忧’。但就目前形势而言，‘报忧’重于‘报喜’。因之‘怀感’所

及，似颇多‘苦口良药’与‘逆耳之言’。”“这篇‘怀感’属个人见解，或为‘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或为‘坐井观天’而流于管窥之谬。而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和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

“一叶知秋”，报的什么“忧”呢？信中说：“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之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连篇累牍的再进行分析了。”

农村经济濒于破产，“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这是何等的景象呀！而且是“一望而知的事实”！

作者对中国大势有异常清醒的判断：“我自己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有人曾经说过：我们

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当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步没有走好，第二步怎么会走好呢？”“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犯了客观规律。”

显然，对国情的认识头脑发热，政策出现了偏差，带来了灾难。社会发展形态显然是“过”了，“如某甲赴某村，距十里，行之十五里过五里，退三里，犹过二里，退十里，复又不及五里，终退五里始抵村境而止。想来我们目前严重困难产生的渊源是走‘过’五里路的问题，因之克服困难的根本办法，也就只是退五里的问题了。”

现行政策”退五里”的“度”在哪里呢？作者提出：“农业方面，按照集体、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的原则。这是养鸡取蛋，有别于杀鸡取蛋，这是釜底抽薪，有别于扬汤止沸，这是根本之道，有别于治标之法，这是我们要退的终点。”要像“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退到终点。

信的第六部分，明确提出了“恢复单干”，并认为“近来农村中不断有‘恢复单干’的传说，这种传说我们不能认为是‘别有用心’者的造谣，说它是日前农民群众单干思想倾向的反映，则是比较妥当的”。

作者评论说，腰带松了不行，过于紧了也不行，“过于紧了，倒会令人气喘”。“目前我们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形势，是否有气喘的象征？是否存在着浑身捆着腰带，动弹不得的

意味？果有之，只有解带松腰才能气和神安；只有腰间仅缠一带其余皆尽解，才能手动脚灵。”

作者还就开放一类物资自由市场、市场要遵循“价值法则”、中小型工商企业“用温和的‘节制’方法代替‘改造’的手段”、民主集中制等，提出了自己的政策主张。

其中，作者用“双程轨道”开车来形象他说明上下之间的“民主集中制”关系，尤为精彩。“双程轨道，车可对开，东来西往，互无妨碍。如双轨交叠，则相与冲突而互为路障，甚或撞击而两车俱伤。再者，车之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循环无息，设无东来之车，西来之车可尽，无西往之车，东来之车可竭。”“广大群众的意志是通过集中那条轨道集中上去的。集中上去的意志，经过加工整理，作出决议，又通过统一领导的那条轨道贯彻下来。这个一上一下，有如两套列车沿着各自轨道，相对而开，而互无妨碍。当群众意志与现行政策哪怕是当时正在特别强调执行的政策发生矛盾时，必须保证群众意志尽快的向上集中，从而让现行政策中，可能存在的偏差，及时得到纠正。同时现行政策未经上级指示，不能任意改变违犯统一领导的原则，不然现行政策压住群众意志，不能舒畅的向上集中，群众意志顶住现行政策，使之不能正确及时的向下贯彻，这就成为双轨重叠，两车对开，中途相遇不避，两撞俱伤了。如果群众意志，能够广泛及时而正确的集中上去，进而才能有及时的切合实际的政策贯彻

下来，那就形似对开之车，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回转不息。迸而言之，群众的意志如果停于下，则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泉源，就会竭于上，故曰：无西车之来，东来之车可尽，无东来之车，西去之车可竭。此为因果交应，互为渊源。”

作者还进一步论述道：“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就人民民主而言，我们的民主是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通过高度民意集中，体现出真正的民主，因之民主与集中，两者是互相关联表里为一的，不能当成两个对立的东西去看待它!”

以上论述，实际上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下情不能上达，置农民意志而不顾，制定政策严重脱离实际的现状。

这是 1962 年！这是中国农民经过灾难的肺腑之言！他们指出了中国问题的要害！陈述之坦率，暴露之大胆，意见之尖锐，问题之逼近，理论之深刻，语言之练达，比喻之生动，如果不加说明，简直不敢相信出自农民之手！其时，能与之比肩者几何!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国家主席刘少奇了解实情后才大着胆子说了三年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也只是说了一个事实或现象。原因是什么没说。1956 年，思想家顾准提出“价值规律”问题，就被认为是相当尖端的问题了。而户县的农民在六年后，系统地提出开放自由市场，随行就市，

尊重“价值法则”的问题了。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讶。

历史让人沮丧。

三个农民共产党员通过正当渠道向各级党组织反映自己对社会对政策的看法，这些看法不仅有真情实感，而且有理论深度，处处闪耀着思想的光辉；不仅提出问题，还积极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然而，他们肝胆相照的建议和主张，并没得到高层应有的重视和支持，反而被上纲上线，遭到严厉批判。

毛泽东批判了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后，陕西省委即向西北局和中央报告，说这封信“是一个明目张胆的、比较系统的要求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纲领”，三个党员的主张，“实质上是恢复资本主义道路。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并决定把三个党员的信作为反面教材，向全省农村党员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省委宣传部给省委的报告则说得更严厉，认为三个党员的建议和主张，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在党内比较完整、系统的反映”，“集中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的观点和主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恢复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

以泰山压顶之势，压制党内不同意见，压制农民的正当要求，敲山震虎，给党内民主生活带来了恶劣的影响。“一叶知秋”一时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杨伟名是《一叶知秋》的牵头人和执笔者。这位农民思

想家中农成份，时年 37 岁，读过三年私塾，1949 年 2 月入党，曾任副乡长。1962 年受批判后，被撤销大队会计职务。“文革”受迫害致死，1979 年“平反昭雪”。

贾生财，贫农成份，不识字，时年 49 岁，讨过饭，当过长工，1950 年入党，土改时任村委会主任，互助组时任组长，初级社时任主任，高级社和公社化后，一直任党支部书记。1962 年撤职。

赵振离，贫农成份，小学文化程度，1959 年入党，时年 27 岁。因及时检讨，于 1963 年接任党支部书记。“文革”期间，受写信牵连，被罢“官”。

户县在咸阳治内。咸阳既生长了王保京，也生长了杨伟名、贾生财、赵振离。他们都是“觉悟的农民”，觉悟的内涵却有天壤之别。他们虽然都是农村基层干部，都是党员，但是，他们的社会色彩却不相同。王保京是“典型”，是“劳模”，是“农民科学家”，是诸多社会荣誉的获得者，是既得利益者。杨伟名等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代表。这是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后，围绕着道路选择，中国农民的一次大分野。

咸阳人民为王保京而骄做，还是为杨伟名等骄傲？

04

六

一位作家在他的报告文学《劳动人民知识化的一曲凯歌》中记录了王保京与一个“地主家的阔少爷”出身的化学

老师的精彩对话。如果记录准确，或者基本准确，对了解王保京的性格和思想方法，很有参考价值。不忍埋没，亦不敢掠美，全文照录如下：一大，王保京和化学老师“在校园外的林子里漫步”

保京说道：“老师，我想提个问题。”

老师：“什么问题？”

保京：“你有没有决心把知识交给我们？”

老师：“我鼓那么大的劲，能说没有决心吗？”

保京：“那你知道我来学习是为了啥？”

老师：“你是劳模，党为了培养你，使你将来回去发挥更大的力量!”

保京：“这话只有一半正确。我也是一个普通农民。毛泽东时代的农民，一心想知识化，一心想掌握科学，就是想把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又快又好。我不是为自己个来学习的，五亿农民中比我聪明的人多得很，如果我上大学上成了，那证明千百万农民也能上大学！你也不是为了我一个人，而是为农民系统学习农业科学理论知识开辟道路呢!”

老师：“你说得很对呀!”他觉得保京把自己学习和老师教学问题，一下提高到了这样的高度，不由得不感动了。可是，他却不晓得，保京还想着怎么说服他，在教学上进行改革哩。

保京：“老师，你说几十年前，人都念四书五经，如今

为啥不念了？”

老师：“谁念那些之乎者也？没意思，又难学。”

保京：“那我们学的化学定理、定律，都是啥时候定下的？”

老师：“这都是经过许多科学家，在几十年前和几百年前，一个字一个字定下来的。”

保京：“那时著书的人是给谁著的？”

老师：“知识分子。”

保京：“几十年和几百年以前的人，没想到今天农民也知识化，也能上大学吧？”

老师：“那怎么会想到呢！”

保京：“我是个农民，我也要学化学，你能不能把那些定理和定律，用俗话编出来，叫我们也学得懂？”

老师：“不行呀，经过无数科学家综合出来的理论，一个字都不能改变，一变就要出毛病。科学有它的严密性、系统性，科学定义是世界性的，一动就是世界问题！”

保京：“世界性问题？咱们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能够改革自然科学，这不也是世界问题吗！难道用农民语言编教材，也会犯了世界性问题？”

老师：“科学，人总是要尊重的，你把它通俗化了，理论说的不完全，有遗漏，这就对科学不尊重了！”

保京：“怎么才算尊重呢？”

老师："你维护了科学名词、概念、定理和定律，没有歪曲这些东西那你就继承了人家的知识，就算尊重科学！"

保京："你说的也对。不过，西农教授到我们社里去，社员待他们像朋友一样，你说为啥？还不是他把科学知识教给了农民吗！我如果不来西农，连你老师也不认识，哪能谈的上尊重？你把科学知识教给了我，我不由得就尊敬你！你想想吧，是少数人掌握科学对科学尊重呢，还是千百万农民掌握科学对科学尊重？"

老师点着头，沉默了。他觉得保京把问题谈得很尖锐，很深刻。他开始考虑保京所说的话了。

保京："老师，毛主席著作有世界意义，讲的都是革命的大事业，为什么人都爱读，而且能读懂呢？毛主席把农业合作化中的保守派，比作小脚女人走路，合作社与小脚女人走路有什么关系？可是，你拿给老汉、老婆和小孩读，都能听懂。为什么自然科学理论就不能叫农民听懂呢？依我看，通俗一下，不走原则，精神对头，就可以试试嘛！"

老师心服了："对。我们试试吧！"可是他一想，这是件大事情，我不反对，别人也会反对，于是又动摇了："编通俗教材不容易呀！通俗化，那不过只为了帮助记忆而已嘛！"

保京："只为了帮助记忆而已？不。这是关系到农民知识化的大问题！你作为人民的化学教师为了响应党的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号召，应该尽啥力量呢？"

老师点着头，于是又下决心了。

保京：“你做得对，就不要怕斗争，依我看，你把毛主席著作装在身上，走到哪里都不会害怕！”

老师开始尝试着编写通俗教材了。

隔了不久，他俩在一起散步，保京又非常关怀他说：“老师，咱们熟了，不知这话当说不当说，我觉得你把红专的位置摆得不合适！”

老师诧异了。

保京：“我看当教师也要以红带专，你想过花十几年时间熬一个教授，为什么没想到花十几年时间争取做一个共产党员呢？如果没有红的条件，教授也当不好，方向不对头嘛。”

这位老师听了保京的话，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他觉得，站在他面前的这位农民，真不愧是一个英雄模范人物，思想真站得高呀！他发现自己在政治上比这位农民矮一截子，这位农民完全可以做他的先生。以往，他在红的问题上，缺乏雄心壮志，觉得熬十几年当一个教授或许可以，却没有勇气争取做一个共产党员。他为自己平时闹个人问题，同志关系搞不好，工作不专心感到惭愧了。保京：“老师，你是青年人，我也是青年人，青年人只有依靠党才有前途。你要相信党，党才能相信你，一切就看你对党交心不交心了！”

老师：“我一定下决心和组织谈谈……”

这位没有摆正红专位置的青年教师，这位地主阔少爷出身的青年教师，应该一辈子感谢王保京这番刀刀见血的教导。王保京不仅在与他讨论教学通俗化的问题，科学的认识问题，更重要的是与他讨论了教育为谁服务的问题，教育的方向问题。王保京直截了当他说，他这样的阶级背景和社会角色的青年人，要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只有依靠党才有前途”。在中国，谁能主宰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前途命运呢？只有党。这是个大实话。这是王保京早就悟出来的生活真谛。青年教师如梦初醒。他必须戴顶“红帽子”，才可能大展宏图。王保京这番话的深刻在于，讲的不是信仰问题，而是生存问题。

化学老师还记得，王保京等来校时，学院党委嘱咐过：“要用革命的方法，只准成功，不准失败。”

闻洪文教授和帐智敏老师为给王保京等上一堂课，常常准备好几天！

王保京有这个本事。他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理论问题通俗化。他本人就是通俗化大师。比如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腐朽、没落、垂死的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垂死，“无法挽救”，到底是什么模样？1975 年 1 月 16 日，咸阳地委副书记兼烽火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保京在社员大会上生动地比喻说：“好比一个人得了肝炎，又得了糖尿病。不吃糖，肝炎好不了，吃了糖，糖尿病更厉害，把

人体的养分一满刮走了!”

农村人铭心刻骨两种怕，一怕天灾人祸没收成，二怕生病，缺医少药，没钱治病。王保京的比喻，能一步到位地打进农民的心坎儿里。

比如，他讽刺教条僵化，讲了一个“老师吃红烧肉”故事：一个老师想吃红烧肉，但是不会做，就去请教大师傅。大师傅教他如何做如何做，他记不下，就让大师傅说慢点，他将烹制方法依次抄录，仔细揣在怀里。他去肉铺买了一块猪肉，拎着往回走，路上，突然窜出一只狗，从他手里叼走了肉。他望着一溜烟跑远了的狗，说道：“你叼走去！看你咋吃！方子揣在我身上哩!”

比如，他骂懒惰，连带着骂干部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讲了一个“老师丢牙刷”的故事：一个老师爱睡懒觉，上课钟都敲了，学生都进了教室，老师还在睡觉哩！农村里，早上刷牙稀罕哩。老师有个习惯，早起刷牙这道手续不走完，什么事也不能干。几个学生捉弄老师，把老师的牙刷偷走了。老师起床，发现不见了牙刷，大嚷：“谁偷了我的牙刷!”其中一个学生跑进来明知故问：“老师，咋了？”老师说：“我的牙刷不见了!”学生说：“老师，莫急，我给你找。”学生推开窗子，喊：“谁把老师的牙刷偷去了？——偷去刷你妈?去哩!”名是骂偷牙刷的学生，实是骂睡懒觉的老师。

比如，他说人不灵活，呆板，讲了个“老师教‘川’字”

的故事：一个老师学问不多便去教书，‘川’字忘了，便去查字典，“川”字查不着，结果找到个“三”字。老师大喜过望，说道：“怪不得寻不着你哩！原来你在这睡觉哩么!”

党支部一班人、社员群众、参观人员喜欢听王保京主持会议讲话，都是农民的语言，好记，好懂，一辈子忘不了，嘻嘻哈哈以后，受到深刻教育。王行兴望尘莫及。他在日记中概括王保京的讲话风格：“生动，有力。”

《人民日报》的报道说：烽火大队是一所“意识形态革命学校”。概括得极其准确。王保京和烽火村，对各个时期各次政治运动的方针政策和政治口号都有发展创造。王行兴日记和各个时期的报纸大多记录在案：

50 年代——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不怕地不产，单怕人没胆。

只有人想不到的，没有地产不下的。

不种百斤，难打百石。

地下建水库、肥库，才有地上粮库。

烽火人要给吃蚕挽笼头。

60 年代——

不准说不利烽火的话，

不准做不利烽火的事。

咬紧牙，勒紧腰，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

社）举得高。

要得富，地里开个杂货铺。

要得发，大种西瓜养骡马。

过去是人听地的话，地听天的话；

现在是人听毛主席的话，地听人的话，产量听人的话。

还有一个版本——

过去是地听天的话，人听地的话，庄稼听自然条件的话；

现在是人听党的话，地听人的话，庄稼听作务技术的话。

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人的司令部，一个是老天爷的司令部，老天爷的司令部不好办，人的瞎指挥好办。

70年代（学大寨、学小靳庄、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种庄稼—地平如镜

土碎如面

埂直如线

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

天天读（读“毛主席语录”）

天天管（管理地、富、反、坏“四类分子”）

天天批（批判资本主义）

天天跟（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天天用（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

天天贯（不学的要硬往脑子里灌输）

批着学，斗着学，不批不斗学不来。

批批批，斗斗斗，烽火才有大进步。

千矛盾，万矛盾，抓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总矛盾。

这重要，那重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新农民最重要。

专老天爷的政，

革老天爷的命，

战胜灾害夺丰收。

高产是学（小靳庄）出来的，

唱（歌）出来的，

跳（舞）出来的，

打（球）出来的。

只有抓好书、戏、球，高产才能夺得来。

两只眼—永远看着共产主义

两只耳—永远听党和毛主席的话

两只手—永远为人民服务

两只脚—坚定不移跟党走

一颗红心—永远向着党

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专政一切

统帅一切

批判一切

揭露一切

指导一切

检查一切

真革命，假革命，革命实践作鉴定。

政治教育要“三舍得”一舍得人力

舍得时间

舍得花钱

路线路线，一路之线，要得不偏，学习关键。

处处，时时，事事，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无不是贯彻革命路线的机会。

处理问题是割韭菜——治表

思想教育是拔萝卜——挖根

思想放在路线上，

学习放在批判上，

决心放在大变上，

行动落实在大干上。

早学理论早进步，迟学理论迟进步，不学理论犯错误。

大学理论大进步，小学理论小进久不学理论要退步。

不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意味着自杀，

不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意味着背叛，

不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意味着动摇无产阶级专政，

不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革命道路的机会主义。

不学习一有脚踏不上道

有眼看不清路

有嘴说错话

有心想斜事

有耳听错话

有手帮倒忙

有鼻子分不清香花毒草

四个不倒—困难再大难不倒

成绩再大喜不倒

表扬再多夸不倒

错误路线压不倒

幸福到了，要会享，不会享就是修正主义。

日子富了，要会过，不会过就是修正主义。

一切斗争都是人与人的斗争。

与天斗争是人与人的斗争，

与地斗争是人与人的斗争，

与自然的斗争是人与人的斗争。

三天不斗不一样，

三天一斗大变样。

只有全面专政，才有全面胜利。

有权不滥用，

有职不脱产，

有钱不变色，

有错不回避，

有功不归己。

还有一个版本——

有权不滥用，

当官不脱产，

有钱不乱花，

有错不回避，

有功不归已。

干部当得瞎和好，看给国家贡献多和少。

05

七

王行兴年龄小，上大学没有那么多政治包袱，也没有后顾之忧。正是困难时期，学院尽可能地保证他们的伙食，公社也不断派人送烙饼，送蒸馍。学习上，他们不上大课，专门有老师“吃小灶”。他们住的地方，是在西北农学院教授区，王保京单独一间屋，其他六人，两人一间屋。他们像是农村人家续香火、做人种的单根独苗，是大学里最受优待最受宠的一批学生。

他的内心是矛盾的。王保京仍然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岂止是英雄，不啻是神话中的人物。白灵官不就是泾河岸边一个普通的小村子吗？这里生活的人们，在祖宗留下的土地上刨食吃，安安分分，早出晚归，勉强糊口度日，既谈不上人杰，也谈不上地灵。径河水日夜流，流的都是白灵官人的哀怨和叹息。现在风光了。王保京拔地而起，由白灵官而烽火

村，还是这些人，还是这些地，还是这些塬，还是这些水，只改了一个名字，给了些说法，便注入了新鲜的活力。王保京想人之不敢想，做人之不敢做，胆大心细，运筹有方，成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农民科学家”，全省知名，全国知名，已经成就了大事业，看势头，还将继续成就大事业。他能够生长在烽火村，真是幸运。他受到王保京的器重和着意栽培，见了大世面。人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他不仅受之有恩，而且在王保京身上获得了激情和力量。他没想到，人的潜能竟是这样的巨大，思想竟能这样地飞翔。小时候想，县城是啥样的？长大了想，咸阳城西安城是啥样的？再往远想，北京城皇帝住的地方是啥样的？所有想象的东西，如今都扑面而来。还有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活生生摆在了面前。生活充满了意义。搞科学试验，移花接木，万物杂交，108 将大战“卫星田”，王保京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别人怎么想他不管，他领导的青年科学试验小组就是要不折不扣贯彻王保京思想。王保京说的就是“科学”。王保京说的就是“真理”。王保京是“农民科学家”，后来还在“农民科学家”前加了“著名”，权威的科学研究机构确认，党报大大方方地登着，科学家说话当然就是“科学”，“科学”等于“真理”，理解起来就这么简单。他比别人的理解还更进一层。王保京掌握着烽火的命运，掌握着他的命运。他把他的一切托付给了王保京。没有王保京，就没有烽火；没有王保

京，就没有他王行兴的今天。他抚摸着刚刚别在黑棉袄上的“西北农学院”校徽，恍如梦中。他清楚，这个校徽，不是他靠本事挣来

的。没有王保京的光环照耀，这枚校徽，别不到他的身上来。这枚校徽，与其说是对他的价值的承认，不如说是当今社会对王保京和烽火价值的承认，他不过沾光罢了。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想都不要想。是不是有点儿不公平？他现在来不及想公不公平的事情，世界本来就不公平，工人和农民公平？农村人和城里人公平？如果公平，他就不会因家庭贫困中途退学，回乡劳动了！如果公平，他现在可能就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坐在宽敞明亮的大教室里了！东方不亮西方亮，王保京这位命运之神拿箭射中了他。王保京跟他说："行兴，党相信你哩！你要好好学习，报答党的恩情！为咱烽火争气!”党离他很远，王保京离他很近，王保京是党支部书记，王保京就是党，党就是王保京。论辈分，王行兴该叫王保京爷。王行兴说：“保京爷，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希望。”还有一件事他没想清楚。王保京跟他说过：“毛主席说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农民是科学试验的主人么！咱不搞科学试验，玉米能产一千多斤？大学教授能到咱村来学习？”既然是成就显赫的科学家了，既然是“最聪明”者，为什么还要拜“最愚蠢”者为老师？“科学试验的主人”为什么还要屈尊进大学学习那些娃们学的基本常

识？进了大学，“科学”却是另外一番模样。这让他很苦恼。他不由自主地拿农民科学家“保京爷”与西农的科学家进行比较，发现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别。

赵洪璋教授来给他们上课了。

“赵教授，认得我不？”王行兴拉着赵洪璋的手问道。

“咋不认得，行兴么！你也来学习了!”赵教授多次去烽火考察小麦“丰产”，当然认得这个烽火科学试验小组组长。

赵洪璋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小麦育种学家，被称为“创建小麦育种里程碑的大师”。他一生抱定“改良品种，兴农富粮，强民救国”的宏愿，从事农作物育种学教学和小麦杂交青种工作五十余年，50年代至90年代，先后选育出碧蚂1号、丰产3号、矮丰3号、西农881为代表的四批突破性优良小麦品种，推广面积、增产效益和性状特点均居全国同期前列。赵洪璋小麦育种经验，给王行兴以巨大冲击和震惊。1942年，赵洪璋利用关中平原当地品种妈蚱麦和泾阳60与美国品种碧玉麦、意大利品种中农28进行杂交，勤勉不辍，倾注六年心血，培育成功碧妈1-6号、西农6028小麦优良品系，50年代大规模推广，其中碧蚂1号、4号，西农6028个品种，一般增产15～30%，1959年三个品种达到年最大种植面积约1.1亿亩，碧蚂1号达9000余万亩，创我国一个品种种植面积的最高纪录。毛泽东称赞他：你救了新中国

的命！一个优良小麦品种的培育成功到最大面积推广，用了整整17年的时间！17年，多么漫长的时间呵！

西北农学院教授、著名小麦育种学家李振声在武功县夏家沟一蹲六年，才培育出小麦优良品种小偃1号。

作物育种学，是一个严密而综合的学科。赵洪璋归纳该学科的特点：生物进化论是其基本理论，涉及遗传学、生态学两大基础学科。赵洪埠用学术语言给定了作物优良品种的标志："作物优良品种是一定生态条件下的优良群体生态类型，具有一整套与生态条件相适应的优良特征特性，能够利用有利的生态因素而增产，克服或减小不利因素的影响而稳产。"育种工作，"既要从经济学和生物学的综合适应性上评价和认识品种，研究品种的丰产性，同时要把品种的适应性落实到性状一个体一群体一农田生态系统等多个层次之中，以适应性为链条将育种目标、亲本选配、杂种后代选择、生产利用等各个环节统一起来"。

这说明，作物育种，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涉及诸多学科的复杂过程。吃饭问题，永远是困扰人类的一个大问题。培育优良品种是吃饭问题的核心。70年代肇始，人类开始探索实验室同步辐射育种和太空青种，以期获得更多的食物。

对照王保京的杂交青种"科学"试验，就像是小孩撒尿和泥闹着玩儿一样了。两三年培育出七八种小麦、棉花、玉

米优良品种，一年实施112种小麦品种试验，又说一年试验小麦品种427种，八字没一撇，便宣布成功，便给予命名，便介绍经验，便登报表扬，便上西安上北京立功受奖。雷声大，雨点小，几十年没有培育并推广出一种农作物优良品种，倒培育出“烽火”这个适应各种政治气候的“政治品种”。这个“政治品种”倒是生命力强健，从50年代到90年代，横扫40年五个年代，丝毫没有退化变异。

这把人搞糊涂了。谁是真正的科学家？

1958年，赵洪埠在小麦高产放卫星、小麦亩产数千斤数万斤数十万斤上百万斤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作了一亩地的小麦高肥试验。一年过去了，他忐忑不安地拿出了亩产846斤的试验报告。846斤！这也算高产？哈哈哈！好意思拿出来亮相！小麦育种学家？简直是开大家的玩笑！开大跃进时代的玩笑！简直就是大跃进最不和谐的音符！简直就是给农民科学家们泼冷水！简直就是给轰轰烈烈的科学种田创高产运动泼冷水！

我们能够想象当时的尴尬局面。不知道这是赵洪璋的尴尬，还是时代的尴尬。

赵洪璋教授1994年去世。他生前把毛泽东的一句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然而，正是毛泽东——这位农民的儿子头脑发热，极力反右倾，鼓励了浮夸风，鼓励了说假话，甚至不惜发动一场政治运动，把彭德怀等说了几句真话实话的人打成反党集团，并株连各级党政官员。

这无论如何是一个玩笑：号称亩产小麦能达到 15 万斤、30 万斤、240 万斤、实际亩产 1000 多斤的“科学家”，不得不屈尊接受亩产只有 846 斤的科学家的教育。

王保京上大学，成为小麦育种大师赵洪璋教授的弟子，事情滑稽，却是事实，如同 1959 年省委书记到烽火，从另外一个角度为 1958 年划了一个句号。

围绕着烽火村，政治家和科学家分别给 1958 年划了句号。一件事情，一场运动，有两个句号。谁的句号真实？谁的句号管用？谁的句号是真正的句号？

再看看赵洪璋是怎么选育小麦品种的。种、管、收、查、记，他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春夏秋冬，周而复始，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节假日，从事着大量的烦琐的枯燥无味的田间劳作。他有一个习惯，出差前最后一件事是看一遍试验，回来后第一件事便是到小麦试验地。他夫人打趣说：“你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小麦。”他说：“就这一个小麦也没搞好。”

科学研究没有止境，王行兴心想：“保京爷可没这劲头。没咋样，就见记者，拍照片，登报纸，满世界作报告介绍科

学经验哩。”

完全是两种人么！可能科学家与科学家不同吧？我们这个社会，需要赵洪璋，也需要王保京？

王行兴的眼睛又盯住了西农的另一个教授。著名昆虫学家周尧教授。这是个右派教授。1957 年打成右派后，下放礼泉阡东公社劳动改造。王行兴认识他。农民不管那么多，只认他是个有本事的右派教授，老汉不多言语，每天戴顶旧草帽，背个水壶，田间地垄，拿个网网逮虫哩。庄稼只要有虫，就请老汉去看。老汉一看，随便出几招，保证让你花钱少，还能防虫治虫。针对农民重治不重防，老汉常讲，要重视防虫，就像先打碎鸡蛋，鸡就孵不出来了。你任意逮个虫子给老汉看，老汉便能脱口而出，说出这虫属于哪个纲，哪个目，哪个科，哪个种，有几个气孔，有几个眼睛，几月份产卵，几月份孵化，越冬藏在哪里，危害什么庄稼。谈起昆虫来，满眼生辉！

王行兴在校园里发现了踽踽独行的周尧教授，问道：“他为什么打成右派？”回答者不屑他说：“他研究昆虫，还研究男人身上的虱子和女人身上的虱于是不是一样哩。”意思是他的研究走火入魔，误入歧途。

王行兴不知道这是不是他打成右派的原因，但是他认定老汉的学问，对种庄稼有用。这让他想起几年前烽火治蛐蛐的故事。

讲治蛐蛐的故事，首先要讲烽火选育出“1506”优良玉米品种的故事。

“1506”，按王保京的说法，是无性杂交的结果。而“无性杂交”的方法，是他在省上开会时，一个搞小麦无性杂交育种的专家教给他的，他回来后用在了玉米身上。只听了这么一耳朵，为了赶播种季节，他回村的当天晚上，就与另外俩人一起研究出了几种无性杂交方法。

关于王保京和烽火的“无性杂交”，据报纸记载，早些时候王保京就掌握并试验成功了。这个故事从何说起呢？

下面要由王保京说故事了：“我兴奋得连觉都睡不着。天刚亮，我就把那些小伙子和姑娘们喊来，把操作方法，注意事项，向他们洋详细细他讲了一遍。当天就进行了各种杂交，紧跟着就下种了。自下种起，我们每天差不多往地里跑三四趟，去看看玉米出土的情况。五六天过后，一、二、三、四、五号玉米都陆陆续续地钻出了地面，只有那 34 颗六号玉米还睡在地里，没有一点动静，我急得没法子。一天傍晚，我和正海几个人，用小棍棍把六号玉米上的土盖盖齐齐一拨，发现大部分都发了霉，只有四窝玉米，顶着被压的弯弯曲曲的黄芽芽，我高兴得跳了三尺高。正海边说边笑，忙着给玉米浇水。建元老头子把手往空中一挥，说：‘快，快给咱这个品种起个名字吧!’众人都偏着脑袋在想，我想了好半天，说有了，咱六种玉米都是在 1500 斤的基础上搞起来

的，我们就把一号叫 1501，二号叫 1502……这是第六号，就叫它 1506 好不好？大家异口同声他说好。”三年后，“1958 年，西北农学院的老师来给我们的 1506 号玉米作了一个鉴定，认为它是一个值得继续培育的品种”。

这时候，王保京已对玉米没有兴趣了，全部精力投给了小麦，因为小麦高产成了时髦的象征，玉米被挤出了卫星丰产试验舞台，烽火的“玉米时代”结束，开始了“小麦时代”。“1506”成了烽火优良玉米品种的说法，生根，开花，结果。

“1506”的培育，是 1955 年的事儿，玉米专家苏献忠在烽火，为什么不请教他？

“1506”生长过程中遇到了一年前 1500 斤高产玉米试验田同样的问题——蛐蛐的骚扰。蛐蛐蹦蹦跳跳和王保京捉迷藏，恶作剧似的狂吃玉米叶。大田的玉米叶，蛐蛐不咋吃，专拣高产试验田和育种试验田的玉米叶吃。蛐蛐的嘴刁着哩！大田玉米，小娘养的娃，肥少水缺，粗耕粗作，懒心无肠地管，叶子枯燥无味。丰产试验田和育种试验田是大娘养的娃，肥多水足，金蛋蛋一样，含在嘴里怕化了，握在手里怕飞喽，叶子自然长得鲜嫩肥美。试验田倍加呵护，大田孤独冷落；试验田欣欣向荣，大田形容调敝，这既是烽火科学试验的目标和结果，也是烽火成功出名的诀窍。

昆虫物种中，蛐蛐属于骁勇善战一类，王保京亦是骁勇善战，棋逢对手，在试验田展开了一场大决战。

正史记载，王保京大获全胜。1954 年大获全胜的办法是，六六六粉和麦麸香油，一亩地，用了多少六六六粉，用了多少麦麸，用了多少香油，没说。1955 年“1506”的决战悲壮得多，四株“1506”，被蛐蛐吃得只剩下了一株。“可把人急扎了。我们马上用农药洒，用手逮，用石块砸，才把害人的蛐蛐治得个个见了阎王。”蛐蛐几乎坏了王保京的大事，所以抓住要处以极刑，用石块砸烂，砸成肉酱！

周尧教授和王保京要互相学习哩。

1958 年 6 月，王保京宣布他领导培育出了玉米新品种“1504 号”红心白马牙、“1506 号”白心白马牙、早熟金皇后，棉花新品种烽选 1 号、烽选 3 号，小麦新品种烽选 1 号、烽选 3 号。1963 年 8 月，王保京宣布，烽火培育出了 11 个粮棉新品种。1971 年，烽火又培育出了小麦新品种争光 1 号、争光 2 号、争光 7 号。但地区农科所却因其“产量及特性均属一般”，不予推广。所有“新品种”既没有鉴定，也没有推广，连烽火人自己都不种。自己认定，自己不种，自己都不信，怎么叫别人信呢？算什么“新品种”呢？

“保京爷，”王行兴把王保京拉过一旁悄悄说，“咱农民搞科研，和人家比，是戴着牛铃铛推磨子——图隔壁好听哩。”

“别胡说！”王保京瞪了他一眼。

八

1960 年上大学，王行兴开始记日记了，一直坚持记到80 年代。

王行兴用日记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内心世界。这个世界将他与喧嚣的外部世界剥离开。在这个世界里，他可以安全地面对自己，完全自己，把他塑造成了另外一个“王行兴”。我们面前有两个王行兴——白天的王行兴和晚上的王行兴，外表的王行兴和内在的王行兴。——与 28 年后的武芳一样，昼伏夜行。

四十多年时间里，王保京身边有两个“王行兴”伴随着他。

王行兴感到烽火脚底下这块土地不踏实。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西北农学院学习，他与王保京有同样的收获，不过王保京的收获是写在报纸上的收获，而他的收获是内心的收获。他明白了什么是科学。科学研究，首先要有科学的态度，首先要有说实话办实事的态度。

烽火浮夸，赵洪璋心里一本账。然而，他没有批评“农民科学家”王保京，没有批评烽火。这个小伙子爱搞科学试验，科学试验有成功，有失败。他认为，烽火浮夸，是政治压力和错误观念的结果。他脱离教材，用最朴素的语言对这些农民大学生进行告诫。他讲水肥条件与小麦增产的关系：小麦由低产到中产，水肥条件好，产量可能成倍增长；小麦

由中产到高产，增产幅度就极其有限了。这和人一样，吃得多，要消化得了么。吃多了，消化不了，也会生病。人病了，可以说话，找医生看；庄稼生病了，不会说话，靠人观察。高产，光有水肥条件是不够的，不用说过量的水肥条件了。他讲密植与小麦高产的关系：小麦高产，适当增加播种量，可以发挥群体优势，达到高产目的；反过来讲，由高产更高产，播种量与更高产就不成正比了。小麦高产与播种量的关系；好比扔石头，形成一个抛物线，横坐标是产量，纵坐标是播种量，产量达到极限时，播种量反而要下降。

王行兴暗想，赵洪璋从科学的角度对症下药，抓住 1958 年小麦产量浮夸最基本的说法——“肥大水大创高产，高度密植创高产”，进行清算。烽火的问题，不仅指标浮夸，而且弄虚作假。仅仅指标浮夸，还可以说缺乏常识说大话闹笑话，一笑了之，里面的区别，顶多是一个大笑话和小笑话的区别，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弄虚作假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现实生活中，指标浮夸与弄虚作假往往是孪生兄弟，互为因果。大话吹出去了，像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于是只能靠蒙骗，只能靠弄虚作假，才能捞回面子，哪怕是短暂地捞回面子。

清算到这一步还不够。说大话，说假话，倒不可怕，大话假话再高明都容易识破，可怕的是有权有势的人喜欢听大话，听假话，造成了一个说大话、说假话的政治环境。在这

个环境里，正如许志路所言，讲实话、讲真话的人活不下去。不讲大话，不讲假话，甚至危及生存！结果，逼着老实人去说大话，说假话。大话戳穿了，假话戳穿了，大话假话导致了尸横遍野的后果，这些人不仅不向天下人谢罪，像封建帝王那样下“罪己诏”，反而振振有辞他说，这是前进当中的问题，工作中难免出现的问题，方向是对的，动机是好的，好心办了坏事，成绩是主要的。为下面捞面子，实际上是为自己捞面子。原因很简单，说大话，说假恬，是他们鼓励的，他们需要大话假话！他们也说大话，说假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以致社会虚浮之风瘟疫一样地蔓延！以致十年浩劫！社会道德败坏，盖源于此。

王保京看到了体制的弱点，并利用了体制的弱点。

王行兴本人参与了“并亩丰产”的骗局。

说到这段历史，王行兴满面惭愧。1958 年玉米快黄的时节，王保京把他叫去，嘱咐：“明天记者要来拍照，你们去把丰产试验田空秆和虫咬的秆拾掇一下，再补些苗。”

王行兴等明白王保京的意思。下午，他和王天顺、王万英、王殿胜、马玉秀先到“丰产田”里挖窝窝。

天一擦黑，月亮露头，满庄稼地银光水色，几条汉子带着手电马灯出动，神不知，鬼不觉，钻进大田里，专选那秆粗株壮、长着个大棒子的，往丰产试验田里移栽，栽完后，放水一灌，新老面目融为一体，分不清彼此你我，都像一块

田里长的亲兄弟，弄毕，各回各家睡觉。第二天，移进了一两百株大田玉米的丰产田，更加厚实，更加神气，谁见谁爱，谁见谁夸。“这玉米务得就是好哩!”“唉，咱咋就不行？”“人家科学哩!”也有不信的。信不信由你。不由你不信，庄稼都在地里长着哩！眼睛看么！王保京的口头禅是：“不信就看，不懂就教。”然后就是杂交技术，合理密植，水肥条件，通风透光，田间管理，海阔天空一番。大家听得呆了，王行兴一旁暗自好笑。领导好哄哩！记者好骗哩！谁天天守着你烽火种庄稼？就是天天守着烽火也不行。24 小时不睡觉？老虎也有打盹儿的时候。1959 年，省上办农业展览，王保京吩咐王行兴等去玉米地里挑大棒子长势好的送。王行兴带着五六个人，在 800 亩玉米地里寻了三天，寻了十株，连根拔出来，坐车送到西安省农业展览馆，用大盆栽起来，秸秆粗壮，叶子肥美，部长着两个大棒子，气气派派，摆在展览馆显眼的地方，说是“王保京玉米丰产田”的玉米。

名堂多着呢。为了让丰产试验田不断放光彩，估产里面有诀窍。估算棉花，有三种算法：一是不算棉花实占面积，然后把套种的作物换算成钱，按实价折钱买棉花，混在一起算棉花亩产量。二是以伏前桃和伏桃为标准推算。棉桃分伏前桃、伏桃、秋桃三种。农谚云：“伏桃缠腰，秋桃盖顶。”说的是棉花伏桃秋桃都要长。一般一株棉花只能长两个伏前桃，三个伏桃。伏前桃、伏桃棉绒长，100 个棉桃能轧一斤

籽棉；秋桃长得多棉绒短，至少 150 个轧一斤籽棉。一般一亩棉花 4000 株，一株棉花六至七层，一层结三个桃。也就是说伏前桃和伏桃少，秋桃占绝大多数。三是全苗计算。

农谚云:“没有不掉的桃。”不算实占面积，加一码；用套种农作物折棉花，加一码；以伏前桃和伏桃为标准，加一码：全菌计算，加一码；层层加码。一亩棉花 4000 株，一株棉花六七层，一层能结三个桃，100 个棉桃轧一斤籽棉，一斤籽棉轧三两皮棉，4000×7×3=84000 个桃，84000 个桃轧 840 斤籽棉，840 斤籽棉轧 280 斤皮棉。乌拉！……亩产 280 斤！估算玉米，有三种算法：一是科学密植，行距二尺，株距一尺五，每亩种植 2000 株。农谚云:“左一跷，右一跷，一亩地，千二苗。”二是每株长双棒的标准。三是折水分，“一斤玉米晒七两”。其实一斤玉米顶多只能晒五两。密植，加一码；双棒，加一码；折水分，加一码；层层加码。2000×2×0.7=2800 斤。乌拉！……亩产 2800 斤！

估算小麦，一斤小麦种 12000 粒小麦，一般一粒麦种分九个蘖。烽火的小麦都不一般。烽火小麦的蘖可以没完没了地分，最多可以达到 100 多个蘖，号称“小麦王”。麦穗一般长有六七籼（注：籼，麦穗对称的阶层），长势，有大籼小籼之分，当然是往大里算，加上“合理密植”，产量当然就是几何级数增长了。

老天爷特别喜欢烽火，棉花，玉米，小麦，当然都是金

枝玉叶，没有机械损伤，没有病虫害，没有风灾雨灾雹灾旱灾。还要特别介绍烽火大田农作物亩产的估算法——“边际效应估算法”。田边地角的农作物通风透光好，水肥吸收好，玉米秆粗棒大棒多，小麦分蘖多，穗长穗大，颗粒饱满，依此为标准，由外往里推算，产量自然就上去了。这种方法，也叫“典型估算法”。由典型推一般，由典型代表一般，由典型统领一般，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一般齐，一块地里岂止生双胞胎，还生十胞胎，数十胞胎，数百胞胎，数千胞胎。

典型的价值，典型的意义，不亦大哉！

懂农村诀窍的人一定会问，农民一般部怕大田平均亩产估得过高，估高了，国家的公购粮任务就会加重，影响农民的口粮。农村基层干部一般都采取瞒产私分的办法来对付国家过高征粮的政策，为什么烽火反其道而行之？烽火 50 年代的做法是，用丰产试验田的浮夸骗荣誉，用大田低产吃粮食。60 年代、70 年代靠丰产田骗荣誉已经过时，没有大田的增产，谁也不信，“边际效应估算法”应运而生。但是，仍然有国家公购粮问题。既要讨好上面，又不能得罪下面，影响烽火这个政治基础，有无两全其美的办法？

九

1964 年的清算，让王行兴吃惊不小。他在日记中写到: “我的内心十分苦闷。”媒体得到指令，不准宣传烽火。他正欲大展鸿图，却进入了漫长的苦闷期。他进入了苦闷期，

王保京和烽火进入了寂寞期。一连七年，王保京和烽火声消迹匿。“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不时兴玩儿生产数字游戏了，时兴玩儿革命激情游戏。游戏规则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更严重的是，王保京与上层权力之间的关系被切断了，甚至还受到了牵连。西北局和老陕西省委的领导一夜之间变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媒体里长期培育的老关系也下台挨整，成了不口村里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一类的牛鬼蛇神，成了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过去的政治关系，不为其福，反为其祸。

政治风云变幻，始料不及。“一打三反”和“斗、批、改”，大队成立革命委员会，王保京只被结合为委员，几乎被排挤在大队权力机构之外。“文革”早期，他曾企图东山再起，动议串联全国 50 年代与他同一级别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河北的吕玉兰和稍后、但是名气更大的陈永贵等，成立全国性的农民造反组织，未果。他像一个过了时的电影明星，被人们遗忘了，被时代抛弃了，他不能忍受没有掌声、没有鲜花、没有媒体跟踪、没有权力关怀的寂寞。

王行兴了解，王保京的成长过程，是与权力不口媒体相伴成长的过程。他与权力和媒体早就结成了互为因果互为利用的生物链。

王保京喜欢两种人，一种是当权者，一种是文人。文人包括记者、作家、诗人、各级党政机关舞文弄墨专写材料的

秀才。前者是“权把子”，后者是“笔杆子”。

首先是记者。记者和他们所代表的媒体，是体制的一个部分，是党的声音，党的喉舌，党的代表。做出成绩，没有记者，党不知道，社会不知道。而且，做出成绩，既是他不口烽火的成绩，也是党的成绩，记者的成绩，党报党刊党台的成绩，社会主义的成绩。下面做不出成绩，党着急，记者着急，党报党刊党台着急。大家都在一个锅里舀饭吃，苦衷快乐都一样。1958 年，1959 年，记者干脆住在烽火等“新闻”。烽火就是“新闻”的制造地，发源地。王保京也乐得把“新闻”源源不断地发布给记者。

王保京是农村基层干部中，是他那个时期的所有农业劳动模范中，最早懂得媒体的作用，最早懂得“制造舆论”，最早懂得运用媒体宣传达到设计目标的人。用现在的话说，他是最早懂得媒体包装的农民。从这个角度看，王保京是个觉醒的农民，最有现代感的农民。各种媒体的记者，只要支持烽火，只要吹喇叭，抬轿子，只要说好话，都是朋友，几十年不断线，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困难时期，城里人没粮油吃，就给记者送粮送油；瓜果下来了，就给记者送瓜送果。现在不觉得怎么样，当时可不得了。你来我往，互赠有无。

从 50 年代初开始，到 90 年代，王保京和烽火几乎每个时代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检索王保京和烽火的见报档案，

令人吃惊的是，初小文化程度的王保京个人署名、连篇累牍大块大块地发表文章，理论文章，经验报告，工作总结，形势跟得之紧，理论水平之高，针对性之强，中心之突出，逻辑之严密，观察之敏锐，文字之漂亮，语言之活泼，叹为观止。

王保京在媒体上的角色是多重的：农业劳动模范，农民科学家。省党报特约评论员，诗人，理论家，村党支部书记，县委书记，地委副书记，副市长，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需要什么角色就用什么角色。1958 年大跃进放卫星，1959 年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粉饰太平，“文革”学大寨，批林批孔，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小靳庄，评《水浒》批投降派（注：“四人帮”发动的批周恩来的政治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引经据典，各种脸谱都有。发言的内容，触及社会政治生活各个敏感部位。“文革”后期的文章，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语录，使用政治家语言，气势早已脱离了农民的范畴。王保京写不出这些署名文章。根据政治需要，或者根据王保京和烽火的需要，各个时期都有强大的写作班子为王保京和烽火服务，捉刀代笔，让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扮演不同的政治角色。政治需要他，他也需要政治。政治利用他，他也利用政治。陕西其他的农业劳动模范，不具备王保京能说会道的本事。报社喜欢王保京这样的人，他有足够的发言分量，

有足够的代表性，有足够的“新闻”背景，而且乐意与媒体和政治合作。他可以根据政治需要，根据报社和记者的需要，要说法给说法，要例子给例子，说点大话假话也无所谓，记者不会去核实，或者正中下怀。

烽火这块土地，不仅能种庄稼，而且能种政治，一亩三分地，炒作起来，得心应手。有的时候，是记者找他；有的时候，是他找记者。来来往往，车水马龙。

1958 年之后，“文革”中后期，由于政治的需要和记者的鼓吹，王保京和烽火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一天省委书记来到烽火，听取了情况介绍后兴奋他说：“很好嘛！咱们陕西也有学大寨的典型嘛！我们可以远学大寨，近学烽火嘛！”而且把学不学烽火提高到了“真学大寨还是假学大寨”的高度来认识。

已是地委副书记的王保京在礼泉县委常委扩大会上讲：“大寨是谁的大寨？烽火是谁的烽火？大寨是党的大寨，中国的大寨！烽火不是烽火人的烽火，而是党的烽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烽火！也是礼泉县的烽火！1955 年，杭州会议时，伟大领袖毛主席向烽火社全体社员问好哩！以前，我们不好意思提，以为是我们自己的事情。现在要理直气壮地提！”（注：中共中央政治局杭州会议，毛泽东是否专门托人带话问候烽火社全体社员，不可考。）

礼泉县委作出了“学大寨，赶烽火”的决定，并呈报省

委，省委作了肯定的批复。18 年前，1958 年 1 月，陕西省专员县长会议上，大鸣大放大字报，向阻碍生产大跃进的“右倾保守思想”开炮，礼泉县长就“培养、推广更多的典型经验”贴大字报“自我检讨”：“王保京是礼泉县多年的生产旗帜，外地都很重视他的经验，学习后出现了很多模范，有的已经赶上或超过了王保京的产量，可是礼泉县还没有出现第二个王保京。这主要是我们领导上存在严重的右倾保守思想，一般化领导，墨守陈规，没有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广。为了掀起生产大跃进，我们计划每个负责同志，必须亲自培养一个王保京，在 1958 年来个大跃进，将现在的一个王保京变成十个二十个一百个”王保京！我的爷！“克隆”王保京!“克隆”王保京大跃进，礼泉一下子涌现出 100 个王保京，那是何等壮观的景象！礼泉就“天翻地覆慨而慷”了，就“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了！

70 年代“克隆”烽火，背景何其相似乃尔——墙内开花墙外香。礼泉人对王保京知根知底，烽火附近的兴隆大队、高家大队就不学。兴隆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尧开曾说：烽火弄虚作假，国家投资，“是看得学不得”。

县委常委扩大会传达省委批示，问题提得很尖锐：“学大寨，赶烽火。县委怎么样？要使别人坚信，首先要使自己坚信。如果自己认识有问题，怎么说服别人？当年昔阳和大寨附近的大队不学大寨，经验教训难道还不吸取吗？”

刚刚上任的县委副书记郭建义（注：1991年，他在咸阳市人大副主任任上，坚决排除干扰，主持处理了武芳毁容案）听说烽火亩产皮棉180斤的产量不实，骑了辆自行车到烽火微服私访，他和负责接待的烽火党支部副书记说："纠缠这干什么？打不到180斤，打120斤也是先进嘛！"

这话传到了王保京耳朵里，便说郭建义"反烽火"。

当时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郭福生是"学大寨，赶烽火"的首倡者。他说，烽火所报粮食产量享有特权，一是不交粮不入库，先报产量，先收一半的粮钱；二是不往国库交粮，公粮存在烽火，说是代储国库粮、三是永远最后报产量，等其他大队报完后再报，谁最高压住谁，确保烽火第一。产量不实，"国库粮"储藏数不实，上半年的公粮，往往下半年才补齐。王保京还在玩儿数字游戏，只不过变换了形式。王保京和烽火村干部还在水利局、电力局、物资局、教育局等等部门要钱要物，有的时候，王保京亲自要，有的时候，烽火队干部直接打着王保京的旗号要，要就得给，不给不行！郭福生在县委常委会上恳切陈词："我们要爱护自己的红旗，不能自己往自己脸上抹黑！"

郭福生因此被诬为"是在拔烽火红旗"！

县三级干部会上，县委书记找郭个别谈话："老郭呵，你对烽火的态度不对呀。你要主动地作一点自我批评。"

真是天大的冤枉！"我是爱护烽火！我问心无愧！"郭福

生说。

谁要是不支持烽火，烽火要钱要物不给，谁要是批评烽火的缺点毛病，谁就是“反烽火”。礼泉县农口各局了解内情，看不惯，爱提意见，便被斥为“反烽火”。王保京说得很清楚，烽火是党的烽火，烽火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烽火，“反烽火”意味着什么？礼泉县咸阳市甚至陕西省的干部，以是否支持烽火划线，动辄得咎，人人自危。

王行兴日记记载，1976 年 3 月 18 日，王保京在烽火给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师生、延安地区参观学习人员、县公社干部学习班等作报告说：“一切斗争都是人和人的斗争。（1952 年提出亩产 1200 斤玉米以来到现在的）产量之争，实质上是阶级与阶级之争。（所以）与天斗争是人与人的斗争，与地斗争是人与人的斗争，与自然斗争是人与人的斗争。”

这是王保京围绕着烽火“产量之争”总结出来的斗争哲学。王保京这番话可不是大话套话，随随便便说的。这是他几十年斗争经验的精髓。弄虚作假搞浮夸，天不怒，人怒。几十年弄虚作假搞浮夸，几十年有人跟踪批评反对，与大斗，与地斗，与自然斗，只能斗出有限的那么多产量，不足以满足弄虚作假搞浮夸的胃口，不足以支撑那么长的弄虚作假搞浮夸的历史，与人斗才能斗出超自然的产量，才能斗出并维持烽火几十年虚浮的政治荣誉。

1976年至1979年，王保京任咸阳地委副书记兼礼泉县委书记，上通天，下通地，统治礼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谁都不敢说烽火一个“不”字，谁说了，就会大祸临头。反对烽火，反对王保京，就是反对学大寨，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支持烽火，谁吹捧王保京，谁就当官，王保京经常和管组织的副书记崔发源说，让谁谁当县革委副主任，让谁谁当局长，直接办理。

崔发源提醒说:“这样不行哩，要交常委会讨论哩。”

王保京训斥道:“讨什么论！礼泉的事我说了算!”

“烽火一举，万里为畴!”

烽火村成了政治的超级敏感地带，成了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摇篮。县委常委会在烽火开，省委党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烽火办，地委党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烽火办，县委公社就不用说了，学习班学习时间，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半载，一面学习，一面参加烽火的生产劳动。

郭福生参加了省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正是烽火学小靳庄的高潮时期。烽火村完全是军事化管理。王保京要求，社员开会要集合，台下坐着，要横看一条线，竖看一条线，会前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会结束唱《国际歌》。田间不管理，地里长满了草。烽火歌谣云:“公社社员情满怀，大步登上赛诗台，诗歌本在土里埋，咱用镢头挖出来。上层建筑闹革命，纵情高歌新时代，千首万首唱给党，人民公社春常

在。”

1975 年 7 月编的《烽火诗选》“前言”云：“礼泉县烽火公社烽火大队，自批林批孔运动以来，认真推广小靳庄经验，开展群众性的诗歌创作活动。他们，干部群众齐上阵，男女老少谱新章。仅今年上半年就创作了上万首（注：半年创作万首诗歌，找当事人核实，摇头不可考，亦涉嫌浮夸）。这些诗歌，土生土长，随时编写随时朗诵，热情歌颂了党和毛主席，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生活，占领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

，王保京刚当土地委副书记，就把王行兴等大队干部找来谈话：“烽火是个先进典型，学大寨十年了。人们去大寨学习，都是学表面的东西，下地不吹号，上工不打铃。礼泉人也去得多了，就是学不到真东西。大寨人都说哩：陕西愣娃爱参观，回去睡下不动弹。咱要实干哩！不干不行！”

王行兴是王保京肚子里的蛔虫，里里外外都明白，大寨人说没说这句话，由他说，这一席话是开场白，是说法，关键的话还在后面呢。他等着听关键的话。

“咱咋弄么？”王行兴问道。

“先从干部参加劳动做起。”王保京深恩熟虑的样子。

“我们成天都参加劳动么。”王行兴不解。

“你是你么。我说的是一个普遍现象。”

“那……”

“你们给县里写个东西。”

“写啥？”

“坚持干部参加集体劳动，批评县委的官僚作风。”

“能行。”

“写好后，让记者改一下。”王保京最后嘱咐道。

“记者都给咱预备下了。”王行兴暗自里佩服王保京想得细致周到。

王行兴执笔，另外两个副书记签名，记者修改，给县委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信写好后，交给王保京审阅批准。信中说，毛主席指出，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他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信中批驳孔孟之道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指出：“我们礼泉县有些领导同志在这方面做得就很差，没有带好头，对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件带根本性的大事认识不足，跟不上趟。他们满足于开大会、发文件、催报表，很少深入基层；就是下来，也是‘走马观花’，坐上‘四个轱辘’到处跑，早出晚归；有的同志名义上有点，实际上是‘铺盖卷’蹲点；或者在生产队试验田的牌子上填个自己的名字，很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种脱离劳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怎能准确地掌握第一千材料，指导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

科学实验）运动，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呢？这怎能改变全县面貌呢？”

信全文在《陕西日报》发表后，礼泉县委吓得屁滚尿流。谁都知道王保京声东

于是便有如下荒唐局面：烽火人唱歌、跳舞、赛诗、打球、批判资本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学员（都是县团级以上的干部）紧急出动，到田里帮助锄草，以维护烽火先进典型的面子。

学小靳庄，其中最著名的是，由王保京七十多岁的小脚老母亲领着一些小脚老太婆打篮球，颤颤巍巍，东摇西摆，参观学习者，或闭眼捂脸，或捧腹大笑。王保京理直气壮地当众训导说：“打不打是态度问题，打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上纲上线，大家捂着嘴不敢笑。还有次著名的是，王保京的老母亲和另外两个老太婆演了一个节目，叫做《三个老婆批邓》，台词说：“刘少奇是条瞎蔓蔓，邓小平是瞎蔓蔓上结的瞎蛋蛋。”

郭福生实在看不下去，把王行兴叫来，劈头盖脸一顿骂：“你们田间管理要抓！地里长满了草，你们唱歌打球，让学习班的人去拔草，你们脸红不红！全省的人来这里，是办学习班哩！学你烽火哩！”

王行兴赶快向王保京汇报，王保京却说：“不理他！领导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有什么不好！生产劳动，培养与贫下中

农的感情么，改造官僚作风么!”

为了促进干部参加劳动，王保京出了大力。

1974 年，王保京刚当上地委副书记，就把王行兴等大队干部找来谈话:“烽火是个先进典型，学大寨十年了。人们去大寨学习，都是学表面的东西，下地不吹号，上工不打铃。礼泉人也去得多了，就是学不到真东西。大寨人都说哩：陕西愣娃爱参观，回去睡下不动弹。咱要实干哩！不干不行!”

王行兴是王保京肚子里的蛔虫，里里外外都明白，大寨人说没说这句话，由他说，这一席话是开场白，是说法，关键的话还在后面呢。他等着听关键的话。

“咱咋弄么？”王行兴问道。

“先从干部参加劳动做起。”王保京深思熟虑的样子。

“我们成天都参加劳动么。”王行兴不解。

“你是你么。我说的是一个普遍现象。”

“那……”

“你们给县里写个东西。”

“写啥？”

“坚持干部参加集体劳动，批评县委的官僚作风。”

“能行。”

“写好后，让记者改一下。”王保京最后嘱咐道。

“记者都给咱预备下了。”王行兴暗自里佩服王保京想得细致周到。

王行兴执笔，另外两个副书记签名，记者修改，给县委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信写好后，交给王保京审阅批准。信中说，毛主席指出，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他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信中批驳孔孟之道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指出：“我们礼泉县有些领导同志在这方面做得就很差，没有带好头，对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件带根本性的大事认识不足，跟不上趟。他们满足于开大会、发文件、催报表，很少深入基层；就是下来，也是‘走马观花’，坐上‘四个轱辘’到处跑，早出晚归；有的同志名义上有点，实际上是‘铺盖卷’蹲点；或者在生产队试验田的牌子上填个自己的名字，很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种脱离劳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怎能准确地掌握第一千材料，指导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运动，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呢？这怎能改变全县面貌呢？”

信全文在《陕西日报》发表后，礼泉县委吓得屁滚尿流。谁都知道王保京声东击西的路数。烽火三个党员的来信，分明就是王保京借三个党员的口说自己的话。谁都知道，王保京也是坐“四个轱辘”的人，早就是不参加劳动的“劳动模范”了。但是，他现在是顶头上司，上面有后台，背后有报社。他的手里掌握的全是“真理”毛主席教导，批林批孔，

学习大寨、昔阳和吴堡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三个党员的来信，仅仅是第一道菜。在第二道菜和第三道菜上来之前，赶紧争取主动吧！赶紧“批评与自我批评”吧！赶紧提高认识、深刻检查吧！赶紧召开大批判会，批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些拗口的孔孟劳什子吧！

记者出席了县委常委专门召开的大批判会，并在《陕西日报》作了长篇报道。一个星期后，《人民日报》摘要登出烽火三个党员的来信，并报道了礼泉县委“虚心接受，立即行动”的态度。

王行兴后来才知道，王保京刚当地委副书记，提拔迅速，人家不买他的账，处境不太好，他就摸准政治气候，运用媒体来了个下马威，小小展示了一下自己的实力，确立了自己在咸阳和礼泉的地位。外人不清楚，礼泉人还不清楚王保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事后，县委办公室主任跟王行兴说：“行兴，王保京是借你们的手打别人哩！”

王行兴说，《陕西日报》代表省委，《人民日报》代表党中央，王保京此举，一箭三雕，打击了县委，震慑了地委，督促了村委，“为他下一步去向，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大家都在套子里有苦难言。07

一〇

烽火的历史，是伴随着新闻界的历史。数百的记者，上

百的作家文人，踩热了烽火这块土地。记者作家热衷于一个小村庄，热情之高，时间之长，渗入之深，影响之大，闻所未闻。究其原因，与王保京的的个人魅力有关。反对他的人，一定说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不准确，也不客观。他是一个本乡本土成长起来的“乡土政治家”，或者叫“农民政治家”。他有极强的政治敏感，有在各种运动或政治危机中应付裕如的超常智慧，有与各种媒体各种文人打交道的天赋。他不乏乡土人情味，不管动机如何，为人实在，送瓜，送果，送面，送油，送肉，过年前，要杀好几头猪，一块块切好，大汽车拉着送西安。王行兴 1959 年去北京开会，王保京专门嘱咐带上小米、红豆去看北京的文人“乡党”。千山万水，小米红豆，推门进去，“乡党”见“乡党”，一掬乡音乡情，自不待言说。不要小看送瓜送果送面送油送肉，在物资极度匾乏的年代里，哪级干部，哪层人士，都有老婆孩子，都要居家过日子，足以重重打动人心。打动人心还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俗话说“礼轻情义重”，被人惦念着，是个啥滋味？而且是长久地惦念。许多老关系，特别是新闻界的老关系，维系四十余年不断线，有的几成生死之交！这是王保京能从 50 年代“红”到 90 年代的诀窍之一。

王行兴长期主持烽火工作，按王保京吩咐，参与了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接待过形形色色的记者，也结交了一些记

者朋友。他“按人生观和世界观把到过烽火的记者分为五类”。一类令人尊重：独立思考，坚持真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宁说九十九，不说一百一，不唯王保京云亦云，看不惯烽火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这一套。他们是烽火的一面镜子，也是王行兴回忆历史、思考现实、寻找良知的一面镜子。二类令人悲哀：你说一是一，你说二是二，你说大红就是大红，你说大紫就是大紫，不核实，不动脑子，动机良好，热情很高，囫囵吞枣，“典型”犯错误，与这类记者有关。三类令人害怕：只讨好采访对象，对被采访人的事迹和观点，加盐加醋，你缺个叶子给你补叶十，你缺朵花给你补朵花，渲染拔高。四类令人惶惑：吃透上面的意图，上面带观点，烽火找例子，先进一切都先进，没有例子，没有说法，就积极出主意想办法，出谋划策，制造例子，制造说法。五类令人厌恶：纯粹利用先进典型、模范人物给自己捞好处，与烽火结成利益共同体，“互利互惠”。除此之外，还有一类记者，归不入以上所述，弄得人哭笑不得。

1976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组织群众上街游行，支持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打倒邓小平，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王行兴跟着电视台朋友老调的采访车到钟楼看热闹。钟楼还是那个钟楼，历史沧桑，看尽了人间的悲喜剧。老调扛着摄像机，专拣那举两个拳头喊“打倒邓小平”的人拍。1978年，庆祝“三中全会”召开和邓小平出来工作，

他恰巧在西安，又跟着老×到钟楼拍游行队伍。老×仍然像两年前一样，追着举两个拳头喊“拥护邓小平”的人拍。同样一个老×，同样一个邓小平，同样的地方，同样多的游行队伍，同样的投入，同样的热情，同样的勤勤恳恳，同样的认真细致，同样的汗流浃背。他跟在老调的后面，疾速行走。他看着老调的背影，满眼迷惑。人怎么会这样呢？他这个年龄，几乎经历了所有的政治运动，批判这个，批判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可这回，也变得太快了一点吧？不是自己扇自己的嘴巴子吗？而且是从上到下集体自己扇自己的嘴巴子。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现实搅乱了他的逻辑。烽火材是一团浆糊，社会也是一团浆糊。他和老×同住电视台招待所。晚上回来，心里憋得慌，要找老×说话。

“老×，咱今晚睡一起。”王行兴说。

“能行么。”老×家也是农村人，也喜欢和王行兴聊天。

他俩睡一个床。

王行兴说：“老×，你挨球的！你嘴里长几个舌头哩？锤子都没了！你是住谁的房，戳谁的窝么！打倒邓小平是你拍，拥护邓小平还是你拍，你是啥人么!”

老×不痛不痒地说：“行兴，这事情很简单么。吃谁的饭，跟谁转。任务就是（口外）么。”

“你就没有自己的观点？你就没有自己的人格？”

“行兴，你看，你这个人就是不好好念书，没把（口外）

事情弄清。”

“我咋没把（口外）事情弄清？”

“孔圣人早就把事情弄清了。孔圣人说，文人无耻，文人无行。”

一句话，把王行兴的嘴堵住了，堵得一夜再无话。无话，可睡不着。人家老×倒睡得踏实，一会儿便酣声如雷。王行兴更睡不着。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年前，王保京还在烽火村批林批孔群众动员大会上说：“以后不能叫孔子，叫孔丘，孔老二。”批林批孔，就是阶级斗争。烽火六年级的小学生部批林批孔哩：“天上星，亮晶晶，半夜我的笔没停，妈问为啥不睡觉，我是批林批孔的小尖兵。”女社员王芳玲批得更美：“敲的一个鼓，跳的一个舞，吹的一个号，唱的一个调，信的一个神，守的一个魂，念的一个经，做的一个梦。虽距两千年，都是害人虫。”王保京语出惊人：“儒家抓生产，法家抓革命。”儒家代表没落的地主阶级，法家代表革命的新生力量。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生产两不误。评法批儒，不是抓了革命，误了生产？他自己不也是大批特批孔老二的“中庸之道”、“折衷主义”吗？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立一个，必须破一个。立一个，不破一个，不是“中庸之道”、“折衷主义”吗？所以，抓革命，必须破生产。反之，抓生产，必须破革命。革命，生产，泾渭分明，二者水火不相容。可是，不抓生产，地里不长粮食，没吃的；不抓革命，又迷

失方向，迷失路线，“有脚踏不上道，有眼看不清路，有嘴说错话，有心想斜事，有耳听错话，有手帮倒忙，有鼻子分不清香花毒草”。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呀！再加上有“资本主义复辟”，“受二茬苦，遭二茬罪”的危险。显然，革命比生产重要，革命比肚子重要。可是，农民离不开土地，离不开庄稼，回到家，老人小孩等着吃，不抓生产吃啥哩？这时候，肚子显然比革命重要。都重要，便是“中庸之道”。逻辑又回来了。还可以这么解释，辩证法，对立统一，革命和生产，是一个对立统一体，既对立，又统一，既矛盾，又和谐。要不然，怎么叫“抓革命，促生产”？这又像是诡辩。明白事在戏上，糊涂事在世上。现在，老×叫孔老二是“孔圣人”了。“黄河清，圣人出。”圣人一出，便说“文人无耻，文人无行”。孔圣人哪本书说的，没听说过，也不可查考。老×把自己都骂了，还有什么可说呢？

“文人无耻，文人无行……”

“文人无耻，文人无行……”

王行兴昏昏睡去。

一一

其实，王行兴的觉，永远睡不踏实。

“西方取经，功劳是唐僧的，闯下‘麻达’是孙悟空的。”烽火王保京这本经是怎么念的，王行兴比谁都清楚。从1958年开始，王保京既是他的长辈，也是他的老师。出去开会带

着他，有机会就培养他，重要的事委托他，村里的事仰仗他，言传身教，不厌其烦。西农学习，爷孙朝夕相处，动辄长谈。他在日记里记下了王保京的谈话：“1、你首先要做一个有朝气的青年人，活泼，主动，精精神神，不要疲疲塌塌，没精打采，乏乏没味；2、不论干什么工作，要小心细心，不要粗心大意；3、不管做什么工作，要有雄心，要有耐心，没有雄心、耐心，今后要搞许多科学研究，往往会搞坏；4、咱们几个人开会，要主动讲话，怕什么，咱们的人嘛，要大胆；5、你念书以来老粗心，不养成细心工作的习惯不好，今后要搞好多科研不细不行；6、要有雄心，不管搞什么工作要认真；7、要对我说老实话，不要操心，要好好认识；8、我们不光是要达到一个大学生的水平，而是为的革命，一定要坚持下去。”

王保京似乎观察到了王行兴的某些迹象，但是，他并不真正了解跟前这个不多言语的年轻人。爷孙二人有着完全不同的为人处事态度。不到二十岁的王行兴在日记中写了大大的六个字：“谦逊，谨慎，稳重。”

六个字占了小笔记本的四分之一页！

他在如饥似渴地学习。他的小笔记本记下了人类的智慧，人类的良知。马克思，列宁，鲁迅，泰戈尔，高尔基，萧伯纳，富兰克林，奥斯特洛夫斯基，瞿秋白，达?芬奇，左拉，普希金，裴多菲，华罗庚，巴甫洛夫，莎士比亚，爱

迪生……把这些大师的名字罗列出来，足以让后来读这些日记的人，感受到1960年西北农学院有一个青年农民的心在怦怦跳动，感受到一个青年农民对知识对智慧的渴望。他摘录大师们的箴言，有很强的针对性。

比如爱迪生："我平生从来没有做过一次偶然的发现。我的一切发现、发明，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严格试验的结果。"

大家都引毛泽东，他引的与众不同："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而且，他还记下自己的见解："每个人的虚荣心是和他的愚蠢程度相等的。"

他摘录德国谚语："接受别人的袒护，出卖自己的自由。"那么自由的价值何在？他引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显然，他的学习目标和态度，与王保京相距甚远。他来学习，不是完成党交给的学习任务，不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他来学习，是为了求知求识，学习科学，探索真理。开会时，他沉默寡言，不是因为他羞涩，不是因为他没有话说。他向人生的提问，向现实的提问，是从另外的角度出发的。他隐隐约约地发现了烽火1958年、1959年大失败的原因，但是不能明说。说出来，不是揭保京爷心上的疮疤？不是扫保京爷热火朝天的兴？

他在日记中偷偷写道："单株卫星是不是丰产的方向，值得考虑的问题？"

他对王保京只在“丰产田”里下功夫做表面文章提出了怀疑。

他在两个世界里生活，一个世界是王保京营造的，一个是他自己在他的小笔记本里营造的。在王保京营造的世界里，他唯唯诺诺，洗耳恭听，保京爷长，保京爷短。在自己的世界里，大可以让思想自由飞翔，并且顽强地与王保京保持着距离。聪明绝顶的王保京观察到了这一点，所以经常敲打他。在日记里，他不称王保京“保京爷”，而是称“王社长”。王保京鼓励他大胆发言，他却在日记里反复告诫自己:“谨防言语泛滥冲堤。注意，注意，不言者为好。”他知道烽火本分的农民在背后怎么议论王保京:“上嘴唇在天上，下嘴唇在地下，胡偏不要脸哩!”他知道礼泉人怎么放声大骂“王骗子”。他也知道别人怎么看他:“帮王保京胡谝的铁杆么!”他更知道他追随王保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正如德国谚语所说的那样。问题在于付出的代价值得吗？从整个局势判断，王保京不仅不见颓势，反而如日中天。上级欣赏他，上级赞美他，上级支持他，老百姓的议论算个狗屁。王保京得大好处，自己得小好处，鞍前马后，各有所求，不借王保京的势，他永无出头之日。当然，他也清楚地认识到了王保京脚底下这块土地的孱弱，王保京头上光环的虚浮，早晚会有“麻达”。权衡利弊得失，内心十分矛盾。但是，出人头地的诱惑太大了。王保京三番五次地跟他说，年轻人“要有

雄心”，就是给他设计政治前途。他顶着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做出了选择，这个选择，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他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藏进了内心深处，藏进了日记本里。

王行兴认为自己是独立的，是重要的。王保京对此没有充分的估计。

王保京一辈子犯的最大错误，可能就是培养王行兴，重用王行兴，小看王行兴，猜疑王行兴，排斥王行兴，失去王行兴，最后用极端的手段对待王行兴。本来，年轻人在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的可塑性是很大的，完全可以让王行兴死心塌地。王保京犯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大忌。

王保京可能是矛盾的。烽火村是他的根据地，是他获得荣誉获得权力的政治基础，是他与政界其他对手抗衡并取得政治支持最有力的一张牌。烽火村对他来说，真是太重要了！他当县委副书记、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常务副市长，从不放手“烽火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牢牢把握着烽火的最高权力。离开土地，真正进入官僚阶层，游戏规则一变，“农民政治家”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离开土地，“农业劳动模范”、“农民科学家”便失去了意义，“王保京”便失去了意义。所有说法便会烟消云散，甚至可能导致颠覆性的后果，因为烽火的底太“潮”了。

70年代宣传王保京当官亦不失劳动人民本色，“白天是地委书记，晚上是村党支部书记”，一时传为美谈。当市长，

是“农民市长”；退休回家，是“重归黄土地”。这就是特色。这就是金子都换不来的特色。打下烽火的江山不容易，巩固和维持烽火的江山更不容易。他对烽火的控制，是一竿子插到底的控制。翻开王保京在党支部会上和烽火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事无巨细，面面俱到。革命形势，方针政策，方向路线，政治教育，政治运动，接待参观，科研生产，干部作风，计划生育，婚丧嫁娶，邻里纠纷，分钱分物，记算工分，奖勤罚懒，多吃多占，小偷小摸……他有一个本事，村里发生的小事情，他可以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往往出语惊人。

1975 年底，烽火有人放猪吃庄稼，沾集体的便宜。12 月 24 日，地委副书记兼烽火党支部书记王保京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召开社员大会，挽着裤腿挽着袖子骂：“最近不学习出了很多怪事。不学习，人心比猪心还瞎！（放猪出来）乱踏路，乱走路，是路线乱了！放猪不是放猪，而是专门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通过猪看人，这是（阶级）斗争新手法！人不敢反对和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叫猪破坏！会说话的不敢破坏，叫不会说话的来破坏！”

王保京活得够辛苦，始终不松阶级“斗争”（注：“斗争”，是王保京政治语言中的一个关键词。斗争哲学，维系了王保京的政治生涯）这根弦。他的今天，烽火的今天，全是“斗争”得来的。他说：“一天 24 小时，连做梦在内，都反映有阶级性。无产阶级（如果只占领了）23 个半小时，半个小时

就是专政无产阶级！做梦也一样，做梦为公，还是为私？为社会主义，还是箩筐筐贩猪娃？”

1976年1月26日中午，王保京跟党支部一班人提出工作要求，并传授了政治斗争经验：2、要争主动权，要夺主动权，不要打被动仗；

3、要有对敌斗争的勇气、志气、手段；

4、要学会制造舆论；

5、要敢于用权。你敢于用权，人家才服权，你不敢于用权，人家当然不服权；

6、矛盾是前进的动力，困难是前进的台阶，斗争是前进的加油站；

7、当干部要当秦始皇，要高度集权，这是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的；

8、党支部要成为干社会主义、想共产主义、领导农民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战斗指挥部；

9、加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

精彩！精辟！刀刀见血！炉火纯青！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他告诉党支部一班人，他就要兼任礼泉县委书记了！果然，一年后1977年4月走马上任——权力由名誉和象征走到了实处。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这一番讲话，既是给一班人布置工作，既是他总结的“权

术”，也是他将来的施政纲领。这套施政纲领，可能这样归纳更清晰：高度集权，敢于用权，采取手段，制造舆论，争取主动，针锋相对。其中，他凭经验概括了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情况下“民主集中制”的本质是“高度集权”，“民主”是虚，“集中”是实，而且“集中”不是一般的“集中”，而是秦始皇式的“集中”。唯有此，才能有效地使用权力，贯彻第一把手的个人意志。党中央主席，村党支部书记，上下同理。所谓的集权统治，便是如此。

咸阳是秦朝故都，站在这块土地上思考历史，观察现实，王保京得出这样的结论，是自然而然的。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兼村党支部书记，自上而下，打通了中间环节，彻底解决了长期困扰烽火和王保京的问题。礼泉的政治局面完全在王保京的控制之中。这个局面，整整维持了三年。奋斗不到20年，王保京拿到了礼泉县的最高权力，开创了礼泉政治生活的“王保京时代”。

听完工保京的教导，王行兴回家后，在日记的扉页上写感想：

1、共事不诚心，虚伪；

2、专权，独裁；

3、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4、回来一个样，走了一个样；

5、贪天之功（为己功）。

王行兴内心的苦闷和矛盾，说明他是清醒的，同时也构成了他的双重人格。

王行兴与工保京周旋、妥协，如愿以偿。他 1964 年入党，1965 年任大队党支部委员，1966—1976 年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公社党委委员，1976—1979 年任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县委常委兼烽火党支部副书记，1979 年回村继续任党支部副书记至 1997 年。

然而，他仍顽强地在日记里与王保京保持着距离，固守自己对科学对人生的态度。

1965 年 2 月 9 日，小麦地。王行兴田埂上坐着，想烽火的事儿。烽火搞科学种田十多年，最后搞出了什么名堂？他心里明白，都是华而不实的花架子，还在延续 50 年代的那些做法，经不起查，一查就露馅。几个月前，工作组来，结论一作，省长批示，辛辛苦苦一风吹。针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四清运动”如火如荼，让人心惊肉跳。烽火的立身之本是“科学种田”，科学还怎么搞呢？显然，王保京要的不是“科学”，而是别的什么东西。他这个大队科学试验负责人真不得，假不得，左右为难，前途迷茫。外面的事情想不清，烽火的事情王保京自有腾挪躲闪的办法，他只能“独善其身”。正月里春风不温暖，煞冷煞冷往领口袖口里钻。他掏出随身带的日记本，写道：

“对搞农业科学实验的同志来说，老老实实，扎扎实

实……抓紧时间试验，求得正确的科学数据，提高科学的准确性，就等于延长了一个人的生命，就等于一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搞科学实验）既不‘知而不说’，也不‘不知妄说’。”

1975 年，正是烽火继 1958 年之后第二个高潮时期，“学大寨，赶烽火”，烽火学小靳庄，全省学烽火，唱歌，写诗，打球，热热闹闹，翻天覆地，不亦乐乎。王保京亲自抓，还发表了诗词《永远革命》:

革命使我获得生命，

革命推动我为自己的阶级陷阵冲锋，

革命指出前边有更艰险的历程，

革命时刻传达党和毛主席的声音:

贫农的儿子要和自己的队伍一起，

永远前进，大步不停!

王行兴也写了《心中太阳永不落》: 批林批孔新事多，

农民登台赛诗歌，

纵情歌唱毛主席，

心中太阳永不落。

王行兴也要应付台面上的事，跟着起哄，内心却十分鄙视，不情愿。王保京大讲“书、戏、球和粮、棉、油的关系”，讲革命和生产的关系，结果村里人编了个顺口溜：“球打赢了，戏唱红了，庄稼种冲了。”村里人的情绪，他都看在眼

里。可是王保京势大，惹不起。王保京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就搞“台上一套，台下一套”。

他在日记中写道：“咋样叫真学大寨？第一条，真说实干：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实事求是。第二条，少说多做：说一件事，办一件事，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

他在两个日记本的扉页摘引恩格斯语录：“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

烽火这场戏，1976 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演到了极致。庄稼没人管，杂草长满地，县委副书记郭福生不敢找王保京，把他找去，一顿臭骂。人家说的都是事实，批评也在理。他有苦难言，憋了一肚子火没处撒。以前在日记里还是含沙射影，现在是直截了当地指责，发泄对王保京的不满：

1、说假话；

2、说高话；

3、说绝话；

4、说空话。

1977 年 9 月，他又写道：

学习上老老实实，

劳动上扎扎实实，

革命上忠诚老实，

工作上实事求是，

作风上言行一致。

往后，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倡导“实事求是”，清算“评法批儒批周公”运动，清算“批投降派”运动，清算“农业学大寨”运动，清算“学小靳庄”运动，清算极左思潮，上到“四人帮”，下到烽火村，招招式式都是对着来的。王行兴预感到对烽火村的总清算要开始了。而且，他还预感到，即将到来的清算，可能不仅是一般性地清算烽火“左”的错误，可能会挖几十年的老根。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三个问题一直对烽火和王保京紧追不舍：一、产量不实；二、土地不实；三、国家给钱给物支持。这三个问题，任何一个问题都要命。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可亏心事做得大多了。1959年混过去了，1964年混过去了，“文革”混过去了，“文革”之后，“华国锋时期”混过去了，调查从未间断过，调查从未深入过，调查从来都是不了了之。王保京不仅没有受影响，反而青云直上。究其根本原因，党没有清算“左”的东西，“左”的路线、“左”的思想、“左”的做法仍然主宰着中国的现实生活。那么，这次能混过去吗？

08

一二

王行兴预料的这一天终于来了。

1981年，在礼泉群众和干部的强烈要求下，咸阳地委和

礼泉县委共同组织的18人工作组浩浩荡荡进驻烽火。地委副书记张世第任组长，地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马云溪、地区农委副主任张宏勋等任副组长。

这是一个十分尴尬的的工作组。地委副书记牵头调查另外一个地委副书记的问题。这位负责调查的地委副书记也看清了局势，称病在家，把调查工作扔给了副组长们，他实际只挂了个名。调查级别立即降了一格，变成了下级调查上级领导的局面。

王保京是在职地委副书记，一年前还是礼泉县委书记，同时是烽火村党支部书记。地委要求王保京回避，王保京不回避。调查期间，王保京回村，要求出席工作组组织的村干部座谈会。张宏勋说："你是地委副书记么，你说了算么!"

会上，张宏勋不敢说话，村干部不敢说话。王保京还在工作组里安插了内线，通风报信，干扰调查。

王保京私下召开村干部会，说工作组谁谁是咱自己人，要搞好生活，谁谁跟咱不一条心，别管他。张宏勋自然是"不一条心"的人。春节后，工作组下烽火村，天冷得很。"自己人"安排进热炕烧得暖烘烘的农民家，张宏勋等被安排进了冷冰冰的接待站（也就是七年后武芳被硫酸毁容毁身的地方）睡硬床板。王保京还跟王行兴等村干部交待："他们的结论写不好就不让他们走!"

什么是农民？当地人说："拎起来一吊子，放下来一堆

子。”这话刻薄，不太恭敬。他们可以什么都不在乎。土地是他们的生存底线。社会任何一个阶层，都不可能站在土地上为人处事，除了农民。土地可以长庄稼，长树木，长花草，长虫豸，长牲畜，长野兽，也可以长思想。土地的享性，也就是人的享性。政治惩罚中最严酷的一条，就是撵到农村与农民为伍。因为没有比农民再低下的社会阶层了。农民当不了自己的“家”，做不了自己的“主”。既被称为“革命的阶级”受到尊崇，又被称为“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而受到贬斥。鸡猪吃食，猪往前拱，鸡往后刨，你拱你的，我刨我的。农民自有一套办法对付。只要能活下来的办法，他们都能找到。逆来顺受，抗租抗粮，瞒产私分，吃糠咽菜，逃荒要饭，实在活不下去，便揭竿而起，陈胜吴广。半个世纪以来，没有陈胜吴广。“三年困难时期”，一村一村的人饿死，说是不能给“大好形势”抹黑，饿死也不出村不出家，饿死也不准出村出家，是为中国历史上的奇迹。时而顽强，时而懦弱；时而稳定，时而摇摆；时而主意大，时而心胸小；时而瞻前顾后，时而挺而走险……都取决于现实的判断，都取决于靠天吃饭的不确定的生存状态。经不起大棒子，也经不起胡萝卜。

王保京起家，把烽火人折腾得不善，也给烽火人带来了诸多好处。从 50 年代起，烽火人便挺着腰板走路，充满了优越感。只要在街上，看见穿日本尿素袋子衣服的人，一定

是烽火人。化纤编织得细密结实，白底黑字，染黑，压不住黑字，屁股上是“含氮 46%”，胸口上是“尿素”、“日本××株式会社”。那时候，日本尿素尽烽火用，袋子要收回，烽火六角钱一个买回来，便是天大的面子。把人羡慕的。那是特权的标志。要钱有钱，要物有物。1964 年，王保京便在“西北地区农业稳产高产经验座谈会”上介绍经验时承认“省、专区、县、公社党政领导”“在人力、物力方面给了我们以很大的支持”。70 年代、80 年代“人力”支持不如 50 年代，“人力”贡献主要是成千上万参观者的屎尿积肥，最多的一天达 5000 人，物力、财力则变本加厉。而且，王保京搞浮夸，产量上弄虚作假，早期只在几亩科学丰产试验田做文章，后期大日高产，是在“瞒亩增产”、“多报少交”、“迟交缓交”做文章，房子，水利，电力，道路，化肥，农药，水泥，石灰，木材，钢材，粮食，要么是钱，要么是物，都从国家的腰包里为烽火人捞到了好处。王保京不像有些农村基层干部“一举两得”，勒紧村民的裤腰带讨好上级，换自己的好处，而是“一举三得”，上级满意，自己满意，村民满意。里面好处的区别，仅仅是大和小、多和少的区别。这种一平二调弄虚作假皆大欢喜的“烽火模式”或“王保京模式”，对烽火村民来说是“人道主义”，然而，对于陕西、咸阳、礼泉最该支持的贫困农民来说，就是不“人道主义”。陕西、咸阳、礼泉本来就是不富裕的农业地区，财政困难，

僧多粥少，烽火分得多，他们就分得少，烽火全拿走了，他们就什么也得不到。更实际的是，烽火拿走的部分，包括他们每年给国家的血汗“贡献”。党和国家不是能下金蛋的母鸡，钱和物皆取之于民，用之于烽火，也不是掏自己的腰包，拆自家的东墙，补烽火的西墙。这说明，小人道是建立在大不人道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肥一个瘦一方的社会再分配机制，因为不是明目张胆地打家劫舍，一平二调，分摊在每个人每个村身上微乎其微，感觉不到，可是聚敛起来，给一个人一个村，便是肥乎其肥。加上意识形态说法，加上黑匣子运作，大家要么不知情，要么敢怒不敢言。烽火人不管那么多，谁给好处就支持谁。上面得了（主要是政治上的）好处，下面得了（主要是经济上的）好处，上下都起来维护自己，后院不起火，上级不追查，即使追查也是走过场敷衍，是王保京地位稳固、屡经风浪而不倒的诀窍，也是王保京聪明过人的另一个侧面。

王保京是农民，他了解农民，懂得用农民的办法来应付危机。他关在烽火村的屋子里与党支部一班人密谋对策时，就不是地委副书记了，而是彻头彻尾的村党支部书记，而是本乡本土的农民。

没有委婉，没有含糊，没有顾忌，没有隐蔽，指示明确：要横，要泼！这是王保京的“杀手锏”。农民要横要泼，能把农民咋！何况背后有我王保京哩！

工作组的调查结论，显然对烽火不利。工作组要走，烽火人不让走。王行兴在家主持工作，对王保京的做法有意见，但是必须执行。这种关键时刻，烽火一致对外，他如果有二心，可能会在烽火名声扫地，无立足之地。烽火的天下，还是王保京的天下。他不得不遵照王保京的旨意，带着人，把张宏勋的工作组堵在了村里。

“张宏勋出来说话!”有人呐喊。

张宏勋被迫出来见烽火的群众。他说:“我们是地委派来的！你们不能这么干！你们的做法是错误的!”

什么地委！王保京就是地委副书记!

围堵者不听:“说不好，不准走!”

张宏勋不吃这一套:“好！不走就不走！我们工作组不走了!”

马云溪和县委负责人闻讯，赶来解围，工作组才连夜惶惶脱身。

09

一三

张宏勋是个黑大个。现任陕西省粮食厅长，之前任咸阳市市长。

“我对我说的话负责。”他爽快地说，“如果打官司，我可以出庭作证!”

1981 年的工作组分三拨人，一拨由马云溪率领查王保京

历史问题，一拨由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率领查王保京任县委书记时“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组织路线问题，一拨由张宏勋率领查“土地不实”、“产量不实”、“国家财力物力支持”问题。

大家的处境都不妙。之前告状不断，也派人来查，谁也不敢真正地查，谁都惹不起王保京。地区农业局长曾查烽火浮夸，连烽火村都没进，对张宏勋说：“叫我去查，大家心里明镜似的，叫我去惹人哩！”

张宏勋说：“文革后期，反大寨就是反革命；在礼泉县，反烽火就是反革命！我亲眼看到，有的干部档案里就这么写！后来平反，把这一条划掉了。可见高压之重。”

三类问题中，张宏勋负责查的部分最艰难，最敏感，工作量最大。面临压力，他进退两难。查吧，王保京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一跺脚，咸阳都要抖三抖，弄不好身败名裂。不查吧，这差怎么交？就像吃“口水面”（注：“口水面”，陕西面余的一种吃法，光吃面，面吃完，剩下汤回锅，来来回回拌面），烽火把面吃了，工作组这碗汤还要倒回大锅里去。问题在于，查不查，查得清查不清，都把人得罪下了。干脆，得罪人得罪到底。可丁可卯地查！

土地不实问题。张宏勋请示地委同意，专门请测量人员精测了烽火土地。

群众来信反映，烽火大队合作化时期，有地二千三百亩，

加上历年造地八百亩，实有地三千亩左右，但只上报一千八九百亩，王保京以隐瞒减少土地，减轻国家征购，并亩提产，弄虚作假，骗取荣誉、奖励。

数字是冷冰冰的。

据查，烽火大队 1956 年有耕地 2309 亩，1964 年减少为 2089 亩，1978 年减少为 1584 亩。《烽火简介》中记载，该队 50 年代后期在“争气滩”修地 300 亩，1973 年冬到 1974 年春在“贡献湾”修地 500 亩。据这次查，烽火大队近十年上报耕地面积数，1971 和 1973 年为 2075 亩，1974 到 1978 为 1910 亩，1972、1979、1980 年为 1960 亩。据队干部座谈会所说，这些上报数字只报了原来的老地（包括果园占地 106.4 亩，砖瓦厂和操场、渠路等占地 324 亩。如除去这两项上报地 1529 石亩），而 50 年代后期修造的“争气滩”和 1974 年修造的“贡献湾”的地没有计入。这次丈量，烽火大队老地包括新庄、跃进村、塬上现有地 2194.8 亩（学校占地未计入），其中耕地 1764.4 亩，比老地年上报的耕地 1529.6 亩面积多出了 234.8 亩；果园占地 106.4 亩，渠、路、树、晒场、砖瓦厂、学校操场等其他占地 324 亩。另外，“贡献湾”现有农作物耕地 203.5 亩；“争气滩”有地 183.2 亩，其中现有农作物耕地 126.8 亩，果园占地 40.7 亩，路、晒场占地 15.7 亩。按照国家和省有关部门关于“农业统计年报制度”的规定，该队的“贡献湾”和“争气滩”的耕地面

积应计入耕地面积上报。依此计算，烽火大队老地和“贡献湾”、“争气滩”现有地面积共 2581.5 亩，比历年上报面积多出 612.5 亩。这次丈量的面积中，有耕地 2094.7 亩，果园占地 147.1 亩，其他占地（包括原报面积中的砖瓦厂、操场等占地）339.7 亩。

另外，经丈量该队农作物面积，除“贡献湾”、“争气滩”的 370.3 亩（“贡献湾”农作物耕地 203.5 亩，“争气滩”农作物耕地 166.8 亩）一直从种至今未报种植面积外，该队的老耕地有六个年份上报的农作物面积少于实有面积。其中有四年平均少报 110 亩以上。而上报的十年粮占面积(不含“贡献湾”、“争气滩”)，除 1971 年报了 1100 亩外，其余九年均报了 930 亩到 980 亩。经查表核对，实际上该队上报的粮占面积只上报了麦粮面积，早秋作物如红薯、豆类、制种田等均未上报。

解析:

以上数字说明了四个概念:

1、“贡献湾”和“争气滩”，一方面隐瞒不报耕地数，一方面宣传上浮夸面积，骗取荣誉。历年的宣传报道，都把“贡献湾”和“争气滩”作为烽火和王保京战天斗地的光辉业绩广泛宣传。据公开的一份材料说，“争气滩”，解放前，泾滩是一片乱石滩。1957 年烽火大队在反右派的激烈斗争中，发挥了高级社的集体力量在这里开展了第二个移石整地

工程。两年造地300多亩，粮、菜、瓜、果年年丰收。乱石滩面貌大改变，社员叫它‘争气滩’。‘贡献湾’，‘泾河’原是一条害河，逼走村庄，冲垮了几百亩农田，伤害过几十条人命。解放后，烽火大队的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长期坚持改河造地的战斗，先后失败过三次。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锻炼，更加深入地开展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干部和社员想大的，干大的，决心根治害河。七三年冬季打了一条‘批林坝’，七四年春季打了一条‘批孔坝’，拦截洪水，炸山垫土，在泾河湾造了400多亩土地（《烽火简介》说造了500亩土地）并将继续改造成高产稳产田。大队党支部和革命群众，为了庆祝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精神，决定把这个河湾命名为‘贡献湾’，把所产粮食全部卖给国家，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更大贡献。然而，当时“贡献湾”和“争气滩”隐瞒土地的事实被捅给了省委，王保京因此没有继党的十大代表连选十一大代表，代表名额给了礼泉县的后起之秀、袁家村党支部书记郭裕禄。

2、隐瞒土地面积612.5亩。

3、除了“贡献湾”和“争气滩”，少报耕地面积。

4、耕地面积多变，随意更改上报。

王行兴说：“一句话，产量要上去，土地要下来!”

粮、棉产量不实问题，烽火长期隐瞒土地，粮、棉产量

总体虚假。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弄虚作假的花样。

1、来信反映，烽火大队1970年以来粮食产量不实，特别是1978年虚报小麦产量，得奖受表扬。

经查，烽火大队1971年以来，在粮食产量方面有以下问题:

一是多报粮食总产。该队1971年至1980年粮食总产上报12927332斤,账面记载数为12815833斤。其中1971、1972、1973、1975、1977、1978、1980年七年共多报232566斤;1974、1979两年共少报121047斤，相抵后，共多报总产111519斤。只有1976年实产与上报总产相同。

二是粮食库短量较大。烽火特殊，首倡大队“代储国库粮”。但是，“该队粮食账混乱，‘五不符’（账实不符、账账不符、账据不符、总账和分类账不符、账物不符）的问题严重，保管多年来没有账，也没有清过库，财务管理不按规定制度办事。”根据1971—1980年粮食账面总产量，冲抵实际支出，应余粮822902斤，但库里没粮。其中会计伙食账上空支冲账即达660000多斤，不知道被谁吃掉了烽火约一年的产量。

原县农业局局长苏发林证词:“烽火一面拍夏收入仓新闻，一面搞先进队特殊化—— ‘以队代储（国库粮）’。他们总是强调自己是先进单位，有物质基础，有参观任务，先报数字后入仓。由于烽火搞特殊，各公社纷纷要求‘以队代储’，

（以致造成）多有国家粮食亏空。第二，以‘接待’为名，多占国家粮食。1976年，烽火接待站超粮万斤左右，粮站催要，烽火村不交，县委常委会决定，用国库机动粮核销。”

三是粮食亩产有问题。主要是“贡献湾”和“争气滩”新修地粮食作物面积一直没有计算，而产量加入了总产，这就必然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其二，老耕地多数年份上报粮食作物面积少于实际面积，少报部分的产量也加入了总产，又给单位面积产量加了码。

1978年更邪乎。

烽火1978年以小麦亩产852斤获得地、县两级的奖励表彰。然而，这一年上报的产量多次变动，前后矛盾：1978年咸阳地区在乾县召开“三千会”（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会），评比奖励小麦生产先进单位期间，烽火7月18日第一次上报小麦940亩，总产852580斤，亩产907斤；8月19日第二次上报小麦780亩，总产680560斤，亩产852斤。王行兴代表烽火大会发言，确认第二次上报数字。大会评奖组的高产登记表上却是小麦940亩，总产800880斤，亩产852斤。但烽火1978年年终报表却为小麦面积780亩，总产680560斤。最后公社核定上报数为小麦面积930亩，总产707460斤，亩产761斤。1979年夏季，地区召开小麦生产会议评奖时，县社仍核定烽火1978年上报亩产为761斤，1979年亩产862斤，比1978年亩产增加101斤。此谓产量

不实。其实，这是烽火60年代就玩过的把戏。算当年亩产成绩时，就往高里算；算第二年增加幅度成绩时，就压低前一年亩产。来回变，随心所欲。其二，1977年秋冬播种和1978年5月上报的小麦预测产量表，小麦面积930亩，夏季杂粮50亩，1978年8月和年终上报的农作物产量表上却填写为小麦面积780亩，夏季杂粮200亩，可是，公社在年终核实上报农作物产量时，仍定为小麦面积930亩，亩产761斤。其三，“贡献湾”和“争气滩”的小麦面积，只计产量，不计面积。经查账，1978年烽火小麦总产680560斤，面积按930亩计算，亩产应是732斤，如果算上“贡献湾”和“争气滩”的面积，烽火1978年的小麦亩产过不了700斤。

这是典型的数字游戏。具有70年代特色的数字游戏。

2、来信反映，烽火1979年比1978年夏粮一季净增产110000斤是吹牛。

《人民日报》1980年4月8日本报记者报道和6月12日省广播电台报道：烽火1979年比1978年“夏粮一季净增十一万斤”。而烽火账面上记载，1979年夏粮产量为762015斤，比1978年夏粮产量691154斤增产70811斤；如果按年终报表算，1979年夏粮产量比1978年还少8234斤。

3、来信反映，烽火自1970年后，棉花产量没有一年是真的，年年虚报，十年当中，只有三年过了百，而报成年年过了百。

经查，1972、1973、1974、1976、1979 五年多报棉花产量 15774 斤，1971、1975、1977、1978、1980 五年少报 11698 斤。1971—1980 年棉花播种面积，一是多数年份小于分配播种数，二是有的年份小于春播上报数。由于播种面积无法核实，亩产亦无法核实。

原县农林局副局长侯建文证词: 1997 年县农林局抽调农科所农技员徐先才去烽火蹲点。正是备耕季节，徐先才在棉花地里挨着看，用笔记本逐块地统计播种数，总数是四百多亩，而烽火党支部副书记王振海的上报数是三百亩。徐问王: “你怎么把棉田面积报得少了？”王说: “不少么。”徐说: “我查了一下，有四百多亩哩。”王问: “你怎么知道的？”他递过本子，说: “我从棉田地牌子上抄下的。”王振海拿过本子，当着徐的面，撕去了笔记本有统计数字那一页。徐回来跟农林副局长侯建文汇报情况，侯说: “烽火的事，你少说！看招了祸!”

煞是奇怪。为什么有的年份少报，有的年份多报?

王行兴解析:

棉花产量多报或者少报，总的来看，都是弄虚作假，欺骗上级。为什么这么干，要结合当年国家的棉花种植政策来分析。国家重视种棉花，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的棉花收购任务，卖价和奖励丰厚。一是浮夸产量，二是鼓励烽火四队大量收购径阳县的棉花上交，获取棉花“丰产”荣誉和利益。

反之，少报棉花产量，则多得棉花，进行私下交易。（注：这是棉花统购统销政策带来的问题，有其合理性在。相似于当时历史条件下，粮食的瞒产私分，是农民对抗统购统销政策，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还要结合土地利用情况来分析。棉花少种，必然别的农作物多种，可能用别的农作物获取荣誉和利益。另外，棉花播种面积是一笔糊涂帐，蹊跷账。总之，多报少报，算计下来，烽火都不会吃亏。

伞来信反映，烽火 1974 年棉花实际亩产皮棉 100.4 斤，却上报为 150 斤。

经查，烽火 1974 年上报棉田面积 470 亩，前后报过两次产量，更改前亩产 150 斤，总产 70500 斤；更改后，亩产 130 斤，总产 61100 斤。但是，账面记载 1974 年棉花总产只有 47368 斤，多报 13732 斤，亩产则是 101 斤，多报了 29 斤。

解析：1974 年，王保京刚提拔为地委副书记，需要“高产”支持。

1981 年 3 月 4 日，县农林局副局长侯建文证词：“1974 年烽火大队上报棉花产量 150 斤，群众有反映。杜振良（县农林局局长）让我派人去了解一下情况。我派我局干部孟国营同志去烽火大队了解。孟从阡东棉绒厂查了一下烽火大队的棉花入库数字，再加上群众的自留棉，亩产为 100.06 斤。”也就是说，烽火集体棉花亩产不到 100 斤。

5、来信反映，烽火 1978 年实种棉花 480 亩，却上报为 380 亩。实交国库棉花 35000 多斤，加上自留棉，平均亩产不到 100 斤。王保京却吹嘘说，他们搞了百亩棉花丰产试验田，亩产 270 斤，到处吹牛，到处得奖。王保京 1979 年还在省电台的一次讲话中笼统他说,他们计划棉花亩产 300 斤,实产 270 斤。

经查，烽火 1978 年上报棉田面积 400 亩，亩产 141.6 斤，总产 52634 斤（注：数字矛盾，按上报数计算，亩产应是 131.5 斤，平均产量多报 10 斤），账面记载数是 57906 斤,总产少报了 5272 斤。这年搞了一块棉花“百亩丰产方”，上报和向外公布为亩产 270 斤。经丈量，这块“百亩丰产方”不是百亩，而是 115 亩。其产量无账可查，亩产不可考。调查组找来了 1979 年 7 月 3 日王保京在省广播电台的讲话录音：“我们烽火大队，去年种的棉花，原来计划亩产 300 斤,结果只达到了 270 斤。”

王保京的棉花“卫星”令舆论大哗。

烽火村民李桂芳证词：棉花“百亩丰产方”又叫“银花田”。“方长”是王保京，“副方长”是党支部副书记王文汉。烽火六个小队，一个小队出八个人，两个妇女，六个男人，有六个小组、四十八个人务“银花田”的棉花。我是妇女队长，负责一个小组。当时，王保京跟我们说：“银花田”“计划亩产 300 斤，你们好好务棉花，在全省弄一个榜样出来，

上化肥不拘口口，只要把产量弄上去，化肥要多少给多少。”我们六个组长私下议论，就是把全大队的棉花都加在“银花田”里，亩产也达不到300斤么！一季种下来，“银花田”的棉花产量和大田差不多，群众意见很大。产量弄不上去，我们交不了差，只好把大田的棉花偷来往“银花田”里塞。每天拾两次棉花，“银花田”的棉花和大田的棉花都往一个库里交，交一次偷一次，和在一起算“银花田”的产量。六个组都偷哩。都是集体的棉花，大家偷不偷不在乎。所以，“银花田”的亩产就高了。其实，王保京心里很清楚，亩产达不到270斤。其他队干部心里也很清楚。王保京在省电台是胡吹哩。

我们再算一笔账：1978年，烽火棉花总面积400亩，总产52634斤，减去115亩“丰产方”27000斤棉花产量，大田棉花产量25636斤，大田平均亩产应是85.5斤。“丰产方”的平均亩产是大田平均亩产的3.2倍。大田和“丰产方”平均产量差距也大大了！这便露出了马脚。只报棉花总产量和平均亩产，只报“丰产方”平均亩产，而不算大田平均亩产，“丰产方”的“卫星”放得高，平均产量也不受影响，一箭双雕。这笔账起码能证明“银花田”平均亩产270斤的来历：一是偷大田的棉花，二是隐瞒“银花田”棉花的实种数量。

王保京50年代放过玉米和小麦“卫星”，70年代三中全会提们“实事求是”后放棉花“卫星”，可谓“年年岁岁花

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50年代放玉米和小麦小“卫星”的王保京是互助组组长、合作社社长、公社社长、大队党支部书记，70年代放棉花“卫星”的王保京是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兼村党支部书记。

国家“输血”扶植烽火，王保京利用影响和权力要钱要物问题。

烽火50年代到90年代，国家“输血”长流水不断线，王保京亲自和烽火村干部仗势向各级领导、各有关部门要钱要物长流水不断线。

以下个案和统计，来源于地委调查组的调查报告和有关当事人:

1、大跃进时期，王保京搞“科学试验田”，国家有关部门支持木材、钢材、化肥、仪器、现金近80000元人民币。人力支持，包括科学家、农业技术人员、其他劳动力，不计其数。省气象局在烽火建立气象站，专门派技术人员住到烽火帮助进行气象观测，培训农民。各级政府、科委和科研机构支持各种仪器设备、科研费用。(注：此数据由王行兴按最低限度计算提供。)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当时的80000元人民币值90年代多少钱呢?

2、烽火交际处，1959年建，50年代到80年代先后翻修三次，都由国家投资。

3、1964年1月，王保京要搞“土电车”，把牛圈、驴圈、

骡圈、马圈与耕地连接起来，把八九十头牛、驴、骡、马的肥料往耕地送，再拉回土地圈。省长一次拨专款 20000 元人民币支持，并派西安电丰公司技术人员来烽火帮助架线路，改装运输车。运行不到半年废弃。王行日记已载："电车死了。"

4、1971 年，省建材局支持烽火搞隧道青砖窑，设计月产大青砖 15000 块，一次投资数万元人民币。后垮台。

5、1972 年开始，国家投资支持建烽火"农村开放点"，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样板工程，供外国人和外地慕名者参观。"烽火新村"村民住宅、学校、义务厅、展览室、文化室、科研室、接待站设施、车辆（三轮摩托、北京吉普）、各参观点配套设施、服务人员工资，等等等等，烽火除了投入人工费和小部分上建材料外，其余绝大部分物资和资金由国家投入。烽火参观点五花八门，洋洋大观，分列如下:

烽火新村

争气滩

贡献湾

批林坝

批孔坝

"五?七"沟

第一养猪场

第二养猪场

爱社果园

文革砖场

跃进村

红专实验场

英雄林

团结井

胜利井

教育坑

东风扬水站

烽火农械修配厂

烽火医疗站

军民路

抗大窑

义务厅

怀念（毛主席）池

烽火农业科学研究室

“百亩方”丰产田

完全学校（从小学到高中）

其中，1976年12月建的“义务厅”对外介绍经验，是广大贫下中农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投义务工建起来的参观点，规模庞大，960平方米。但是，历史材料记载，这是王保京任县委书记时的礼泉县:“根据形势发展，为了适应

内外事需要”，县财政投资 50000 元人民币建起来的。

每个参观点都有一套结合当时政治形势、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故事或说道。

6、1973 年烽火只付了 2000 元便在县砖厂强行拿走价值 6500 元制砖机一台，后又拿走 28 千瓦电动机一台（使用五年后付钱）。引起县砖厂职工的强烈不满，阻止不成。

7、1974 年王保京以“外宾多，省、地在烽火办学习班,看病人多”为由，要求地区卫生局给烽火一台调光透视机。地区将调光透视机分给礼泉县，礼泉县通知烽火公社卫生院取回。公社书记通知卫生院将已经安装好的机器拆下来，送给烽火大队。

8、1974 年，县卫生局请示主管县委常委同意，给烽火医疗站、产院、托儿所无偿拨款 6000 元人民币。

9、1974 年 6 月，县商业局以“烽火公社供销社在烽火大队盖营业室”为由，给烽火 20000 元人民币，烽火给营业室窑

10、1975—1976 年，地区体委以体育服装费和武术训练为由，给烽火两次汇款 1151.15 元人民币。

11、1976 年烽火搞隧道窑，投资 130000 元人民币，其中 30000 元是省科委白给的“科研费”；省建材局指定给烽火 100000 元低息贷款，期限两年，1977 年 6 月，烽火归还 60000 元本金；尚欠 40000 元本金，1976—1980 共欠利息

3295.22 元，一直催要不付。后隧道窑垮台。

12、1976—1977 年，烽火在县电力局以盖配电室的名义，拉走变压器两台，20000 块砖，五拖拉机上好白石灰（一次一吨），二三十立方米松木板；“借”走 8000 元，不还。电业部门规定，配电室由用户自己修建，县电业局自 1959 年供电以来，从未给用户投资盖配电室，1975 年开始，烽火长期偷电，1978 年查出，作为大案，康世恩副总理批示严处。按规定应罚款 300000 万元，后从轻发落，只罚 16896 元，烽火实交罚款 4118.2 元，欠 17777.8 元，电力部门多次催要，拒交。烽火有恃无恐，1980 年继续偷电，电力部门追补电 68382 度，追补电费 2805.88 元；1981 年上半年烽火又偷电，电力部门追补电费 5000 元。按照规定，偷电必须罚款，对别的村执行非常严格。对烽火，能查出来，追补到电费就不错，罚款根本没门。

13、1976—1978 年，省委党校开门办学，在烽火建立开门办学点，投资 45000 元人民币，计划修建窑洞 52 孔，1260 平方米，灶房 60 平方米，厕所 30 平方米，烽火拿了钱，没盖房。80 年代，省委党校追款，烽火不还。

14、1977 年，咸阳民族学院开门办学，给烽火投资 20000 元人民币。

15、1977—1978 年，咸阳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先后以买传为中，通过银行给烽火汇去 172944 元人民币，名义是市人

防办与烽火合办砖瓦厂。“协议”规定，市人防办投资，烽火砖瓦厂 1977—1985 年九年中每年向市人防办供红砖 2530000 块，以砖归还市人防办的投资。而钱到齐后的 1978 年，“协议”就停止执行了。

16、经常到县水泥厂拉水泥、白石灰、钢材，不付款。累计约拉白石灰一百吨，水泥无法统计。

17、县教育局给烽火学校投资情况：人民币?元

1972 年 5000

1974 年 6000

1976 年 4000

1977 年 1000（县体委给的武术试点服装、设备费）

1979 年 5000

1980 年 5000

合计　32000

这些钱，有的是经教育局会议研究，有的是经局领导碰头决定，有的是烽火学校领导来要，有的是王保京亲自要。

18、县水利局以各种名义给钱给物情况：人民币?元

1972 年　330 水泵、5.5 千瓦电机各一台　1059

1973 年　灌溉用试验管子款　2800

1974 年　地区水电局指拨烽火改河造田补助　15000

1975 年　防汛补助　1000

汛改河造田补助　3000

1976 年 打大口井补助款 1000

1977 年 泾河洪水淹没损失补助款 2000

1978 年 抽水站改造款 5000

450 水泵一台 2486.4

1979 年 购水泥款 1600

喷灌工程材料折价 6072.51

1980 年 深井一眼、中深井两眼补助 17500

120 深井泵一台 5560.12

450 水泵两台 2656.29

喷灌补助 55

1989 年 渠道衬砌 29550

1989 年 渠道衬砌 49250

1990 年 渠道衬砌 30000

1991 年 改田及机井配套 97000

1992 年 河道治理 100000

1993 年 方田建设 100000

合计 473589.32

19、1992 年，县计委资助 800000 元人民币，给烽火搞大棚菜，一年后失败。材料和土地被村干部分光。

20、县财政 1977—1997 年给烽火的无偿拨款：人民币?元

1977 年 拨给烽火棉花栽培培训费

1000

1978年 拨给烽火棉花高产培育费 4000

1981年度 全年拨给烽火接待站 32434.12

1992年 下达事业费预算 100000

1992年 多种经营扶持资金 30000

1993年 科技兴农专项经费 100000

1994年 农业事业费 50000

1995年 支农合作组织资金（市指定拨款） 50000

1995年 烽火接待专款（市指定拨款） 50000

合计 462434.12

21、县计委无偿支持烽火：人民币?元

1992年 以工代赈 200000

以工代赈 100000

1993年 泾河堤防水毁修复 300000

1994 年　泾河堤防水毁修复　　　　80000

泾河堤防　　　　　　　　150000

1995 年　泾河堤防　　　　　　　　150000

泾河堤防　　　　　　　　50000

合计　　　　　　　　　　1030000

备注:

一、据与烽火村民和县水利局核实，1980—1995 年，泾河没有发过大的洪水，每年有一些小洪水，主要水毁在兴隆村，所以也谈不上烽火堤防“水毁”和“修复”。烽火只有一些小型的堤防加固。按理，无论是哪个渠道来的水利工程款，应由县水利局根据全县情况统筹安排，统一调度，统一管理，由县计委直接拨给一个村水利工程款是极其不正常的。

二、据了解，1992 年以前，县计委还有直接给烽火的投资，种种原因，无法详查。

要钱要物案例补遗:

原礼泉县教育局局长梁治英说：当时县里提倡公社办高中，烽火要把公社的高中办到烽火，就成天要钱哩。王保京来找我，拍着我的肩膀说：“老梁，给我拨点钱。”钱拨去后，王保京又来，又拍着我的肩膀说：“老梁，拨得不够哩。再给拨点，”王保京张口，多少要给点哩！不是教育局一家，水电局、电力局、生产资料公司，王保京迟要迟给，早要早

给，多要多给。

高立胜1972—1980年在水利局工作，任人事干事、局党委委员，主管办公室工作，亦主管计划，因为有实权，被人叫做“高拿事”。他说：县水利局是礼泉“富户”每年上面拨给的钱，水利局要占到三分之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么。烽火来要水泥，30吨，给！王保京说“泾河造田”派人来要硝铵化肥做作药，20吨，给！硝铵，国家调拨价，一斤一角二分；黑市价，一斤一块二角钱。钱不钱倒不要紧，关键是化肥紧缺。硝铵拿走后，局干部们在一起开玩笑，说：我的爷！把20吨硝铵做成炸药，能把唐王陵（注：即礼泉县境内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炸平！水利局长段维正说：“有什么办法，人家要就得给。不给能行？咱紧给着，还整天寻事呢！不给能了得。这几年，咱局给的水泥可能都上几百吨了。你们听人咋说哩，把水泥都要去盖居民点和义务厅了！霸道得很。水利局成了烽火的水利局了！”局长不在，烽火来要水泵，2600多元钱的水泵，给！给东西不要钱，王保京也不会给钱。我把话说得难听点，我是舔王保京和烽火的沟子哩！我想定了，给王保京，给烽火，保证没错。局长回来汇报，还说帮他把事办好了哩。局长在也要给。不敢不给，人家有权有势！王保京是在巧取豪夺！烽火村完全是国家喂肥的！当时水利局的资金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上级拨款，二是宝鸡峡水利工程礼泉一、二工区节余款。水利款的

用途，面向全县支持比较贫困的社队的小型抽水站、打井、修库，解决山区人畜饮水，等等，烽火是先进队、富裕队，按理，很难享受这种支持。

王行兴说："几十年来，国家给烽火的支持'输血'数百万，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从已查实的情况看，按照最保守的算法，烽火1958—1995年，国家无偿"输血"现金、实物至少250万人民币。因为横跨五个年代近四十年，考虑各个年代的物价指数和通货膨胀率，250万元人民币远远不是现在的"250万元人民币"的概念了。

烽火从80年代初开始，财政、银行、信用社贷款还本付息情况:

一、礼泉县财政局借款：人民币?元

1984年12月—1987年12月　　60000

1988年12月—1990年12月　　150000

1988年12月—1991年12月　　30000

1991年11月—1994年11月　　100000

1992年　　50000

1993年　　210000

1994年　　600000

（注：1991年11月借100000万元，用于抵还1986年1月的借款100000元。）

截至 1997 年 6 月，还现金 52000 元，用水泥 312 吨分别以每吨 236 元、240 元的价格给县财政局抵借款，其中卖出 112 吨，计 26432 元，其他水泥开提货单未售出。所以，全部借款逾期，欠本金及滞纳金 1121578 元。

二、1985 年 7 月 1 日在县建行贷款 297 万元，期限五年，用于“技术改造”，1990 年 7 月 1 日到期，至今未还，利息累计 429 万元，共欠 726 万元。

三、1986—1997 年在县农行贷款 1160 余万元，绝大部分到期未还。

四、县城市信用社贷款 2448000 元，全部逾期未还。

烽火白拿了国家那么多钱，借贷了财政和银行那么多钱，享受了那么多的特殊待遇，“贡献”如何呢？据县税务局提供的情况，1980—1996 年交税 142 万多元，1988—1996 年农业特产税合计 119312 元，1990—1996 年农业税合计 365033 元。

获得与付出相去甚远。

我们知道，普天之下，皇天后土，得到如此厚待者，当属凤毛麟角。烽火即是凤之毛，麟之角。光用“巧取豪夺”来解释是不够的。“巧取豪夺”仅仅是手段，不是本质。本质是根据时代需要，授予“典型”“巧取豪夺”的特许的权利。

1975 年学小靳庄，烽火社员罗炳昌写了一首诗《幸福全

靠共产党》:

烽火生产大发展，

队里盖起居民点。

有高楼，有平房，

屋顶机瓦砖砌墙。

油漆门，玻璃窗调

社员住进心欢畅。

喇叭响，电灯亮，

男女老少喜洋洋。

翻身不忘共产党，

幸福全靠共产党。

10

一四

王行兴内心的痛苦，已经到了极限。地委调查组正在调查的时候，省委书记秘书和主管农业的副省长秘书来烽火收集资料，他给提供假数据。调查组刚走，王保京就派他和另外一名副书记去省委告状，汇报烽火的光辉业绩，诉说烽火的委屈，控告调查组的结论，虽然他认为调查组的调查是实事求是的，是谨慎小心的。张宏勋在会上说得很清楚:“调查结果，宁说九十九，不说一百一。”王保京秘密交待的事，他都办了。隐瞒账目，阻挠调查组，围堵调查组，不让调查组离开烽火，与调查组辩论。这些都是违心的，但他去做了.

纸包不住火嘛！他一生跟着王保京做了多少弄虚作假的事，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现在还站在第一线挡枪子儿，还在冲锋陷阵。局势扭转了，大家相安无事，一旦翻把，王保京翻脸不认人，说他不知道，他当地委书记不回村，瞎瞎事都是我王行兴领着干的，怎么办？

他在日记中发泄着愤怒。1981 年 12 月 18 日晚：

“一个有头脑的人，在一生把自己的一切，应该有一个长远的安排，考虑，计划。”

“不要被甜言蜜语所欺哄，不要被忙忙碌碌的工作所欺骗，总而言之，不要让别人牵着鼻子前进，否则被利用，到后来悔之晚也。”

“要学会自己走路，独立生活，独立思考，要拿出自己的主见、主张、看法。”

“总结自己的前半生，是上当的前半生，是受骗的前半生，是依靠别人的前半生。”

他开始在公开场合表明自己的观点。

1981 年 12 月底，调查组回烽火开座谈会，他直言不讳：“我们烽火过去说过一些错话，办过一些错事，带过一些瞎头。‘左’的方面，如中央所说，任何地方并无有无之分，只是先和后，多和少。我们烽火‘左’的方面，是多，是先。”岂止是“多”和“先”，而是有创造发明。

王行兴的发言，让调查组和在场的烽火人愕然。王行兴

怎么跟换了一个人似的？谁不知道他是王保京的“大内总管”，铁杆红人？谁不知道他昨天还带着烽火人山呼海啸地与调查组作对？大家都愣在那里半晌不说话。王行兴今天是怎么了？莫非吃错了药，完全不计后果？王保京随便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碾死！几十年的规矩，几十年的惯例，村里再有矛眉，上面来调查，都一致对外。几十年来，烽火人都沾了王保京的光，得了王保京的好处，没有王保京，就没有烽火村，就像歌里唱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种庄稼，化肥再紧张，烽火不会缺化肥，王保京几十吨几十吨地往烽火弄；盖房子，修道路，兴水利，搞科研，建学校，办工厂，要钱有钱，要物有物，除了王保京，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即使王保京拿了钱拿了物，也是拿国家的钱，国家的物，也是为了烽火村。我们不拿，别人也会拿。

王行兴破了规矩，破了惯例。然而，他们不知道，王行兴是烽火最矛眉最痛苦的人。他矛盾和痛苦的根源在于，他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一方面要独立思考，保持独立的人格，一方面紧跟王保京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白天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轰轰烈烈，晚上反省，忏悔，像一个明知故犯的虔诚的基督徒。

一五

形势往相反的方向发展。

1981 年 11 月 8 日，王保京致信地委书记辩解。辩解信

一千多字，全篇语法混乱，错别字 22 个。

调查组 81 天的调查，只在地委做过一次汇报，便搁浅了。

接下来便是城头变换大王旗，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接下来，戏全是王保京的了。这场戏以与历史惊人相似的面貌演义着。

1981 年 12 月 27 日，《人民日报》两名记者来到了烽火。两名记者在烽火过了元旦，1982 年元月 5 日离去。

1882 年元月 7 日，《人民日报》、新华社三名记者来到烽火。

元月 15 日，《人民日报》总编辑来到烽火。

元月 22 日，省委第一书记来到烽火考察。

元月 23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长篇消息，主标题是“烽火大队科学管理好，共同富裕节节高”，一个长长的全面肯定的副标题：“管理井井有条，农林牧副工全面发展，向国家多贡献，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已建成一个崭新村庄，有商店、中小学校、幼儿园、邮电所、俱乐部、医疗站、自来水站等，初步形成一个新型农村城镇。”并在同天的第四版上，用半个版篇幅发表了本报记者的长篇通讯《更上一层楼——烽火大队科学管理经验》。这还不够热情。又在同天一版配发了本报记者述评：《方兴未艾——烽火大队实行

科学管理的启示》。以罕见的、极其隆重极其热情的文字和版面语言，推出新时期的烽火形象。

1982年元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可以说是烽火的《人民日报》，国内新闻版几乎被烽火占完了！消息、通讯、述评一块儿上，从“科学管理”的角度，全面肯定烽火5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的成绩，并妙笔生花，赋予烽火这个老“典型”以“当代”意义，使烽火又一次登峰造极。

没有极其特殊的背景，实现如此规模如此强度的报道，是难以想象的。

还是叫化子王志清那句吉言：“烽火一举，万里为畴!”

报道说：“全国劳动模范王保京领导的陕西礼泉县烽火大队，从坚持科学种田到推行科学管理，取得显著成绩。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到这里检查工作时说：‘这种管理办法好，符合按经济规律办事。’日中农业交流协会代表团考察后也认为，‘这里的农业管理高级了一步’。”

报道说：“五十年代的青年农民科学家，一直希望像用科学方法办工业那样办农业，像按经济规律管理城市那样管理农村。三中全会以后，他这二十多年来的理想开始实现了。去年全大队的队、组干部精简了一半，大队的领导工作反而大大加强了。现在这个268户人家、1387人、1960亩耕地的大队，管理得井井有条，农林牧副工全面发展，得到很好的经济效益。”

报道说："农业这里早就园田化，1971 年来粮食亩产超千斤。1981 年在关中地区严重秋涝普遍减产的情况下，总产仍由 113.3 万斤增加到 115 万斤，亩产由 1344 斤增到 1360 斤。""全大队去年交售给国家的公购粮，总任务是 8.8 万斤，他们坚持把多余粮食按国家牌价全部交售，一共交售 30 万斤，还捐献了救灾粮一万斤和 400 多件衣服，"

通讯上来就说："早在 1958 年，陕西礼泉县烽火大队的科学种田已经全国闻名。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保京想，农业要发展，光抓种不行，还要抓管。当时他曾提出农业生产要工厂（专业）化，农业管理要企业化的理想。由于各种干扰，未能实现。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科学管理才从理想逐渐变为现实。"

通讯说："当年的农业技术学校已办成了科研室，有 100 多亩固定的试验基地，增添了新的仪器和设备，正进行着二十多个项目的试验，其中部分项目已取得成果，用于大田。玉米、小麦亩产千斤的探索也在进行，小麦远缘杂交的试验已到了第十代，颇有希望，"

通讯说："充分利用光能促进农作物增产，也是烽火大队科研的重要课题，早在五十年代就取得重大成果。"

通讯最后总结说："这个队社会风气很好，没有什么歪问邪道，因为党支部作风正，党团员的模范作用比较好，领导干部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支部书记王保京 1971 年就被吸

收为国家干部，先后当县委副书记、书记，地委副书记，但一直坚持不把自己和家庭的户口转到城市，每年都坚持三四个月时间回大队劳动却不分队里的一分钱，连自己的口粮也按商品粮价格向队里交钱。大小队干部、党员多年来所遵循的一条原则就是：坚持参加劳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好党风带来了好民风。如今烽火大队到处洋溢着大干‘四化’的热情和活力，洋溢看爱国家、爱集体、遵纪守法、团结互助的良好风气。”

述评说：“烽火大队学习按经济规律办事，采用‘计量标准’和‘内部流通券’等办法，对各专业进行了一系列的精打细算和巧安排，使各项经济事业产量增加，质量提高，成本降低，取得了比较好的经济效益。群众说，过去是‘干了算’现在是‘算了干’。全队收支清清楚楚，一年早知道，每人每年的全年收入也基本上做到了一年早知道，大大促进了大家千方百计增产节约，增产增收。”

述评说：“烽火大队的科学研究和推广工作能坚持二十几年，因为他们的科研工作密切结合本大队的生产实际，针对性强，边实验边推广，使全体社员越来越体会到科学种田的好处，逐步培养全体社员对科学的喜爱。不仅支部书记、队干部是‘科学迷’，社员中的‘科学迷’也越来越多，现在大队的科学研究室和各种试验田不仅进行着一些卓有成效的实验，也进行着一些很有希望的大胆试验。”

述评说：“社会主义的科学管理要不断壮大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不断增加集体福利事业。烽火大队在不断增产增收的情况下，特别注意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把大队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把社员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结合起来，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既坚持多劳多得又注意共同富裕。三中全会以后，这里农民的生活水平已经超过城市一般职工，社员住房条件和家庭陈设已经赶上甚至超过城市中等水平的职工；大队党支部注意教育社员适当控制个人分配，更多地增加公共积累，不断扩大再生产的投资，不断扩大公共福利，使社员福利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发展密切地联系起来。烽火调队结合科学管理进行了比较经常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在党团员干部的模范作用带动下，全队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团结互助的空气比较浓厚，在物质财富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全村老少的精神面貌也更好了。”

元月 24 日，《陕西日报》头版头条全文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消息和述评。

元月 28 日，《陕西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省委第一书记会见王保京的报道。

报道说：“元月 22 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会见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烽火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保京，仔细询问了当前农村工作、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情况，听取了王保

京关于当前农村形势的汇报。”

王保京仍然妙语连珠，发挥着自己善于归纳概括的政治才能。他说，三中全会给农村带来的变化，可以用五多概括：粮多、油多、肉多、钱多、建房多。他永远拣现时的当政者爱听的话讲，大跃进“浮夸风”如此，1959 年反右倾如此，“三年困难时期”如此，“文革”学大寨、学小靳庄、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如此，三中全会后也是如此。烽火不仅是个摹写板，更是一个放大器，其中真话假话另当别论。

元月 30 日，《陕西日报》头版头条全文转载《人民日报》长篇通讯：《更上一层楼——烽火大队科学管理的经验》。

在党报上下费吹灰之力，烽火完成了从 50 年代“科学种田”到 80 年代“科学管理”的飞跃，完成了从历史虚构到历史“真实”的飞跃，完成了从现实虚构到现实“真实”的飞跃。

这是一次质的飞跃。

这是一次一锤定音式的飞跃。

如果把这些报道与烽火和王保京 50 年代、60 年代、70 年代的报道对照着看，和国家给烽火输血的长长清单对照着看，我想，一定会有一些奇妙的效果。——特别是与 1958 年和‘文革’后期的报道对照着看，得出一些客观的结论是不难的。

搞不清谁的脑子出了毛病。王保京岂止有农业生产“工厂化”理想，他已经给小麦搭了“楼”，盖了房，号称亩产可以达到240万斤！以科学的名义搞浮夸，骗取荣誉，也算是“理想”？用世界上最昂贵的代价种庄稼，财务账严重“五不符”，长期偷电，算是“农业生产企业化管理”？从国家的腰包里大捞好处，靠国家输血装门面，大量国家支持血本无归，算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利用光能促进农作物增产”，在“五十年代就取得重大成果”，大概指的是名噪一时的“田间设计学”，然而，“田间设计学”的参与者，今天回忆起来都不好意思。80年代再把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当作成绩来提，不是拿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玩笑？科学试验丰产田产量作假，“并亩增产”，“瞒亩增产”，“科学”愚昧，“科学”作假，前后算起来几十个试验成功的农作物新品种昙花一现，“书、戏、球”促进“粮、棉、油”，也算是坚持了几十年的科学实验？

玩笑开得也太大了！

50年代、60年代“科学”典型，70年代政治典型，80年代管理典型，随机应变，各领风骚，逻辑似乎说不通。如果换一种说法，“科学”浮夸，政治浮夸，管理浮夸，勉强可以成为并列的逻辑关系。

一张嘴，死的可以说成活的，无的可以说成有的，臭的可以说成香的，假的可以说成真的，丑的可以说成美的，恶

的可以说成善的，愚昧可以说成科学，浮夸可以说成理想，谎言可以说成真理……那么，这世上还有没有客观标准？还有没有真善美？还有没有科学？还有没有理想？还有没有真理？还有没有良知？

烽火的历史还在良性延续，发扬光大。50 年代，60 年代，70 年代，80 年代，烽火的历史被政治家、新闻媒体逐代传递，一线打通，光辉灿烂，一直影响到 90 年代。

谢天谢地，所有历史记录在案，后人有据可查，有案可考。把噩梦说成赞美诗，谎言岂止说了一千遍。时间隔得不长，人们就忘记了谎言和谎言的制造者，人们忘记了谎言曾经导致过莫大的灾难和痛苦。人们忘记了！为此，人们将继续付出代价。

幸好，陕西出过一个大历史学家司马迁。陕西人有记载历史的传统。

一六

王保京左手托着媒体，右手托着权力，“天王盖地虎”，调查组顷刻瓦解。调查人员惶惶如丧家之犬。调查的性质自然成了打击劳动模范，打击先进典型。

这是一次你死我活的超级运作。王保京力挽狂澜，扭转乾坤，成了大赢家。烽火又以新的包装登上了 80 年代的政治舞台。

王保京又可以理直气壮地召开烽火社员大会了。

1982年元月26日，永远的胜利者王保京坐在了台上。他完全控制了局势。台下的烽火人是他永远的听众和子民。他给他们带来过躁动、狂热、不安、恐惧，更给他们带来过荣誉和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使他们有别于其他农民并受到社会尊重，因此，他有理由坐在台上发号施令。他了解农民，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需求是什么。他恐惧的不是官场上的政治对手，因为官场上的政治对手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在官场上，他手里最大的牌是“农民”身份，“农业劳动模范”，“农民科学家”。即使对方有政治实力与他斗，也不屑跟一个“农民”斗，或者害怕跌了身份，或者予以原谅，不跟他一般见识。大家对他几十年的荒唐行为已经习以为常，不荒唐才奇怪呢。逼紧了，会说“农民么”、“劳动模范么”。关键时候营救他的人，也是这个理由。他充分利用了这种心态，每每翻牌，每每得手，打得对手们落花流水。他恐惧的是坐在台下这些不吭不哈本分老实的农民。他们得了好处，但是，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小九九。平时，他们对他言听计从，唯唯诺诺，尊敬有加，他只要一倒霉，他们便可能抛弃他。“文革”初期就是如此。大队革命委员会成立，他只被结合为一个委员。他们能老老实实坐在台下听他讲话，挨他训斥，是因为他现在还有权有势，还会继续给他们带来好处。被台下这些人抛弃，才是真正的抛弃。如果台下这些人起来和他作对，才是他真正的末日。

王保京一番话，为这次较量作了总结：“《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陕西日报》头版头条，×××书记同我谈话，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指导。党中央说话了！省委说话了！为我们撑腰打气。我们要挺直腰杆干，重整旗鼓，轻装上阵！”

一七

所有的信息都向外界证明，王保京不仅没事，而且继续大红大紫。

新的地委书记走马上任。但是，所有常委心里都清楚，无论是老书记还是新书记，都不能回避地委调查组81天的调查报告。老书记调到省委工作，还不时打电话来催促开常委会讨论调查报告。新书记只是打哈哈。大家都在等着。

一天，地委常委会从下午开到了晚上，饿得大家肚子呱呱叫。会开完，大家正准备走，被书记喊住：“大家先别忙走，我还有点事通报大家。”书记从兜里掏出个小笔记本，一页一页，慢腾腾地翻着。一面翻，一面念念有词：“别忙，别忙……哦！翻到了！”书记说：“我给大家念一下。我临来时，×老找我谈话。×老说，王保京同志是个老劳模，没有什么大事，要妥善安排工作。好了，通报完了！散会！”

不久，咸阳“地”改“市”，王保京改任咸阳市管农业的副市长、市委常委。

舆论先导，权力呼应，组织落实——好一个三级跳！动作完美无缺！

一八

调查报告及其附件一两尺高。

“弄了那么多，咋办哩？”马云溪一脸愁容。

“咋办？放在那里嘛。”张宏勋也无可奈何。

他俩都被装进口袋里了。他俩都戴上了反烽火的帽子。张宏勋运气还不错，因为是大学生，赶上“干部年轻化、知识化”潮流，虽经王保京阻挠，仍选上咸阳市副市长、市长，又调省粮食厅任厅长至今。

马云溪惨了，两三年没有安排职务，最后由老地委书记帮忙，调进了省人大。

1983 年 5 月 24 日，地委副书记传达地委书记指示：此案“已经结案。调查材料交档案馆”。

所有调查材料被架子车送进了咸阳档案馆，成了“永久”睡觉的档案。

一九

王行兴还是那么自信。他认为，烽火的事情并没有了结，烽火这笔账早晚要清算。他了解下面人的情绪，这些情绪，如同酝酿的火山，早晚要喷发。

他说：“社会舆论这个东西，农民讲话，斗量不成，秤称不下，眼见不着，手摸不着。大家心里有一杆秤呢！舆论在人的心里呢！”

1996 年 8 月，有王保京二公子王农业参予的烽火硫酸毁

容毁身案揭露后，烽火村的真实面貌在公众面前亮相。谁都不会料到，王保京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土围子，竟是由一个极其普通又极其刚烈的农村妇女武芳突破的。

伤天害理的事做到这一步，烽火这场戏该收场了。

王行兴几十本日记摆在了我的面前。日记本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王保京和烽火村几十年的风云都在里面记录着，王行兴几十年的酸甜苦辣都在里面记录着。

王行兴把日记按年代顺序一本本取出来，抚去封面的灰尘。灰尘顿时在斜刺进来的阳光中显现出来，化作成千上万的微粒，急速分解、弥漫、奔突。

王行兴将王保京和烽火村和盘端出。

01

一

郭裕禄是个黑脸人，从省纪委出来，搭拉个脸，脸更黑;眼皮本来就长，再气得搭拉着，样子吓人。他在陕西，也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他是礼泉县离烽火只有十几里路的小村庄袁家村的党支部书记。翻开他的履历，亦是显赫：党的十一大、十二大、十四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党务工作者，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礼泉县委副书记，1995 年 8 月前，《人民日报》、新华社连续刊登五个关于郭裕禄的“内参”，涉及内容，条条都是杀头的罪——盗窃唐昭陵国宝壁画，用大货车到云南贩卖大烟，肆意挥霍国家扶贫款 500 多万

元……目无国法！这还了得！中央领导批示，省纪委立案，查了个天翻地覆。查了一年多，结论是：纯属诬陷！写“内参”的记者都是与烽火村和王保京几十年的老关系，王保京本人并动员别人制造伪证，欲置郭裕禄于死地。

省纪委书记向来访的新华社记者总结说：这是一次蓄意的诬陷活动，其特点是，一、无中生有，如贩卖大烟；二、功过颠倒，如昭陵壁画被盗并破案；三、混淆事情性质，如500万财政借款。

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社会报》三家记者调查，证实了省纪委书记的总结。

一位省委副书记说：我在最初接到的告郭裕禄的材料上批示，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把问题搞清楚；郭裕禄是个好同志，有正义感，有贡献，控告的那些问题都不存在，不应让他背上包袱，受打击。省纪委李焕政同志的结论是最权威的。

原咸阳地委书记说：这是一次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要分清是非，诬告者应该追究！

王保京为什么要置郭裕禄于死地?

二

虽然查了一年给了个没事的结论，郭裕禄仍然感到满腔的郁闷。傍晚，他独自踱出饭店，在路边的小摊上，吃了一碗牛肉面。“双份牛肉！多余放些辣子!”他说。一把大蒜下

一碗被辣椒染红的牛肉面，热汤，热面，大蒜，辣椒，加上西安7月的伏天，直吃得心火燥热。吃毕，付了账，他用店家粗糙的手纸把嘴一抹，起身离去。天已擦黑，不想回饭店，去哪儿呢？走，听戏！

贴护城河往北走，不到一里路，便是西安城东门。东门城墙下，一大块空场地，白大小商小贩摆地摊，做买卖；晚上便是秦腔戏迷的天下，一对巴板胡，板胡声脆冽清扬，越过城楼，直向夜空。

或坐，或立，戏迷们早就围出了场子。郭裕禄拣那不近不远处圪蹴了，点一根烟，静静地品味。

都是业余搭档。唱罢一曲，再唱一曲，便有人喊："来段《舍子》!"

好个《舍子》!《舍子》是《金沙滩》最精彩最悲壮的一个唱段。宋朝时，辽国入侵，围困宋仁宗，兵陈金沙滩，胁迫宋仁宗赴宴，要么降之，要么杀之，欲夺大宋江山。杨家满门忠良，危急中，杨继业杨老令公毅然决定杨大郎装扮宋仁宗赴宴，用身家性命掩护宋仁宗突围，精忠报国，家破人亡。金沙滩一役，大郎、二郎、三郎、八郎战死沙场，四郎被俘，五郎突围后出家，留下了六郎、七郎，杨老令公悲愤交加，撞碑而亡。《舍子》是杨老令公决定大郎装扮宋仁宗赴宴后的一个唱段。

杨继业唱道："事急了才知把佛念，怀报着王柄满腹寒。

老杨业大佛殿拿本见，万岁耐烦听心间。太平年主公摆酒宴，庆贺文武到殿前。主公你推樽不饮倒桌前，你一心五台把景观，保主的忠良臣将都不见，还有潘仁美狗奸谗。主一心要把活龙见，毒龙出水遭险难。杨七郎我儿掌剑把龙斩，怀报龙头跪主前。主封他斩龙将军官爵显。潘仁美一旁进谗言，哄吾主幽州把景玩。老臣拦挡把本参，他言说为臣是反叛。你言道为臣误江山，你一言不当将臣推下要问斩。万岁呀！多亏了八王贤爷拿本参，才将臣死罪免了活罪难免，把臣囚在五台山。北国鞑子又造反，要叫为臣到阵前。保主驾的忠良臣将一个一个都不见，又不见仁美狗奸谗。纵然你受了这艰险，你看哪家忠来哪家好……”

皇帝昏庸，忠好不分，奸臣当道，忠良遭殃。这戏听不下去，摁灭烟头，走呀！

民间的是非好恶倒也简单，道德为界，忠臣奸臣，清官贪官，正义邪恶，等等，听戏，除了个人偏好，亦多与现实对位，娱乐之余，对戏说事，发现实之幽怨幽伤幽愤。

往回走，后面传来《诸葛祭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出帅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可惜呀，聪明盖世的诸葛孔明辅佐的是一个听信谗言的昏聩阿斗。戏台上的诸葛亮本是一身黑衣，满心凄凉。郭裕禄也不合节拍，不合旋律，旁若无人，拉着嗓子兀自唱：

为江山气死了周瑜少年

为江山我也曾南征北战

为江山我也曾六出祁山

我也曾西城弄险

把亮的心血劳干

……

02

三

与烽火比，原来的袁家村是个小巫。70年代初比，甚至连小巫也不是。三十多户人家，五百多亩耕地，多是坡地瘦地石头地。袁家是老户、大户，故称袁家村。郭家人丁兴旺，是仅次于袁家的大户，其次是王、张、阎、杨、曹、龙、宋等姓，都是不同年代逃荒要饭聚集到袁家的。袁家村是个地地道道的逃荒要饭移民村。“土改”时，袁家连个“团结的对象”——富裕中农都没有，所以几十年没有“阶级斗争”。穷哥们对穷哥们，没有阶级斗争的对象么！这在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年代，可是一大缺陷，或是一大遗憾。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像是三条安身立命的腿，袁家缺了一条腿。你想，三条腿行走的年代，只有两条腿行走，如同跛足的怪物，怎会迅跑如飞？所以，翻开袁家70年代崛起的历史，没有“大批促大干”的历史，没有“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历史，没有“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只有“撅着

沟子傻干”的历史。所以，“学大寨，赶烽火”，在袁家，装装门面而已，其精神实质没法学，条件先天不足。

王保京出名的时候，郭裕禄还是个撒尿和泥横着抹鼻涕的碎娃。郭裕禄 1971 年当袁家第 36 任队长时，王保京已经是礼泉县委副书记了，还有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农民科学家、全国人大代表、党的十大代表等等红帽子戴着呢。郭裕禄从小长到大，从不懂事的碎娃到生产队长，看着十几里路远的烽火红红火火，羡慕得晚上睡不着觉。他读书的时候，背的馍，只能吃个七八成饱，舍不得花一分钱买学校预备下的酱油汤，嘴对着水龙头，咕嘟咕嘟往下顺馍。所以，这位生产队长向社员宣布的“远景目标”难登大雅之堂：一年苦干，每户缝上一套新衣服；三年苦干，不吃“返销粮”，每户缝上一床新被子，小伙寻上个媳妇子。

台下，有人欢呼，有人鼓掌，有人撇嘴。欢呼鼓掌的人，既带着希望，更带着调侃。有一种极致的说法，袁家的男人，除了一个瞎子，一个跛子，一个矮子，一个哑巴，十几年时间，走马灯似的换了 35 任队长，都轮遍了，再也找不着人，找了个放鸽子、撵兔子、“丢方”（注：“丢方”，关中农民的一种简易棋，类似围棋，有五方、七方、十三方之分，横竖七道线、四十九个交叉点，谓“七方”。双方执“子”，在交叉点上轮流放，谓之“丢”；谁先占一个方块儿，谓之成一“方”，可以吃掉对方一“子”。所谓“子”，是土坷垃、石

子儿、杏核儿、桃核儿、秸杆儿、树枝、树叶等就地方便之类。“子”丢满后，各拿掉对方一“子”开始走方，走的目的还是成方，然后吃掉对方一“子”、还可以把已有的方拉开又合拢，吃对方一“子”。最后谁一子不剩便为输。“丢方”还有“围方”和“恬方”之分，事先讲好，“恬方”不围，与“围方”相比，不咄咄逼人，不招招见血，输赢较平和。这是陕西人的智慧，争斗不必刀光剑影，既有刚性的游戏规则，又有柔性的游戏规则，根据偏好，自由选择，留有余地。一个“恬”字，用得飘逸，稼穑劳累之余，汗流浃背、蓬头垢面的庄稼汉，居然可以“恬淡”、“恬静”、“恬适”、“恬然”地君子一般地进行厮杀博奔，是为奇观。农民更喜欢选择七方，下完一次，抹掉，叉开手指，横竖四次各七道，便可划出“方”来）、掷骰子、不懂庄稼活的愣冲闲人。袁家已经到了拿大家生计开玩笑的地步，倒是活出了境界。所以，郭裕禄的“远景目标”定得再低，大家也没拿当回事。大家高兴的是，终于选出了个队长，不管队长咋样，算是让上面马拉松选队长大赛有了个结果。撇嘴的人可能更真实。35任队长是袁生瑞老人，一上任，就不打算长干，“忙后”，不交公粮，把粮食分光吃尽，说是省得吃“返销粮”，交给国家，国家再返销回来，来回折腾，干脆一步到位；不等公社来撤职，回家床上一躺，自动卸任。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公社离袁家不到两里路，公社干部也不愿来，确切他说，是不敢

来。袁家穷得难缠，穷得事多，到别的村，必经袁家，也绕着走。老队长留给郭裕禄的烂摊子，可用一个专门描写袁家的“顺口溜”来概括：

吃饭呢，没盘；

腌菜呢，没盐；

睡觉呢，没席；

花钱呢，啬皮；

种地呢，不长；

分粮呢，乱抢。

住的地窖，

养的母猫。

贼来了不管，

贼跑了不撵。

门关住，吵架呢；

吱哩哇啦打娃呢。

地窖，又叫“地坑窑”。平原不能像山区那样依山挖洞筑窑，贫困的地方盖不起房，平地往下挖一个 25 米见方、10 米深的大坑，东面、西面、北面筑窑，南面大斜坡上下窑。窑洞高 6 米，进深 20 米。人、猪、牛、羊、鸡、鸭同住一窑。袁家大多数人家住的是地坑窑。这地坑窑，最怕的是雨水，山上洪水一来，五六米深的蓄水井根本不管用，不及时跑出来，所有生物，顿为鱼鳖。

1973 年，洪水真的来了。

已是午夜 11 点过，郭裕禄开毕会不回家，躲在“娘娘庙”谝，只听得庙门外大雨倾盆，炸雷掀天，势头罕见的凶猛。“我的爷！雨咋这大！要出事哩!”他念叨着走出问，大风大雨迎面扑打过来。

“咔啦啦——”闪电撕破夜空，“我的爷”！四面筑起了雨墙，几米开外见不到人物！

“轰隆隆——轰隆隆——”的声音自远处席卷而来。一会儿，洪水灌进了村东北角的砖瓦窑，冷热一激，窑内热量急速膨胀，像是引发了一颗大炮弹，“嘣——”的一声巨响，借着闪电，能看见几十丈高的热浪腾空而起，没有烧熟的砖块漫天飞舞。

哎呀！村外抽水站大坑的窑洞关着十几条牛呢！十几条秦川良种牛，三年的心血，是全村人的命根子。

历史上，袁家人养不起牛。耕地，人拉犁；打场，人拉碌碌。郭裕禄当选队长，第一件事就是想着养牛壮大集体经济。可他是个光杆司令，会计账上有账没钱，村里大多数人都欠着集体的钱，没钱的还不了，有钱的也不还，陈年旧账，越累越多，恶性循环。要买牛，就要清欠，清欠拿谁开刀，群众都瞪眼看着呢。郭家亲兄弟四个，郭裕禄行三，加上叔伯兄弟八个，郭裕禄行七，因此，村里人又叫郭裕禄“老七”。六个哥哥，家家欠款，他们不动，村里其他人个个动不了。

“打虎离不了亲兄弟”。可眼下，打“虎”要先打亲兄弟！

农村村一级基层干部的权力基础，除了上级信任外，一般有两条，一是大家族利益的代表，一是自己有超常的个人能力。无论是大家族还是小家族的人当村干部，其中总要占一条，否则无以立足。郭裕禄的当选，主要是前者。在此之前，他的个人能力并没有显示出来。家族的支持，是头等重要的事情。要获得家族的支持，就必须维护家族的利益；可是维护了家族的利益，又会侵害其他村民的利益，失去广大群众的支持。要么得罪家族，得罪的是少数；要么得罪群众，得罪的是多数，利弊得失摆得清清楚楚。以往的干部包括他的兄长们都过不了这一关。

郭氏家族是袁家村的大户，郭裕禄一支又是郭氏家族的大户。郭裕禄亲房一辈，兄弟八个，依次为天禄、西禄、举禄、永禄、积禄、福禄、裕禄、友禄。八个“禄”，八只虎，十六个精壮拳头，除了郭老七，个个长得人高马大，而且各有特点。老大天禄，长房长子，父亲在世能当一半的家，父亲去世便是郭家的掌门人，操持穷家，工于算计，人称“瞎瞎绅士”。老二西禄，老三举禄，老四永禄，老五积禄，老六福禄，老八天禄，裕禄以上，都当过干部。阵容摆开，谁敢惹，谁敢碰？

清欠，社员大会宣布，15天期限，15天过去后不见动静。郭裕禄恍然大悟。他把头一拍：“我咋这瓜哩！”群众看

干部！立即开了个干部会。“清欠，先清干部，先从我清起！”他说。他家欠队上170元，卖了“飞鸽”自行车，不够，又去把母亲卖鸡蛋的钱“动员”出来；不够，又出去找朋友借，里外凑够了，交给队上。队干部还清了欠款，又开社员大会，限15天还清欠账。

15天又过去了，还是不见动静。社员中传出风来，欠钱的大户是你郭裕禄的亲哥福禄么！你福禄哥一家就欠了700，盖了新房，买了自行车，他咋不先还？700，当时可是笔巨款。看你郭裕禄咋办呀。

福禄谁也惹不起，老高中生，当过队长，一米八几的个，膀大腰圆，要说会说，要打能打。

郭裕禄撵鸭子上架当队长，家族反对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害怕得罪人，害怕几十年维系的关系毁于一旦。乡村社会，维系人际关系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劳作耕耘，鸡犬相闻，亘古不变的土地，千丝万缕的血缘，把人们牢牢地拴在一起，同生死，共命运，除非万不得已，决不会恶言相加，大动干戈。

郭裕禄私下找福禄：“福禄哥，你欠队上的钱咋办呷？”意思是“我刚当队长，你给我点面子”。

福禄都不正眼瞧他，冷冷地说道：“没钱。”

“福禄哥，咱队穷，你也当过干部。再说，你盖的新房，就拿的是队上的钱么！”前十句说队里穷，福禄清焚，“干一

天，买不起一包‘宝城’烟”。当时，一包“宝城”烟一毛多钱。郭裕禄接手队长，夜间点灯喂牛的一斤煤油部买不起，喂牛都是点千秸行秆照明。后半句话就听不得了，分明是在揭老底嘛。

福禄一听这话，抻着脖子喊：“咋说（尸从）不顶！没钱!”

郭裕禄今天便被逼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福禄这个挡道的大石头不搬掉，他断难继续执政。

福禄不给面子，敬酒不吃吃罚酒。

一天吃毕午饭，郭裕禄亲自出马，率领几十条精壮汉子，来到福禄家。

“福禄哥，队上的钱你倒是还也不还？”他说。

“没钱，拿啥还？”福禄说。

“你没钱，咋买得起缝纫机自行车，咋盖得起房？咱队上有哪家买得起缝纫机自行车，有哪家盖得起房？”他质问。

“……”福禄顿时语塞。

“还不还，给句话!”他搭拉着眼皮，面无表情地说。

“……”福禄不说话，抬眼瞟了一下老七背后的几条汉子，鼻子“哼”了一声，意思显然是“你吓唬谁？今天能把我咋？”

只见裕禄手一挥：“不还钱，拿东西抵。”

“抬缝纫机!”

“抬自行车!”

“拉羊!”

他频频令下，十几条汉子扑进了福禄家，抬缝纫机的抬缝纫机，推自行车的推自行车，拉羊的拉羊，一时间，福禄家里乌烟瘴气，鸡飞狗跳。

好个老七！真敢下手呀！平时能说会道的福禄这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大骂“土匪！土匪!”

“上房！溜瓦!”他根本不在乎福禄怎么骂，继续下令。

倏地儿个人上了房。

农村人，上房揭瓦，比挖祖坟还厉害。福禄大张着嘴，噎得骂不出话来。

老七铁石心肠，老二只好认输，赶紧借钱还钱。

从此，兄弟失和，好几年见面不说话，视若路人。

“其实，我是吓唬福禄哥哩！他有能力还钱么。真把他家的东西抬去卖喽？”郭裕禄说，“我是杀鸡给猴看。大家一看拿福禄开刀的架式，知道躲不过去，卖东西的卖东西，借钱的借钱，不到 15 天，村里十几年三千七百多元的欠款全部还清。不得了啊，三千七百多元，买架子车，买胶轮车，买牛，办成了多少做梦都在想的大事。咳，没有这场大闹，没有袁家的今天!”

掐指算来，27 年村干部，得罪的大都是自家人，从老大天禄到老八友禄，有一个算一个，七兄弟全得罪了。有一年

拾棉花，眼见天气转坏，抢不及时，满地银子一样的棉花就泡汤了！男女老少齐动员，抢拾棉花，老大天禄媳妇却不出门。郭裕禄去责问：“咋不去拾棉花？”天禄媳妇借口“没有拾棉花的兜”。郭裕禄气急了，一把扯下大嫂的花布门帘：“去，扎个兜!”

有一年，老八友禄私自做主，卖掉了村里的日本“三菱”大货车，说他的时候还犟嘴，郭裕禄几拳过去，打伤了老八，打断了自己的小指头。自然又是兄弟几年不说话。

洪水来了，赶快救牛!

袁家的牛场，是三条小牛发展起来的。郭裕禄当政，提倡买牛。刚当队长，还没有胆量清欠，只好厚着脸皮各家各户借。袁家人看见老七办事公道，没有私心，东家几角，西家几块，从骨髓牙缝里挤出了 360 块钱。郭裕禄拿着 360 块钱，手心发烫，眼睛发潮。手里捏着的，不仅是钱，更是信任。买牛是件大事，而且，一次买三头牛，既隆重，又慎重。除了村里几个通牛经的老汉，他还从县上请来了“牛经纪”老康康彦海，镇上请了“牛经纪”老董董正书。买牛不能没有牛经纪，牲口市场风云诡谲，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不仅要通牛经，还要通这里的人情世故和秘而不宣的规矩。只要牛经纪死心塌地地帮忙，被他们盯上的牛，不会有错，准会少花钱买好牛。比如，他们看上了一头牛，牛头上有一块白点，便会不动声色地跟卖家说：“这牛要赶快卖哩!”“咋？”

卖家问，“它头上有颗丧门星!”牛经纪说。丧门星？不光牛有问题，还会给家庭带来厄运。牛经纪一张嘴，便摧毁了卖家的自信。“你看这牛值多少钱？”卖家问。牛经纪便把手伸进卖牛人的袖筒里，一阵紧张的捏咕。外人不知道袖筒里捏咕啥，只见牛经纪从容不迫，卖家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直到牛经纪把卖家折磨得无可奈何了，讨价还价便有了结果。牛经纪再去跟买家说:“那是一头好牛。”“咋好？”买家问。“你看，头上长着一枝花哩!”牛经纪说。“多少钱哩？”买家问。接着又是袖筒里的捏咕。牛市场往来行人，匆匆忙忙，交头接耳，喧哗叫卖，烟尘弥漫，表面而已，风云际会都在袖筒之中。两边捏咕，两边撮合，最后成交，皆大欢喜。卖家转走了“丧门星”，赚了钱；买家和牛经纪的好处就不用说了。牛经纪的重要可想而知。

那时候的郭裕禄，穿着一件没外套的破棉袄，说是“蓝”棉袄，实际已是白棉袄，早已风吹雨淋洗褪了色，好几处棉花吐出了“舌头”。“我这身打扮去买牛，卖牛的说我是骗子哩!”他说。

袁家这个穷光蛋，要想少花钱买好牛，非有几个真心帮忙的牛经纪朋友不可。穷光蛋维持牛经纪，要钱没钱，要物没物，只有使不完的情和义。康彦海老汉无后，眼疾，西安住院，他专门派贫协主席到西安伺候。老汉缺粮，队上粮食再紧张，也要送点过去救急。他只要进城，都要去看看老汉，

晚了干脆住在老汉家，彻夜请教“牛经”。久而久之，倔老汉康彦海看见郭裕禄这个小伙子心地实诚，虚心好学，遂与郭裕禄成了莫逆之交，直至养老送终，自成佳话。

经康老汉和董老汉挑的秦川牛，个个都是好样的。俗话说：“关中道，秦川牛。”秦川牛，是关中特产的良种重牛，看上去，爱煞人：白鼻梁，白蹄子，红毛，大个，圆疙瘩犄角，像一尊尊温厚而倔强的神灵。

牛神，牛值亦神。袁家牛倌杨兴民，侏儒，身高一米一，年龄比郭裕禄略长，村里人叫他矮子杨兴民。矮子杨兴民爹妈死得早，随其兄到袁家上门，其兄改姓袁。矮子杨兴民身有残疾，依附其兄，一生不敢奢望，苟且生存而已。

袁家以往养牛，有“顺口溜”云：“牛哭哩，猪笑哩，饲养员往回偷料哩。”说的是饲养员损公肥私，把集体喂牛的饲料偷回家喂猪，集体的牛饿瘦了，私人的猪养肥了。杨兴民不这么干。他养牛尽心尽责，死心塌地与牛为伴，以饲养室为家，铡草拌料，看病喂药，牛比人高，人出出进进，穿行于牛裆胯之间。牛与人自有默契，门一响，便知是矮子，不用仰视，大眼对小眼，平等迎将进来，自然是欢呼雀跃，“哞——哞——”长鸣。牛饿了便召唤他，牛饱了就与他嘻戏，耳鬓厮磨，拍打腾挪，然后飘然离去。平时在村里尽量躲着人走路，害怕人笑话他嘲弄他。只要进了牛圈，看到秦川牛善良的眼睛，恐怖和压抑便一扫而光。与牛对话比与人

对话安全。他的聪明和善良可以在牛们面前表现得淋漓尽致。牛们似乎善解人意，不吭不哈地听着小矮人絮絮叨叨，喜怒哀乐。一个小矮人与一群牛，牛喜欢小矮人，小矮人更喜欢牛，人牛合一，其乐融融。小矮人喂的牛，个个壮得跟蜂子蛰过一般。集体的牛越喂越多，公牛母牛延续着后代。牛丁兴旺，他却黯然。他杨兴民来世上走了一遭，什么都没给世上留下，想女人，哪个女人会瞧得起他？农村人有规矩，一辈子光棍汉，死了都不准进宗族的老坟，只能荒地里草草埋了。他闷闷不乐，独自一旁惆怅。

郭裕禄揣摸透了杨兴民的心事，却故意问道："兴民想啥呢？"

除了牛之外，这刚上任不久的郭队长郭老七，就是最贴己的人了。

"……"他不说话。

"我不知道你？想女人！"郭裕禄说。

被猜透了心思，小矮人的脸红到了耳根子，冲着郭裕禄傻笑。他都快三十岁了，女人气味儿都没闻过。他是袁家最后一个光棍了。

"嗨，终归是个人么。"郭裕禄轻轻地一叹，留下了一桩心事。

一年春节，郭裕禄到党村同学家拜年，同学母亲说，村上有一个瞎子，小名"翠儿"，说不出去，爹妈着急得很。

郭裕禄一灵醒，忙说：“嗨，咱村有个矮子。瞎子和矮子，说不定能配成一对哩。”

同学母亲说：“那我找来给你看看。”

领来翠儿一看，除了眼瞎，哪儿都好好的。“陷的很么！”他心想。便跟翠儿说：“我村的矮子，人矮一点，精灵着哩。”

翠儿的脸，羞得绯红，嘤嘤地同意了。

一看有戏，郭裕禄赶快张罗。

话说“是媒不是媒，要跑七八回”。一个瞎子，一个矮子，都是残疾人，瞎子由爹妈主事，矮子由哥嫂主事，郭裕禄袁家和党村之间岂止跑了七八回。

翠儿爹妈倒好说话，女儿这么大了，养在家里不是办法。矮子的哥嫂却有自己的小九九。矮子的哥叫袁生西。袁生西对郭裕禄说：“这是个矮子，那是个瞎子，我们将来咋养活哩？再说家里穷，哪来钱说兄弟媳妇哩？”

郭裕禄心想，谁养活谁？矮子的脑袋比你当哥哥的灵光得多，在队上养牛，都是满分工，工分比你挣得多。矮子挣的工分都给了哥嫂。你们是想拿矮子当长工哩！他不想把话说破，说破了，面子上不好看。“说媳妇花钱的事，你们不管。”他说。

他和矮子的哥哥说：“你们爹妈死了，你当哥哥的，就跟父亲一样，有责任给兄弟定婚事哩！”

他和矮子的嫂子说：“你给你兄弟寻个媳妇，可以落个

好名声哩！你要是不寻，村里人会永远谴责你们的。”

从头至尾，他不让矮子的哥嫂插手。正式上女方家说媒的“四色礼”——一双鞋、一双靴、一身衣服、一根皮带，都是他亲自操办，拎上送去。

呀，高兴起来，差点把一件大事忘了。结婚，就要干那件“事情”，就要生娃传宗接代，矮子虽说经常在一起谝闲传，还经常不回家，跟矮子睡在一起，却不知道矮子胯裆里那根“家具”顶不顶事。这事不落实，心里不踏实。安排矮子和瞎子见面时，这事情必须搞清楚。

他让袁有才把矮子骗到一个僻静的去处。

“兴民，让我把你挨球的‘家具’看一下。”他笑眯眯地说。

矮子一惊，撒腿就要往回跑，无奈腿短，没跑出几步，便被袁有才拎回来。

“有才，把挨球的拉住，裤子一脱，把挨球的‘家具’看一下，别结婚后没情况。”

矮子紧抓住裤腰，挣扎着不让看。

有才三下五除二，便把矮子拾掇了，压在地下。郭裕禄一把就扯下了不到一尺长的小裤子，“家具”暴露无遗。

“嘿！这挨球的‘家具’大得很么！有情况！没问题!”郭裕禄乐了。

矮子害羞，坐在地下不起来。

“咋，不起来，我把你挨球的裤子拿走哩！让你挨球的精沟子回去呀!”

矮子赶紧爬起来，接过郭裕禄扔过来的裤子。

郭裕禄探明了矮子的“家具”没问题，便约时间男女双方见面。自然是矮子去党村见瞎子和未来的岳父岳母。矮子一听女人多的地方，吓得要死。

“不去去哪？早晚都要见面哩。”郭裕禄说。

“去哪里都行，就是不去党村。”矮子说。

不去女方家，总得在女方家的地面上吧。郭裕禄的主意，双方也只能同意，在党村外的苹果园见面。

苹果树绿了。

油菜花开了。

袁家、党村相隔十里地，郭裕禄骑自行车驮来了杨兴民。这边是郭裕禄和杨兴民，那边，翠儿由她父母陪着。

他们终于见面了。杨兴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得那么干净整齐：黑布鞋，黑裤子，白衫子，戴着一顶蓝帽子。翠儿短发，蓝裤子，白塑料底布鞋，红底碎花布衫。

翠绿掩映，满地的金黄，春风吹来，周身搅裹着油菜花和果园的芬芳，两个天生不幸的男女青年相会，竟是这般诗情画意。

不管怎样，到荒郊野地来定终身大事，终究是件尴尬的事情。乍一见面，自是僵持在那里，左顾右盼，好生嗫嚅。

杨兴民生来怯懦，打小就见不得人，打小就觉得世事与己无干，从来没有充当过也不可能充当某一事件的中心人物，从来没觉得自己重要过，今天突然成为了中心人物，突然变得重要起来。临出门，说什么话，郭裕禄都是教好的，这时节，胆魄早就吓飞到了九霄云外，恨不得变作土行孙，遁进地里去。

“兴民，你挨球的，舌头被狗吃了？在家咋说的？”郭裕禄不耐烦了。

“我……”杨兴民继续嗫嚅。

“你挨球的……”郭裕禄要骂人了。

“裕禄，我说！我说嘛!”杨兴民压低声音哀求。

“我有缺陷，腿短，做活没问题。我是个勤劳人，能吃苦。”杨兴民跟翠儿说。

杨兴民有郭裕禄一旁助威，更仗着翠儿看不见他的人样，声音洪亮，话说得实在，翠儿心里满自欢喜。

“我眼不好，以后是个拖累哩。”翠儿跟杨兴民说。

“只要咱俩事能成，我保证将来不让你吃亏。”杨兴民说。

两下说合，郭裕禄抓紧给翠儿家送过去十斤棉花，缝一床新被子，择吉日过门呀!

矮子杨兴民说上了媳妃，自然是袁家最大的新闻。

郭裕禄晚上回家，得意洋洋地和妻子说：“芳兰，你说

不行，我说能行，现在咋样？”

芳兰说：“你这人，咋啥事情都管里。”

郭裕禄说：“他也是个人么。”

03

四

“洪水下来了！……”“洪水下来了！……”郭裕禄呐喊着，三步并作两步往牛圈窜，洪水跟着他屁股后面追来。袁家的牛圈是村外大坑里的几拱窑洞。大坑有二十几米深，六七十米长，五六十米宽；坑底是抽水站，往背面源地打水，南面是牛圈，东面是行车行人的大斜坡，娘娘庙在大坑东面，郭裕禄出娘娘庙，顺着大斜坡往牛圈跑，他跑到牛圈，水也追进了牛圈。牛见洪水，“哞——哞——”惊叫，急于挣开拴在柱子上的缰绳。牛使劲，绷紧了缰绳，平时一拉就开的绳扣，一下子别死了，郭裕禄急忙解不开。他急中生智，三步并作两步窜进料房，漆黑一片里摸到铡刀，抽去连接刀座和刀片儿的铁栓，举铡刀，连连斩断缰绳。这时候，北面源上的水渠决口，洪水从坡头上倾泻而下，东、北夹击，大坑水位急速上升，牛还没有全出去，水已经淹到郭裕禄的脖子了，最后一根牛缰绳斩断时，水已没顶。我的爷！这位袁家的新当家人不通水性。好在他手急眼快，拽住了牛尾巴，牛把他带出水面，带上岸。他救了牛的命，牛也救了他的命，一报还一报。他刚上岸，不一会功夫，洪水就把大坑填满了，

又向地势低洼的东北方向涌去。

狂风，暴雨，雷电，来得块，去得也块，洪水还在汹涌肆虐，头上已是晴空万里，一轮明月。哎呀！不好！忙着救生产队的牛，芳兰和三个孩子还不知死活哩！岂不知他在抢救牛时，他家的水已经漫进门坎儿了。

他站的高坡，离家只有一百多米远，可是看得见过不去，中间被洪水隔开，他扯着嗓子喊：“芳兰!……芳兰!……”

“在哩!……”芳兰答应。

“人都好着没？……”他问。

“都好着哩!……”芳兰说。

“水还大得很！赶快上树!……”他喊。

他家门前，有棵老杏树，满树的杏子已经翻黄。芳兰怀里抱着两岁多的儿子，带着两个女儿，一家四口爬上了杏树。芳兰埋怨：他心里，牛比我们娘儿四个重要!

五

郭裕禄选上队长不久，骑上自行车，悄悄一个人，溜进了烽火。

“我们也是人，人家也是人，我们为什么穷，人家为什么富？”这个问题一直索绕心头，排解不开。“心里羡慕得很！一排排的新房子!”他说。烽火是他的“西天”。唐僧西天取经，历尽千难万险，烽火就在身边，骑车几十分钟。他在烽火村转悠，家家户户，田边地垅，东张西望。什么大人

物都见过的烽火人不会注意到这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年轻队长。此时的“郭裕禄”到底有几两，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他渴望见到烽火的当家人王保京，渴望王保京面授真经，但是他不敢去敲人家的门。“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对于郭裕禄来说，王保京和烽火村的形象，可谓高山仰止，高不可攀，他心里多少有些自卑，还好面子，人家如果不冷不热，面子往哪儿搁。“人家是什么人，咱是什么人？”他说。

王保京是郭裕禄心目中的传奇英雄。50年代他还是个娃时，王保京已经是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和名声远播的“农业科学家”了。袁家人吃不饱穿不暖，烽火已经富得流油。王保京是他学习的榜样，烽火是袁家学习的榜样。几年后，王保京由县委副书记而地委副书记，袁家在礼泉已小有名气，郭裕禄也当了袁家村支部书记，他们才有了面对面的机会。陕西组织农村基层干部去湖北学习种棉花，咸阳由王保京带队，在湖北，他们住在一个房间里，朝夕相处。一个是地委副书记，一个是村党支部书记；一个是闻名遐尔的“科学家”和“劳动模范”，一个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而且，王保京比郭裕禄年长15岁。王书记长，王书记短，郭裕禄自是处处尊敬，处处伺候。一天，王保京换下了裤衩，郭裕禄说：“王书记，我洗衣服，把你的也洗了。”湖北气候潮湿，第二天不干，用风扇吹，还是不干，等不急，王保京说：“不穿了。”“噫，不穿咋行哩……”郭裕禄一面吹裤衩，一面说。

不等他说完，王保京已经大大咧咧光腚套上裤子出门了。

没有“谢谢”，上下级关系，前辈后生关系，似乎一切都应该应理。那时的王保京没把这位谦恭的袁家村党支部书记看在眼里，手拿把掐，不在话下。

1977 年，郭裕禄选上党的十一大代表，第二天就要去北京开会，袁家村放电影庆祝。电影已经开演了，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王保京带着烽火党支部副书记王振海坐着北京吉普前来祝贺。不过，郭裕禄没品出“祝贺”的滋味。

“王书记来了。”王保京有史以来第一次屈驾袁家村，让郭裕禄受宠若惊。

“哦，来了。”

“快坐快坐，芳兰，沏茶!”

茶端上来，稍作寒喧，王保京就说:

“裕禄，你当十一大代表，是袁家人民的光荣，也是烽火人民的光荣，大家都很高兴。我是十大代表，组织上本来叫我去十一大，我让给你了。”

这时的郭裕禄还傻着呢，不知道“组织”是咋回事。他以为，王保京是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王保京就是“组织”，“组织”就是王保京，既然“组织”让王保京去开十一大，怎么可以随便让给我呢？弄不明白。但是，王保京一席话的意思他是听明白了。王保京高风亮节，把“十一大代表”这件极大的荣耀让给了自己，他要记住王保京的好处呢。

他说:“王书记，本来应该你去，我对党和国家贡献不大。但是组织已经决定了，改变不了了。我也没办法。”

郭裕禄没头没脑一席话，既像客套话，又不是客套话，什么“本来应该你去”，什么“改变不了了”，什么“我也没办法”，在场的人听不懂，如坠云雾中。

其中有故事。

党代表的选举，一般都是上面预定，选举只是一个过场。十一大代表预定时，没定王保京，定的是郭裕禄。一天，在县委办公的窑洞里，王保京和郭裕禄谈话。

“裕禄，有件事和你商量一下。”

“啥事？”

“这一回党代表叫你去哩。我想了一下，我年龄大了，机会不多了。你去找省上说一下，十一大叫我去。你还年轻，机会多着哩，以后十二大叫你去。”

原来，王保京想继续当十一大代表，让他“主动”让出十一大代表名额。这话王保京不好和上面说，让他去说。

“能行么？”

党代表是可以随便变的？组织上定的，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郭裕禄没有思想准备，拿不准，就去找朋友参谋。朋友来龙去脉一听，一拍大腿，说道:

“裕禄，你这人糊涂!”

“我咋糊涂？”

“王保京想当十一大代表哩!”

“组织定的嘛。”

“我说你糊涂!”

“我不糊涂，找你参谋做啥？”

“你想想，王保京是十大代表，想继续当十一大代表，你去当了十一大代表，不是抢了他的头彩？看着吧，你将来有没完没了的麻达哩!”

郭裕禄一听这话，心情顿时沉重，六神无主。“那咋办呀？”他问。

“别当十一大代表呀。”

“……”

他犹豫了。

一个农村基层干部，带着全村改变贫穷面貌，“把苦吃扎了。”袁家都是“跑水田”，他带领全村男女老少把几百亩地的石头都拣出来，平整了土地。务棉花，买不起肥料，连续三年，正月初五一过，发动全村到几十里外九峻山上的唐王陵（昭陵）和顶天寺拾羊粪。顶天寺有多高呢？有一个故事极言其高，陕西人和河南人屡次相遇，互相炫耀吹牛。河南人说:“河南有个无影塔，离天只有一丈八!”陕西人悦:“那算啥！陕西有个顶天寺，顶得青天咯吱吱!”河南人愕然：好生了得顶天寺，把天部顶得“咯吱吱”响呢！可见顶天寺之高。

农村过春节，闹不完十五不干活。其他村的人还猫在家里打牌喝酒逗乐子，袁家男女老少，推车的推车，挎筐的挎筐，一两百口子人浩浩荡荡，上山拾羊粪蛋儿。这在当地可算一奇景。当地农民，没有拾羊粪蛋儿的习惯。有人怕笑话。郭裕禄说：“怕啥！笑话？穷得没粮吃，不怕人笑话？穷得没衣服穿，不怕人笑话？”穷人穷打算，穷人穷办法。他挎着柳条筐，筐里装上冷馍，带上儿根大葱、几头大蒜，穿着破棉袄，头前里走。寒风刺骨，路途遥远，爬上山，一身汗，风一吹，透心冰凉。肚子饿了，捧雪下冷馍。

九峻山上，荒凉冷漠，到处可见袁家人，把满山遍野的丰粪蛋儿像金子一样一颗颗拾起来。天刚亮上山，天擦黑到家，积少成多，集腋成裘，羊粪蛋儿堆成了小山。这几年的棉花那个好！杆粗，枝繁，叶茂，桃多，棉花密密麻麻，像是夏天里一场厚厚的大雪！喜煞人！爱煞人！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参观。

与烽火比，袁家除了不缺“穷”，啥都缺。烽火紧靠泾河，大多数田地是自流灌溉，仗着王保京，仗着老先进，要钱有钱，要物有物。可以说是天上地下的区别。袁家要钱没钱，要肥没肥，要水没水。拾羊粪蛋儿，养牛，解决了肥料的问题；肥料的问题解决了，庄稼长得好，棉花务得好；庄稼好棉花好，解决了钱的问题；可是钱再多买不来水。“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只有肥当家，没水也白搭。”缺水

急死人。打井取水是唯一的出路。

郭裕禄模仿烽火的“争气滩”，给准备打的第一口大口井起名“争气井”。大口井一丈二直径，六丈多深时，打到了连山石。石硬，井深，进度缓慢。更可怕的是，井壁护围的水泥砂浆没有钢筋，强度不够，偶有震落的小块水泥。大家害怕，再也不肯下去。郭裕禄喝开其他人，脸黑着，叫了两个村干部:“咱下!”他那股子不要命的劲头上来，谁都不敢违拗。

下到井底，他掌住钎，大叫:“给我打!”

井底下传来“叮?叮?”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响，水泥块越掉越多。上面惊呼:“快上来！快上来！要塌方!”

卷扬机赶快往上吊人。卷扬机慢慢腾腾上升，水泥块士块开始大块大块劈头盖脸往下砸，砸伤了人，加重了踏板，卷扬机负重过大，“哼哼”着拉不动了。人吊在井中央，情况十分危急。井上的老六郭福禄鬼使神差跑过去，双手吊住卷扬机和滑轮之间的钢丝绳，上下闪动，为卷扬机借力。卷扬机也鬼使神差地启动了，把郭裕禄等三个人吊上了井面。三个人上来时，头上脸上胳膊上鲜血直流，都砸成了血人！在场的人都吓傻呆了。

郭裕禄满脸是血，血里透着吓人的铁青色。他点燃一支烟，刚抽两口，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六丈多深的大口井顷刻被砂石土块填满了。他这才意识到，他们今天是死里逃

生。这么深的井，要是埋进去，一两个月都扒不出来！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恐惧。头发发炸，拿烟的手不由自主地抖起来……

袁家的今天，是郭裕禄和袁家人赌命换来的，“党代表”不仅是郭裕禄的荣誉，更是袁家的荣誉，岂能拱手让人？

朋友见他犹豫，劝导道：“你不知道王保京的厉害。你跟他争啥么？”

“我没争。”他辩解道。

“你说没争就没争？说你糊涂。你还年轻，机会多的是。这回让了王保京去。”

说起来，他郭裕禄处处都维护着王保京。就说前不久，有人给王保京贴大字报，历数烽火浮夸和弄虚作假的事实。大字报上还画了一幅漫画：一头大母牛，大母牛屁股上趴着王保京吹牛?。全县轰动。王行兴来找他：“脑系（注：‘脑系’，关中方言，‘首脑’、‘头儿’的意思）叫你哩。”晚上，王行兴带着郭裕禄到了烽火王保京家。

王保京情绪激动，见郭裕禄和王行兴来，高兴地说：“快坐。快坐。”

王保京说：“裕禄，咱县里有些人对先进队有意见，要拔我烽火这杆红旗哩！你袁家是后起之秀，在县上也是有名气的，也是先进队。烽火保不住，你们袁家也保不任。你要把烽火支持一下。”

“能行么。”郭裕禄说，“咋支持哩？”“你以袁家党支部的名义写张大字报贴出去。”“大字报咋写哩？”

王保京思忖片刻，说道：“这么写：烽火的道路我们袁家走定了!”

“能行么。”当天晚上，郭裕禄紧急召集村干部开会，传达了王保京的意见：“王保京叫我们袁家支持他的工作。他说，县上有人要拔烽火这杆红旗哩。咱要站在烽火一边，咱也是先进。他说，烽火保不住，袁家也保不住。我们要写一张表扬大字报，把烽火表扬一下。”当下布置会计捉笔。

表扬大字报，赞美烽火“敢想敢干”、“艰苦创业”云云。“烽火的道路我们袁家走定了”云云。第二天贴在县北门最热闹的大十字，又是轰动。

那是一个以“大字报”为武器的时代。那一代人，是大鸣大放大字报训练出来的一批人。大家运用起来都得心应手。第一张大字报揭露烽火问题，讽刺王保京，大快人心。第二张以袁家名义回应的大字报却遭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唾弃。有人指着鼻子骂郭裕禄跟王保京是一丘之貉，是迫随王保京的“小爬虫”。其实，郭裕禄“烽火的道路我们袁家走定了”仅是王保京反击的第一张牌，第二张牌打出来时，对方便被置于死地了。牵头调查烽火和王保京并写大字报的人，后来以“三种人”（注：“三种人”，“文革”结束后，对“文革”期间靠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

分子的合称）的罪名投进了监狱。后经查证，牵头人在“文革”期间曾任农民造反组织的司令，而王保京是他的搭档，任政委。这叫做此一时，彼一时。

郭裕禄还不服，还与人辩论。

“裕禄，你袁家写大字报，把你的名声搞臭了。”言下之意，你郭裕禄本来名声不错，现在公开表态支持烽火，支持王保京，等于跟烽火和王保京同流合污了。“咋搞臭了!”郭裕禄质问。

“王保京是靠什么起家的？靠吹靠哄靠骗么。你不知道？”郭裕禄也看不惯烽火和王保京的一些做法，而袁家和烽火正相反，是靠出大力流大汗实干起来的。但是他嘴硬。

“看问题要一分为二么，要看主流么。”“主流是啥？”对方反诘。“学习小靳庄搞得好，打篮球，老婆老汉唱革命歌曲，全省都学烽火哩!”“纯粹是搞形式!”

一句话就把郭裕禄对到了南墙上。郭裕禄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还记得县上组织基层干部到烽火学习“学习小靳庄”的经验，王保京六七十岁的老母亲带着一些小脚老太婆打篮球，摇摇晃晃，丑态百出的情景。他都羞得不忍看，把头埋在腿裆里面，他知道，他和王保京不是一路人，袁家走过的道路和烽火走过的道路不是一回事。第二天，袁家的大字报不翼而飞。郭裕禄叫人把大字报撕了。

王保京亲自谈话，朋友晓以利害，郭裕禄隐约感到了搅

进礼泉政治旋涡的危险。与王保京交恶，可是不太妙的事情。他不是搞政治的料。他和王行兴刚刚当上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县委常委，不过是时髦政治的产物，虽然进入了礼泉县权力的核心，脑子里根本没有政治这根弦。王行兴管文教卫生，他管农业，他的行政能力，别说跟王保京比，连王行兴都比不上。县委对这两个农民常委也是另眼相看。他们哥俩只有一间宿舍，三年床对床。他们倒也不在乎，下班一块去吃羊肉泡馍，晚上谝闲传，一直谝到睁不开眼才睡觉。有个地方睡觉，有个地方吃饭，要求不高，惬意罢了。三年后，两个农民常委被撵回家，没有割舍不下的东西，农民身份，简简单单卷了铺盖卷来，简简单单卷了铺盖卷走，互相扬扬手告别，一个回去继续主事袁家，一个回去继续主事烽火。郭裕禄三年常委，最大的收获有两个，一是结交了王行兴这个烽火的朋友，一是了解了王保京和烽火的真实情况。一天，王保京把郭裕禄和王行兴两个农民常委叫到家里来，说："裕禄，你和行兴在县里抵着干，我在地区给你们撑腰！"跟谁抵着干？当然是县委书记。王保京觊觎礼泉县委书记的职位，想利用他俩搞得现任县委书记干不下去，他来收摊，王行兴了解王保京的思路，地委副书记有势没权。郭裕禄、王行兴哥俩从王保京家出来，已是更深夜静。

王行兴说："裕禄，恩格斯说，衡量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不要看他的声明，要看他的行动。王保京给饭你吃，

王保京给话你不能听。当心着他的活!”这是王行兴跟王保京鞍前马后总结出来的经验，也是王行兴在烽火消灾避祸的生存之道。郭裕禄一惊:“这挨球的，支使瞎狗咬虱子哩!我们做坏人，他做好人，弄我们往火坑里跳哩!行兴，咱俩贵贱都不能这样干。这样干，把咱俩就毁了!”王行兴说:“咋不是么。”王行兴有文化，凭着观察和理性判断;郭裕禄没文化，凭着情感和直觉判断。王行兴在烽火这潭浑水里滚，政治敏感远在郭裕禄之上。郭裕禄胆大心细，一点就透。后来，王保京把郭裕禄和王行兴逼上了绝路，郭裕禄和王行兴联手跟王保京斗，已是90年代的话了。王保京要郭裕禄去找省委谈，省委的大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而且，这事儿还必须找当时陕西的第一把手李瑞山。“这咋办呀?”郭裕禄抓耳挠腮没办法。他想到了“组织”。他即刻去找管组织的县革委会副主任李新华，李新华省上熟。他对李说:“王书记叫我去跟省上说，十一大代表我不当，让他去。你也帮忙说说。”“那可以么。”李一听是王保京的意思，便满口应承下来。西安雁塔路省委八号院，是陕西政治权力中心，省委常委以上的干部住家办公都在这里。办公区平房结构，一个单元一个单元，深宅大院，相对独立，平实而威严。陕西人说“八号院”，就是指省委。郭裕禄第一次进八号院，第一次见李瑞山这么大的官，心里着实忐忑。爱听戏的郭裕禄暗自琢磨，省委书记，在戏里相当于巡抚?村党支部书记是啥

官？县是七品，乡（公社）是八品，村支书不吃皇粮，品都不品。“品都不品”受到巡抚接见，可谓一步登天。听说李瑞山脾气暴躁，如果没有省委组织部长和李新华陪着，话都不知道咋说哩。李瑞山，瘦瘦的小个子，看上去，倒是平易近人。客套一番后，郭裕禄介绍袁家发展情况。他打好了主意，介绍情况的时候，顺便把王保京交代的任务完成喽。这可是此行的目的，其他话题都是装样子。“李书记，我有个想法……”他说。“啥想法？”

“我想不去十一大……”

“为什么？”李瑞山一愣，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王保京说，十一大代表是他让我的。”他不会挽花子，据实说理由，“烽火比我的成绩大，十一大还是让王保京去。”

“胡说！十一大代表，是省委决定的！他王保京有啥权力让你!”李瑞山大怒，“腾”地从藤椅上站起来，手插在兜里来回走着说。“我们袁家是‘学大寨，赶烽火’的结果……”“学啥烽火！他妈的！贡献湾不贡献，争气滩不争气!”不知为什么，一提“学大寨，赶烽火”，李瑞山有这么大的火气。省委组织部长赶快拉他出去，低声说：“快别说学烽火的事。学烽火要学长处，不要学他胡吹。”

组织部长语焉不详。烽火的“长处”是什么呢？“胡吹”两个字，出自组织部长之口，似乎又是彻底否定。“你回去，这次十一大，不是他王保京让你去的，是省委决定的。他说

是他让你去，他骗你的!”李瑞山又强调。

谈话到此结束，郭裕禄赶紧跟着组织部长往外走。他寻思，“学大寨，赶烽火”不是省委号召的吗？省委书记现在怎么是这个态度呢？看来风头变了。什么原因？一脑袋浆糊。

完了，王保京交代的事情办砸了!

04

六

正如朋友所预料的那样，以出席党的十一大为界，王保京对郭裕禄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随着改革开放，袁家经济发展的势头健猛，经济实力超过了烽火，并大大拉开了与烽火的距离，郭裕禄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政治实力不断加码。他又被选为党的十二大代表、十四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省委候补委员，省委委员，1991—1992 年任县人大副主任，1992 年至今任县委副书记。与王保京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管郭裕禄愿意不愿意，在礼泉人看来，郭裕禄算是登上了礼泉县的政治舞台，年纪轻，势头猛，是足以与王保京抗衡的政治新星。

袁家的崛起，结束了烽火一支独秀的历史。这是 50 年代以来礼泉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局面，相隔十五甲，一东一西，东边是烽火，西边是袁家，各搭了一个戏台，各有各的路数，各演各的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方唱罢我

登台，紧锣密鼓，分庭抗礼，谁也不能忽视对方的存在，蔚为礼泉政治奇观。

郭裕禄比着烽火追赶，首先追赶粮棉。认真说，70年代“学大寨，赶烽火”，真正“赶烽火”的可能就是袁家。几年的努力，特别是郭裕禄和王保京一起到湖北等地考察棉花种植技术后，袁家的棉花平均亩产咄咄逼人，一举超过了烽火，结果逼得烽火搞“百亩丰产方”，逼得王保京弄虚作假，到广播电台说计划棉花亩产300斤、实际亩产270斤，以证明十大代表比十一大代表能干；结果招来了“产量不实”调查组。这里的“产量不实”当然是指往高虚报产量。统购统销政策下，农民采取的对策，一般都是“瞒产私分”，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一般情况，多报粮棉产量意味着给国家多交，就意味着自己少吃少穿少用，没吃没穿没用。除了“放卫星”浮夸年代，一部人民公社史，就是觉醒的农民用“瞒产私分”的办法与政府捉迷藏的历史，除非农村基层干部昧了良心，不为治下的农民谋利益，上面讨好。像烽火敢往高虚报产量、又可以少交、两头都讨好的情况，如果没有大规模隐瞒土地，如果没有权力笼罩或保护，绝难实现。王保京以己度人，事与愿违。调查组查下来，袁家不仅没有多报亩产，而且由于计算方法的问题，还少报了亩产，离开时，还总结了袁家粮食丰产的好几条经验。

1978年是王保京和郭裕禄大较劲的一年。十大代表不仅

棉花产量“高”过十一大代表一筹，而且还要在小麦产量上“高”过一筹。这叫做“生姜还是老的辣”。这一年，袁家小麦大丰收，亩产710斤。烽火呢？以上已有详述。要言之，烽火第一次上报亩产907斤，一个月后调整为亩产852斤，公社核定亩产761斤，地委调查组查账核实，亩产实际是732斤，“如果把‘争气滩’、‘贡献湾’的（小麦种植）面积算上，亩产就上不了700斤”。王保京是数字魔术师，而且身居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当地话说，“簸箕虫日虱子，闭着整”。他不仅想要什么数字就有什么数字，而且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全无顾忌。地区规定的小麦亩产奖励标准是600斤，烽火以“亩产852斤”受奖，袁家亩产710斤却被排除在外，这还不算羞辱袁家。王保京还下令袁家派代表去地区开颁奖大会。郭常委老老实实派村党支部副书记张文西去开会。张文西开了几天会，坐了几天冷板凳，一肚子窝囊，跑到县上，向刚开完常委会的郭裕禄诉苦：“本来颁奖有咱哩，被王保京压了。开会的人都是获奖单位的代表，咱去没人理!”郭裕禄火冒三丈，推门进了王保京的办公室。

“王保京!”郭裕禄也不叫“王书记”了，质问道，“人家领奖，叫我村去干啥哩？”

“干啥哩？去接受教育!”王保京说。

“教育他妈的?! 受啥教育哩!”郭裕禄开骂了。

“裕禄，你是个小村，取得点成绩算什么!”王保京提

高声音训斥道，“你不虚心！骄做!”

王保京分明是说，你郭裕禄当上十一大代表就翘尾巴，有什么了不起!

“王骗子!”郭裕禄是那种吃软不吃硬的人，连“王保京”都不叫了，连珠炮一般地骂将过去，骂得王保京没有还嘴的余地，“谁骄傲了？是没学好小靳庄，还是粮食产量上不去，弄虚作假？”

“你不要嚣张!”

王保京想镇住郭裕禄，郭裕禄根本不吃这一套，骂的声音更大，骂得县委院子里的人都能听见。天已经黑了，常委们看见郭裕禄闯进王保京办公室，也都不回家了，等着看热闹。偌大一个礼泉县，敢跟王保京真刀真枪面对面地干可能只肩这个郭裕禄了。

“王骗子，你有啥本事！嗯，你就是凭你六七十岁的老妈唱歌跳舞打篮球当的书记么！你以为那歌唱得好听？猫念经哩！你以为那篮球打得好？小脚老婆在球场上跑，还说打得好打不好是水平问题，打不打是态度问题，我都替你脸红哩！你就是靠骗人胡吹冒撩当的书记么！我就是不当先进，也不让我的老妈去唱歌跳舞打篮球！你有啥本事！嗯，你自己摸着良心说，你真正给党给国家给人民有啥贡献!”

直骂得灵魂出窍，星辰跌落。这在几年前是不能想象的。

局势的发展难以预料。这年麦收前，《光明日报》发表

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天，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第二天全文转载，这是一个信号，一个告别旧时代的强烈信号，其中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原则，构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烽火将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扮演什么角色，这台戏怎么演下去，自然是善于应变的王保京首先要考虑的事情，于是故技重演，在粮棉产量上做文章。

严格地讲，这次较量，不是下级跟上级的较量，因为不涉及权力之争；也不是新先进跟老先进的较量，因为双方不在一个量级上。王保京是久经沙场的重量级选手，郭裕禄是刚刚出道的轻量级选手，这次较量，严格地讲，是农民跟农民的较量，是两种农民完全不同的价值观的较量。50 年代选择合作化道路时，出现了金光耀和王保京的分野，即金光耀所代表的“农民”与王保京所代表的“农民”的分野，金光耀被时代淘汰，王保京独领风骚二十多年：60 年代选择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还是选择分田单干的道路，出现了以杨伟名为代表的“农民”与王保京为代表的“农民”的分野，杨伟名被时代淘汰；70 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一场大吵架，郭裕禄和王保京分野。淘汰谁？当时不好说，形势在发展，但并不明朗。郭裕禄虽然已经当了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常委，并没有改变农民的身份，1992 年当了县委副书记后才改吃“商品粮”。

王保京对付体制内的官员好办，比他官小的用大官压小官的办法，比他官大的用农民的办法，他有“农民代表”、“农业劳动模范”、“农民科学家”、“地区级干部”等多重保护色，有早就利益一体化的新闻媒体、高层领导人等的庇护和支持；对付郭裕禄这样的人就不太好办。郭裕禄跟他一样，有自己的根据地，有强大的集体经济实力，有体制认同的政治色彩，有了解他底细的中层干部在背后撑腰，而且年轻，有逼近权力核心的趋势。还有很重要的一条，郭裕禄是靠拾羊粪蛋儿发展起来的，发展过程中，九死一生，脾气暴躁，要打可以打，要骂可以骂，抹下脸来，什么都可以不在乎，大不了回村种地。郭裕禄在身边共事，这种大扫面子的威胁就不会消除。

矛盾公开化不久，郭裕禄戴了一顶“公社副书记”的帽子被免职回村。

回过头来看，郭裕禄1979年免职回村，表面上政治受挫，其实是救了他，使他不必过早地混迹官场，是非政治，保持农民的本色，借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机，集中精力，壮大袁家经济。

纵观袁家发展的历史，1971—1979年是原始积累时期，大发展时期是1979年以后的整个80年代。这个时期，烽火踏步不前，袁家办建筑队、预制件厂、金属加工厂、大型运输队、化工厂、5万吨水泥厂；比着烽火，盖起了卷洞式袁

家新村。1987年他带着袁家人访问西德，大开眼界，回来后，力排众议，拆掉卷洞式新村，重新翻盖，让家家户户住进了可抗地震的二层小楼。进入90年代，水泥厂扩建为15万吨，投资餐饮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影视业，资产规模达到了二亿五千万以上，把烽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郭裕禄1979年不仅没有一蹶不振，反而如鱼得水，名气愈大，愈加咄咄逼人。

05

七

王保京日子也不好过。三中全会以后，他的问题雪片一般地飞到了省委和中央。

这期间，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1980年山西省委对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作了“初步总结”，报告中央。中共中央批转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并作了长篇批语，要求全党吸取经验教训，引以为鉴。

批语指出：“表扬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一向是我们党推进各项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地把任何先进典型都看作是群众集体智慧和辛勤劳动的产物。历史已经证明，人为地树立先进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先进典型，同其他事物一样，是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的。对于先进典型，我们当然要努力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以正确的指导，尽可能使其避免失去先进性

以至垮台，但是当它们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致不再继续成为先进典型的时候，就不应当人为地去‘保’，更不允许滥用职权，动用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支撑所谓‘先进典型’的门面，甚至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欺骗舆论。那种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

批语指出：“宣传和介绍先进典型，一定要说真话，不要讲假话。那种只让人看几个事先安排好的点，只讲甚至夸大先进的一面，隐瞒落后一面的做法，是很错误的。这类误人害己的事，已经很多，今后务必要引为鉴戒。”

批语指出：“在推广先进经验的时候，必须分析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适合于哪些条件，哪些是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哪些是不带普遍性的具体做法，绝对不能生搬硬套，强迫命令，重犯过去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不分东南西北，不分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用大寨这样一个典型的经验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同时，对先进典型也不要提不适当的、过高的要求，以免助长弄虚作假。要一分为二，经常指出不足之处，使他们不断进步。”批语指出：“任何先进技术经验或经营管理经验，都必须同当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重视经济效果，在农民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切不可用一阵风的运动方式一哄而起，更不得乱扣政治帽子，采取行政压制等手段。”

批语指出："劳动模范不仅是从群众中产生的优秀分子，而且由于他们往往在生产技术或生产管理方面有所革新和创造，因而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理应得到党、群众和社会的尊敬。'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打击劳动模范的做法，已经得到纠正，但是，一成为劳动模范，就一定要当从下到上的各级党代表、人民代表或其他代表，一定要担任从下到上的几级党政机关或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事实证明，不仅会使一些劳动模范自己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而且会使他们陷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无法应付的会议、报告和各种政治活动中去，无法再起劳动模范的作用。这种做法，害了一批劳动模范，也给党的王作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初步报告"概括大寨党支部书记兼昔阳县委书记，后来成为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一个派头头，眼中没有党，没有组织，把大寨、昔阳搞成谁也不能过问的独立王国。他实行封建家长式统治，一切都得由他个人专断。他作风霸道，飞扬跋扈，自以为一贯正确，一切都要以大寨的是非为是非，以大寨的标准为标准。人们对大寨、昔阳只能颂扬，不能说半个'不'字，如有不同意见，就是'感情问题'、'立场问题'，随之而来的便是'反大寨'的帽子、棍子。他思想路线极不端正，从思想上形而上学，发展到弄虚作假，虚报产量，骗取荣誉。"

1980 年，大寨问题揭露，陈永贵下台，标志着对农村"左"

的错误路线将进行彻底清算。中央文件传达到县团级，在礼泉激起轩然大波。“学大寨，赶烽火”，“外学大寨，内学烽火”，大家记忆犹新，拿王保京对比陈永贵，拿烽火对比大寨，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如此，烽火和大寨比较，还有重大的区别。“大寨，在合作化运动中是先进的。在‘大跃进’时许多地方发生浮夸风，大寨的王作则是比较实在的。特别是 1963 年遭受重大灾害后，大寨党支部带领社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迅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事迹，是很突出的。”被政治需要高高挂起来之前的大寨，三战狼窝掌，修梯田，修“海面田”，凭自己的力量整治了穷山恶水，作出了可歌可泣的业绩。烽火正好相反——从头至尾的浮夸，弄虚作假。客观他说，烽火广大群众既是浮夸和弄虚作假的受益者，也是浮夸和弄虚作假的受害者。礼泉了解情况的人都说，烽火人比其他地方的人吃苦吃得多，“科学”试验，奋斗高指标，历次政治运动，来来回回折腾苦了。

这场反思，真正带来了王保京和烽火的危机，以致发展到县党代会无法开幕的地步。县党代会预备会，局以上干部到会。王保京主持会议。大家的脸色都不大对头。几天来，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气氛，在无形中酝酿着。

火山终于爆发了！县交通局局长李天寿第一个要求发言。

八

李天寿，精神矍铄的老人。1996 年，高寿 75。

他是礼泉县赵镇人，1949 年参加工作，1950—1983 年先后在礼泉担任公社书记，财贸部副部长、农业局副局长、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农办副主任、物资局副局长、交通局局长，1983 年在交通局局长任上离休。他对烽火了如指掌。1979 年 5 月开始，他连续不断地给中央和陕西省领导写了 45 份材料，反映王保京和烽火村的问题。他的反映受到上级领导重视，直接导致了 1981 年初对王保京和烽火村的大调查。

他跟王保京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就是看不惯王保京的为人和做法。他观察了王保京和烽火 40 年。他说："在外面，别人说到王保京如何如何，说到烽火如何如何，我们礼泉人脸上都发烧。"

1958 年让他终生难忘。

十几辆大客车拉着省委党校的全体学员和教职员工到烽火参观学习"科学种田"。此时的烽火是陕西省最光芒耀眼的明星。参观的队伍浩浩荡荡，像是赶大集一样。因为他是礼泉籍学员，校方让他打前站联系。

王保京扎着"豹子头"，站在小麦"阿房宫"前眉飞色舞地介绍烽火的伟大创举。"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 15 万！"

李天寿硬着头皮听，浑身针扎似的难受。学员大多数是

农民出身的文化人，表情复杂。面对小麦“阿房宫”，面对王保京的豪言壮语，有的激动，有的亢奋，有的不屑，有的茫然，有的困惑。

回西安的路上，学员议论，“(口外) 是吹牛专家哩”。

累了一天，迎接李天寿的却是一场惊吓。隔壁宿舍一个学员没去烽火参观，躲在屋里上吊自杀了！自杀原因不明。尸体吊在空中，伸长了舌头，好像是给学员们一天的激动和庄严加了个注脚，开了个玩笑，搞得大家心里一团糟。

官员怎么看烽火呢？

党校回来，李天寿成了县党校的理论教员。1959 年秋季的一天，县委办公室主任通知：“天寿，准备铺盖卷下乡哩。”

“跟谁？”李天寿问。

“跟王（世俊）书记。”

李天寿去找王书记，问道：“书记，跟你下乡，去哪里？”

“烽火。”王世俊说。

1958 年，烽火满世界的牛吹大了，看他怎么收场。

1959 年，在一片“莺歌燕舞”的宣传气氛中，全县的粮食形势严峻。县政府报告说：1958 年用于大炼钢铁、大修水利的补助粮四百三十多万斤，“如果按一人一天一斤计算，就够 144000 人吃一个月”，而且，“秋收、保管、社员吃粮等方面也浪费了一些”。评比 1958 年的成绩，自然是以“高产”为标准。但是，谁都清楚，所谓“高产”都是骗自己骗

上面的话，解决不了吃粮问题，这样下去不得了。

1959年8月17日，县下达作物评比会秘书处通知：“县委研究决定：全县1960年小麦平均亩产260斤为第一笔账，280斤为第二笔账。280斤高出260斤7.7%。请各公社根据增长比例，结合当地情况，讨论提出本公社第一、第二笔账的小麦平均亩产，迅速报给大会秘书处。”

显然，在王世俊的主持下，头脑十分清醒地对一味浮夸高指标到强调“平均亩产”的调整，从天上回到地下，从浮夸回到实际。这在当时，难能可贵。但是，王世俊料想不到，1959年“庐山会议”进一步“反右”，继续跃进，继续浮夸，可能调整的机会丧失殆尽，大饥馑的灾难接踵而来。

此去烽火，李天寿与王世俊同屋，一住20大。

王世俊与省委书记的态度不同。省委书记更从宏观和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他必须面对全县黎民百姓的生计。他跟李天寿讲：“王保京（口外）（尸从）胡吹哩!”他在全村社员大会上公开批评王保京：“保京，你这个人作风太坏了!你把你村的青年都带坏了！你胡吹哩!”他已经注意到了王保京“胡吹”所带来的道德后果，狠狠地敲打了一下王保京，让王保京第一次在全村人面前大扫了一回面子。

王世俊是礼泉、乾县合大县的县委书记，王保京虽然有一系列的红帽子，政治翅膀并没有长硬。王世俊的批评不留情面，让王保京坐立不安。

李天寿盯住不放，王保京精神紧张，便以利诱惑。

一天，本家的一个孙子来当说客。

“八爷，保京叫你去坐一下哩。”

李天寿在亲族里行八。

“不坐！没有啥话说！”李天寿没好脸色。

“保京准备了一桌好饭，请你里。”

“这顿饭，我不吃！××，你是王保京的狗腿子！”

李天寿不耐烦了。

来人却厚着脸皮说：“保京说，八爷你如果交通局安排不好，县上十几个局任你挑，想去哪个局就去哪个局。”

“对了，感谢王保京的好心。你给王保京带句话：你八爷是腰硬不低头，舌硬不颂屁（注：‘颂屁’，当地鄙视阿姨奉承之徒的典故，说的是皇帝放屁很臭，佞臣们却说放得好，放得香），跟党干革命，决不阿姨奉承。”

“保京说，八爷你有什么困难尽管说，三个孙子是农村户口，给你转两个。”

“不转！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给儿孙当牛做马！你再给王保京带句话你八爷是坐小车修桥补路，学准则狠批骗子！”

态度坚决，没有妥协的余地。

“我李天寿当交通局长，修桥补路，做的是积善积德的事情，工作顺心得很，不需要特殊照顾！不需要利诱拉拢！”

他说。

06

九

李天寿慷慨陈词，三个小时，未尽胸臆。

多少年来，由于高压政策，围绕王保京和烽火村的话题，万马齐喑，只是私下议论发发牢骚而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目前的形势略有好转，大家还是不敢说话，王保京毕竟还是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毕竟还是权大势大，压抑的气氛并没有消除，大家还心有余悸，“反烽火就是反大寨”，“反烽火就是反革命”，声嘶力竭的历史似乎还余音绕梁。这次党代会换届是最后的机会，如果没有人敢于站出来说话，往下的局面不堪设想：王保京继续当礼泉县委书记，继续主政礼泉。会场上鸦雀无声，多少颗心在怦怦跳动。没有资格进入会场的人挤到窗户前倾听。郭裕禄也在会场里，他看见有的人高兴，有的人担心，有的人忧虑，有胆大的，给李天寿递烟点烟，沏茶倒水，无声地表达着佩服和支持的心情。在公开的场合，敢于给发表揭露王保京和烽火问题的人点烟倒水，等于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可谓胆大包天。点烟的时候，倒水的时候，会场寂静肃穆，只听见打火机“嚓嚓”的声音，只听见水倒进杯里“喝喝”的声音。这个场面让所有经历过的人不能忘怀。大家忘记了吃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并亩增产”，“虚报浮夸”，“欺上瞒下”，“顺我者

昌，逆我者亡”……李天寿“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壮怀激烈，与那点烟的声音，倒水的声音，还有最后热烈的掌声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意愿。

李天寿的长篇发言如同一颗炸弹，炸开了礼泉政治生活沉闷而压抑的局面。党代会的程序被彻底打乱了。现在已经不是党代会怎么开的问题了，而是开不开得成的问题了。预备会后，以礼泉县中层干部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形成了一个共识：如果王保京不离开礼泉，继续当选礼泉县委书记，大家将集体抵制本届党代会，或者是把他选掉。李天寿甚至说：“如果王保京不离开礼泉，我还要在大会上当着全体代表的面发言!”

王保京的去留成了本届党代会是否顺利召开的先决条件。地委书记闻讯赶来扑火，但是礼泉人决不妥协。

迫于党内压力，迫于民意，王保京无声无息地离开了“礼泉县委书记”的岗位。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没有掌声，没有话别，没有欢送会依依不舍的场面，总之，什么都没有，就这么无声无息地不光彩地走了。接王保京任县委书记的李志远 16 年后回忆：“1980 年礼泉县党代会开不下去，地委掌握了王保京可能落选，筹备党代会有问题，急急忙忙把我找去，交待接任王保京，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到礼泉后，王保京匆匆忙忙和我见了两面，什么也没说就走了，走了就再没回来。”

可是，人走了，影子还在。李志远是礼泉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县委书记。他禀性谨慎稳重，因此当了九年礼泉县委书记。九年时间里，王保京的影子一直伴随着他，让他不得安宁。

一〇

1982 年，王保京在媒体和权力的干预下，再一次过关斩将，度过危机，保持了屡战屡胜的纪录。咸阳地改市，他任副市长、市委常委，虽然比原任的副书记“稍逊风骚”，毕竟保住了体面，巩固了政治地位。现行体制中，一般情况下，同级比较，党的干部比行政干部地位高，权力大，正职如此，副职也如此。但这是“一般情况”。实践中，有权是一回事，用权是另外一回事，其中正反两个方面的诀窍甚多。王保京深知其中三昧。他说过：“要敢于用权。你敢于用权，人家才服权；你不敢用权，当然人家不服权。”他的“用权”，包含着“弄权”的涵义。

下一步就是反击了。

一一

1986 年 2 月 13 日，后山突然浓烟滚滚。

“山上着火了！山上着火了！”

2 月 16 日，在省市两级政府的强令下，由县公、检、法三家组成的专案组，十几辆警车喧叫着开进了袁家村。

起火原因，说是郭裕禄给他舅上坟引起的，烧毁“山林”

几千亩。

县常委集体找郭裕禄谈话，说“有人反映，你给你舅上坟，把山点着了”，要求他配合联合专案组调查。郭裕禄气得大骂：“他妈的！我哪个舅死了？我舅没死，给谁上坟！烧毁几千亩林，山上哪有林嘛！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他说：“我有两条要求：一是要实事求是，二是不要带其他的意思。”

他临出门，对着常委们说：“我把你们好有一比：你们是呼噜爷（注：‘呼噜爷’，即‘雷公’）的锤子——胡抡哩!”

2 月 13 日这天，袁家人确实开着大车上山了。不过不是上坟，而是村党支部组织青年上山进行传统教育。让这些没吃过苦的年轻人看看当年拾羊粪蛋儿的地方，看看袁家创业的艰难，以思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所谓“山”就是渭北高原边缘的笔架山，西头是九峻山，东头最高处就是顶天寺。山上除了有一些荆棘灌木丛，满山都是荒草，到了冬天荒草枯黄易燃，每年要燃好几次。唯有这次“势大”，烧毁了几千亩姓“子虚”名“乌有”的“山林”。

要说山上有林也不假，那是史书上记载的“林。”

九峻山上，整座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加上陪葬陵，昭陵园陵周长 60 公里，总面积 30 万亩。县志记载，昭陵陵园内，有高山，有平原，广植苍松翠粕、长杨巨槐，称为“白

城。”唐人刘沧有《秋日过昭陵》诗云：“原分山势入宫塞，地匝松阴出晚寒。”说的就是陵园松树遍地成阴的景色。

袁家座落在陪葬陵徐懋公墓旁，亦在“白城”之中。

杜甫在《重经昭陵》诗中吟道：“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不过，一千多年来，战乱兵燹，社会疯狂，“白城”早已成了往事云烟，南柯一梦。稍有残渣余孽，1958年也化作了小高炉下的一把柴火。

联合专案组折腾了一个月零两天，把袁家的男女老少像蓖头一样蓖了一遍，写了一个报告。是为“烧山事件。”

“烧山事件”把郭裕禄和袁家整得乌烟瘴气，不了了之。

看来，下去找常务副省长白纪年不行。

早期的王保京，是共青团组织扶植起来的“向科学进军”的青年农民典型。白纪年，陕北人，1953年以前任青年团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53年26岁担任陕西团省委书记，1959年任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文革”被打倒，1972年底恢复工作任省体委主任，1976年任省农业局局长，不久任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兼农委主任，1981年底任常务副省长，1983年兼省委常委。在担任常务副省长期间，克服阻力，坚决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党内生活中，倡言“清除封建余毒，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等等，获得威望，1984年陕西省党代会换届选举时，无记名投票，以没有提名、票数第一当选为省委书记，并得到中央确认。通过直接选举担任

省委书记，在党内还是第一次，无先例，亦无来者。这个结果，给他带来了殊荣，也给他的政治前途埋下了隐患。1987年8月，受政治大气候的牵连中途离任。

白纪年是一个幽默的胖老头。他当省委书记的时候，要给他配专职警卫人员，他不同意，认为“声势太大，脱离群众”，可在常委会上不这么说。他说：“要警卫员干什么？会个情人都不方便。”查他的问题时，有人密告，“情人”问题被查得不亦乐乎，哭笑不得。他事后嘲笑说：“嗨，这些人智商怎么这么低，开玩笑的话嘛。真正有情人还敢拿到常委会上说？”他怀念胡耀邦。胡耀邦任团中央书记、陕西省委书记、党中央书记，他一直都在胡耀邦的领导下工作，既是上下级关系，也是推心置腹的同志关系，可以坦坦荡荡地交流真实想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胡耀邦演说流畅而富于激情，可下面交流时，急了就结巴：“白……白……白纪年同……同志，你……你怎么这……这么……么说……”白纪年操着浓重鼻音的陕北话说，更添几分幽默。他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能记住四五十年前的某件事发生在某月某日，亦能记住某个干部几十年前的某个细节。他被称作陕西的“活字典”。

他不讳言王保京的发迹与他有直接关系。他领导的青年团1953年开始推广王保京玉米丰产、耕地间作套种的“科学种田”经验，推荐他参加陕西省和全国社会主义青年积极

分子代表大会，推荐他出席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为此，省委农村工作部和省农业厅的领导同志还埋怨他“为什么培养这么个好吹牛的积极分子”。

他不讳言曾与王保京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当省委书记的时候，王保京的母亲八十大寿，还专门派人给烽火村送花篮祝寿。

他不讳言保护过王保京。1982 年查出王保京问题后，曾有把王保京免职的动议。王保京去找他。他出面找省委书记说，王保京应该保护，理由是：“一、陕西以至于西北老的一代劳模所剩已经不多，而且劳模层次低，由劳模成长起来的干部不多。与全国其他地方比较，山西有陈永贵，河北有吕玉兰，河南有耿长锁，陕西一个也没成长起来。（注：此时，陈永贵、吕王兰、耿长锁已先后式微或下台。工业战线的劳模，陕西就有吴贵贤和陈永贵一样，当到了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段历史变迁证明，在“左”的思想主导下，把劳动模范树为意识形态典型并给予权力，不加区别地提到各级领导岗位，以体现国体，参与国家和地区的治理，显然是失败的。但相比而言，产业工人劳动模范与农业劳动模范还有重大区别，涉及许多重大而严肃的理论问题，不能一一讨论，仅从实践看，李瑞环、倪志福、王崇伦等产业工人的代表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特别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作用，几乎所有担任领导职务的农业劳动模范落马，就很

能说明问题。）二、全国各大战略区从抗战到解放战争时期，民主人士中成长起来许多高级干部，原来陕甘宁边区曾经有过一个李鼎铭先生，当过边区政府副主席，解放初期死了。而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后都产生了高级干部。因此，从这两个角度出发，我们应该向其他地方学习，把劳模提到高级干部的干部岗位上来，对我们了解基层工作，联系群众生活有利。陕西只有一个王保京当干部，虽然水平低，有毛病，但根本上讲，他对党有感情，又在农学院学习过，有提高的基础，就不要免职了。”

省委书记采纳了他的建议，因此才有了接见王保京、新任地委书记受命就地安排王作的结果。应该说，这个结局还有一个更大的政治原因。1980 年清算大寨，陈永贵下台，各地纷纷情算陈永贵式的人物，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劳动模范多少都有“陈永贵式”的问题，清算风潮大有一发不可收的趋势。如果清算风潮继续发展下去，顺藤摸瓜，必将诱发体制等深层次的问题，必将影响仍在台上的一系列当事人，引起社会震荡。于是采取了遏止和冷处理的办法。

白纪年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安置方案。

他找已到省农委工作的郭福生征求意见，说道：“人家咸阳不要保京，你说咋办？”

“不要，咱要么。保京是咱的劳模么。”郭福生说。

“安排到哪里呢？”白纪年问。

“我不好说。”郭福生心嚅没底，而且安排王保京这样级别的干部也不便于插嘴。

“安排到农科院当副院长，你说咋样？”白纪年思忖片刻说。

“能行么。”

其实，王保京“工作上浮夸，吹牛，高指标，弄虚作假”，白纪年早就知道，只是作为一般的“缺点”看待，“没有追究。”简单的解释是，“农民么”，“劳模么”，“就是那么高的水平么”，不和他一般见识；更深一层的解释是，“当时党内气氛和社会风气就是如此，喜欢听浮夸的消息，喜欢搞高指标”，领导“只想利用他的成绩去鼓舞群众，动员更多的群众人跃进，发展生产，也知道他很多东西不实在，认为只是支流”。王保京只不过为了迎合上面罢了。

原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秘书长何金铭的谈话，为白纪年的看法作了一个注脚。这位离休的省委秘书长，文人出身，不失儒雅风度。他 1954 年任《陕西青年报》总编辑，后任团省委宣传部长，团省委常委。1964 年调任团中央宣传处长，“文革”期间被打为“反动文人”，和胡耀邦关在一个“牛棚”里劳动改造。1972 年回陕西工作。他多次去烽火，熟悉烽火的历史，熟悉王保京的历史，王保京的的几篇主要报道都是他组织和亲自采写的。他强调：分析和评价王保京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他说：“王保京比较聪明，

比较好学，是青年当中能把大家团结起来的人。他有一个鲜明的特点：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比如，我们号召搞互助合作，他就办互助组合作社；我们号召学习文化，他就办夜校；我们号召科学种田，他就搞玉米丰产，在全国都很有影响。这样的典型，在1958年以前很稀罕。同时也发现他的一些缺点，比如好出风头，到了1958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大跃进，大放卫星。陕西人背着历史的包袱，倾向保守，大跃进时期也保守。陕西人和陕西领导，总是瞻前顾后，不敢出头冒尖，所以经常挨中央批评，压力很大。我天天听广播，天天听到山东、河南放卫星。我也为陕西不放卫星而感到发愁和压力，一听说哪儿放卫星，就连夜赶写社论。王保京也放了卫星，在陕西是重量级的，但在全国不算是重量级的。陕西老百姓朴实，不能接受粮食亩产上万斤。陕西干部‘保守’，也觉得粮食亩产上万斤玄乎，即使接受上万斤，心情也矛盾，也不可能核实，核实的话，可能跟中央唱对台戏。1958年，谭震林在西安人民大厦作报告，说，我们粮食吃不完，要想办法吃粮食。这个讲话在陕西影响很大，会场上一千多人听，情绪激动。王保京吹什么？还不是响应中央号召。团省委的干部年轻。大多数来自农村，大跃进到底跃进不跃进？1958年造成了严重后果，大家持怀疑态度，有的私下，有的公开，焦点在毛主席身上。我就说过：‘这么大的问题，毛主席要负责任。’反右倾的时候，成了很严重的问题。总结大跃进

的经验教训，第一条，盲目热情；第二条，缺乏实践经验；这两条还不是最重要的。第三条，毛主席说‘六亿神州尽舜尧’，实际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是‘舜尧’，六亿个脑袋服从一个脑袋，只要是党中央和毛主席说的，就是正确的。十有八九的高级干部这么想。王保京算什么？他只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第四条，1957 年‘反右’，给全党一个下马威，不能不在脑子里留下深刻烙印，谁也不敢怀疑，谁也不敢提意见，”

关于“烧山事件”，白纪年说：“这事我知道，是王保京栽赃郭裕禄!”

时任县委书记的李志远也证实了这种说法。

07

一二

白纪年可不好见。

有人说，王保京是做的白纪年的官，或者说，白纪年是王保京在省里的保护伞。这话说得不太准确，但是沾到了边。

郭裕禄当时不认识白纪年。他固执地认为，白纪年不了解情况，而他应该了解情况，不奢望他能改变立场，最低限度，让他能公正客观地看待烽火、袁家之争。

那时，白纪年还是常务副省长，但是陕西说话有分量的人物。郭裕禄第一次去找，被秘书挡驾，说“白省长没空，有话对我说”。

郭裕禄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要了个花花肠子。他对秘书说：“礼泉人都传哩，王保京给白省长冬天下池塘打鲤鱼，专挑九两九的，多一两少一两都不要；夏天送西瓜。专挑九斤九的，多一两少一两都不要；秋天摘苹果，不大不小，专要四两四的……”

这都是郭裕禄现编的捕风捉影的事儿，因为涉及省长名声，秘书肯定不敢“贪污”，目的是要把白纪年激出来。

“激将法”果然奏效。不久，白纪年召见。

后来，白纪年和郭裕禄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而王保京 180 度大转弯，恩将仇报，成了 1987 年落井下石者。王保京亲自安排王行兴写信告白纪年，被王行兴拒绝。王行兴说：“人家省委书记的事情，我一个村党支部副书记咋知道？人家一来落实，我咋说？不好写哩。”

一三

李志远在礼泉县委书记任上苦熬了九年，熬出了一句话：“咳，礼泉县委书记不好当啊！”他几次要求调离，都因为没人敢来礼泉接替他而作罢。不好当的原因有两条：“一是王保京插手，二是烽火和袁家的矛盾。”

乡上政治最要害的是“人事”，用谁不用谁，是谁的人不是谁的人，效果大下一样。另有指挥中心，心不往一处想，劲不往一处使，阳奉阴违，闪劲吊腰子，谁受得了？用人之道，学问大了。“德才皆备”往往不是用人的标准，或者往

往是攻击政敌的口实。是什么人用什么人，诸葛孔明的悲剧在于，他的“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的告诫是呈献给阿斗的。问题不在于用什么人，而在于什么人在用人，什么制度在用人。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礼泉是昭陵所在地。唐太宗李世民的英灵和大唐雄风都埋葬在这里。这里埋着魏征、徐懋公、房玄龄、尉迟敬德。昭陵西南凤凰山上侧依傍着魏征墓。唐太宗和魏征——明君和贤臣的关系流传千古，成了“贞观之治”的象征。“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古语”，也是魏征对李世民最著名的告诫，亦是历朝历代有作为的帝王将相的座右铭。贞观十七年，魏征逝世，李世民派人整理魏征遗物，看见了一份表章草稿，“字皆难识，唯前有数行，稍可分辨，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乱。公卿之内，情有爱憎，憎者唯见其恶，爱者唯见其善，爱憎之间，所宜详慎，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贤勿贰，可以兴矣，’算是魏征对李世民的最后告诫。”

罢卷慨叹：清明政治，礼泉几稀！“安”、“乱”，“兴”、“亡”，都在于判断“善”、“恶”，“邪”、“贤”之间啊。

礼泉，原名“醴泉”。——明明流的是苦水，哪里有“甘甜的泉水”赏心悦目？即使“礼泉”，何“礼”之有？李志远 1958 年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咋不知道礼泉工作不实在，

浮夸成风，吹牛说大话盛行？咋不知道王保京的影响？为此，同一地区的乾县、永寿等县都瞧不起礼泉。

王保京走了，留下了影子，留下了影响，留下了早已安排好的“人事”，留下了纠缠不清的矛盾，让李志远难以为继。

他陷入了礼泉矛盾的泥潭。

往事不堪回首。

李志远的叙述缓慢而清晰:“我刚上任就遇到一件事情:进袁家的路是泥路，约有一里路，一下雨，车就进不去，外面去参观的人不方便，反映强烈。我提出给袁家修一条路，王保京坚决反对。王保京害怕袁家发展，害怕袁家超过烽火。我顶住了。我决定县里出点钱，负责征地，袁家出劳动力，修一条石子路，实际上是一条比原来稍强点的便道。后来袁家自己投资修了一条柏油路。烽火呢？一开始就没有积累，是个空壳。路是国家修的，水泥厂、纸箱厂是国家贷款帮助建起来的，贷款也没打主意还。烽火发展完全是国家扶植起来的。1981 年地委调查组调查王保京和烽火的问题，查清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产量不实；二、大批使用国家款项，国家或给钱给物，或贷款不还；三、偷电被处罚；四、王保京当县委书记任人唯亲。后来王保京到处活动整马云溪和张宏勋。马云溪长期分配不了工作，一次见到我，很恼火，只好调走。我当县委书记，大家都有反映，王保京浮夸，产量

不实，但是我无能为力。王保京在市上是我的顶头上司，上面查都没有结果，我县里怎么可能查？作为县委杇记，烽火和袁家一样对待。我多次找郭裕禄。他说：‘烽火老大哥，袁家是学烽火学起来的。’我想让烽火和袁家团结起来，让王保京和郭裕禄坐到一起，握手言和。我当礼泉县委书记九年，部在努力做两家的团结工作，结果一次都没谈成。郭裕禄同意，王保京说谈不拢，不愿谈。县里处理烽火和袁家的关系非常慎重。外面来参观礼泉典型，只要是县里安排，烽火袁家两个点一起看，不偏不倚。如果领导或其他参观者明确提出去哪里，就安排去哪里。特别是人事安排都要照顾到。袁家安排一个委员，烽火就一定要安排一个什么职务。市里的安排也是这样，要求对烽火和袁家通盘考虑。80 年代，郭裕禄只是一个县委委员嘛，没有任何什么职务，你王保京是地委副书记、副市长嘛，不可能分庭抗礼。王保京只想让烽火一花独秀。袁家的发展明显超过烽火，却处处受到王保京的限制。王保京当县委书记三年，把班子和干部的思想搞乱了。干部对烽火和袁家的看法不一样。王保京听不得别人说烽火，稍微提点意见，就是反对烽火；谁支持袁家，或者说袁家的好话，也是反对烽火。礼泉的工作难搞，一是烽火和袁家的矛眉，二是王保京插手。王保京安排了自己的人，走了后继续插手礼泉人事，很伤脑筋。”

烽火和袁家成了礼泉超级敏感话题，因为敏感，遇到具

体问题，就失去了是非标准，处理起来，要么大而化之抹稀泥，要么文过是非躲老远，要么谁也不得罪各打五十大板，新矛盾积攒成旧矛盾，旧矛盾又派生出新矛盾，旧矛盾新矛盾纠缠在一起，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让人头痛。不光是李志远头痛，他之后的县委书记也头痛。

按照何金铭的说法，王保京和郭裕禄两个劳模，烽火和袁家“两个典型水火不相容，在咸阳在陕西是个大公案。”这个“公案”持续了好几任县委书记、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也没了断。剪不断，理还乱。不仅没有了断，反而愈演愈烈。前后算起来，70 年代，80 年代，90 年代，三个年代近二十年时间里，明争暗斗，矛盾尖锐，攻讦，密告，栽赃，伪证，诬陷，无所不用其极，以致激烈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这种现象是很奇怪的。它的奇怪之处在于，矛盾的没有理由或者不是理由，理由讲出来太不成话。

颇有意味的是，烽火和袁家两个矛盾主体的背后，背负着明显的历史与现实的政治色彩，王保京背负着“958 年”、“文革”、“权力”，而郭裕禄则背负着三中全会以后发展起来的经济实力及其评价系统，以及几十年紧盯着烽火的政治力量。“王保京”和“郭裕禄”某种程度上成了两个抽象的政治符号。矛盾的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似乎都在里面插了一腿，利用矛盾，利用斗争，各舀一杯羹，与过去不正常的年代一脉相通，构成了认识陕西政治生活的一个侧面，一个

微观载体。

接下来的问题是，“公案”是怎么形成的？主要责任在谁？里面有无是非？既然是“公案”，就应该公断，就应该有一个了结。

一位熟悉内情的干部说：“关于‘郭裕禄和王保京两个劳模斗争’的说法，我不同意。这只是现象，不是本质，两条理由：一、你王保京做下的事，都是袁家和郭裕禄默默无闻的时候做下的么，郭裕禄怎么跟你斗？二、袁家和郭裕禄后来成长起来，你王保京容不下么！郭裕禄能与上面说上话了，我们礼泉的父老乡亲通过郭裕禄反映愿望和心声，怎么能说是袁家和烽火的斗争呢？两个乡的两个村，隔得老远，哪有斗争可言？宗法关系不存在，地界不挨着，没有资源利用的矛眉，又没有财产纠纷，哪有斗争可言？要说有矛眉，是烽火容不下袁家么！王保京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同一县治下的两个村，如果没有王保京的高位，你看怎么斗起来？那边有权，给这边施加压力，有压力就有反抗么！”

白纪年持同样的看法。他说：“郭裕禄后期发展起来，当了党代表和全国劳模，王保京吃醋，还想压一头。我当副省长后，王保京和郭裕禄都到我这里来告状，我对两人多次做工作，郭裕禄年轻，接受我的批评。我批评王保京：‘一个老劳模，一个新先进，不要互相拆台，互相嫉妒，互相吃醋。你们矛盾，主要方面在你，不在人家。你现在不如人家，

人家赶上你了么！’王保京表面应付，实际不接受批评，反而对我不满，说我保护郭裕禄。”

何金铭的分析更具理性色彩：“王保京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改革开放后，不是‘名列前茅’了，心里不平衡。”“这里要特别注意‘劳动模范’的问题。‘劳动模范’一定有个大后方。这个大后方就是他所在的村。他是这个村的太上皇。（这个村是他的政治基础。）这个基础一垮，官儿也跟着垮。‘先进’形象，‘劳模’形象，是他进身的梯子和台阶。作为领导干部，水平不行，只能拿这个东西跟其他人比。既要保‘劳模’，又要保‘副市长’的位置，这个原因就很复杂了。”

严格地讲，这场“公案”，郭裕禄始终处于劣势。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王保京千锤百炼，逢凶化吉，跟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政治上的“宗法关系”，形成了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和关系网，而且懂得“制造舆论”，与一些主要媒体的人物保持了长期的“远远超出正常工作和同志关系”的关系，上能通天，下能接地，可谓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农民政治家”，或者叫“乡土政治家”。当然，他把“乡上”的涵义远远扩宽了，“乡土”已经不再是“烽火村”，甚至不再是“礼泉”和“咸阳”，而是“陕西”，而是“中国”。

而郭裕禄基本上是在一个半封闭的环境下发展的。他不信任媒体，甚至“轻视”媒体，不懂得媒体在现代社会的重

大作用，认为媒体经常不说实话，媒体对王保京和烽火的宣传就是例证，所以根本谈不上主动联系媒体，包装自己和袁家村。记者找上门来，他经常躲着不见，躲不掉，也只是敷衍一下。翻开袁家村的历史，二十多年，媒体报道非常有限，名声很大，却不显赫。他是那种典型的“乡村英雄”，没有任何外援，竭尽极其有限的自然资源和自身潜能，靠着朴素的价值观，靠着苦干实干，靠着不满现状的牛存本能，在自然和人为的压力下拔地而起。他的发展历史，袁家村的发展历史，是中国朴素农民在落后的牛产力水平下，在城乡二元差距、农村政策扭曲、农民受挤压的情况下，图生存、求发展的历史。他信奉的原则是“只干不说”，因此吃了大亏，首先是妨碍了经济的发展，其次，遇到危机时处于被动状态。然而，亦失亦得，就像 1979 年卸职回村一样，不与媒体接触，与媒体保持距离，避免了虚浮，避免了王保京那样“拔高了，下不来”的尴尬局面。

中国媒体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宣传”，围绕着特定时期特定需要的宣传，帮了一些人，也害了一些人，特别是害了一些头脑不清醒的人，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负面不健康因素，实质损害了公共道德，比如“讲实话”、守信用的道德；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准则。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08

一四

郭裕禄基本上处于守势。他自己也对比过王保京的实力。他认为他不是王保京的对手，而且也没有长期对峙的必要。“我要搞经济，惹不过人家哩。”他说，“政治”与“经济”，他更有能力选择经济。他不希望两败俱伤，对省委书记白纪年以来的所有说和工作，都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但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王保京不接这茬儿。按理，王保京是副市长、市委常委，年龄大，地位高，不应和一个村党支部书记“一般见识”。可他恰恰相反。一直到1995年，烽火和袁家的关系才出现缓和的转机。

1995年春节后，不知哪河水发了，王保京的司机突然跑到袁家找郭裕禄：“郭书记，王保京已经退了，你去把老汉看一下么。”

关于王保京退休回村，搞得动静很大。1995年3月3日《陕西日报》头版头条登载本报记者写的通讯《赤子回归黄土地——王保京主动离职回乡纪事》，并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永葆为人民服务的本色》。

报道说：“1994年的一天，原咸阳市政府顾问王保京像往常一样，按时上班。可是，没人想到：这天，竟是这位老市长将要告别他熟悉的岗位，离开和他常年工作在一起的同志们，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礼泉县烽火村的特殊的一天。

“一切都在按照常规进行着。没有省上领导的谈话，没有人们的窃窃私语，也没有将要发出的离退休通知书，是王保京自己主动把钥匙和常坐的奥迪车交给了办公室，并向组织提出自己该退休了……”

“王保京说：位置是党给的，权力是用来给人民办实事的。”报道表扬了他“在其位，谋其政，以一颗赤诚的公仆之心，脚踏实地，勤奋为民”的业绩。

“本报评论员”文章说：“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在其位就有其权。这权力，是人民给的。他只能用手中的权力脚踏实地、一丝不苟地为人民办实事、谋幸福，当个人民的好公仆。”“我们党内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能遵循这一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王保京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王保京时刻牢记党的宗旨，他从一个劳动模范走上领导岗位后，随着他职位的升高、权力的增大，可为人民做贡献的思想始终没有改变，相反，这种思想越树越牢。他在领导岗位上，工作认真负责；退休回家后，他不忘群众疾苦，放弃留城过清闲的日子，回到家乡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操心劳神，受到人民的称赞。”“毛主席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当一个好公仆难，当一辈子好公仆更难。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用党的标准要求自己，像王保京那样多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着想，为党增添光彩，永葆共产党员的本色。”

细查字里行间，报道似乎有一个小小的疏忽，王保京是多大年龄退下来的，没交代。据公开报道考证，1994年，王保京应该是64岁“主动”要求退休，是不是“主动”得太晚点儿了？再干一年，就到了正部省级退休年龄了。

1996年7月24日《陕西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三张新闻照片，标题是“从市长到农民”。照片说明写道：“1994年7月，担任地市级领导22年咸阳市副市长王保京主动要求回家乡——礼泉县烽火村当一位普通农民……”云云。

真实情况如何呢？

原咸阳市市委书记说：“主动退休？根本没那么回事！1992年，王保京过了退休年龄，市委和省委组织部要求他退休，他找到我，说他的年龄填得不对，他不到退休年龄。后来组织部查他的档案，结果是有九次岁数超过了60岁，三次没超过60，最后按多数填写的年龄认定，让他退了休。考虑到他的情绪和政治平衡，我迁就了他一下，让他当市政府顾问，保留副市长待遇，1994年换届，顾问就免了。临走，还要求组织把他儿媳妇安排到市公安局工作，我们满足了他的要求。王保京的年龄和他其他问题一样，是个谜。”

王保京档案里的年龄到底是填大了还是填小了？不好判断，只能按多数算。至于为什么有大有小，不得而知。可以判断的事情是，领导干部退休，年龄是一个硬坎儿，王保京退休颇费了一番周折。

王保京“主动”退休被大大炒了一把，光是新华社就图片加文字三次发稿，其中两次涉及王保京的年龄。两次下一样。一次是 1995 年，说当年王保京的年龄 63 岁；一次是 1996 年，说当年王保京的年龄是 66 岁，真假难辨。王行兴说，1996 年王保京的年龄应该是 68 岁。陕西人说年龄，一般都是虚岁，王行兴的说法减去一岁，是 67 岁。

王保京叫人捎来了橄榄枝。怎么回应呢？

郭裕禄很矛盾。十几年的恩恩怨怨，挥不去，赶不开。“学大寨，赶烽火”，他处处都忘不了提“烽火老大哥”，后来成了生冤家，死对头。两个村隔 15 里，却好像隔了天涯海角，屁股永远坐不到一起来，光说王保京“嫉妒”，似乎又说不过去。时光如流水，转眼间，王保京卸职归田，到了“其言也善”的地步。咳，他当县委副书记，说起来是父母官，王保京老汉退了，继续当烽火村党总支书记，由上级变成了“下级”，何况这个老汉还余威不减呢。好了好了，跟老汉不斗了，现在重抹桌子重摆菜，集中精力搞经济吧，过去的事，让他自己慢慢想去吧。

他对来人说：“能行么。我去把老汉看一下。”

这天下午，春节的喜庆劲儿还没有散去，郭裕禄买了两条“中华”烟，拎了两瓶“茅台”酒，来到烽火王保京家。1970 年，他是多么想敲开王保京的家这扇门呵。后来，学大寨，学小靳庄，与王保京县委共事，多次踏上烽火的土地，

这次再来，心情要复杂得多，脚步要迟滞得多。他还是忘不了王行兴的告诫：“王保京给饭你吃，给话不听。”

两个劳模见面了。王保京热情地拉着郭裕禄的手往里屋让。

“裕禄，进来坐，进来坐。”

“王市长，你最近身体还好？”郭裕禄问候道。

“好着哩。”王保京说。

“这下回来好好休息，养好身体，身体好一天幸福一天。”

“裕禄，你到县上工作了，过去的事情过去了，这里面有瞎人挑拨哩！”

“……”一上来，王保京就拉开了积极修补关系的架式，一时搞得郭裕禄不知说什么才好。

“裕禄，过去有人是‘爬别人的陵前，哭自己的伤心’哩，拿你的棍子打我，拿我的棍子打你哩！”

王保京这么总结烽火和袁家的关系，郭裕禄肚子里不服，心想：你整我，自己做下的事，怎么嫁祸于人呢？你是不是棍子我不知道，反正我不是棍子。他不便反驳，只是打哈哈。末了，扔下一句话：“王市长，将来有什么事，你写条子，我照办。”

果然，王保京急于修补与郭裕禄的关系，另有目的。

09

一五

王、郭二人见面不久的一天晚上，县委常委会。会议议题，讨论报全国劳模，县工会主席列席。

其实，这是一次准备走过场的常委会。“全国劳模”已有所属。

请工会主席介绍情况，工会主席开门见山：“全国劳模上面已经定了，点名推选王农业。”

郭裕禄一听就炸了：“这话咋说？上面是谁？咋能点名当全国劳模！已经定了，叫下边推选干什么？”

其他常委知道这会有好戏看，谁都不愿惹事，谁也惹不起事，一旁不发言，静观其变。

郭裕禄数落：“全国劳模么，要有成绩，有威望，有群众基础，选上后，要发挥带头作用，桥梁作用，骨干作用。王农业有什么成绩？有什么威望？有什么群众基础？大是劳模，娃也应该是劳模？他王保京是劳模品种？劳模的蔓上结劳模的瓜？”

这是一个更强有力的信号：3 月 6 日《陕西日报》头版刊登消息：3 月 3 日晚，省委书记和王保京促膝长谈，共商振兴陕西农业大计”。

经验告诉大家，王保京又与新任省委书记搭上线了。谁敢说个“不”字？

偏偏遇上了个不怕事的郭裕禄。

“这回报全国劳模要农民哩。王农业 1992 年就是国家干部了。”郭裕禄说。

“王农业上面批了国家干部，但是没去报到办手续，国家规定，半年不报到的，自动作废。”工会主席解释说。

当国家干部，吃商品粮，下大力气争来的好处，怎么会自动放弃？今天的效果，就是当初的“深谋远虑”？

“还有！王农业材料上的产值和上交国家税收不实!”郭裕禄又抛出了一个炸弹，“他说上交国家税收一百二十多万，实际不到 30 万。产值也不对！不信可以查!”

这时，郭裕禄已经拿到了税务人员作假的证据，并严肃地批评了当事人。烽火上交税款后面几乎乘了个“10”多报了九倍！还有一个简单的判断，烽火产值报了 7000 万元，税收却只 27 万元，要么没有那么多产值，要么严重偷漏税!

县委书记胡补旭一看会开不下去，想抹稀泥:“老郭，王保京的娃上，你不要挡，你也可以再报人选么。”

叫报就报。郭裕禄报了烽火乡小应村党支部书记张志杰，南坊镇东峰村党支部书记刘素娥。他说:“张志杰党支部书记二十多年，人正派，捐资办学，为青年办事，政绩也比较突出。刘素娥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当了二十多年党支部书记，领导山区人民改天换地，脱贫致富，起到了带头作用，在群众中影响好，”

“那好，就报三个人的材料!”胡补旭一锤定产。

可工会主席嘟嘟囔囔说：“上面要的是王农业的材料，其他两个人的材料报上去也没用。”

“就这么定了！三个人的材料按文件规定的程序调查上报。常委不再上会讨论了!”胡补旭说。

胡补旭的结束语，有非常关键的八个字：“调查上报”，“不再开会”。在激烈的矛盾漩涡中暗含着能让他上下不得罪的两个策略：一是矛盾上交，二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一年以后，已任市委党校校长的胡补旭叙述了当时的苦衷：“实际市上只上报了王农业一个人的材料。老郭知道后骂我：‘咳，老胡，我上了你的当了!’材料没有盖章，不能生效，市里领导写条子，说：‘研究盖章上报。’市委书记市长当面也谈，市工会专门来找我。我说：‘硬要我盖章，你市里来领导协助我开常委会!’老郭说：‘老胡，你不能盖章，盖了连你一块告!’我知道，一开常委会，郭裕禄肯定把会搞砸了。材料一上会讨论，老郭说不实，你查不查？肯定要查，一查就砸锅！查也不是，不查也不是，我干脆来了个不讨论，程序也没有规定常委会讨论，我讨论个锤子！材料由市上定，材料的真实性由工会负责，老郭反映材料不实，你上面可以下来调查么，我可以协助你调查。你上面把事往下面推，我也不是糊涂人，我也有村付的办法，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1992 年，王农业当省人大代表，县里就不知道。我的爷！这王农业当全国劳模的事，

把人看得气的!”

市里向县里施加压力，是因为省里向市里施加压力，省上的人三番五次跑市上，市上的人三番五次跑县上，一级压一级，搞得声势浩大，沸沸扬扬。省委书记亲自出马，找省总工会一位副主席，要他到咸阳做工作。副主席问省委书记:“我能不能说是你的意见？”省委书记说:“不要说是我的意见，就说是工会的意见。”

这就给工会出了个大难题，工会也不能给地方党委下指示。更严重的是，有人告诉这位副主席，办不好这件事，关乎他的前程！无奈，副主席只好跑到咸阳跟市委书记说清来龙去脉。市委书记说:“材料已经报给总工会了，你们总工会定。省委书记有意见，请写个条子来,”副主席两头受气。省委书记断然不会写条，一写条就可能被抓住把柄；市里上报的材料县里不盖章，不算数。罢罢罢，这事横竖办不好，打道回府。

奇哉怪哉，不知道哪儿出了毛病，为一个三十出头毛孩子的“劳动模范”称号，犯得着弄虚作假？犯得着那么兴师动众？犯得着那么声势浩大，沸沸扬扬？犯得着省委书记亲自出马？好像一群精力过剩的人千里各拿一把牛刀，庄严地追着一只鸡杀; 好像一些长跑运动员，训练出了发达的肌肉,攒足了劲拿世界冠军，到了比赛场，汉流浃背地原地踏步跑——好像大家没有什么正经事可干，好像其中有无穷无尽

的乐趣。

一六

常委会后第二天，郭裕禄去了咸阳。他有预感，从上到下，围绕王农业当全国劳模，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保障系统，只有他这个县委第四把手是局外人。这是他一个人的战争，对手是一个军团，一个人对一个军团，实力极其悬殊。然而，他也看到，保障军团有着致命的弱点，他们捧的劳模典型虚假，他们的运作方式不光明正大，不敢拿到桌面上来说，而且，军团阵营里，除了极少数人，县市两级大多数人离心离德，只不过慑于权力，敢怒不敢言罢了。

他打电话给市劳动竞赛委员会主任、副市长田朝。

“劳模的事研究了没有？”

“刚研究毕。”田朝说。

“定的谁？”

“王农业。”

“田市长，报王农业不符合上面的政策。一、王农业没有政绩，就是沾了他爸王保京的光；二、王农业上报的材料没研究，主管领导没见，县委没讨论盖章。你们的做法是不对的。据我了解，王农业材料里给国家纳税一百二十多万元是假的，年产值七千多万元是假的。你们这种做法不符合党的实事求是原则！这样的劳模评下来，群众不服!”

“现在已经撵不上了，材料已经报省上了。要说，要找

省上说，市上根本没办法。”

郭裕禄了解咸阳市被逼无奈的处境，毛病在省上，非得到省上才能解决问题。他转身去了西安。

他打电话约见省委书记。

“×书记，我要跟你汇报一个事情哩。”

“哎呀，今天没时间。”书记说。

“晚上行不？”

“晚上要见北京客人。”

“那你啥时候回家？”

书记回避不见，郭裕禄缠住不放，拿出了非见不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

书记只好说：“九点左右。”

郭裕禄说：“那我八点到你家门口候着。”

书记说：“有什么事，明天谈嘛。”

郭裕禄说：“我这事比较急哩，要晚上跟你汇报哩。”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勉强说，“那行。”

郭裕禄毕竟是省委委员，省委委员找省委书记有急事汇报，不见有失情理。

果然，郭裕禄按时把车开到八号院门口候着。八点过，见书记的车进了大门，他便前后脚跟了进去。

“×书记，王农业全国劳模的材料，其中向国家纳税数是假的，产值数是假的，不实事求是，弄虚作假，不符合劳

模标准。”郭裕禄直截了当。

“老郭，人家也有证明啊。”出乎意料，书记已早有准备，拿出了一张税票，不急不火地说道，“你看，人家去年纳了 126 万元税呀。”

“×书记，这张税票是假的!”

“老郭，人家税务局开的证明盖的章呀。你不相信税务局？”书记显然不高兴了。

“但是，我掌握的情况，这是假的。”郭裕禄却不给面子。

一张税票，书记说是真的，郭裕禄说是假的，场而极其尴尬。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绝无第三种可能。书记说“你不相信税务局”的潜含意思是：你不相信我堂堂的省委书记?

郭裕禄感到了压力。再换一个人，这种上下级关系，这样的对话气氛，省委书记的态度如此鲜明，可能早就知趣退却了。因为，一个农村青年当不当全国劳模，确实跟任何人包括郭裕禄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如果坚持下去，就可能给省委书记难堪，得罪省委书记。说到这儿，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不是真假之争了，已经变成了是否藐视省委书记权威的的问题。所以，跟省委书记这场面对面的真假之辩，挑明了后，郭裕禄就没有退路了。即使如此，他仍有余地，要么妥协，要么坚持。郭裕禄选择了后者。

“是真是假很简单，可以去查么。”郭裕禄动了感情，说道，“×书记，我是共产党员，省委委员，县委副书记，我拿党性和人格担保，王保京的娃如果纳税超过30万，你把我头割了！可以开除我的党藉！我愿意承担任何处分！”

郭裕禄的大嗓门惊动了省委书记夫人。书记夫人不高兴地说：“有事白天到办公室说去!”

省委书记起身说：“老郭，人都有缺点，都有不足之处。你先回去，你说的事，组织上会考虑。”

郭裕禄一听这话，明白了今天是白来了。什么叫“有缺点”，什么叫“有不足之处”？陕西评出的“全国劳模”，是弄虚作假的“全国劳模”，说出去，不让陕西人民脸红，全国人民笑话？烽火闹出的笑话还少吗？他也站起身来，语气生硬他说道：“×书记，如果不调查，就这么上报，我要上北京，还会去中央告，连你一块告哩!”

他豁出去了！而且，他手里还有一张王牌一1988年，烽火发生的硫酸毁容毁身案。受害民女武芳指控说：王农业是参与者！武芳1989年、1991年、1992年三次找过他。他不能忘记这个农村妇女跪地喊冤的情景，不能忘记她痛哭流涕地揭掉假发、掀开衣服让他看的情景。那时，他还不是县委副书记。她撕心裂肺地哭诉道：“你是党代表，省委委员，你要替我伸冤哪!”他问道：“你怎么不去找司法机关，去找市上省上？”她说：“都找遍了，没人理哩!”郭裕禄接过了

武芳的控诉材料心里却叹道：“找我有什么用处？我无职无权，说话谁听？再说了，烽火的事，谁惹得起？”正如所料，他转出去的材料石沉大海，而且还让烽火知道了他郭裕禄过问此事的风声。有如此劣迹的王农业还能当“全国劳模”？弄虚作假，欺压乡里，一块告！最后鱼死网破，水落石出，管他得罪谁！他说“共产党要讲实事求是么。我反映的情况不是假话么。碎官上面有大官，大官上面有大大官，省上面还有中央么！我是公民么，是共产党员么，是党的干部么，维护党的利益和党的原则么，维护真理、打抱不平么！我怕啥！顶多把我的县委副书记撤了。撤了更好，回我的袁家村搞经济呀!”

与省委书记谈话，不欢而散。他还不死心，省长，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省人大主任、副主任，省政协主席、副主席，省工会主席、副主席，只要是管事的，或打电话，或亲自面谈，一时间，让完全是“黑匣子”操作的事情在陕西政界曝光，让满天下都知道了烽火弄虚作假搞“全国劳模”的事情。

结果是王农业“全国劳模”流产。

结果是对郭裕禄大规模的政治陷害。

10

一七

《金沙滩?舍子》，《诸葛祭灯》，一唱三叹。

一场恶战下来，已是伤痕累累。一年多的时间里，社会谣言四起，家里人担惊受怕，袁家经济受到严重影响。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到底是为了个啥？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伸冤，在自己的治下不允许弄虚作假，职责所系，天经地义！大底下还有没有说理的地方！说起来，他还是个有身份的人，还是个能找到地方说理的人，还能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奋争，进行反击；回为他有知名度，也算是陕西名流，会有人同情他，会有人来为他打抱不平，换成了普通老百姓，岂不是冤死了没办法？真是不敢往深里想。他早有思想准备，被处分，被撤职，回村务农。如果连党支部书记都不让当，就当一个优哉游哉的农民，没事了，找上几个老哥们儿“丢方”，争个而红耳赤太阳落山，回家吃饭，端上一大碗油泼辣子面，稀里呼噜地吃进去，何等畅快！家里闷了，再像十年前一样，带上擀面杖，带上油泼辣子，带上干馍，去国外看看。有什么可笑话的？咱就是农民么！咱吃不惯洋人的西餐大菜么！没有“丰肉泡馍”，没有“肉夹馍”，干馍夹油泼辣子便可让他胃口大开。“干馍要咬得掉渣儿才好。”他说。人活着，有口气，有碗饭，有张床，知足了。严格他讲，他不真正懂经济，袁家的钱，都是一分一分挣来的血汗钱。“我这个人，就是运气好，干一件事成一件事，想干的事都干成了。务棉花，养牛，建石灰窑，建砖瓦场，建水泥厂……那时是‘瓜’的。就是害怕借银行的钱，还本付息，费了半

天劲，钱都给银行挣去了。银行找到门前借钱，都不借。”他说。直到 80 年代中期水泥厂扩建到 5 万吨！90 年代扩建到 15 万吨，事业要发展了，靠自己原始积累的那点钱支撑不下去了，才开始借钱。早点觉悟，袁家的发展规模还会更快，还会更有实力。相比而言，他更下懂政治。他希望的政治，是丢方里的“恬方”，斗而不“围”，斗而不逼，留有余地，遵守游戏规则；不希望是“围方”，直杀得血肉模糊，你死我活。可现实不是这样。现实政治，就是“围方”！所有的手段，都是要想方设法地扼住对方的喉咙，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也难怪王保京下手那么狠。王保京老了，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政治风云一辈子，要让儿子接班，按自己的成长模式精心设计了儿子的前途，“代表”，“劳模”，然后掌握权力，联络省委书记，媒体频频宣传，几乎做到了该做到的一切。道路铺平了，前途无限光明，中间却搁着郭裕禄这个死硬死硬的绊脚石。环顾礼泉，环顾咸阳，环顾陕西，能跟烽火作对的只有郭裕禄了。于是屈尊把郭裕禄请到家里来，好言安抚，捐弃前嫌。“原来他是想扫清王农业当全国劳模的障碍!”郭裕禄恍然大悟。一切的一切都做到了，就是忘了把王农业屁股底下的“潮气”烘干，就是没有办法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把烽火由礼泉的“中等生活水平”提高到出类拔萃的水平，于是再一次“故技重演”，在数字上做了小小的一点手脚，于是被揪住了。于是一切的一切被他郭裕禄给毁

了。毁了王农业的前程，等于毁了王保京身后的政治安排。郭裕禄春节后拜访王保京，是想和王保京玩儿“恬方”，可没想到王保京打的是玩儿“围方”的主意。等他明白的时候，“围方”的绞杀已经白热化了。

“恬方”也罢，“围方”也罢，沾上政治都不好玩儿。还是跟过去的老哥们儿玩儿得踏实，又开手，就地划“方”，杀个难解难分，尘土飞扬。

一八

郭裕禄回家的路上，看见矮子杨兴民两个“壮得像蒜锤一样”的孙子满地疯跑。杨兴民和翠儿两个残疾人，真是前世修来的福，生了个高大健壮的儿子，高大健壮的儿子找了个全村称羡的好媳妇，又生了两个健康茁壮的孙子。杨兴民得了孙子的时候，村里决定，批准再生一胎，郭裕禄设计，第二胎希望能生一个女儿，将来可以照顾眼睛看不见的翠儿。结果生下来，又是一个“带把儿”的秃小子，他的设计多少有些遗憾。

咳，天底下的事，哪有十全十美的呢？就在郭裕禄摆脱诬陷干系后，杨兴民去世。郭裕禄说，由集体出面厚葬，以表彰他一生对集体的贡献，以寄托老哥们儿的怀念。一个先天残疾人，一个本本分分的农民，后半生找到了幸福的生活，不能善始，却能善终，村民无不感叹羡慕。

一九

说到杨兴民，故事只讲了一半。

杨兴民和翠儿结合，心里并不踏实。说亲的时候，光说他个儿矮，翠儿看不见，故意不说清到底多矮，一进被窝，不露了馅儿？

杨兴民新婚之夜躲在饲养室不回家。

郭裕禄虽说婚前检查过杨兴民的“家具”同房没问题，心里还是不踏实，天一亮就到饲养室，问道：“兴民，你跟媳妇睡觉没？”

杨兴民要面子，憋了好半天才说：“没睡……”

“你个挨球的！”一块儿养牛的王有才拍了一下杨兴民的后脑勺，说，“不和媳妇睡觉，算什么男人哩！”

“唉，你成天钻饲养室，不回家和媳妇温存，这咋行么！”郭裕禄说。

“……”杨兴民不说话。

翠儿也来找郭裕禄：“郭书记，晚上没见女婿么。”

郭裕禄赶紧说：“不怕，女婿马上回呀。”

郭裕禄吓唬杨兴民：“你挨球的不回去，看媳妇跟你离婚哩！”

郭裕禄和王有才私下商量：“晚上把这挨球的拎回去，门反锁上，早上再打开。”

如此这般，一个月下来，杨兴民和翠儿，一个不让摸，一个摸不着。翠儿感觉不对头，一天，她摸着了杨兴民，呀，

个子咋这矮哩!

“郭书记，我要离婚哩……”翠儿找到郭裕禄说。

“翠儿，过了一个多月了，咋才提出离婚哩？”郭裕禄早知有这么一天，也想好了应付的办法。

“我刚一摸，人咋这矮哩。”

“秤砣虽小压千斤哩！你要多大？”

“个子太碎了么。只有碎娃大么。”

“个子碎，树老了么。”

一句赶一句，正正经经的事，轻轻松松地说，一个劲儿地把翠儿不好说出口的理由暗示过去。

郭裕禄心里有底。他这边哄着翠儿，那边教着矮子：“兴民，你挨球的不会来事。赶紧给媳妇去买几件新衣服！平常回去，买点糖啊饼干啊啥的，慢慢培养感情么。”

果然显见成效。不久，杨兴民悄悄告诉郭裕禄：“翠儿怀娃了里……”

附录一（上）

媒体报道编年史--王保京和烽火村 50 年代-90 年代（不完全统计）

1、《陕西日报》1954 年 8 月 31 日二版

标题：烽火社的多种玉米增产试验

体裁：消息

作者：魏丕强

内容提要：笼统介绍烽火探索玉米增产，用了七种播种方法，五种留苗方法，三种配种试验，一种无性杂交试验，一种种子排队试验。以辽东白玉米胚移在红心白马牙玉米上，进行无性杂交。

2、《陕西日报》1954 年 10 月 13 日二版

标题：醴（礼）泉烽火农业社分社后社员信心提高

体裁：消息

作者：王志强　阎潮珠

内容提要：1954 年 2.37 亩王米高额丰产地平均亩产 1220 斤，51 亩回种水地平均亩产 500 斤。

3、《陕西日报》1955 年 4 月 2 日三版

标题：西北农学院帮助烽火农业社总结回槎（茬）玉米丰产经验

体裁：消息

作者：陈策贤　周梦亮

内容提要：西北农学院教授赵洪璋、吴焕斌等′访问′回茬王米亩产 1500 斤，高出当地产量 253％的经过。

4、《陕西日报》1955 年 6 月 9 日二版

标题：醴（礼）泉县烽火农业社又创包谷（玉米）丰产新纪录

体裁：消息

作者：无

内容提要：1954年五十一亩七分水地玉米平均亩产五百六十斤零十四两（十六两老秤），其中有十八亩红心（白）马牙优品种平均亩产七百八十五斤。一亩九分红心（白）马牙玉米高额丰产地平均亩产一千五百斤零十三两，丰产纪录比1953年高出一百八十四斤二两。一亩九分高额丰产田是回茬地，夏收小麦平均亩产八百八十六斤，小麦和王米两料相加，平均亩产两千三百八十六斤十三两。

解析：关于1954年的玉米产量，1954年的报道与1955年的报道明显矛盾。首先是王米高额丰产地亩数，1954年比1955年的报道多了四分七厘地，如果按1955年报道为准，玉米高额丰产地平均亩产为一千四百九十五斤七两。其次，大田玉米1955年报道的平均亩产比1954年多了六十六斤十四两。高额丰产地是两亩三分七厘呢，还是一亩九分？平均亩产玉米一千五百斤零十三两从何而来？本书已有考证。数字游戏。

5、《陕西日报》1955年7月2日一版

标题：礼泉烽火农业社小麦丰收　高额丰产田每亩产量达一千多斤

体裁：消息

作者：无

内容提要：两亩高额幸产田平均亩产小麦一千零二十七斤四两，超出原定计划14％多。

6、《陕西日报》1955 年 9 月 13 日一版

标题：烽火农业社玉米又将丰收许多农业社主任和农民代表前往参观学习

体裁：消息

作者：刘敬尧　魏丕强

内容提要：根据预测，两亩高额丰产地每亩可产玉米 1624 斤。

7、《陕西日报》1955 年 9 月 16 日二版

标题：我们战胜困难　连年获得了高额丰产

体裁：经验介绍

作者：王保京

内容提要：介绍高额丰产玉米 1500 斤经验，预测 1955 年高额丰产玉米每亩可达 1624 斤。

8、《中国青年报》1955 年 9 月 17 日四版

体裁：新闻图片

作者：新华社记者　盛继润

内容提要：1954 年丰产田玉米平均亩产一千五百多斤，1955 年要达到一千六百斤。

9、《人民日报》1955 年 9 月 22 日一版

体裁：新华社综合报道

内容提要：王保京在全国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言，称 1953 年他使用小麦碧妈 1 号，使一亩地的产量达

到六百九十斤。'同年，玉米丰产地每亩产量达到一千五百一十五斤，创造了全省最高纪录。'1954年，玉米丰产地的产量达到了一千五百斤，1955年两亩小麦丰产地的平均亩产达到一千零二十七斤四两。

解析：1953

年玉保京王米丰产地每亩产量一千五百一十五斤，比1954年的产量还高，之前没有任何报道，而1955年6月9日《陕西日报》的报道称，烽火1954年玉米丰产地的亩产比1953年高出一百八十四斤三两。1953年王保京在北京的大会发言，说1953年丰产玉米地亩产一千五百一十五斤，纯属空穴来风!

10、《中国青年报》1955年9月29日四版

标题：我们见到了毛主席

体裁：综合报道

内容提要：王保京在全国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言说：今年我们小麦最高每亩打1027斤；玉米最高每亩收1600斤，全年每亩共收2600斤。我保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要提高到平均每年每亩收1000斤粮食，最高的收3000斤。

11、《陕西日报》1955年10月22日二版，三分之一版篇幅

标题：在陕西人民代表大会上'王保京代表的发言。'

内容提要：王保京介绍高产经验，说：′去年平均每亩收 875 斤，最高收 2500 斤，五年内平均要收 1000 斤，最高收 3000 斤。′

12、《陕西日报》1955 年 10 月 26 日二版

标题：贫苦农民办社最积极最坚决

体裁：王保京署名文章

内容提要：五年内，一主要达到全社每亩产粮食 1000 斤，高额丰产地产粮良 3000 斤的新纪录。

13、《陕西日报》1956 年 2 月 2 日二版

标题：烽火农业社水地回茬玉米为什么能亩产 1500 斤

体裁：西北农学院副教授苏献忠署名文章

内容提要：文章总结了烽火回茬玉米丰产的三个栽培技术环节：

一、播种前深耕、施基肥、灌水、蓄墒、选用果穗中部种子，并进行粒选和′两开对一凉′浸种等处理，保证了幼苗健壮发育，并为玉米后期的生长发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二、拔节期间施追肥、培土、提早初灌并加强防治虫害以及时供给充足的养分和水分，给茎叶的迅速生长和性器官的发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三、开花授粉期选株去雄、人工辅助授粉，进行品种内杂交，以提高授粉率，增进当代产量和品质，进一步发挥玉米的优良种性，为继续增产作好了准备。栽培的问题：一、播种前整地采取了曝晒，延迟了播种期；二、行

距不一致，下种籽不均匀；不能及早间苗。文章确认了烽火1954年平均亩产一千五百斤零八两，1955年平均亩产一千六百二十四斤的纪录。

解析：苏献忠教授1955年4月到烽火住了′一季庄稼的时间′，按照王保京高产措施种王米高产试验田，平均亩产是1027斤，何来′624斤？′文章确认的产量显然不实。原因何在？苏教授40年后回忆说：′当时玉米大田产量只有二三百斤，最好也只有四五百斤，亩产上千斤，在全国可是件不得了的事！首先是玉米品种，烽火种的辽东白和红心白马牙，现在看，不是好品种。犁茬曝晒，延长了播种期，不科学。′平均亩产1500斤都是问题。为什么品种不好，耕作方式不科学，反而会有超级高产呢？

14、《中国青年报》1956年2月17日二版，三分之一版篇幅

标题：不，这不是数字的错误

体裁：新闻图片（五幅）

作者：张毓

内容提要：广西省一位读者对《中国青年报》报道烽火1954年亩产玉米1500斤质疑：′看了这图片，使我们广大群众十分惊讶，到底这个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是你们把150斤错成1500斤？因为玉米从来就没有这么高的产量。′编辑部委托《陕西青年报》记者张毓调查的结果是：否！王

保京 1955 年对记者说：′今年计划每亩地要打 2000 斤，比去年还要多 500 斤。′

15、《陕西日报》1956 年 3 月 16 日一版

标题：醴（礼）泉烽火社妥善安排劳力

体裁：消息

作者：王德兴

内容提要：烽火计划今年夏秋两季粮食亩产达到 1731 斤，比去年亩产 590 斤增加 193%；棉花达到 181 斤皮棉，比去年亩产 72 斤增加 151%。

16、《陕西日报》1956 年 4 月 2 日一版

标题：烽火农业社（向省青年玉米丰产经验交流大会）的献礼

体裁：消息

作者：俊祥

17、《陕西日报》1956 年 4 月 4 日二版

，三分之二版篇幅

标题：我们的玉米为什么能亩产 1500 斤--醴（礼）泉烽火农业社主任王保京在陕西省青年玉米丰产经验交流大会上讲--

内容提要：除了已有经验，1956 年吸取苏献忠教授的意见。亩产一千五百斤零十三两，合理密植，留苗 1960 株。′说起经验，我看就是两句话：′听党的话，依靠群众，相信

科学技术和细致地进行作务。'''现在我们计划全社所有的玉米地，每亩都要突破1000斤。'

解析：为什么不介绍1955年亩产玉米1624斤的经验？1624斤比1500斤高得多呀？看来已经高得不好意思介绍了。

18、《中国青年报》1956年4月7日一版

标题：团陕西省委召开大会在青年中交流玉米丰产经验

体裁：消息

作者：本报记者　李振东

内容提要：会上王保京报告了烽火获得王米亩产1500斤的经验。西北农学院副教授苏献忠也作了报告。

19、《陕西日报》1956年4月8日二版

标题：烽火社创造了小麦亩产1027斤的纪录

体裁：消息

作者：董俊祥

内容提要：1955年两亩高额小麦丰产田每亩产量一千零二十七斤四两，创造礼泉县历史最高纪录。

解析：为什么近一年才显著报如此大的喜讯？不太符合王保京的风格。

20、《陕西日报》1956年6月7日二版，约两千字篇幅

标题：听党的话，相信科学技术

体裁：王保京署名文章

内容提要：'有些老年的人见了我父亲和我母亲就说：'

你们的命好，要了那么个能干的娃！′我父亲和母亲对他们说：′不是我们的命好，是共产党、毛主席教育的好。′′

21、《陕西日报》1956 年 6 月 24 日一版

标题：种好玉米　争取丰收--烽火农业社主任王保京答本报记者问

22、《陕西日报》1956 年 9 月 9 日一版

标题：王保京，延安专区青

年要赶过你了！

体裁：消息

内容提要：延安黄龙界子河乡 21.5 亩青年丰产玉米试验田，预测平均亩产可达 2000 斤。

23、《陕西日报》1956 年 10 月 20 日一版报眼

标题：王保京领导的烽火农业社玉米又获大丰收，丰产地亩产两千斤大面积平均八百多

体裁：新闻图片加消息

作者：丁一

内容提要：一亩二分高额丰产田平均亩产王米两千零七十斤十三两，四百五十五亩玉米地平均亩产八百二十二斤八两，其中亩产达千斤以上的有一百二十一亩五分。

24、《中国青年报》1956 年 10 月 31 日二版

标题：陕西不少青年生产队、组推广王保京玉米丰产经验成功　团陕西省委作　出奖励决定

体裁：消息

作者：本报记者　李振

内容提要：陕西各地许多农业社青年丰产田赶上了 1954 年王保京的 1500 斤

25、《人民日报》1956 年 11 月 2 日三版

标题：烽火农业社玉米又丰收了

体裁：消息

内容提要：1956 年烽火一亩二分玉米丰产地亩产玉米达到两千零七十斤十三两，四百二十亩水浇地平均亩产八百四十斤，′四百五十五亩玉米地每亩千斤以上的有一百二十一亩五分。′

26、《人民日报》1956 年 11 月 15 日三版

标题：陕西省推广王保京玉米丰产经验　青年玉米试验田普遍丰收

体裁：消息

作者：朱波

内容提要：陕西各地学习和追赶王保京和烽火玉米丰产经验，高额丰产地丰收。

解析：王保京和烽火没法学，没法追，也永远追不上，因为弄虚作假的真经根本就没传授给大家。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即使吃小灶，再往高里走，除了弄虚作假，别无出路。没法追，还有一条，水涨船高，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你再

高也高不过王保京。

27、《中国青年振》1957年1月18日二版标题：全国著名的玉米丰产社--烽火社为每亩产粮千斤以上积极作准备

体裁：消息

作者：本报记者　李振

内容提要：小麦高额亩产要达到1200斤，玉米高额亩产要达到2300斤。

28、《人民日报》1957年1月27日七版

标题：学好技术　增加生产

体裁：新华社讯

内容提要：陕西五个县九万七千多青年学习王保京的玉米高额丰产经验。

29、《人民日报》1957年3月13日五版

标题：在烽火农业社里

体裁：通讯

作者：学穆

内容提要：过去一年里，全国人民都恨关心烽火农业社，烽火收到各地寄来的信件一千多封。

30、《陕西日报》1957年3月18日二版

标题：烽火社的1956年

体裁：通讯

作者：本报记者　董俊祥

内容提要：′大丰收，大增产社员喜欢。′′群众性的技术学习见了效。′′社在变，人在变，风气也在变。′

31、《陕西日报》1957 年 4 月 28 日二版

标题：有办法把玉米产量提得更高

体裁：王保京给编辑部的信

内容提要：参加全国农业劳模会议学习到，在原有高产的基础上，还可以密植增产。

32、《陕西日报》1957 年 9 月 7 日五版

标题：中苏友谊′比山还高，比海还深′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归来畅谈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

体裁：王保京的发言

内容提要：苏联工厂、农庄、衣学院观感。会见李森科。批′右派头子′韩兆鹗′反苏谬论′。

33、《陕西日报》1957 年 11 月 7 日七版

标题：苏联鼓舞我们前进

体裁：王保京署名文章

34、《陕西日报》1958 年 1 月 23 日一版

标题：猛击右倾保守思想--专员县长会议上的大字报摘记

体裁：综述

内容提要：醴（礼）泉县长折敬盈说：为了掀起生产大跃进，我们计划每个负责同志，必须亲自培养一个王保京，

在 1958 年来个大跃进，将现在的一个王保京变成十个二十个一百个王保京。

35、《陕西日报》1958 年 2 月 18 日二版

标题：我们要像人造卫星一样飞跃前进

体裁：王保京署名文章

内容提要：烽火农业社作出决定：1958 年，要如同人造卫星一样飞跃前进。提出：苦干，苦干，再苦干，各项作物一翻三（在 1957 年的基础上提高 130%），棉花亩产一百六，粮食超过一千整，飞过秦岭跨长江，提前九年突破纲要指标。要在 1958 年，小麦由 1957 年的亩产 210 斤提高到 450 斤（回茬），玉米由亩产 405 斤提高到 800 斤，搞玉米小麦两熟亩产 2000 斤田 100 亩，玉米 1500 斤高额丰产田 300 亩，玉米亩产 2400 斤田 1 亩。棉花水地由亩产皮棉 92 斤提高到 200 斤，旱坡地由 35 斤提高到 115 斤，沙坡地由 50 斤提高到 140 斤，高额丰产棉田 10 亩亩产籽棉 1000 斤。

36、《陕西日报》1958 年 2 月 19 日头版头条

标题：苦干苦干再苦干　十年事情一年办，烽火社员大年初一向荒地进军

作者：无

37、《陕西日报》1958 年 3 月 1 日头版头条

标题：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要同生产单位紧密联系互相支援；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推广西北农学院和烽火农业社建立

联系制度的经验

作者：无

38、《陕西日报》1958 年 3 月 1 日

标题：我和烽火农业社建立了深厚感情

体裁：西北农学院副教授苏献忠署名文章

内容提要：总结烽火玉米高产经验，说 1957 年烽火棉花丰产田亩产皮棉 207 斤。政治上也收获很大。′我深深体会到要在政治思想上有所提高，使自己成为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向他们学习阶级斗争的知识和生产斗争的知识，这样，自己的思想才能得到彻底的改造，才能成为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又红又专的干部。′

39、《陕西日报》1958 年 3 月 22 日一版

标题：王保京浑身是劲　今年要亩产粮食五千五百斤

体裁：消息

作者:无

内容提要：′他们的办法是先种大麦，然后套种农林四号红苕和玉米，收了玉米再移栽谷子。把过去的一年一熟或两熟改为一年四熟。′王保京′计算大麦收一千斤，红苕收一万二千斤（折三千斤粮食），玉米收一千斤，谷子收五百斤，共五千五百斤。′

40、《陕西日报》1958 年 5 月 17 日一版

标题：王保京当了科学研究员

体裁：消息

作者：无

内容提要：王保京和在他领导下的烽火社亲自培育出的小麦、玉米、棉花优良品种达七八种之多，正在试种的小麦品种达一百多种，解决了小麦、棉花一年两熟的问题。

41、《陕西日报》1958年5月20日一版

标题：烽火社成立科学研究室

体裁：消息

作者：无

同上一版：

标题：县县社社都办科学事业--祝醴（礼）泉科学研究所烽火社科学研究室成立

体裁：社论

同上二版：

标题：祝烽火社技术革命成果辉煌

体裁：西北农学院教授赵洪璋署名文章

内容提要：'除了社干和各队男女青年搞棉花丰产田外，壮年妇女、老汉、老婆也分别组织起来进行丰产试验。''由王保京同志直接参加和领导的亩产粮食五千五百斤的丰产试验，更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因为它说明了农民的社会主义干劲和创造性。'

42、《人民日报》1958 年 5 月 22 日七版

标题：新农民的新风格--记礼泉县烽火社主任王保京学习科学革新技术的经过

体裁：通讯

作者：吴钢　刘斌

内容提要：小标题：

一、′有困难，想办法去解决它，才能把人吸引住；稳稳当当，慢慢腾腾，还叫什么跃进？′

二、有些人的思想公式是，′不能办-不去办-办不到′；王保京的公式是：′能够办-马上办-办得到。′

三、′为什么大学教授能做，农民就无法学会呢？′

43、《人民日报》1958 年 5 月 22 日一版

标题：农民的劳动创造丰富了农业科学　王保京被聘为科学研究员

体裁：消息

作者：无

内容提要：报道说，王保京领导的烽火农业社选育和培育出小麦、玉米、棉花等作物品种有七八种之多，正在试验的小麦品种有 112 种，继续试验麦棉两熟和亩产 5500 斤。

44、《人民日报》1958 年 5 月 23 日四版

标题：破除迷信，振奋大无畏的创造精神

体裁：转载《中国青年报》5 月 22 日社论

内容提要：社论举例：′被聘为农业特约研究员、在农业增产上连创奇迹的王保京，是一个只上过三年小学的贫农。′

45、《人民日报》1958年5月26日七版

标题：打破对科学的神秘观念

礼泉成立农业科学研究所

烽火农业社成立科学研究室

体裁：消息并配发短评《农民也能研究科学》

内容提要：短评说，烽火农业社科学研究室是我国第一个农业社的科学研究组织。

46、《人民日报》1958年5月28日八版

标题：要多想，多讨论

体裁：言论

作者：谭清露

内容提要：谈论青年农民王保京当′科学研究员′现象。

47、《陕西日报》1958年6月4日一版头

标题：红旗插在烽火社技术革命鲜花开

人人学科学　个个学技术　队队搞试验　户户搞丰产

体裁：长篇消

息并转载《人民日报》让论《向技术革命进军》

作者：本报记者　李世秀

内容提要：烽火目测小麦丰产地亩产可达1100斤以上,

计划水地棉花亩产籽棉 600 斤，亩产杆棉 1000 斤的棉田要占到全部棉田的 25％以上，丰产田的籽棉亩产 2330 斤；计划亩产 1500 斤的玉米地要占到全部玉米地的 25％，丰产地的玉米要达到亩产 3000 斤：并要搞一年五熟亩产 5500 斤的试验。

当天二版一个整版在′鼓足干劲　破除迷信掀起技术革命′的通栏大标题下：

标题：把技术革命的红旗插遍全省各地

体裁：社论

内容提要：烽火农业社的做法是陕西全省技术革命的方向。

标题：领导群众站在技术革命的最前列

休裁：烽火社支部书记袁伯福署名文章

标题：技术股长马书秀

体裁：人物通讯

作者：本报记者　李世秀

标题：作掌握科学理论的新农民

体裁：烽火青年生产队署名文章

标题：西农送仪器给烽火社

体裁：消息

作者：孙健　伯福

标题：农民科学家−王保京

体裁：人物通讯

作者：蒲字平

新闻图片之一：王保京和科学研究室副主任王保学（注：他后任烽火党支部副书记，是王保京的搭档，后自杀未死，被救数天后脑溢血死亡）研究玉米发芽情况。

作者：新华社记者　姜国宪摄

48、《陕西日报》1958年6月9日一版

标题：王保京被聘为省科普学组委员

49、《中国青年报》1958年7月4日二版

介绍王保京和烽火社′今年来选育和培育出来的小麦、王米、棉花等品种达七八种之多。正在试验的小麦品种达112种。他们还在试验麦棉两熟和亩产五千五百斤的耕作技术′。

50、《陕西日报》1958年7月5日一版头条

标题：看烽火社的大火箭一年四熟　亩产三万二

体裁：消息

作者：袁伯福

内容提要：′王保京和他领导的烽火社员，经过学习总路线，最近又在湖北、河南等地小麦高产奇迹的鼓舞下，干劲越来越大，决心力争上游，采取套种办法，试验一年四熟，亩产三万二千多斤粮食。′′王保京满怀信心他说：′有总路线灯塔的照耀，有湖北先锋社青年创造的四千多斤作样子，我们再继续苦干一年，实现亩产三万二千斤是有把握的。′′

51、《陕西日报》1958 年 9 月 7 日一版

标题：有高度密植　才有高额丰产

体裁：烽火人民公社社长、青年农民科学家王保京署名文章

内容提要：预测每年每亩可产粮食 240 万斤。他说：′我相信，有着我们党的正确领导和教育，有着许多兄弟省、兄弟社的宝贵经验作榜样，以及我们全社青年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和智慧，只要我们肯虚心学习和大胆试验，我们的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小麦高产卫星就一定能够飞上高空。′

解析：王保京在此提出了空中播种和农业耕作工厂化的设想，′假若试验成功，每次收成以亩产十万斤计算，每年收三次，每次设楼种八层，每亩地每年即可收粮二百四十万斤′。这就是 1982 年《人民日报》宣传的王保京早就有的种粮′工厂化′的先知先觉。这就是王保京′科学′的大胆设想。当然，这种′科学′在当时是受到赞赏和鼓励的。估计《人民日报》记者看到了这个报道，否则不会确认并赋予王保京 80 年代的意义。

52、《陕西日报》1958 年 9 月 29 日三版

标题：突破专家包办圈子　工农大胆著书立说

王保京正在创立田间设计学

体裁：消息

作者：本报记者　张济美

内容提要：'为了争取大面积的高额丰产，农民科学家王保京从解决农作物大量密植最感困难的通风透光问题出发，正在进行一门新学科--'田间设计学'的试验研究。他的计划是彻底改变原有的耕作习惯和套种方法，使种植庄稼也像建立厂房一样进行各方面的综合设计。''他独创的设计形式有六种'，麦棉间作、凸形播种、梯形或坡形播种、波浪式播种、区田播种、空中播种。

解析：其精髓是'空中播种'，只有这种方法可以使粮食产量达到'二百四十万斤'；只有这种方法可以气势磅礴，供人参观，几十年印象深刻。此其一。其二，需要说明的是，'田间设计学'的功劳不仅属于王保京，还属于在烽火蹲点试验的农业科学家们。王保京可以大胆设想，大胆宣传，但说理论话，成为'学'，还是靠农业科学家们。农业科学家们功不可没。

53、《陕西日报》1958 年 10 月 3 日一版

标题：烽火社万能试验田预测玉米亩产万斤

体裁：消息

作者：袁伯福　杨彭年

内容提要：王保京、马书秀、王万英、王天顺和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的杨彭年等八人，种植 1.615 亩'万能试验田'的回茬玉米，'经县上派出测产工作组的大量和测算，亩产

量在万斤以上'。

解析：特别要提到的是，消息的作者之一'杨彭年'与参加玉米'万能试验田'的'杨彭年'是一个人。他是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派到烽火搞试验的土壤化学专家，是'田间设计学'的实际构思者。严格他讲，1958年大跃进，没有科学家的搀和，光靠农民是'科学'不了的，'跃进'不了的。

54、《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1日六版

标题：新的社会　新的专家　新的学科

王保京创立'田间设计学'

体裁：消息

作者：本报记者　孙传镐

55、《陕西日报》1958年11月27日一版

标题：永远听党的话，跟着党走！

王保京在全国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言

体裁：新华社讯

内容提要：烽火公社几年来用无性杂交、有性杂交和远缘杂交的办法，已培育出小麦、玉米、棉花的新品种共23种，正在研究的工业、农业、畜牧业、医学项目44个，正在试验的小麦品种427种。

解析：这次发言，把不久前报道的成果全面加码：已试验成功的小麦、玉米，棉花七八种涨到了23种，正在试验的小麦品种由114个涨到了427个。真正的科学试验'大跃

进′。

56、《人民日报》1958 年 11 月 27 日六版

标题：征服大地高山　保护粮帅升长

青年积极分子报告农业大跃进中的成就

体裁：新华社综合报道

内容提要：′著名的农民科学家王保京今天在大会上发言，再一次证明了党所领导下的农民那种无穷无尽的创造力。′烽火社几年来用无性杂交、有性杂交和远缘杂交的办法培育出 23 种小麦、玉米、棉花新品种，正在试验的小麦品种 427 种。

57、《人民日报》1958 年 12 月 26 日三版

标题：王保京领导烽火社大闹技术革命

体裁：根据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材料（改编）

内容提要：报道说，王保京 1955 年开始进行作物杂交试验，已经试验种植小麦品种 112 个，棉花 32 个，玉米 13 个；选育出烽选 1 号、烽选 3 号棉花新品种，烽选 1 号、烽选 2 号小麦新品种，′1504′、′1506′玉米新品种。

解析：比前不久公布已选育出的小麦、玉米、棉花品种少了 17 种，试验种植的小麦品种少了 315 种。暂且不说现有 6 种新品种的水分。

58、《陕西日报》1959 年 6 月 19 日头版头条

标题：英雄立下凌云志　要同全省比高低

烽火队倡议开展玉米丰产竞赛

体裁：消息（附《倡议书》）

内容提要：《倡议书》说：′今年我们计划种回茬玉米七百亩，比去年多种五十亩，平均亩产五百四十斤，比去年增产28%，其中一百四十亩大面积丰产田，亩产八百斤，十亩高额丰产田，亩产两千斤。我们的曰号是′党挂帅，团当先，科学技术把谋参。特干、巧干、加油干，定要玉米大丰产。′′

解析：小麦没戏唱，又旧话重提说玉米的事儿。我们如果把烽火1956-1958年三年的玉米产量或计划来和1959年的计划比较，1956年玉米大面积平均亩产已经达到了822斤，1958年800斤，怎么1959年反而只定了540斤？1958年300亩玉米达到平均亩产1500斤，怎么1959年只有140亩达到800斤？高额丰产玉米田，1956年亩产2070斤，1957年2300斤，1958年2400斤，怎么1959年反倒成了2000斤？到底哪一年是代表烽火的高水平？哪一年是真实的产量？

59、《陕西日报》1959年6月22日二版整版篇幅

标题：在初生太阳的曙光照耀下（通栏标题）--介绍一个人民公社整社以后的新气象

60、《陕西日报》1959年7月29日三版半个版

标题：中共乾县烽火人民公社委员会

关于1959年小麦丰产经验的总结报告（以烽火队为主的经验）

61、《人民日报》1959年8月15日三版

标题：干劲越足措施越多　措施越多干劲越高

烽火玉米田间管理好上加好

体裁：消息

作者：朱波

62、《陕西日报》1959年8月28日二版

标题：党给了我们继续跃进的无限力量

体裁：王保京署名文章

内容提要：烽火玉米平均亩产1957年410斤，1958年480斤，1959年估计比1958年要增产百斤左右。

解析：王保京文章关于小麦部分只说提高了产量，亩产问题回避。玉米亩产与前几年对照，明显降低。

63、《人民日报》1959年9月2日七版三分之二版篇幅

标题：人民公社促进了农民对农业科学的研究工作

--记陕西烽火人民公社农业技术学校对充分利用阳光的试验和初步研究情况

体裁：调查报告

作者：胡季委

内容提要：全面总结王保京和烽火′科学研究′、改善耕作制度的经验。

64、《陕西日报》1959 年 11 月 3 日

标题：过好小麦幼苗关

体裁：烽火公社社长、本报评论员王保京署名文章

65、《人民日报》1959 年 12 月 4 日七版三分之二版篇幅

标题：人增知识地增产--陕西乾县烽火人民公社开辟农业技术革新的调查

体裁：调查报告

作者：林牧　王伯惠　李若冰　胡明　张兴民　袁伯福

内容提要：小标题：一、人人学科学，队队搞试验；二、大普及，大提高；三、土洋结合，取长补短；四、新农民在成长。

66、《陕西日报》1960 年 1 月 15 日

标题：施了麦田又施棉田

施了头遍再施二遍

烽火社集中力量猛攻施肥关

67、《人民日报》1960 年 2 月 20 日四版三条报道

标题：举办业余学校　实行短期培训　师傅广带徒弟

烽火公社燃起技术教育烽火

一年多培养了上千名技术人员许多技术问题都能自己动手解决

体裁：消息

作者：无

内容提要：′早在1958年公社刚刚建立时，党委就在烽火生产队和兴隆生产队建立了两个试点，总结了社员王保京从一个普通农民成为科学家的经验，在全社普遍推广，各队迅速掀起了′学王保京、比王保京、赶王保京′的热潮……′

标题：王保京上大学

体裁：通讯

作者：本报记者　张安南　韩国英

标题：普及和提高

体裁：新闻评论

作者：华仁

内容提要：王保京上大学′鲜明地体现了党的′两条腿走路′培养技术人才的方针。′

68、《陕西日报》1960年3月25日三版三分之二版篇幅

标题：介绍烽火人民公社的农业技术学校（即烽火队农业技术学校）

体裁：调查报告（同时发表中共陕西省委批语）

作者：共青团陕西省委

69、《人民日报》1960年4月11日14版

标题：我们公社的技术学校

体裁：在北京的大会发言

发言者：王保京 70、《陕西日报》1960年5月1日

标题：宽行间作套种充分发挥土地潜力

烽火公社大闹农田作务技术革新

体裁：消息

作者：本报记者　景铭　袁淙　东祥

71、《陕西日报》1960 年 5 月 8 日

标题：麦田必须继续加工才能超产

烽火队超产运动进入高潮每亩小麦再超产 100 斤

体裁：消息

作者：袁伯福　赵鼎均　苟靖华

内容提要：670 多亩小麦，原计划亩产 600 斤，现在又从不久前修订的超产指标 700 斤的基础上,争取亩产 800 斤。

72、《陕西日报》1960 年 6 月 12 日一版

标题：再鼓干劲　夺取秋粮更大丰收

烽火队抢种晚玉米

软茬下种　施足底肥　定向密植

体裁：消息

作者：伯福　靖华

内容提要:1959 年实际亩产玉米五百多斤,原计划落空。1960 年′全部按新技术办事，力争亩产翻一番′。也就是说，平均亩产要达到一千斤。

73、《陕西日报》1960 年 8 月 4 日头版头条

标题：总结田间管理经验　掌握玉米生长规律

烽火队主攻玉米空杆（秆）力争棒多粒饱

体裁：消息

作者：东祥

内容提要：烽火提出′株株结多穗，穗穗长五两，亩亩双千斤′的高指标。

解析：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玉米计划又翻了一番，从1000斤到了2000斤。

74、《人民日报》1960年8月11日三版两篇报道

标题：总结田间管理经验　掌握玉米生长规律

烽火公社烽火队主攻玉米空杆（秆）力争棒多粒饱

体裁：消息

作者：无

标题：叫玉米结棒多结棒大 <

体裁：王保京、王保学、马书秀署名文章

75、《陕西日报》1960年10月10日

标题：烽火队插红旗树标兵读报宣传到地头

政治思想工作深入田间　社员大办粮食劲头大增

体裁：消息（新华社西安8日讯）

76、《人民日报》1960年10月26日七版

标题：以农为乐　其乐无穷

体裁：王保京署名文章

77、《陕西日报》1960年11月18日二版转三版一个多版篇幅

标题：劳动人民知识化的一曲凯歌--记王保京和农民伙伴上大学

（配发短评《农民学科学又快又好》）

体裁：报告文学

作者：李若冰

内容提要：全篇用王保京的话构成五个部分：一、′我是来当学生的，你们该打就打，该骂就骂……′；二、′为党、为农民、为烽火公社争气！′三、′科学，它身上长刺，我要碰它；理论，它是刀山，我也要钻，要上！′四、′是少数人掌握科学对科学尊重呢，还是千百万农民掌握科学对科学尊重？′

五、′农民要听党的话，大立雄心壮志，不但学科学，而且可以学得多快好省！′

短评说：′农民上大学，以短短的一百五十大的时间，取得这样大的成绩，这件事，有力地驳倒了资产阶级教育学者们的偏见。资产阶级教育学者，从反动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宣扬什么劳动人民大生就是′愚蠢′的，只能接受一些简单的技术训练，使用一些简单的生产工具，根本不可能学习和掌握比较高深的文化科学知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这种荒谬的论调。我们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从来就认为，一切文化科学知识，都是来源于人们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劳动人民既然是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直接参

加者，他们和一般脱离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比，就必然具备更为优越的学习与掌握文化科学知识的条件。而且，从世界上许多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者都是劳动人民的历史事实来看，即使在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劳动人民被剥夺了学习和研究科学技术权利的情况下，卑贱者最聪明，仍然是一个不可磨灭的真理。

78、《人民日报》1960 年 12 月 5 日七版三分之二版篇幅

标题：农民学科学的新途径

体裁：署名文章

作者：康迪（西北农学院副院长）

内容提要：介绍烽火王保京等九名农民上西北农学院的情况和经验。

79、《陕西日报》1960 年 12 月 21 日

标题: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体裁：王保京署名文章

80、《人民日报》1960 年 12 月 24 日四版

标题：在知识化道路上迈进

体裁：通讯

作者：新华社 23 日讯

81、《陕西日报》1961 年 3 月 11 日

标题：一条心　一股劲　夺取夏田好收成

体裁：劳动模范、烽火公社社长王保京署名文章

82、《陕西日报》1961 年 3 月 16 日

标题：齐心合力搞好大集体生产

合理安排兼顾自留地生产

烽火队开展讨论提高社员集体生产积极性

体裁：消息

作者：袁伯福　王保京

83、《陕西日报》1961 年 3 月 22 日

标题：王保京、张秋香等集会田间交流总结经验推行套种轮作　力争多打粮食

体裁：消息（新华社西安 21 日讯）

84、《中国青年报》1961 年 4 月 7 日头版头条半版篇幅（配发三幅照片）

标题：谁说劳动人民不能作文化科学的主人？只要发奋图强刻苦学习就能成功

王保京等九位庄稼汉从西北农学院毕业

体裁，消息作者：叶浓　安凤和

85、《人民日报》1961 年 4 月 8 日四版两篇报道

标题：农民学科学又快又好

体裁：署名文章

作者：西北农学院第一书记　陈吾愚

标题：九个农民大学毕业生

体裁：通讯

作者：本报记者　张安南

86、《陕西日报》1961 年 4 月 11 日一版半个版篇幅（配发两幅照片）

标题：听党的话　勤学苦钻　革新教学　战胜困难

王保京等九位青年农民大学结业

体裁：消息

标题：坚持就是胜利

体裁：王保京署名文章

标题：农民学科学又快又好

体裁：中共西北农学院第一书记陈吾愚署名文章

内容提要：王保京在署名文章里说：′学了科学还把我的思想学活了。科学，它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需要实实在在的态度对待它；要有实实在在的态度，才能学到实实在在的科学。如果不按照它的规律办事，就会走弯路，就可能把事情办坏。1958 年我搞丰产时，只知道水、肥越上多越好，地越翻深越好，结果地翻得过深，麦子长得反而不好；肥多烧坏了根，反而造成了倒伏，使产量没达到原计划的要求。′

87、《陕西日报》1961 年 6 月 6 日

标题：回种玉米　越早越好

体裁：烽火公社书记孙彦江、社长王保京署名文章

解析：这篇文章用烽火 1959 年和 1960 年两年的玉米种植试验得出结论：回茬玉米′越早越好′。1959 年回茬玉米相

隔10天播种，晚种者和早种者的水肥条件完全一样，晚种者平均亩产比早种者少48.4斤，1960年晚种5天少79斤，这个结论印证了西北农学院教授苏献忠1955年玉米晚播′不科学′的论断。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1954年烽火玉米丰产田亩产1500斤的问题。

88、《陕西日报》1962年1月1日二版

标题：鼓起干劲　战胜困难

体裁：王保京署名文章

内容提要：王保京说：′几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要鼓实劲。鼓实劲，就是要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勤勤恳恳。少说些大话，多做些实事。一些地方先进不先进，最要紧的看他们把庄稼做得怎样，粮食及其他收入是否增加了。给国家贡献得多不多，社员收入多不多。三年前，我们在有些事情上做的过火了些，有些王作做得不大实在，结果，走了一些弯路，但在党和政府及时指导下，总结了经验，纠正了缺点，把教训变为力量……′

解析：这是王保京公开承认1958年′过火了一些′，′不大实在′，并信誓旦旦他说′要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勤勤恳恳′，′少说些大话，多做些实事′。但是事实证明，他并没有真正吸取教训，继续在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弄虚作假。

附录一（下）

89、《陕西日报》1963年3月8日二版三分之一版篇幅

标题：人民公社红花怒放

烽火大队发扬大跃进风格　坚持斗争去年夺得粮棉丰收

体裁：调查报告

作者：中共醴（礼）泉县委工作组

内容提要：报告说：′1958年来，烽火大队在科学试验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58-1961年′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好收成。′《陕西日报》′编者按′说：′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王保京同志领导的醴（礼）泉县烽火公社烽火大队，在大跃进年代里，曾经以干劲冲天、敢想敢作、大搞科学试验等闻名各地，激发了附近农村广大社员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

解析：继续肯定大跃进，继续肯定王保京在大跃进中的大话、空话、假话。刚刚在党报上检讨完的王保京作何感想？

90、《陕西日报》1963年5月24日

标题：我们自己的人民公社史出版了

体裁：烽火公社党委书记袁伯福、烽火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保京署名文章

91、《人民日报》1963年7月4日五版

标题：集体化农民的革命家谱--赞人民公社史《烽火春秋》

体裁：评论

作者：阎纲

92、《陕西日报》1963 年 7 月 27 日

标题：实行三攻三防　提高玉米单产

体裁：王保京署名文章

93、《陕西日报》1963 年 81 月 29 日二版

标题：公社化给农业科学试验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体裁：王保京署名文章

内容提要：文章说烽火公社化短短的几年里，′运用杂交的办法，培育出了十一个粮、棉新品种。′

解析：王行兴说：′完全是假话！新品种在哪里？我管科研，怎么没见过？怎么没推广过？′

94、《陕西日报》1964 年 1 月 6 日头版头条

标题：发扬总路线精神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烽火大队坚持生产规划粮棉稳产高收好处和经验：一、方向明确，中心突出；二、农林牧副，互相促进：三、轻重分明，便于指挥；四、评比竞赛，扎扎实实；五、狠抓重点，一抓到底

体裁：消息

作者：无

内容提要：烽火提出第二个′五年规划′，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总产增长 46％的基础上，农林牧副大规模增长。

解析：高指标，不断根据形势需要提高指标，不断向社

会公布高指标，最后兑现不了指标，是烽火′五年规划′的特点。

95、《陕西日报》1964 年 2 月 25 日二版、三版两个整版篇幅（三幅照片）

通栏标题：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红旗　逐步扩大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西北地区农业稳产高产经验交流座谈会典型单位介绍

标题：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大搞科学实验连年稳产高产

体裁：王保京署名报告（加中共中央西北局农村工作部按语）

内容提要：王保京说：′十几年来，我们在科学实验工作中深刻体会到，只要听党的话，就没有办不好的事情。省、地区、县、公社的党政领导，不仅在人力、物力方面给了我们以很大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及时地给我们指出工作方向，帮助我们正确地总结经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在政治上关心我们的进步，在技术上关心我们的提高，′第一次承认上级党政领导给烽火人力物力支持。1957 年至 1963 年六年来，小麦平均亩产 230～280 斤，最高亩产 1070 斤；玉米 450 斤左右，最高 1500 斤。

解析：这是烽火第一次公开小麦玉米大田平均亩产。说明两个问题：一、继续维护高额丰产田的虚假亩产；二、烽火长期在高额丰产田上做文章，让′高额丰产′一花独秀，吃

小灶，装门面，科学试验本末倒置，以获取荣誉。

96、《陕西日报》1964 年 5 月 8 日

标题：普遍讲　具体带　重点帮

烽火大队′一带二′有成效

体裁：消息

作者：刘俊士　吕明轩　张椒阳

97、《陕西日报》1964 年 7 月 13 日

标题：烽火大队是怎样培养教育回乡知识青年的？

体裁：礼泉县委副书记董孝先署名文章

内容提要：培养王行兴等青年干部、雷锋式男青年、李双双式女青年数十人。其中最出色的是王行兴。（注：此后，王保京和烽火的报道沉寂了整整七年。）

98、《人民日报》1972 年 5 月 17 日四版二分之一版

标题：烽火大队在阔步前进

作者：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体裁：长篇通讯

内容提要：小标题：一、认真总结经验，不断反骄破满；二、狠抓路线教育，精神面貌大变；三、虚心学习，永远向前。1971 年粮食亩产 1037 斤，跨过了′长江′。承认 1964 年玉米亩产 1500 斤后，几年时间里，′粮食亩产一直徘徊在 600 斤上下。′

99、《陕西日报》1972 年 10 月 8 日头版头条

标题：狠抓路线　面貌巨变--烽火大队把路线教育经常化的调查

体裁：调查报道

作者：中共咸阳地委通讯组

内容提要：总结烽火自合作化以来路线斗争促生产的经验。'什么时候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人的觉悟就提高，产量就上升；相反，什么时候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人的思想就抛锚，产量就下降。''路线是决定一切的，路线对了，有钢能使到刀刃上，路线偏了，一天忙到黑也是瞎忙。''路线教育也要下毛毛雨一样经常下，'地皮不能干'。'除了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初期，年年都是大丰收。

解析：根据报道，烽火三年困难时期也是'大丰收'，粮食产量年年都在增长。怎么说是'刘少奇一类骗子大刮'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黑风'，集体经济受到损失呢？

100、《陕西日报》1973 年 3 月 25 日

标题：烽火新事

体裁：通讯

作者：礼泉县委通讯组　本报记者

101、《陕西日报》1973 年 5 月 17 日三版三分之二版篇幅

标题：走和工农相结合的康庄大道--同知识青年谈谈上山下乡问题

体裁：王保京署名义章

102、《陕西日报》1973 年 7 月 22 日二版

标题：坚决打好围歼棉铃虫这一仗

礼泉县大力推广烽火大队经验，采取夜间防冶棉铃虫取得显著成效

作者：礼泉县委通讯组

103、《陕西日报》1973 年 10 月 18 日二版二分之二版篇幅

通栏标题：鼓足干劲学大寨　大干快变多贡献

标题：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礼泉县烽火大队开展科学试验活动的经验

体裁：通讯作者：礼泉县革委会通讯组本报记者

内容提要：′在一段时间内，烽火大队的小块试验地的产量尽管很高．而大田的平均产量并不高。1970 年以前，小块地上早已创造了亩产上 800 斤的纪录，但大出产量一般只有 300 来斤。群众形容这种状况是：′高的高，低的低，骑的骆驼引的鸡。′′1972 年亩产上升到 11300 斤。

解析：这说明：一、起码是 1970 年以前，烽火玩儿的是小块地高额丰产的把戏，科学试验不管大田生产，不为大田生产；二、群众对此早有意见和看法，′骑的骆驼引的鸡′。太形象了！当然，报道的目的，上是烽火一贯的做法，不把以前产量压低，不显现在产量之高。怎么有利怎么来。不经

意之间，露出了烽火的秘密。声称培育出了那么多好品种，总结了那么多高额丰产经验，创造了那么多震惊全省全国的′纪录′，还把好品种好经验传向了四面八方，可自己的大田产量长期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难免贻笑大方。

104、《陕西日报》1973 年 11 月 7 日

标题：烽火育新人--礼泉县烽火大队党支邻培养教青青年干部二例

体裁：通讯

作者：咸阳地委通讯组　礼泉县委通讯组

105、《陕西日报》1973 年 12 月 12 日

标题：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青人--礼泉县烽火大队进行政治思想教盲的几点体会

体裁：通讯

作者：本报通讯员

106、《陕西日报》1974 年 2 月 23 日二版半版篇幅标题：批判林彪鼓吹孔孟′芳心者治人，劳力者冶于人′的反动观点

永远接受群众监督--礼泉县委虚心听取群众批评认真改进领导作风纪实

体裁：通讯

作者：咸阳地委通讯组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内容提要：1974 年 1 月 5 日上行兴等烽火三个共产党员写信严厉批评县委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县委专门召开会议

接受批评，深刻检讨。

解析：王行兴在报道旁批注道：′1974年2月23日陕报三个干部来信出笼。王保京任咸阳地委副书记，处境较为困难，为了他下一步去向，先扫清障碍。（信）一是指地委干部不深入实际；二是指县乡两级干部下不去；三是制约我村干部，要带头劳动。他可以劳动模范的身份抬高自己。′

107、《人民日报》1974年4月2日二版头条

标题：狠批孔孟之道　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体裁：烽火大队干部王行兴、王正海、王保学给礼泉县委人的信

标题：虚心接受　立即行动

体裁：消息

内容提要：礼泉县委端正态度，接受批评。

108、《人民日报》1974年4月24日三版

标题：批判唯心主义的′天才论′

体裁：理论文章

作者：陕西省礼泉县烽火大队党支部书记　王保京

109、《陕西日报》1974年6月15日

标题：先进带后进　共同向前进

体裁：中共咸阳地委副书记、礼泉县烽火大队党调支部书记王保京署名文章

110、《陕西日报》1974年8月6日二版

标题：抓大事　促大干　夺高产　多贡献

烽火大队夺得小麦丰收

体裁：消息

作者：礼泉县委通讯组　本报记者

内容提要：′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礼泉县烽火大队夺得了今年的小麦丰收。全大队 710 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 721 斤，创历史最高纪录。有两个生产队小麦亩产达到 800 斤以上，148 亩田块亩产超过千斤。′

解析：烽火又玩儿了数字游戏。看报道，烽火小麦种植面积只有 710 亩，但是，根据烽火账面记载，1974 年的耕地面积是 1910 亩，加上′争气滩′、′贡献湾′的近 400 亩地，一共是 2300 亩耕地，其他地都干什么去了？晒太阳？根据烽火账面记载，1974 年其他夏粮作物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不到 10％。产量显然不实。

111、《陕西日报》1974 年 8 月 18 日版头条

标题：深入批判孔孟之道

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烽火大队干部今年前半年劳动一百天以上

体裁：消息

作者：咸阳地区革委会通讯组

112、《陕西日报》1975 年 1 月 4 日

标题：进一步搞好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

烽火大队党支部坚持加强学习，抓紧批林批孔，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提出了新的跃进规划

作者：咸阳地委通讯组　省广播电台记者　本报咸阳记者组

内容提要：烽火提出′想大的干大的，想新的干新的，想快的干快的′，规划在1975年在泾河改河造地300亩，粮食亩产双过′江′（即亩产2000斤），棉花亩产双过百，每人植树50棵，每人平均养猪一头半。

解析：当然，这个一年规划和以往任何一次规划一样，都是高指标、实现不了、最后也没实现、更不会有入追究的规划，当然，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烽火进入了′上层建筑′领域搞生产。

113、《陕西日报》1975年1月15日头版头条半版篇幅转二版

标题：在思想上筑起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礼泉县烽火大队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

体裁：通讯

作者：咸阳地委通讯组　礼泉县委通讯组　本报咸阳记者组

内容提要：烽火′1971年以来，年年粮过千，棉过百。1974年，粮食平均亩产1420斤，比1970年增长了近两倍；棉花亩产130冬斤比1970年翻了近两番′。破除′泾河没龙

王，神鬼不敢撞′的迷信息想，大干45大，泾河故道上围起了500多亩河滩地，筑起了′批孔坝′、′贡献田′，′已有100多亩长出了绿油油的麦苗。′

解析：′贡献田′与′贡献湾′、′争气滩′是不是一回事？如果是，烽火的田地至少比1910亩增加500亩；如果不是，则增加近900。烽火土地不实则成了自己公开承认的铁案。土地不实，粮食亩产自然不实。烽火明确进入意识形态。

114、《陕西日报》1975年3月18日三版三分之二版篇幅

标题：战斗在思想战线的庄稼汉--记礼泉县烽火大队理论队伍成长的几个片断

体裁：通讯

作者：咸阳地委通讯组　礼泉县委通讯组　本报咸阳记者组

115、《陕西日报》1975年3月25日

标题：礼泉县烽火大队党支部引导干部、社员紧密联系斗争实际

认真学习理论　深入批林批孔

体裁：消息

作者：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116、《陕西日报》1975年7月7日

标题：烽火大队小麦亩产跨长江

体裁：消息

作者：木报通讯员

内容提要：′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指引下，礼泉县烽火大队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继去年夺得小麦亩产721斤的历史纪录之后，今年又创新纪录：全大队710亩小麦平均亩产突破800斤，一季跨过了′长江′，其中300亩上了千斤。′′专老大爷的政，革老天爷的命，战胜灾害夺丰收！′党支部一班人在王保京的带动和影响下，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坚持′有权不滥用，有职不脱产，有钱不变色，有错不回避，有功不旧已。′

解析：田地不实，产量不实。泾河或许能跨过，′长江′断然跨不过。

117、《陕西日报》1975年7月31日版半版篇幅

标题：光辉的道路--烽火大队农业合作化二十年来的回顾

体裁：通讯

作者：咸阳地委通讯组礼泉县委通讯组　本报咸阳记者组

内容提要：全大队公共积累资金达一百十一多万元，每户平均五千多元。文章三个部分的小标题：一、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二、占领与反占领的斗争，三、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

解析：对于公共积累资金每户平均 5000 元，当时在烽火主持工作的王行兴说：′不可能！′

118、《陕西日报》1975 年 9 月 13 日半版篇幅

标题：关于′六寸庄基′问题的再讨论--礼泉县烽火大队的一次理论学习典型分析会

体裁：通讯

作者：本报记者

119、《陕西日报》1975 年 9 月 15 日三版

标题：评论《水浒》，认清投降派的嘴脸

体裁：理论文章

作者：礼泉县烽火大队贫下中农理论组

解析：评法批儒、批《水浒》、批投降派是′文革′后期′四人帮′针对周恩来的大批判运动。

120、《陕西日报》1976 年 3 月 9 日三版通栏半个版篇幅

通栏标题：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标题：礼泉县烽火大队干部和社员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

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

体裁：消息

作者：礼泉县委通讯组　本报记者

内容提要′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礼泉县烽火公社烽火大队的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重要指示，狠批党内那个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大批判激发了干部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劲头，推动了春耕生。′解析：′党内那个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指的是邓小平。1975 年初起，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中共中央读书班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毛泽东严厉批判了这个讲话，斥之为′三项指示为纲′。

121、《陕西日报》1976 年 3 月 15 日三版三分之一版篇幅

标题：工农兵是科学实验的主力军体裁：理论文章

作者：王保京

解析：错别字连篇的王保京署名发大块文章多矣，以前还是经验体会，现在一脚跨进理论领域，能够应付自如地引用恩格斯、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语录。

122、《人民日报》1976 年 3 月 19 日三版

标题：卑贱者最聪明　高贵者最愚蠢--批判攻击开门办科研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奇谈怪论

体裁：理论文章

作者：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农民科学家　王保京

内容提要：′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散布了许多奇

谈怪论，他们攻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工农兵占领科研阵地，专业科技人员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他们看来，群众办科研、开门办科研等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是好得恨，而是'问题很大'。我们广大革命群众一定要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彻底革命精神，给右倾翻案风以猛烈回击。'再次重述了烽火 1954 年以来搞科研粮食'高产'的成就，当然还有更新的信息：烽火试验田里'曾经出现过分蘖一百多穗的'小麦王'，七八尺高的'棉花王'，水桶一样粗的'白菜王'，还有三巴掌大的'萝卜王'。'

解析：'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指的是胡耀邦。1975 年 9 月胡耀邦在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期间，起草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指出科研要走在国民经济前面，要发挥老科学家的作用；强调科技事业要后继有人，中心是办好教育。

关中农民把小麦分蘖叫'破头'，有农谚曰：'一麦破九头。'就是说，一株小麦有九个分蘖。'小麦王'分蘖就邪乎了。

123、《陕西日报》1976 年 6 月 20 日二版头条三分之二版篇幅

标题：深刻的革命--烽火大队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阵地

体裁：通讯

作者：礼泉县委通讯组　本报咸阳记者组

内容提要：′不斗争就不能进步。′点名批判邓小平。

124、《人民日报》1976年7月27日三版

标题：革命的′烽火′越烧越旺

体裁：通讯

作者：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内容提要：有人说烽火大队是一所′烽火意识形态革命学校′。′最近，我们来这里访问时，看到了许多反修防修，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和诗歌。在各个生产队的政治夜校里，在阶级教育展览馆、科学试验站和文化室里，人们在讨论着如何全面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在礼堂里、在体育场上，数以百计的社员所演出的戏曲、歌舞、体操等节目，都以不同的形式，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愤怒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这一切给人们强烈的感觉是，革命的′烽火′多在这里越烧越旺了。′王保京的母亲杜元贤已是71岁，她跟老婆婆组连夜编写和登台演唱、批邓快板，还提笔写了一首诗：

雄伟的天安门，你是升起五星红旗的地方。旧社会的奴隶们，想起你心花怒放。就在这儿，我苦老婆子发誓要把红旗扛。今天听说邓小平要扯下红旗，克己复礼，气得我肺要

炸开，心往外撞。不行，不行，决不许反革命猖狂！来，千万双粗手攥成一只铁拳，打倒'还乡团长'！

125、《人民日报》1976 年 10 月 9 日四版

标题：为无产阶纵革命事业奋斗终身

体裁：署名文章

作者：中共咸阳地妥副书记、烽火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保京

内容提要：悼念毛主席，批判邓小平。

126、《人民日报》1978 年 8 月 4 日一版

标题：认真调查研究　坚持群众路线　纠正指挥生产上的'一刀切'

礼泉县委实事求是制定增产措施

体裁：长篇消息

作者：新华社记者

内容提要：王保京由地委副书记兼任礼泉县委书记后如何实事求是地治理礼泉县的事迹。

解析：这真是一个讽刺。1978 年，王保京和烽火村大搞弄虚作假，瞒亩增产，浮夸棉花'百亩方'产量。宏观'实事求是'，微观弄虚作假。

127、《人民日报》1979 年 3 月 11 日二版

标题：农村领导干部要当内行

体裁：署名文章

作者：礼泉县委书记　王保京

内容提要：称烽火大队百亩棉花高额丰产田（′百亩方′）平均亩产皮棉 270 斤。

解析：多方事实证明，棉花′百亩方′平均亩产皮棉 270 斤纯属弄虚作假。

128、《人民日报》1979 年 9 月 18 日三版

标题：′也可以′好着哩！

体裁：署名文章

作者：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中共礼泉县委书记　王保京

内容提要：赞同搞联产承包责任制。

129、《陕西日报》1979 年 9 月 25 日

标题：联系产量计酬的办法好着哩！

体裁：理论文章

作者：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中共礼泉县委书记　王保京

内容提要：文章四部分小标题：一、′也可以′，好着哩；二、不要忌讳′小′；三、不要怕′差别′；四、让农民自己总结经验。

解析：王行兴在报纸上批注道：′这篇报道按王保京一贯的思路和指导思想是相违背的。全是违心话，只不过是大势所趋，不这样说也不行。′

130、《陕西日报》1980 年 7 月 16 日

标题：向专业化生产发展　向牛产深度广度进军烽火大

队建立三十二个专业组

体裁：消息

作者：本报通讯员　田丰　本报记者　权新顺

解析：王行兴接待了记者。王行兴在报纸上批注道：′三中全会后，烽火村迟迟转不过弯，起步慢，主要是王保京思想不解放，一怕接三中全会精神走，自己打自己嘴巴，这跟三中全会前历年紧跟中央形成明显的反差；二怕丢掉烽火先进典型这杆旗，自己失去创奇迹的基地，又失掉了利用这杆旗打人的工具。′′如是按三中全会文件精神、政策办，烽火今天绝不是这样。′

131、《人民日报》1980 年 8 月 7 日一版

标题：全国劳模、礼泉县委书记王保京谈

要合理解决生产队长的报酬

体裁：消息

作者：无

132、《陕西日报》1980 年 10 月 4 日二版头条

标题：调整旱地作物布局的调查

体裁：调查报告

作者：中共礼泉县委书记　王保京

133、《人民日报》1982 年 1 月 23 日头版头条、二条，四版半个版

头条标题：烽火大队科学管理好共同富裕节节高管理井

井有条，农林牧副工全面发展，向国家多贡献，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已建成一个崭新村庄，有商店、中小学校、幼儿园、邮电所、俱乐部、医疗站、自来水站等，初步形成了一个新型农村城镇

体裁：消息

作者：本报记者　姜卯生　张安南

二条标题：方兴未艾　烽火大队实行科学管理的启示

体裁：本报记者述评

四版标题：更上一层楼--烽火大队科学管理的经验

体裁：通讯

作者：本报记者　姜卯生　张安南

解析：这大的《人民日报》被人们称作烽火大队的《人民日报》。消息、述评、通讯一块上，占据了一版、四版主要篇幅，热情程度之高，是极其罕见的。通讯开篇第一句话就说：′早在 1958 年，陕西礼泉县烽火大队的科学种田已经全国闻名。′从 1958 年开始，全面肯定烽火的′科学试验′创′高产′的经验。不仅肯定，而且开华，认为王保京早在 1958 年就有农业′工厂化′的想法，80 年代上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已由科学试验发展到了′科学管理′的水平。这个结论，迅速平息烽火土地不实、产量不实、靠国家′输血′发展起来的咸阳地委调查结论和社会舆论。

134、《陕西日报》1982 年 1 月 28 日头版头条

标题：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形势变化大

粮多油多肉多钱多建房多

春节前夕，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会见著名劳动模范王保京，了解当前农村情况。马文瑞指出，要向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宣传，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已经实行了的，就要做好完善和稳定工作，不要再乱析腾。

体裁：消息

作者：本报通讯员

解析：王保京大难不死，顺利过关。

135、《陕西日报》1982 年 1 月 30 日头版头条全文转载《人民日报》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更上一层楼--烽火大队科学管理的经验》

136、《陕西日报》1982 年 3 月 20 日

标题：烽火大队春耕又快又好

体裁：消息

作者：田丰

137、《陕西日报》1982 年 5 月 20 日

标题：烽火大队科学种田剪影

体裁：新闻图片专题报道（一组四张）

作者：本报记者　王天育

内容提要：烽火大队科学种田 30 年（1952 — 1982），粮食产量连年增长，经济收入不断增加，农村面貌发生了大

变化。

138、《陕西日报》1983 年 4 月 27 日

标题：烽火有了副业户

体裁：消息

作者：董俊祥　李牧泉

139、《陕西日报》1983 年 2 月 19 日头版

头条标题：烽火大队不吃′大锅饭′

全国劳动模范、礼泉县烽火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保京说：′我们包得慢了，这说明我们还有′左′的思想，也有怕丢面子的思想，怕人家说我们自己否定自己。事实证明富队实行承包责任制，会更富，否则就要落后了。′

体裁：消息

作者：本报通讯员　王成　本报记者　高彦明

标题：富队包了会更富

体裁：本报评论员文章

140、《陕西日报》1984 年 11 月 27 日

标题：运用集体积累　发展商品经济烽火村办起′三厂一栈′

体裁：消息

作者：新闻实习生　边清江　本报记者　董俊祥

141、《陕西日报》1985 年 7 月 18 日

标题：烽火村建成′绿色银行′

体裁：消息

作者：本报通讯员　王景铃王忠雄　本报记者　董俊祥

内容提要：烽火村建成拥有十万多株成材树木、价值一百四十多万元的'绿色银行'，有计划有步骤地砍伐更新后，可办一至两个3～5万吨的水泥

解析：王行兴批注：'全村渠道、道路不到20里长，按一米一棵算，才是1万裸，栽4行才是4万棵。何况没栽4行。'再说1987年烽火建了一个年产5万吨的水泥厂，'只花了'796万，140万建一至两个3～5万吨的水泥厂从何谈起呢？

142《陕西日报》1987年5月31日

标题：礼泉县烽火村建成万吨水泥厂--总投资七百多万元已产水泥五千多吨

体裁：消息

作者：本报记者

143、《陕西日报》1987年6月7日

标题：节约在这里闪光--烽火五万吨水泥厂建厂纪实

体裁，通讯

作者：本报记者　安民　原野　东祥

144、《陕西日报》1987年7月10日

标题：'有了大树好歇凉'--烽火村干部领着群众致富记事

体裁：通讯

作者：本报记者　陈明　东祥

145、《陕西日报》1989年1月12日二版

标题：烽火村迈出新步伐

体裁：通讯

作者：本报记者　东祥本报通讯员　韩晓长

内容提要：在王保京的领导下，烽火公共积累达1500万元。

解析：这是1988年4月26日烽火硫酸毁容毁身案后的第一篇′显富′报道。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这些公共积累来自哪里？有多少是靠过硬的本领干出来的？有多少是靠国家输血养肥的？烽火说起来富甲一方，′精神文明′，可是，硫酸毁容毁身案后，武芳父母跪求王保京给500元的救命钱而不可得。

146、《陕西日报》1989年9月11日二版

标题：乡镇企业要在调整中求发展

体裁：理论文章

作者：咸阳市副市长　王保京

内容提要：多次引用邓小平语录阐述乡镇企业的发展问题。

147、《陕西日报》1989年12月21日头版头条

标题：骨干队伍不散　集体积累不散　人心不散　烽火

村改革十年公共积累逾千万元

体裁：消息

作者：本报通讯员　青凡　本报记者　东祥　国华　岳民

148、《陕西日报》1991 年 6 月 25 日头版头条

标题：党旗飘飘烽火魂--烽火村党总支加强自身建设的几个侧面

体裁：通讯

作者：本报记者　南峰　东祥

内容提要：报道说烽火'连续被县、市、省和国家建设部评为文明村'。

解析：这篇报道是烽火村硫酸毁容毁身案久拖三年不决，被害人武芳找市人大伸冤二十多天后发出的。我们不能说发生过刑事案件的地方就不能评'文明村'，问题在于，一、是什么性质的刑事案件，什么影响的刑事案件；二、案件发生后，村领导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配合司法机关侦破案件。王保京作为副市长兼党总支书记不仅管不好自己的儿子，案件发生后，不体恤苦主，却厚葬死刑罪犯，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都没有尽到，谈得上什么'自身建设'？

149、《陕西日报》1992 年 2 月 19 日头版头条

标题：'农民市长'王保京

体裁：通讯

作者：路正遥

内容提要：报道说：′王保京是50年代合作化时期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几十年来，他除了兼任烽火村大队党总支书记外，先后担任过礼泉县委副书记，咸阳地委副书记兼礼泉县委书记，1984年起任咸阳节副市长，主管农业。但不管职务有任何变化，他心连着群众，公而忘私的本色却一直没有变，群众亲切地称他为′农民市长′。′

解析：1991年12月底，礼泉县一声枪响，结束了烽火村硫酸毁容毁身案首犯的罪恶生命。此事在礼泉县和咸阳市反响强烈。记者适时来到烽火，为王保京贴金，顺便宣传嫌疑人王农业王二公子，混淆舆论视听。

150、《陕西日报》1994年11月23日

标题：控制消费　多做贡献

烽火村经济蓬勃发展

体裁：消息

作者：本报记者　安莉

内容提要：报道说，烽火村依法纳税，积极还贷。

151、《陕西日报》1995年3月3日头版头条标题：赤子回归黄土地--王保京主动离职回乡纪事

体裁：通讯

作者：本报记者　安莉

内容提要：报道高度评价王保京主动离职回乡的事迹，

高度评价王保京一生的功绩。

解析：当时的咸阳地委书记说：主动离职？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找王保京谈退的事，王保京不愿意，说是年龄不到，1992 年王保京从副市长职务退下来，光是王保京的年龄到底多大，就让组织部查了半天，为了照顾情绪，还搞了个′市政府顾问′的′安慰赛′，直至 1994 年。1992 年，王保京的年龄至少 61 周岁，1994 年，王保京的年龄至少 63 岁。

标题：永葆为人民服务的本色

体裁：本报评论员文章（配发）

内容提要：′通讯《赤子回归黄土地》，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勤奋为人民服务的事迹，读来令人感动。′′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在其位，就有其权。这权力，是人民给的。他只能用手中的权力脚踏实地、一丝不苟地为人民办实事、谋幸福，当人民的好公仆。′′毛主席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当一个好公仆难，当一辈子好公仆更难。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用党的标准要求自己，像王保京那样多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着想，为党增添光彩，永葆共产党人的本色。′

152、《陕西日报》1995 年 3 月 6 日一版

标题：×××与老劳模共商兴农计

体裁：消息

作者：丰月

内容提要：报道说，省委书记在全国农村工作会后，3月3日晚会见′曾13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的全国劳模王保京′，′促膝长谈、共商振兴陕西农业大计′。

解析：一、据了解陕西历史和王保京历史的省领导干部说，毛主席、周总理13次接见王保京，绝无此事。王保京上北京开各种会议，在会议上见到毛主席、周总理倒有可能。不说是故意制造事实，提高王保京身价，起码是故意制造歧义。二、根据王保京50年代到90年代的实际表现，省委书记找王保京共商兴省农业大计，真算是找对人了

153、新华社《每日电讯》1995年6月25日头版头条

标题：黄土地上的三代劳模

体裁：通讯

作者：新华社记者　王世焕　李勇

内容提要：一、′担任咸阳地市领导22年之久的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王保京主动离职′；二、′烽火村在五十年代初很出名，因科学种田创高产，毛主席、周总理13次接见王保京′；三、′1953年和1954年年仅二十一二岁的王保京连续两年创造了玉米亩产658公斤和750公斤的全国最高纪录′；四、′作为市长的孩子，王农业在1992年成为省劳模，不是靠照顾，而是靠自己苦干实干得来的′；王、′1994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已达7000多万，农民人均纯收入近4000元，村里向国家交税112万元。′

解析：王保京主动离职与事实不符，毛主席、周总理13次接见王保京与事实不符，1953年和1954年玉米亩产连续两年创全国纪录与事实不符，1994年烽火村工农业总产值7000多万元和纳税112万元与事实不符。1995年围绕王保京和烽火村的报道有一个小高潮，其背景是为工农业步王保京后尘，当全国劳动模范做舆论铺垫。由于郭裕禄的揭露和阻击而流产。

154、《陕西日报》1995年12月17日一版

标题：×××近访王保京

体裁：消息

作者：述成　向阳

内容提要：省委副书记×××到烽火村′看望全国老劳模、解甲归田原咸阳市副市长王保京。′王保京说：′我是农民出身，50年代人搞农业科学试验，出了一点点成绩，受到了毛主席接见，一家三代当了芳模，现在我不当副市长了，还是烽火村的党总支书记。平时我有一个不服气，听不得人骂我们的党，骂我们的政府。我憋着劲要用自己的行为表现共产党员的堂堂正正……′′王保京讲着讲着，动了感情掉了泪。′

155、《陕西老年报》1996年7月8日四版

标题：共产党员有晚年无闲年

王保京解甲归田再立新功

体裁：消息（新华社电讯稿）

内容提要：′今年66岁′、′曾13次受到毛主席、周恩来总理接见的全国劳模王保京，从陕西省咸阳市副市长位置上退休后，毅然回到农村带领父老乡亲建设两个文明，赢得了群众的赞扬′。

156、《陕西日报》1996年7月24日

标题：从市长到农民

体裁：图片新闻（专题报道）

作者：新华社记者焦卫平

内容提要：1994年7月，王保京主动要求回家乡；′50年代20多岁的王保京曾连续两年创造了亩产玉米658公斤、750公斤的全国最高纪录，13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

157、《中国青年报》1996年8月8日二版头条半版篇幅

标题：蹊跷的特大毁容案

体裁：通讯

作者：本报记者　卢跃刚

内容提要：揭露1988年4月26日烽火村发生的特大硫酸毁容毁身案内幕，揭露烽火村的背景，以及王农业王二公子参与此案的嫌疑，以及案件久拖二年不决，被害人武芳八年告状不止的事实。

158、《陕西日报》1996年8月24日二版

标题：理顺关系　发展经济--访烽火村党总支书记王保京

体裁：访谈录

作者：省政策研究室　章陆柳

内容提要：报道说，作者带着农民如何实现富裕，农村如何达到小康水平的问题访问王保京。

解析：这是王保京针对《中国青年报》8 月 8 日的报道的第一篇反击报道。

159、《陕西日报》1996 年 8 月 28 日三版一个整版篇幅

通栏标题：烽火村在改革中阔步前进

标题：艰苦奋斗，实干巧干，带领群众奔小康

作者：全国劳模、礼泉县烽火村党总支书记王保京

标题：跳出'小农业'兴企又富民

作者：王农业

（注：发表时被编辑删掉）

标题：烽火今日更辉煌

作者：礼泉县烽火村村民委员会

标题：严抓质量管理　实施名牌战略

作者：礼泉烽火水泥厂

标题：白手起家办企业　再苦再累无怨悔

作者：陕西省优秀女乡镇企业家、烽联纸箱厂厂长　张云霞

解析：烽火村花钱买版面反击。当然，反击还远远没结束。

160、《中国社会报》1996年11月30日头版头条

标题：特大毁容案的背后--对'武芳毁容案'的追踪调查

体裁：调查报道

作者：戴国强　墨皑

内容提要：刊登了武芳毁容前后的大幅照片。证实《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属实，'而且有关证据显示毁容案背后，确与王保京的影响有关'。报道进一步揭露了烽火村硫酸毁容毁身案和王保京发动舆论反击的情况。

161、《陕西日报》1996年12月26日头版头条

标题：×××在咸阳考察工作时鼓励农村新老典型

物质文明敢'冒尖'精神文明出成果

体裁：消息

作者：本报记者　张向阳　省电台记者　朱述成

内容提要：省委书记×××到烽火和袁家考察，说：烽火村是我省农村40多年的老典型了，袁家村是20多年的先进了。当先进不容易，几十年当先进更不容易。先进是要付出艰苦劳动的，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烽火村和袁家村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能够继续前进、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有三条：一是村上一个好班子，一支好队伍，一个好带头人，一代一代，一茬一茬，坚持下去，这是农村发展的基础。

二是坚持不懈地对农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用正确的思想、政策，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干部群众，这是几十年当完进的保证。三是发展有长远观点，一年一个新点点，一年一个新台阶。

解析：省委书记到烽火村和袁家村两个新老典型考察有两个背景：一、历时一年多对郭裕禄的调查已有结论：纯属诬陷。二、《中国专年报》和《中国社会报》对烽火村毁容案的报道，陕西省闻而不查，并积极起诉《中国青年报》。这次'考察'，实际的效果是，支持王保京和烽火村，压抑郭裕禄和袁家村，对烽火发生的硫酸毁容毁身案公开表态。

162、《陕西日报》1997 年 3 月 4 日二版

标题：正确对待先进典型--×××司志在咸阳基层调研新老先进典型后的讲话

内容提要：省委书记全面论述先进典型：要全面辩证地看待牛进典型，对先进典型要在更高层次上严格要求，要客观地宣传和推广先进典型的经验，要重视培养和爱护先进典型，先进典型要珍惜荣誉正确对待自已，先进典型要在新形势下迈出更大的步伐。

附录二

当前形势怀感

《户县县志》按：《当前形势怀感》也叫《一叶知秋》，是 1962 年 5 月 10 日，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杨伟名、贾生财、

赵振离三名党员写给镇和镇以上各级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材料，当时曾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并在县内多次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中，执笔者杨伟名受整含冤身亡。1979 年 4 月 27 日，按照中共户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城关公社党委主持召开群众大会，给杨伟名平了反。

作者按:《一叶知秋》是一篇奇文。当时被认为是“集中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的观点和主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恢复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在咸阳和陕西引起很大震动。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出来，并散发给各级领导机关，其见解，其勇气，都令人惊叹。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执笔者杨伟名堪称农民思想家和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

现将《当前形势怀感》全文辑录于后:

一、前言

参加农村基层上作，已八年有余，俯首回顾，百感交集，尤其在当前困外形势下，其所见所闻，势如汹涌狂涛，冲击心膛。每于激动之余，口述笔道．常至情不自禁。

这篇“怀感”不是向上级领导“报喜”，而是“报忧”。但就目前形势而言，“报忧”重于“报喜”。因之“怀感”所及，似颇多“苦口之药”与“逆耳之言”。

这篇“怀感”于各节申述中，不少雷同重叠之处，所以然者，皆在不同角度，用不同比喻，反复说明问题。

这篇“怀感”属个人见解，或为“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或为“坐井观天”而流于管窥之谬。而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与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

这篇“怀感”因限于个人水平，仅止“感情”认识的汇集，未“理性”台阶的推理，又因阅读不多而引证绝少。

这篇“怀感”，除“如实反映情况”并表达个人见解外，诸如锻炼、习写，亦在“原旨”之数。

这篇“怀感”拟邮寄有关领导单位及个人，作为研究参考之用，并望赐复指正是幸。

只将“怀感”所及，分别记述如后:

二、忆“撤退延安”

1947 年 4 月间，我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以后形势的发展说明这一步骤是极其英明而果断的。当行将“主动撤离延安”的时候，有些同志思想搞不通，认为延安为党中央所在地，……一旦“撤守”，无论国际视听，人心士气都将影响很大，必须尽全力保卫才好。当时果真按照这样观点去作，不但保卫不住延安，并将于“被动撤离”之后，欲自图收复，诚为难矣。

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

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之下，河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连篇累牍的再行分析了。

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很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的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见以下各节。关于“关于一类物资自由市场开放”问题前曾写有专题。

几年来，我们是朝着退的方向做的，并且收到效果。不过还未到家，应进一步就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方针作全面彻底的调整，直到困难克服而后止。

三、处方

医生对病者的诊断过程：始则“望、闻、问、切”，进而分析研究对病情作出判断，然后开“处方”以治之。在处方将用未用之前，处方的效果，尚属医生估计分析的可能性阶段；而处方之真正有效与否，需以病患者服药之后，病情如何以为断。处方未用前，仅属可能性的效果，过早的当成现实的效果，则是不妥当的，病患者病情的好转与痊愈，才是处方有效的验证，反之则反矣。

当患者服药之后，病情未见好转，或仅有好转而迟迟不能痊愈时，可尽快的重新调整处方，直至病情痊愈而后止。

同理，为了克服当前的困难，我们已经采取了不少措施，并且估计所采取的措施对于当前克服困难会收到效果。而我们不能认为困难已经得到克服，我们必须密切注视措施应用的效果，发现不能解决困难时，就得及时的考虑改用新的方法，于是我们克服困难的措施的应用和调整，则要到困难得到彻底克服而后止。目前我们已经采取的步骤“三大政策”……等，不能认为是克服当前困难应用措施的最后一步。

四、腰带

一个人勒条“腰带”，走起路来会感到紧凑轻便，不然就会觉涣散无力。看来勒条腰带倒是十分有用的。不过所谓有用也只仅是一条而已；如三条五条的把浑身都捆起来，那即使是一个走起路来健步如飞的人，也动弹不得。

再者，腰带的有用除了仅有一条而外，而缠在腰里的腰带，一定要松、紧适度，过于松了固然不行，而过于紧了，倒会令人气喘。

目前我们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形势，是否有气喘的象征？是否存在着浑身捆着腰带，动弹不得的意味？果有之，只有解带松腰才能气和神安；只有腰间仅缠一带其余皆尽解，才能手动脚灵。

按国民经济形似人身，中、小型工商业自由生产，农村包干任务外的自由贸易，则为人身的手足。无人身，手足无依附，无手足，人身失所能，两者相依相成，关联互赖。理

由明显，毋容赘述。

五“改造”与“节制”

几年来，尤其是近两年来，市场供应情况，显得特别紧张。回顾一下这种紧张情况，是发生在 1954 年开始私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改造开头两年，还不太看出，这是因为原来社会商品有储存，继续维系着市场的供应的结果。而紧张程度的与年俱增，应看作是原有储存逐年消耗然（这与在农业合作化开头几年用单干时土地遗留下来的肥力长了几年好庄稼，以后则每况愈下的情形是十分相象的）。虽然说市场紧张程度的与年俱增，不尽属于此，但属其中主要因素之一，则是可以肯定的。

按说私营工商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生产力得到解放，产品逐年增多，从而市场供应亦当臼渐充盈，但其结果，却正相反，对此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追求所以致此原因：首先改造的面过广，把还不适于“改造”的中、小型工商业都统统改造了。这样旧的生产关系破坏了，新的生产关系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迟迟不能形成（或是形成了而生产效率反不如从前），从而出现工、农业脱节现象。农业生产迟迟不前，不能给工业提供足够的原料，关于第二个问题属“外在”问题，第一个问题则是“工商业改造”本身问题，就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基础看，除了较大的私人工商业可以采取改造的步骤外，一般中、小型工商业，只宜采取“节制”的方

法（按即孙中山先生的“节制资本”），节制其使之不足以操纵国计民生，仅取其合法利润，这与“恢复单干”一节中土地到户，权归集体，既能促进生产，又可堵塞阶级两极分化是一样的。于是我们目前的工商业政策，应在一定程度上，用温和的“节制”方法代替“改造”的手段。

六、“恢复单干”

近来农村中不断有“恢复单干”的传说，这种传说我们不能认为是“别有用心”者的造谣，说它是目前农民群众单干思想倾向的反映，则是比较妥当的。如果目前农村群众在思想上有的存在着恢复单干的愿望，那么他所希望恢复单干是否就是合作化前那样的单干呢？就目前群众的认识水平和交谈情况来看，多半数“是”，少半数“不是”；属于是者，这里且不必说，属于不是者，却有必要提出讨论。

目前有不少的人在认识上觉得现在再要恢复单干，就不必恢复合作化前那样的单干，而是以新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单干形式出现。这种单干，其所以有别于合作化前的那种单干，正是因为：土地虽分到户，而地权仍归集体所有，牲口农具可以私有，但不能买卖，也不能出租，劳动致富，生产发家，剥削行为概不能有。

就目前农村客观形势来看，社员集体观念太差，近两年来，更是这样。农村基层干部尤其是生产队一级干部领导水平过低，远不能适应生产队工作需要，任务过重，力气过怯。

按：社员集体观念太差，干部领导水平低，看来是个教育锻炼问题，而锻炼和教育，则是长期的，而当前存在的问题，却要求“立竿见影”。

按：新的单干形式，既能适应当前客观条件，又符合按劳分配杜绝剥削的社会主义原则，堵塞了农村阶级的两极分化。至于将来如何适应机耕问题，他们认为不必采取酒席摆好，还没有客的等待办法（土地老早就连了片迟迟不见机耕来）。领导集体生产的基层干部等条件都具备了，然后根据群众自愿，因势利导的朝着集体促进。

按：“分田到户”，不是要求一律单干，而是愿意单干者，可以允许，愿集体者可以另行自愿结合，这样集体与单干两种形式，同时并存。估计这样因皆出于个人自愿，生产是会搞好的。如在合作化时虽说“人社自愿”，实际多为“大势所趋”，现在采取自愿，正是补救了过去的不自愿。农业合作化以来，生产所以停滞不前，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初多数不是出于真正自愿有关。

有人虑及分田到户于国际视听有碍。其实人民公社依旧保留，分田到户仍归公社领导，为公社社员。至于集体与单干之间的领导关系——单干到户，归队领导，还是归公社直接领导，可以另行研究。

七、“过”与“退”

据医生朋友们谈：人所患病症中，有所谓“并发症”，

即如患麻疹引起肺炎，患“急性高热”引起脑症状——昏迷、抽风等，以上两点皆为“并发症”，又据谈前者病之“本”，后者病之“标”，治疗之道以治本为主，标则兼而治之。把这与克服当前革命工作中的困难比较，道理也是一样的。目前我们工作中存在的困难是很“严重”的，而这“严重”困难的造成，自有其根本的渊源——“病之本”。而目前存在诸如粮食困难，市场供应紧张，并由此产生的走后门、投机倒把、盗窃事故、逃荒迁移，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意志消沉，丧失信心，怨声一片，不安心工作，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谊情寡淡等不正常的精神表现，统属于“病之标”。对于这些存在的问题如何设法消除，则属于兼而治之的事；要希望问题能够尽快的获得根本的解决，那就只能是探索渊源而治其本了。

现在进一步我们要问：目前严重困难产生的渊源是什么？而克服的根本办法又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必多所引证，只就“过”与“退”二字略作申述。

所谓“过”与“退”者，如某甲赴某村，距十里，行之十五里过五里，退三里，犹过二里，退十里，复又不及五里，终退五里始抵村境而止。想来我们目前严重困难产生的渊源是走“过”五里路的问题，因之克服困难的根本办法，也就只是退五里的问题了，几年来，总的形势我们是在退。至于迄今为止，我们已经退了几里？还需再退几里？这是我们所

要提出进一步共同讨论的问题。

我自己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由 1949 年解放起到 1955 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

有人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当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步没有走好，第二步怎么会走好呢？

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犯了客观规律。

从上述情况看来，回答我们需要再退几里的问题，是很简单的。工商业政策方面，大体遵循孙中山先生“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的原则。农业方面，按照集体、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的原则。这是养鸡取蛋，有别于杀鸡取蛋，这是釜底抽薪，有别于扬汤止沸，这是根本之道，有别于治标之法，这是我们要退的终点。

八、“走后门”

“走后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人人都很明白，就不再

说了。走后门这回事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大家都还记得，是从 1958 年开始露头。从这以后，逐年显著，到目前为止，已经成为普遍的事实了。

因为“走后门”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前次在工商企业中还大力地反过一次。从这以后，走后门的事，比起从前少了些，不过采取这种反的办法要收到绝对的堵塞后门的效果是不可能的，至于如何彻底消灭走后门的问题，下面好来说它。

近来自行车标价六百余元，大量出售，顾者虽亦不少，而排队争购之局，已见敛迹。何以至此？缘自用者购之，欲之渔利者却步使然。

“高价”自行车的出售情况，给我们提示走后门这件事的根源，以及消灭走后门的根本办法，这就是：①牌价与黑市价格差距过远，暴刊过大，把这与目前群众觉悟水平结合起来，有如“风流少女”与“贪花浪子”，欲求不拈污，是不可能的；②凡出售给农村的一切工业产品，皆以高价出售，农产品及原料收购以高价付之，统购派购的农产品任务，以满足农业以外靠工资吃饭（设目前工资不变）的各行业人口的生活需要为度。

这样以来，黑市不存在了，走后门的路彻底根断了，投机倒把的事情随着相应减少，以致消失。至于因各地区之间的物价参差，而进行贩卖从中渔利者，我们应从积极方面把

它看成是促进物资交流的正当行为，不能与走后门式的投机倒把相提并论。

九、市场管理

按国家统购政策，一类物资是不许上市的。但就目前形势看，一类物资自由交易的行为，已成为普遍存在的事实，并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对一些领导同志来说，也是很清楚的。可以设想，如果我们对一类物资采取严格控制、坚决取缔的办法，不但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会使粮、棉、油等物资供应情况更加紧张。尤其春荒时期，粮食的困难程度更为加深。也正因为如此，所谓不合法的一类物资自由交易行为，才能以公开的秘密形式，普遍的出现，并一直存在着。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有关市场管理问题如馍、饭、蛋、肉、莲藕等自由交易，就无必要再加禁止了。

按目前国营、集体经营的食堂等行业的供应情况，远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因此可以借助自由交易的支援，共同满足群众的要求。这难道还有什么害处吗？有的同志认为，这样会助长投机倒把。其实这是见木不见林的办法。我认为投机倒把是兴大利中的小弊，就像因为抱小鸡才发生鹞子抓鸡的事，我们能因怕鹞子抓鸡就不抱小鸡了？看来真正的鹞子要防，而鸡终是要抱的。

入春以来，户县市场管理工作中，曾有过几次大收，包括馍、肉、蛋等。其结果，除了引起群众一片怨声，进一步

加剧了市场供应紧张情况外，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并且在所收东西（馍、蛋、肉）的处理上引起群众的种种怀疑和不满。

一〇、烦琐的哲学

据说毛泽东主席把“农业社”（后改为队）每年制定的“三包方案”称之为“烦琐的哲学”，也正因为这部哲学过于烦琐，现在已决定不再采用它了。然而放眼看来，我们工作的各项措施和方法，可称之为烦琐哲学的，倒不仅限于三包方案。这里试举一、二件小事谈起。

今年二月间，给我队的鸡蛋派购任务是十八斤，所辖生产队九个，每队平均二斤，将任务落实。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所做具体手续如下：①供销社同志送来红糖九斤，②大队向各队下达派购鸡蛋任务，并通知把蛋送到大队。③因蛋价低，社员售蛋不踊跃，组织干部做思想动员工作。④大队干部称收各队交来的鸡蛋，并按规定，每斤蛋付红糖半斤。⑤供销社按每斤蛋奖售半斤粮的规定，又送来包谷 9 斤，并叮咛发给各队。⑥按糖、粮、蛋各自计价，并向队找补价款。⑦大队通知各生产队领取奖售粮——包谷一市斤——又领找价九角八。⑧各队原来所交鸡蛋，有的来自社员各户，各户所得粮为几两几钱，款为几角几分，逐户称粮点款。⑨大队分粮、糖中或多或少总有损耗，书写证明财务队长签字，再作帐务处理。⑩完成任务过程中，无论蛋的交纳，糖、粮款的领取，须催逼再三，令人大害头痛。

以上收购十八斤鸡蛋的手续，看来是够烦琐的了！而目前这种烦琐并不限于我队，也不限于鸡蛋收购一项。

另外，在“计划供应”中，有过这样一回事：供销社给我大队配套了带碱煮青颜料六包计六市斤。全大队二百八十六户，每户平均二分多些，如何分配呢？十分作难，谁家需要就给谁家吧，其实谁家都需要。既想不出妥当办法，又不敢叫群众知道，怕闹出纠纷，只好暗里一户一包分配给认为“需要”的个别户（其实这是不合理的，但又无法合理）。

关于鸡蛋收购问题，我曾向供销社收购蛋的一位同志说过，你们门市部如果用自由市场或稍高于自由市场的价格收购鸡蛋，不但手续简便，而且收购率将会数倍提高。如果认为高价赔本，何不高售、高购？这样以高对高，虽高何妨？这位同志答：有理。

关于以高对高的办法，其好处还不仅止此而已，内中还包含着通过价值法则，鼓励养鸡取蛋的积极作用。而所出售的东西，又会为最需要者购之。以上所举仅一、二例，然而“一叶知秋，异地皆然。”

——双程轨道

双程轨道，车可对开，东来西往，互无妨碍。如双轨交叠，则相与冲突而互为路障，甚或撞击而两车俱伤。再者，车之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循环无息，设无东来之车，西来之车可尽，无西往之车，东来之车可竭。

借用上述比喻，说明民主集中制中，集中上去与贯彻下来，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颇为适宜。按：广大群众的意志是通过集中那条轨道集中上去的。集中上去的意志，经过加工整理，作出决议，又通过统一领导的那条轨道贯彻下来。这个一上一下，有如两套列车沿着各自轨道，相对而开，而互无妨碍。当群众意志与现行政策哪怕是当时正在特别强调执行的政策发生矛盾时，必须保证群众意志尽快的向上集中，从而让现行政策中，可能存在的偏差，及时得到纠正。同时现行政策未经上级指示，不能任意改变违犯统一领导的原则，不然现行政策压住群众意志，不能舒畅的向上集中，群众意志顶住现行政策，使之不能正确及时的向下贯彻，这就成为双轨重叠，两车对开，中途相遇不避，两撞俱伤了。如果群众意志，能够广泛及时而正确的集中上去，进而才能有及时的切合实际的政策贯彻下来，更能不断的集中上去，又不断贯彻下来，那就形似对开之车，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回转不息。进而言之，群众的意志如果停于下，则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泉源，就会竭于上，故曰：无西车之来，东来之车可尽，无东来之车，西去之车可竭。此为因果交应，互为渊源。

从以上情况看来，群众意志能否广泛、正确而及时的集中上去，是能否正确制定与贯彻政策的唯一关键。于是广开思路，调查研究，重视群众反映，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就显

得万分重要了。

以下再就一部分人对民主集中制的社会问题，简单的谈谈。听到有些人说，我们是民主的，也是集中的。又有人说，我们不能光讲民主，民主还有个集中制呢！从字面上讲，他们倒像没有说错，但从他们对民主集中制的真正领会程序方面去了解，就会觉得他们的认识是很错误的，他们把民主与集中两个概念对立起来看待，认为民主与集中，就是一半民主，一半集中（意为集中就是专制——不民主），或群众作一半主，干部作一半主，或者既不是百分之百的民主，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集中（即专制）、而是民主与集中（专制）简单结合，或折衷并容。显然这种认识，是十分谬误的！应该知道，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就人民民主而言，我们的民主是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通过高度民意集中，体现出真正的民主，因之民主与集中，两者是互相关联表里为一的，不能当成两个对立的东西去看待它！

一二、提建议有感

两三年来，先后提书面建议多次。建议内容，有为国家政策，有为情况反映。发送单位十六（各级党委），份数计三十一，园（圆）满作复者五，泛泛回复者六，余皆挂号回执而已。

对此虽然遗憾，然一转念间，亦不甚介意，而最可令人深思者，信之不复，封群众建议之口，复之潦草，冷人民热

爱集体之心，何言密切党群关系，对此之作岂可得乎！又次，气可鼓而不可泄。实泄也，非鼓也！按调查研究，旨在材料汇集，借作政策研究之依据，今材料送上门来，而又漠漠然置若罔闻，忙乎？重视不够平？究何属！不得而知！仅此提出，引起注意是幸！

后记

“前言”一节，尚有余意未尽，兹随释于后：

（一）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有的同志说：三座大山推倒，革命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任务就算完成了，从此以后，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了，我觉得这中间并不存在什么问题，就以第七节中所提的把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说成是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也是可以的。

（二）第二节中，“濒十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数语，是否有分量过重之处，经考虑再三，确认无偏误，不欲掩耳盗铃，欺人自欺，终于如实表述如上。

（三）第六节中，劳动致富、生产发家两句话是解放后合作化前，我们所提出的，但就目前农业牛产水平看，“老话重提”，还是很适用的。

陕西省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

党员　杨伟名　贾生财　赵振肉

1962 年 5 月 10 日

后记

一、关于“法”

我没有许多报告文学同行那么好的运气，可以踏踏实实地打死老虎，然后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从容不迫安安全全地解剖一番。我碰到的大多是活老虎，大多是景阳冈上死缠烂打的局面。数年来，我都陷在大大小小的官司里欲罢不能。找我的人和找我的事，大多数涉及法律问题，法律无能为力才找的我，事情到了撕破了脸皮破釜沉舟的地步才找的我。因为，找我意味着舆论干预，意味着没有退路的公开宣战。他们是冲着我的笔来的。然而，我也是“套中人”，与我的所有当事人那样，无时不生活在藩篱与枷锁之中。我这支笔的活动空间也是非常有限的，不可能天马行空。而且，对手个个不是等闲之辈，等闲之辈干不出种种违反常理违反常规违反人性的事儿来。更多的时候，对手是一个军团，一个千丝万缕的强大体系。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对付一个由各种共同利益集结起来的军团和强大体系，便是堂?吉诃德，顶多是堂?吉诃德小组。我们的立场，是公众立场。我们的合法性基础是公众利益，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第四种权力”。我们手里的武器，一件是公理，一件是法律。但是，我们的对手往往不认公理，不认法律，执法犯法，徇私枉法。这样的局面，经常使我们的武器软弱无力，使我们的行动平添几分不合时尚的黑色幽默。但是，正如一位我所尊敬的人所说：“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几个堂?吉诃德。”当然也需要几个堂?吉诃德

小组。“社会需要”可能就是堂，吉诃德存在的全部理由和价值。

所以，像以往那样，这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对于案件，对于包括作者在内的所有当事人，都没有结局，更不要说满意的结局了，这又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这让我想起了湖南娄底阴雨绵绵的天气。

1993年我先后在《当代》上发表了报告文学《以人民的名义》及其续篇《讨个说法》，从发表作品到最终解决问题，用了近三年的时间！当时我说：“我将用连续报告的形式，来揭示娄底非法拘禁人民代表案件的全部过程。”事态的发展正如我所预料。人民代表颜跃明被非法拘禁214天以及我后来的调查连同发表作品后公开与私下的较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娄底事件”。《以人民的名义》的结尾我这样写道：“2月24日凌晨，寒流来了，漫天都是雪片。我们匆匆赶路。我在风雪中与饱经磨难的娄底城告别。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较量并没有结束，我还会回来，无论是怎样的结局我都会回来。我相信，我还会为我这篇报告文学写一个可能是悲剧可能是喜剧，也可能是悲喜交加的长长续篇。”到年底，我续篇的结尾却更加令人失望：我“只能告诉人们，惩恶扬善、伸张正义、因果报应、出口鸟气的好莱坞式结局，在生活中，往往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和美丽的期待”。

这样的结局，对于怀着良好的愿望和美丽的期待的读者

无疑是一种嘲弄和蔑视。《当代》编辑部也认为这样的结局不是“结局”，无法向读者交待，颇人道地想等出个好的哪怕是稍许说得过去的结局来再发“续篇”。《当代》不仅是想给法律和颜跃明一个尊严，更想给读者一个尊严——不至于让读者太绝望，太窝囊。但我说：“没有结局不正是最好的‘结局’吗？”于是，《讨个说法》发表。

这还不算完。湖南组织反击。战场从湖南转移到了北京。众多湖南要员居然与匿名信作者沆瀣一气，对我进行诬陷，公函满天飞，以地方党政组织的名义罗列罪状，足以置我于死地。接下来便是对我的调查。我不得不致信湖南省委书记，言：我做好了被起诉的一切准备，可以在你们指定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出庭！当然，他们没有这个勇气。他们除了“大事化小”的黑匣子策略外，除了匿名信作者提供的子虚乌有外，除了被揭了疮疤的仇恨心理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端到台而上来说。

北京新闻界连袂应战。最后，湖南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正式承认：新闻舆论监督对解决娄底事件起了积极的作用。被害人颜跃明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加害人受到了应有的处分，虽然处分结果不能令人满意。

“娄底事件”划了句号。用三年时间划了一个句号！

与“娄底事件”比较，“任亚非事件”更加棘手。

颜跃明行使人民代表权力，提出罢免市长案，几乎送了

命；重庆市海外集团总裁任亚非没想到他主持收购重庆针织总厂的性质是私营企业收购破产的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第一例，也没想到他向纪检部门和司法部门举报一些党政官员受贿动摇了刚刚搭起来的重庆高层政治结构，以致各种政治力量联手将他送进了监狱。

这是 1996 年初的事情。

1994 年底任亚非便有预感。那天深夜，好大的雨，雨点儿砸在地上，整个山城“噼啪”作响。任亚非对着录音机录下了他所掌握的证据，并把相关的证据材料一式数份藏好，以防不测。窗外雷电交加，任亚非的语调缓慢而沉重，情景悲壮。本来他可以一走了之，但是他不走。他固执地认为“不至于那么黑暗”。当然，他也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否则他不会害怕“突然消失”而录下自己的“遗言。”

任亚非在劫难逃。他以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被判刑 15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根据我所掌握的证据，任亚非案纯属冤案。他判刑后，我写了报告文学《在底层》，发表于《中国作家》1996 年第三期。《在底层》实际上是以底层人的生活为线索，描述了底层人生存的人文环境，彻底打破长期营造起来的“当家做主”的虚幻景象，从“天上”回到地下，进行生存自救。“自救”是改革 20 年乃至 21 世纪中国基本的时代特征。

报告文学发表后，即在海内外引起了反响。这篇报告文

学以沈阳下岗职工为线索，采取了单元逻辑结构，多主题叙述。由于没有采取某个人物或某个事件为依托的叙述逻辑，搅乱了读者的阅读习惯。我有两个考虑：一是文体。我不希望重复我已经使用过的文体。我必须在一种新鲜感里写作才可能产生愉悦，才可能产生创造的激情。我的《乡村八记》曾经做过这样的冒险。二是写作环境和内容的考虑。我必须把一些我认为必须写的“干货”撕成碎片，由读者去费些力气，拣回来拼接。我承认，这种写法，有点儿得罪读者。我的作用，是为合理的拼接提供一个潜在的逻辑。这种“单元阅读”的方法，为我提供了一个空间，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空间。为了这个空间，我不惜冒险，不惜失败，不惜破坏已有的报告文学审美习惯。因此引来了“好得不得了”和“糟得不得了”的评论。

当然，“任亚非事件”是我叙述的主要单元。

我敢于冒“为犯罪分子鸣冤叫屈”的风险认定任亚非冤枉，主要有两条理由：第一，海外集团的企业性质，是本案的要害。海外集团是一个由任亚非出资、挂靠市统战部海外联谊会的假集体企业，即所谓的“戴红帽子”，这是《公司法》未公布实施前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全国这类“假集体”、“假国营”企业何止几十万家；第二，任亚非举报贪官污吏，按照相关规定，他是举报人，应该受到保护，现在不仅没有受到保护，反而受到了残酷打击。

前者涉及“产权”，后者涉及“政治”。政客利用海外集团产权不清、前期运作不规范的情况，操纵司法，对任亚非进行打击报复，这一点确凿无疑。原重庆市委书记和一位了解内情的副书记后来也支持这一看法。因为他们知道，由于任亚非举报带来的风波，是用“大事化小”的政治办法解决的。但是在解决的过程中，没有遵循政治“游戏规则”，妥协与平衡的规则。一位副书记说：“这种处理结果，对任亚非太不公平。”这位副书记所说的“公平”是政治“游戏规则”里的“公平”，离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公平”相去甚远。结果是弱肉强食，贪官污吏这边放了一马，举报人任亚非却锒铛入狱。

政客操纵法律得心应手。于是，任亚非的“产”便被“共”了。政府派出的接收大员坐进了“奔驰 320”，企业自然被搞得一团糟。司法者的角色也很尴尬。我晚上到临江门吃夜宵，碰上主办任亚非案的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此公借着酒劲儿，毫不忌讳记者和任亚非的律师、任亚非的妻子等多人在场，极其生动地描述了一个事实：“这件事是上面阋（注：‘阋’，四川方言，这里有‘笼罩’、‘迫使’、‘操纵’等义）起整的。我们没办法。我们只是丘儿！”“丘儿”，四川方言，有“丘八”之急，又引申为“跟班的”、“听喝的”。“上面”是谁？为什么要这样？这个事实说明了政客与法律的关系。

临江门外，江水挟带着万家灯火湍急东去。人们不免悲

哀和怅惘。

让咬谁就咬谁，让整谁就整谁，“法律”成了什么？颜跃明被解救出来了，任亚非还在监狱里苦苦挣扎。

介入任亚非事件，掐指一算，将近四年，还没有句号!《在底层》发表后，重庆的反击比湖南卑鄙得多，一时惹来无数的烦恼。许多不相干的机构和不相干的人借权势压人，在没有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听信地方组织一面之词，妄下结论，极尽攻奸之能事，酿出一场大风波。

如果任亚非冤案纠正，又不知有多少人尴尬。

重庆风波没了结，我便登上了咸阳故道——就是那“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的地方。就是那“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地方。

不识时务，不识时务，好端端不识时务！有朋友劝导，何必自己跟自己较劲，何必自己给自己找麻烦。逼到了这种份上，我只能直面说，如果你面对人不人鬼不鬼的武芳，你能熟视无睹吗？你能回避吗？但凡是人，都会拍案而起，痛斥禽兽！何况我的手里还握有一支笔！这甚至不是责任和良知的问题，而是人性问题。

与颜跃明和任亚非相比，武芳的命运更悲惨。颜跃明毕竟还是曾经风云了十年的“改革家”，任亚非也曾经是声名显赫的“企业家”，而武芳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孤立无援的农村妇女，总要有人帮她说话吧？法律在无可奈何的

情形下，案发三年后，羞羞答答发了言，结果是，几个月后让王二公子农业人模人样地去当省劳模、省人大代表。

与湖南和重庆相比，陕西弥漫着一种说不太清楚的怪异气氛。湖南民风强悍，重庆则带着码头上行走赤裸裸不在乎的劲头，历史上，这两块土地风云变幻，躁动不安，着实扮演过重要的角色。陕西本应恢宏大气，秦汉宫阙，大唐雄风。然而，这几十年阴柔、诡谲、虚妄之气漫溢，怎生不怪异？劣迹斑斑的人，仍在陕西叱咤风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可见是非不清，黑白颠倒。

如此背景，“法”便更加微不足道了。

一个村庄，一个退休的副市长，对当地政治影响如此之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在被害人指控、媒体曝光、中央领导人批示、司法机关复查的情况下，居然还能左右省人大代表的侯选局势，居然还有人出来为武芳案嫌疑人王农业当省人大代表出大力流大汗，担千古骂名也在所不惜，几乎如愿以偿。换别的任何一个地方，会不会有这样的局面？只是感觉这儿有些人更加没有廉耻，更加肆无忌惮；更加信奉权力，匍匐长跪，唯权是命，唯权是听。真是邪气浸淫，不忍卒睹。

我们只要把 50 年代—90 年代王保京和烽火村媒体报道编年史看完便知道，王保京和烽火村被宠坏了。主流意识形态推崇什么事，推崇什么人，便知道推崇什么风气，推崇什

么精神。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说谎话的虚妄之风毒害了人们的心灵，摧毁了人们的信念，亵读了人们的美好期待。结果就是死人，数千万地死人。结果就是失望，直至绝望。结果就是道德沦丧，斯文扫地。“法律”也不能幸免。

我们通常说，法律是人制定的，是人执行的，也就是说，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法律是冷冰冰的工具，掌握在一些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人手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无数的可能性及其后果。人有善恶之分，于是人们又制定了法律之法律，对执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恶进行防范和制裁，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面对欲望，面对权力，面对恐惧，法律之法律算得了什么呢？看来，光有法律不行，辅之以法律之法律还是不行。还应该有更高的原则来支持法律。比如公正的原则，平等的原则，自由的原则，等等。如果法律违背了这些原则，法律就要修改；如果执法者违背了这些原则，就应该启动罢免程序。当然，在专制制度下，法律是统治者的意志，法律的支持系统是强权。朕即是法。

现代法律，我想，应该有一个社会公认的理性准则和尊重法律的社会氛围来维持，否则就是一堆废纸，断难维持公正。法学界说：为什么重思辨的希腊精神和重法律的罗马精神没有在中国社会出现？这是个文化问题。这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态度有关。传统中国，基本上是个伦理国家，社会保护机制中，伦理的功能远远大子法律的功能；法律维

持的仅仅是现实秩序，而不是形而上准则。甚至历史上就没有出现过现代意义的法律。直到二十多年前，中国的法律还是不能保证国家主席人身安全的“法律”，还是拿刀割断张志新脖子的“法律”。

近二十年，中国社会匆匆忙忙走进了市场经济，生生地要把一锅夹生饭煮熟。人们痛切地认识到无法无天、以权代法乃社会罪恶之渊源，于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加紧立法，并且成效显著。90年代称“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但是，谁部知道，中闰社会离“法治社会”还有很远的距离。原因起码有两条：一是制度，二是伦理。都不是吹糠见米一蹴而就的事儿。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不完整，市场经济应该是以一整套伦理规范为背景的法治经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与其说是一套经济制度，不如说是一套人类普遍认同的伦理价值体系。这套伦理价值体系的核心只能是“公正”。我们的麻烦在于旧的伦理体系破坏了，新的伦理体系又没有建立，司法制度设计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于是在很多坎节儿的时候，法律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了空中楼阁，成了权势者掌中玩物，成了仅供观赏的花瓶。把人家的法律精神（注意：不是“法律”，而是“法律精神”）移栽到我们这块土地上，假借雨露阳光，吸收本土肥力，长成一棵健康的大树，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

提供这么一个“法”的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颜跃明、

任亚非、武芳的命运了。

这让我想起了一幅佛家的对联: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不了了之”谈何容易,“非法法也”姑妄听之。

二、关于“记录历史”一个村庄发生一起刑事案件甚至一起重大的刑事案件,没有什么了不起,任何一个村庄都有这种可能。烽火与其他的村庄不同的是,它有一个非同小可的人物,有一段长胜不衰的历史,一个人和一段历史在这块土地上营造出了一种特殊的气氛,这种气氛酿成了武芳的悲剧,居然能把如此重大恶性又如此简单明了的案件的情节和细节瞒住,并决定了武芳案的现状。仅仅把眼光盯在案件上——虽然搞清楚案件的来龙去脉是头等重要的事情,仅仅去追踪犯罪动机并对犯罪原因作出一般性的社会解释——虽然犯罪动机和社会原因的探寻是武芳案重新调查非常重要的环节,对于武芳案来说,显然是不够的。

对王保京和烽火村的历史清算便不可避免了。

王保京和烽火村发迹的历史,基本上是一个浮夸和弄虚作假的历史。清算过程中,最让我迷惑不解的是,撒了弥天大谎,一屁股屎,反而可以理直气壮地从历史走向今天,看那架式,还将光辉灿烂地走向未来。所以,对王保京和烽火村的历史考察,主要是围绕着与产量的浮夸和弄虚作假及其

政治文化背景展开的。

当地人印象深刻的是1958年“大跃进”，王保京大会小会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小麦15万”。除了烽火人，当地一般人并不知道奠定了王保京和烽火村政治基础的两次虚假产量：1952年玉米丰产地亩产玉米1200斤，1954年亩产玉米1500斤“零十二两”；不知道王保京的署名文章中声称可以亩产粮食240万斤。在那荒诞的历史断面里，农民领袖要在政治台面上立足，受到当权者垂青，要害不是提供一系列说法，虽然关键的时候提供说法也很重要，要害是“产量”。注意，不是“丰收”，而是“产量”。“丰收”的含义清楚，而“产量”可以有歧义。“产量”后面再跟上“科学试验”，便可以蒙人唬人，便可以产量高而不丰收了，便可以永远在一亩三分地里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精神）生产（物质）双丰收了。科学试验，“科学”穿着神秘的衣服，“试验”又装扮成了一系列不确定性的模样，解释起来，进可攻，退可守。

这种把戏蒙农村人不行，蒙包括记者和作家在内的城里人绰绰有余，当然，有些记者和作家不是被蒙的无辜者，而是怀着不同的动机自愿加入了蒙人帮闲的队伍。产量高才会丰收，他们之间有牢不可破的逻辑关系。官员们天天教农民们如何种庄稼的时候，经常出现两个概念：一是“提高单产”，二是“增加复种指数”或“增加复种面积”。就是为了提高

产量，“夺取粮食大丰收”。王保京和烽火村最精妙绝伦的经验，是长期把“产量”与“丰收”的逻辑关系截然断开，或者是在媒体上混淆这两个概念，即使不丰收，也能获得荣誉，也能获得社会的普遍尊重。许多农民出身的官员绝对清楚里面的诀窍，不点穿罢了，各取所需罢了。

这是一场聪明人的聚会，一场聪明人的交易，一场聪明人的默契。

烽火村自助餐开始了，人们端着盘子各取所需，川流不息。烽火村自助餐丰盛而长久，是一桌场面浩大的流水席，从 50 年代一直吃到 90 年代。

“产量”是烽火村政治含金量很高的关键词。考证烽火村的产量“纪录”构成了本书主要特征。跨度整整 45 年，近半个世纪！产量就是一系列数字。我以往对数字充满了厌恶。然而，当我进入烽火村的数字世界时，内心充满了发现奇迹般的快乐。每一组数字仿佛就是一组会说话的历史画面。一个个阿拉伯字母仿佛就是一个个絮絮叨叨的小精灵，不厌其烦地给你讲述过去的故事，给你一页页翻开真实的历史。亩产粮食 240 万斤的豪言壮语便非常隐蔽地埋在了 1958 年王保京一篇署名文章的尾巴里。《陕西日报》的编辑也算是没昏了头的高手，既不张扬，也不得罪浮夸的时代，便那么冷冷地处理了。看得见就看，看不见就算。要是有人叫真儿，说陕西人“保守”，便可出示证据反驳：“保守？我陕西

人浮夸全国第一!”换了湖北、河南、河北等浮夸风厉害地区的报纸便可能大炒特炒，便可能出现这样的标题:

“青年农民科学家王保京说：粮食亩产可达 240 万斤!”

《烽火春秋》的作者对数字也相当敏感。《烽火春秋》的考证具有颠覆性：1952 年玉米亩产 1200 斤“纪录”不确，只打了 800 多斤；1954 年玉米亩产 1500 斤，可是玉米过秤时“不干”。作者显然对当时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了如指掌，对烽火村的情况了如指掌。我的调查考证与《烽火春秋》结论基本吻合。

后来，我甚至把枯燥数据的考证过程并在书中展示考证过程当作了审美过程。这种做法对于一些读者来说是非常残酷的。读到这些数据时，没有耐心的读者完全可以跳开。

历史线索便这样连接起来了：从 1952 年玉米亩产 1200 斤到 1995 年产值和税收弄虚作假，互助组，合作让，人民公社，反右，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中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批投降派、学小靳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我们发现，烽火村的历史像一个发育完整延续性极好的地层剖面，每个时代层面都能找到烽火村的“标准化石”。

我敢断定，这是独一无二的。

在如此大的历史跨度下解剖一个村，由一个村的历史进程来看一个社会的历史进程，通过一个微观点的考察，“一

叶知秋”，来把握和描述整个社会历史演进的过程，难度可想而知。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社会力量的介入，乡村社区生活的延续既是一个超稳定的静态复制过程，又是一个口授心传的过程，事过境迁，以往的社区生活痕迹渐渐淡忘消解，最后便丢失了。烽火村不同。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检索了《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陕西日报》三家报纸，结果令我大吃一惊：好生了得！

我们要感谢王保京对政治的敏感和对媒体功能认识的早熟，更要感谢媒体近半个世纪对烽火村坚持不懈的关注和宣传，这种关注和宣传依年代在我们面前展开时，白纸黑字，很容易把我们带进烽火村几十年的生活，使我们可以能见度很高地观察烽火村的历史。所以，为王保京和烽火村建立一个“媒体报道编年史”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我认为，这部“王保京和烽火村媒体报道编年史”是本书有机的扩展和补充，为文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研究和认识烽火村提供了可能，也为认识特定时期媒体的社会功能提供了可能。也就是说，我把报告文学的文体和社会功能有意识地扩展了。工作量巨大，但是值得。

这涉及到了报告文学界长期模糊不清的一个问题，即作为非虚构文体的报告文学首要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在我看来，首要的社会功能与新闻一样，是“记录历史”，选择历史和社会矛盾最激烈、分量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现象、事

件或人物来记录历史。这是由非虚构文体的真实性原则决定的。真实包括情节细节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台湾把报告文学叫做“报道文学”，就是用文学的眼光和方法报道新闻事实，比“报告文学”的定位更准确。首先是“报道”，其次才是“文学”，“文学”的余地非常有限，“文学”的价值非常有限。不能本末倒置。任何打着“文学”的幌子玩儿虚的玩儿飘的，哗众取宠，任何打着“主旋律”的幌子回避矛盾回避现实的闪烁其词，都可能严重损害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都可能严重损害报告文学的社会批判精神，从而失去现实和历史的价值。不能想象，一个作家离开了中国社会多灾多难的大转型大变迁背景进行写作能写出什么样的东西来。

我们不能离开我们的生存处境写作。

我们不能避重就轻环顾左右而言他。

我们应该是也只能是历史的一部分。

三、关于本书中的几个人物

1、杨伟名

今天，我还为发现了杨伟名而激动不已。那天晚上，我阅读《陕西省农业合作简史》。我与杨伟名相遇了。我们似曾相识，神交已久。我感慨万分，夜不能寐。从此，我与任何一个进入我房间的人谈论着杨伟名，谈论着阅读《一叶知秋》（《当前形势怀感》）的感触，不管他或她有没有兴趣。李锐先生说：中国共产党中产生了顾准，应该是党的一个安

慰。套用这句话，陕西 60 年代产生了杨伟名，应该是陕西人的一个安慰。这还不够，应该是中国人的一个安慰。

一位朋友看完《大国寡民》原稿后说："整个民族应该向杨伟名致敬！杨伟名的意义甚至超过了顾准。"

我们知道，顾准是一位在黑暗中探索真理的思想家，他在 1956 年提出计划经济也要遵循价值规律；他从希腊城邦制度入手考察了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起源，提出了至今还是尖端问题的政治"多元化"问题。他是一个去世了 30 年后才被人们逐渐发现的思想家。

顾准是共产党内高层的知识分子思想家。他了解体制，是体制的创立者之一，是体制内罕见的保持了独立思想品格的高级干部，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杨伟名则是底层拔地而起的思想家。他出身卑微，只读过三年私塾，有过短暂的基层政权从政经验，然后回乡务农。他的出现是个谜。我们现在还不能深入地了解他的生平和思想发生、发展的轨迹，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叶知秋》。这就足够了。我们在《一叶知秋》可以看到他的生存环境，可以看到他探索真理、坚持真理的勇气，站在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的土地上直面现实，毫不躲闪毫不隐讳地揭示重大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其真知的见，足以与顾准交相辉映。我想，任何一个了解历史背景并有判断力的人，读了《一叶知秋》，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杨伟名如同布鲁诺，把生命

压在了思想的天平上。这是在黑暗中探索真理的思想家的共同命运。思想家的孤独，为世俗社会所不容，经历一个轮回，又为社会所认识，是人类社会一个重大的现象。

民族精神，往往不是一群人的简单集合，而是一桶水与粮食发酵后酿出的一杯酒，而是众多矿石冶炼出的一块钢坯。顾准如是，杨伟名如是。

杨伟名使我改变了对中国农民的基本看法。

历史证明，严重的问题不是教育农民，而是教育城里人。

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问题。首先，农民是中国社会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八亿人口，四亿劳动力，两亿劳动力剩余，七千万贫困，上亿的文盲或半文盲；第二，农村是中国文化的母体，无论怎样的文化定义，都可以在农村找到原点；第三，中国现代化的本质是农村的城镇化，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和非农产业的转化；第四，1949 年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经历了革命、改革、改良的过程，土地革命，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联产承包责任制……涉及问题极其广泛，人口问题，贫困问题，粮食问题，土地问题，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农村城镇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问题。每一个问题的解决或迟滞、恶化，不仅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也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后冷战时期，随着中国市场经济进程和不可阻挡的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这种影响将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直接。

谈中国21世纪粮食问题的“布朗报告”发表后，即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便是明证。不回到杨伟名的时代认识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不足以认识现实，不足以认识未来。

说到这里，必须提到一本书:《第三只眼睛看中国》。这是一部思想混乱、具有新纳粹倾向的书。书中花了很大的篇幅讨论农民问题。这位有第三只眼的人操着旧贵族的腔调，用他伪装的德国名字评论了土地承包制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端后，提出了一条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思路”:“让农民再饥饿几年”！这个思路潜藏着两个令人恐怖的逻辑：一是死几千万人或再死几千万人算不了什么；二是统购统销通过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剥夺农民近二十年，时间还不够长!

作为观察者，我没有看到应有的反应。可悲的不是出版了这么一本怪书，可悲的是知识界出奇的迟钝和麻木，可悲的是知识界由于某种狭隘的心理而失去了判断力。

2、王行兴

王行兴是个思想型的农民。从文学的角度看，他的经历最具有文学性。但是，他又是我写得最不满意的人物。他的几十本日记，我先后读了三遍。据我所知，他是烽火村最早觉悟最早反省的人。他1960年便在日记里对王保京单株高产单亩高产的浮夸做法提出了疑问。他与王保京的关系，前期采取了比较功利的选择，正是这种功利选择，使他能几十

年存活于烽火村的权力核心里，逼近地了解和观察王保京，给我们留下极其珍贵的几十本日记，为我们认识王保京和烽火村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他是内向的，他的全部丰富性在于他充满矛盾的心理活动，而大量的心理活动描写是非虚构文体最忌讳的。他的特点是善于归纳总结，不善于讲故事。而我不需要归纳总结，而是需要故事。虽然他已经给我提供了大量的故事，但远远不够！谈话，谈话，夜以继日地谈话。我已经把他挖掘得精疲力竭了。

3、郭裕禄

由于叙述逻辑的原因，郭裕禄的展示和分析还不够充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农民。他的文化比王保京高不到哪儿去。他的身上弥漫着乡土的智慧和幽默。他的简历带着浓郁的旧时代痕迹。他身兼四任：袁家村党支部书记，袁家集团董事长，礼泉县委副书记，陕西省委委员。除此之外，他还是党代表，全国劳动模范。他当县委副书记，与其说是一个职务，还不如说是一个荣誉。他这个县委副书记可以不坐班，因为社会活动频繁，村里还有一摊事。县团级干部按规定只能坐“桑塔纳 2000”以下级别的车，但他坐的是“凌志400”，而且谁还说不着什么，因为他同时还是村党支部书记、乡镇企业家，车是村里花钱买的，县上只报汽油钱。70 年代，80 年代，他在礼泉政治斗争中处于下风，无官一身轻，全付精力搞经济，远远超过了烽火村。现在反倒一身累赘，招了

许多说法。权力可以给人带来好处，使人趋之若鹜；然而，权力也是陷阱，也是希腊神话里会唱歌的女妖。他面临着选择：要么彻底告别过去，集中精力发展袁家经济，使袁家集团向现代企业迈进；要么满足现状，厮守过去荣誉带来的利益格局，被别人赶超过去。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局面并正在作出选择。

四、感谢

严格地讲，这部书不是我个人的作品。我的采访写作得到了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帮助。很多支持和帮助过我的人士至今不曾谋面，至今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还有一些支持和帮助我的人士，出于种种考虑，我不能披露他们的名字。所有这些人士的支持和帮助极大地鼓舞了我。

在北京，一些作家、评论家、学者和朋友分别阅读了我的原稿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修改意见，他们是：刘方炜、秦海、韩毓海、阎石、周政保、李书磊、刘晓宇、牟鹏。我还要特别提到一位陕西农村青年，他通读了原稿，充任了我的陕西方言顾问。

律师张思之前辈、傅可心小姐的职业精神和正义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童心未泯的“老先生”，一位“可心可爱”的小姐，不仅在法庭上给我提供了法律支持，而且还在平时的合作中给我以美好的回忆。他们从法律的角度通读了原稿并提出了意见。

我所供职的中国青年报社的领导和同事给予了我最大程度的理解和支持。报社作为“名誉侵权案”第一被告，敢于承担责任，全力以赴维护舆论监督的尊严。

本书责任编辑和终审、中国电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汉涛先生以极其严谨的态度逐字推敲，认真考证，促成了本书的出版。担任复审的秦赞女士，还有朱彦玲女士，也对本书作出了贡献。

在此，谨对以上人士，一并鞠躬致谢。

书中内容和观点由我负完全责任。

卢跃刚

1998年1月23日凌晨5：20分